

罗莎·卢森堡

——生平和思想

程人乾 著

167

人 大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程人乾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

ISBN 7-01-001945-2

I. 罗…

II. 程…

III. ①卢森堡, L.-生平事迹②卢森堡, L.-思想-研究

IV. K83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00102号

罗莎·卢森堡

——生平和思想

LUOSHA LUSENBAO SHENGPING HE SIXIANG

程人乾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 224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 7-01-001945-2/K·433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在20世纪人类文明史的丰碑上，镌刻着一位杰出女性熠熠生辉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她像一颗璀璨的巨星，在20世纪群星灿烂的天幕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在国际革命运动史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不朽的贡献。

卢森堡(1871—1919)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伟大的女革命家和女理论家，她的革命实践活动尤其是理论研究是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列宁曾称誉卢森堡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①、“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②、“伟大的共产党人”^③。列宁还曾指出：“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④

往事如烟，但列宁对卢森堡的称誉和评价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卢森堡是一位富于独创性思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跨越世纪、跨越时代。在人类社会从19世纪向20世纪更迭的年代里，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在无产阶级从积聚力量到开始直接冲击资本统治的转折时刻里，当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变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6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447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443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454页。

化、新特点，要求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发展时，卢森堡是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的。卢森堡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党纲的制订者；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理论领袖，也是波兰共产党的奠基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国际多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人，一些革命决议的起草者；又是德国党校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课的教师；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种思潮连绵不断的、令人目眩的理论论战的左派旗手。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非凡的才智和惊人的学习毅力，使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有着广博的知识和精深的研究，使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的理论家、帝国主义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者之一。她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著，除一些篇幅较大的著作外，还有数达几千篇的论文、政论、札记以及大量书信，总的说来是马克思主义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尽管其中也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错误，但更多的是启迪和智慧。

卢森堡还是一位反对资本统治的无畏战士，是脚踏实地、不断探索前进的革命实践家。她视野广阔，跨越国界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掌握波、德、俄、英、法、意6种语文的她直接参加波兰、德国、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对国际事务尤其是英、法、意的革命问题有着广泛的了解和积极的参与。她还高擎反对殖民主义的大旗，支持被压迫民族受侵略国家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无反顾地反对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卢森堡作为波兰、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和整个第二国际革命左派的领袖，20多年如一日驰骋于国际革命舞台，如此宽广的革命实践活动，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她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反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包括自己营垒内的背叛者和动摇者。把

自己短暂而火热的一生，最后连同生命一齐无私地奉献给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卢森堡还是一位少见的、多才多艺的革命家。她不仅信念坚定，斗志旺盛，而且激情满怀，想象丰富、胆识出众、才华横溢。她既有诗人那种细腻敏感，观察入微的气质，又有政论家那种气势磅礴、横扫千军的雄浑笔锋，也有雄辩家那种汪洋恣肆，感人至深的讲演口才，还有思想家那种高瞻远瞩、善于剖析事物本质和预测社会发展趋势的历史洞察力。卢森堡还是一位难得的文艺学家。她不但大量阅读文艺作品，爱好音乐艺术，还自己动手写诗作画搞文学翻译，还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文艺评论。卢森堡还怀着浓厚的兴趣涉猎了数学、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可以这样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众多的革命领袖人物中，像卢森堡这样全面发展的，集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理论家、勇敢的实践家、优秀的演说家、卓越的政论家、热心的教育家、出色的文艺学家于一身，而且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极为罕见的。卢森堡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曾说过：“……广泛的兴趣·内在的和谐，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具备的，至少是应当朝这个方面努力的……。我想，正因为是一名政治战线的战士，恰恰应当努力做到高于寻常的生活，否则他就会陷于琐事，我这里当然指的是伟大的战士……”。卢森堡不平凡的一生，证实她自己正是这样一名伟大的战士。

伟大的战士还必须有宽阔的胸襟和高屋建瓴的气势。卢森堡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直言快语，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敢于冲破前人的思想樊篱，尽管有时也不免有误，但她一旦认识到了，就勇于改正。她在德国共产党建党大会的纲领报告中曾说过两句至理名言：“没有比幻想更损害革命的了。没有比明确地、坦率地说明真理更有益于革命的了。”她还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追

求新认识的世界观。它不是僵化的，令人生厌的，一次性有效的形式。它利用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在历史的电闪雷鸣中最出色地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她按“社会主义的方式去相信它”，而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去思考。”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她一生在精神上是独立的，人格上是高尚的，不碌碌随波，不唯唯苟合，超脱了世俗的毁誉和名利。在艰难困顿的环境中，她奋斗不息，那怕尘埃蔽天，信念不移，那怕荆棘遍地。不论是阶级敌人的当面迫害，还是机会主义者的背后攻击，都无法阻挡她前进的步伐。恰似郑燮《题材》一诗中所比喻的，“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因此，卢森堡的英名长存 影响不衰，与其说人们被她的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和气势恢宏且有现实意义的论著所折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被她伟大的人格力量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所吸引。

卢森堡牺牲70年来，世界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也有深刻的变化，真可谓沧海桑田，变幻多端。但是，时代并没有变，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的根本任务也没有变。70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来潮和退潮，斗争的胜利和挫折，多次地、反复地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其实现革命性转折的道路和方式，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运动的渗透和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等众多复杂的问题，重新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这些重大问题恰恰是卢森堡毕生努力探索并作出了有价值的论述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尽管人们对她的某些思想理论的认识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总之，卢森堡的许多思想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黯然失色或随风而去。如同大海的潮汐受天体的引力而起伏一样，对卢森堡的研究及其评价

受社会实践的引力而不断起伏。这就是70年来世界各国对卢森堡及其思想的研究、探讨、评价之所以时起时伏、历久不衰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也是本书作者对她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理论进行新的审视、写作这本著作的出发点。

程人乾

1990年12月



罗莎·卢森堡

目 录

前 言	1
一、 故国波兰 风暴中成长	1
1. 家庭环境与童年	1
2. “叛逆的”女中学生	4
3. 出逃的风波	11
二、 流亡瑞士 磨剑和试剑	14
1. 进入苏黎世大学前后	14
2. 邂逅约吉希斯	17
3.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	19
4. 内心的独白	24
5. 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	26
6. 困难的抉择	27
三、 初居德居 改良还是革命?	30
1. 暴风雨前夕	30
2. “新兵”的锋芒	35
3.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反击伯恩斯坦主义	39
4. “米勒兰主义”的波澜	45
5. “红色罗莎”的真面目	52
6. 首次入狱	55
四、 激流中浮沉——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	59

1. 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岗位上·····	59
2. 和列宁的最初相识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61
3. 面对狂飙突起的俄国革命·····	66
4. 重返华沙与铁窗生涯·····	71
5. 《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	77
6. 在德国的第二次牢狱之灾·····	82
五、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调和还是斗争？ ·····	88
1. 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反帝斗争的实践·····	88
2. 党校任教与《国民经济学入门》·····	98
3. 与考茨基的分道扬镳 ——《疲乏战略还是斗争？》·····	104
4. 艰难的抗争·····	113
5. 《资本积累论》的问世·····	121
6. 法庭内外·····	131
7. “人应当像两端同时燃烧的蜡烛”·····	137
六、大战和炼狱——灵与肉的考验 ·····	144
1. 八月四日剧变之后·····	144
2. 第三次在德国入狱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148
3. “斯巴达克派”的领导者·····	156
4. 铁窗关不住心灵的美——狱中世界·····	160
5. 面对新世界的曙光——《论俄国革命》·····	168
七、德国十一月革命——烈火中永生 ·····	185
1. 革命初潮时期·····	185
2. 苏维埃政权还是国民议会？·····	189
3. 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7
4. 最后时刻——“革命是永存的”·····	204
八、多棱镜下70年——卢森堡评价与研究的演化 ·····	211
1. 多彩多姿的真实形象·····	211
2. 傲视“鸡群”的“鹰”——20年代·····	216

3. 风云突变——30年代·····	218
4. 扑朔迷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方研究者·····	219
5. 卢森堡的事迹与中国革命·····	221
6. 初露转机——50年代·····	224
7. “重新发现”——六七十年代以来·····	227
8. 建国以来中国的卢森堡研究·····	234
九、当代启示录 ·····	239
1. 有历史洞察力的思想——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	239
2.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辩证关系·····	244
3.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探讨·····	253
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变革的思考·····	257
后记·····	269
附录 罗莎·卢森堡生平年表·····	272
主要参考文献·····	286

一、故国波兰 风暴中成长

1. 家庭环境与童年

历史的步伐走到了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在高纬度的北国波兰，春天往往姗姗来迟，早春三月，当暖融融的春风开始吹绿地中海沿岸的时候，这里仍是冰封雪锁，一片严冬景色。

然而，比自然界气候更为严酷的是当时这里的政治气候。那是波兰国土破碎、民族沉沦的苦难岁月，是波兰人民在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这三个强邻瓜分和占领下痛苦呻吟的年代，也是波兰的工业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和工人阶级茁壮成长的时期。

在这个70年代第一春的3月5日，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罗莎·卢森堡。^①

波兰东南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在卢布林省与乌克兰交界的

^① 关于卢森堡的出生年代过去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她诞生于1871年3月5日。据波兰一些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她似乎是生于1870年3月5日，尽管卢森堡本人也自称生于1871年，但鉴于此说尚未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本书仍采用1871年3月5日说。

卢森堡这个姓氏有多种写法，卢森堡本人一般用波兰文写法：Luksemburg，后来她到德国后也使用德文写法：Luxemburg。

卢森堡的名字在官方文书中称：罗扎莉亚（Rozalia），在私人交往中称：罗莎（波兰文Róża，德文Rosa）。

地带，坐落着历史文化名城扎莫什奇、瑰丽多姿的文艺复兴式建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城中心大市场的周围。大市场南侧斯塔希茨街上有一座小巧而恬静的两层宅院，那就是卢森堡降生之地。

1873年，3岁的卢森堡随同全家迁居俄属波兰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华沙，住在市中区一所老式的砖石结构的住宅内。为什么要离开祖居之地而迁往首都呢？卢森堡本人后来从未提及此事。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父亲经营上的挫折，想易地碰碰运气，更可能的是，为了儿女们有更好的求学机会。

罗莎·卢森堡是犹太裔波兰人。她的祖辈早几代已定居波兰，在家庭中也使用波兰语，一切风俗习惯均按波兰人行事。所以，卢森堡一直认为波兰是自己的祖国。她的父亲艾略希和母亲莉娜不但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而且有相当良好的文化素养，同时还是文学艺术的爱好者。罗莎是家庭成员中最年幼的。她有三位哥哥：马克西来利安、约瑟夫、尼古拉以及一位姊姊——安娜。

卢森堡的母亲对儿女们的教育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对孩子中最年幼而且从小体弱多病的卢森堡更是关怀备至。幼儿时期，大约在1874年前后，卢森堡患了腿关节病，却被误诊为骨结核病，从而耽误了治疗，卧床将养了一年，而且造成了终身缺憾——轻微的瘸跛，即两腿长短不一。傍晚时分，母亲在操持家务之暇，在卢森堡的病榻旁，为她诵读德国浪漫诗人席勒和波兰伟大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等人的作品。在父母的熏陶下，卢森堡从幼年起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终身不渝。卢森堡是个聪颖过人的孩子，她从五岁起，就学会了用波兰文看书写字，还跟着母亲学德文。可以说，母亲是卢森堡的第一位文学和德文的启蒙老师。卢森堡还尝试自己写作诗歌，她用清秀而有力的字体把自己创作的小诗抄在小纸片上，从一个房间传递到另一个房间——给双亲和同胞姐妹传阅。她还用散文诗形式给亲戚们写信。在童年生活中，卢森

堡还为自然景观所吸引。通过她卧榻对面的窗户，卢森堡迷恋地注视着窗外迎风摇曳的树丛、跳跃啁啾的鸟雀、变幻多端的晚霞。总之，诗歌和自然景观给卢森堡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减轻了疾病的痛苦，增长了她的求知欲和观察力。

卢森堡的童年是在贫寒的家境中度过的。在她出生前后，父亲是一位殷实的木材商人。但是，随着经营的失利，家道中落。家庭搬到华沙后，父亲改而从事木器加工业。正如卢森堡后来回忆父亲时说过的话，全家就靠这个“可怜的小买卖”度日，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为了糊口，有时不得不出售衣物，甚至把卧床送到寄售处去。尽管家境清苦，家庭里却一直保持着温馨、和睦、乐观的气氛。有一次，父亲好不容易挣了一点钱，拿回了一张银行支票，准备靠它支撑一阵子。不懂事的卢森堡竟把这张“花纸头”当做引火纸点了灯。当父亲得知后，却没有责骂她，而以诙谐的口吻给她讲了这支“昂贵的火柴”的来历。这给童年时代的卢森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稍稍懂得了一点生活的艰辛，使她久久不能忘怀。多年后，卢森堡在瑞士流亡时向她的战友尤·马可赫列夫斯基讲述了这个童年故事。

卢森堡的少年时代，正是她祖国波兰遭受外国占领者恣意蹂躏和奴役的苦难岁月。沙皇俄国在血腥镇压了波兰1863年民族大起义^①以后，在波兰王国变本加厉地推行民族压迫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波兰王国的名称被禁止使用，代之以“维斯瓦边区”，并宣布处于“战时状态”，全国军警密布、岗哨林立。波兰人的任何反抗

^① 波兰在1795年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最后瓜分后，波兰人民不断发动民族起义以争取重新独立。1863年1月发动的波兰民族大起义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武装起义。沙皇俄国调集了20多万俄军进行疯狂镇压，起义者进行了1200多场战斗，英勇奋战一年多，最后被俄军镇压下去了，上万名起义者战死，成千上万名波兰起义者被处决、判处苦役和流放西伯利亚。

行动哪怕是反抗嫌疑，都会遭到严厉惩罚：苦役、流放、枪决、绞刑。卢森堡从幼年起，就常常听到父辈们关于波兰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事迹以及沙皇政府种种暴行的议论。

在这方面，卢森堡的舅舅在帮助她认识祖国波兰光荣又悲惨的历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舅舅是个有学问而且思想激进的人，他的朋友中就有1863年起义的参加者。当他领着卢森堡沿着流贯华沙市区陡峭的维斯瓦河岸散步时，给她讲解发生在这条大河两岸的英勇而神奇的动人史迹时，少年卢森堡对“维斯瓦母亲”油然而产生了崇敬仰慕之情。是啊，维斯瓦河是波兰最大的河流，它的纵横交错的干支流覆盖了波兰大半国土，如果说蜿蜒曲折的维斯瓦河像一条碧玉带，那么矗立着无数银灰色建筑物的华沙城便像镶嵌在碧玉带中央的一颗灿烂的珍珠，它是波兰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无数英雄史诗在它两岸扮演。华沙则是波兰历史的见证和缩影，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里诞生，多少次起义火炬在这里点燃。如今，维斯瓦母亲在呜咽中流淌，华沙这颗珍珠也蒙上了屈辱的灰尘。卢森堡心头感到一阵阵紧缩和抽搐。从此，在卢森堡童稚的心田里，萌发出了对祖国的挚爱和对外国侵略者仇恨和蔑视的幼芽，也使她对探究政治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兴趣。多少年以后，浪迹国外的卢森堡还不时在书信中深情地怀念“维斯瓦母亲”。

2. “叛逆的”女中学生

1880年，卢森堡进入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念书^①，那是为一般市

^① 关于卢森堡究竟于哪年上学，众说纷纭。如1877说、1880说、1884说等。本书采用1880年说，这是因为，沙皇时代的中学（或称古典中学、文科中学）为八年制，实际上也包括了小学阶段。卢森堡在1887年中学毕业，这是确凿无疑的，按八年推算，她于1879年入学，但她似乎未念一年级，所以极有可能是1880年上学。

民开设的平民中学。她爱学习,肯用功,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在班里经常名列前茅,还多次受到嘉奖。诗歌是卢森堡的特殊爱好。波兰伟大的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是她最景慕的人。

……

一起前进,年轻的朋友们!
大众的幸福是我们的目标;
团结才有力量,热情产生智慧,
一起前进,年轻的朋友们!
幸运的是在斗争中殒躯的人,
如果他倒下的身躯,
能当作他人攀登光荣之城的阶梯。
一起前进,年轻的朋友们!
尽管道路险峻又滑溜,
尽管强暴和软弱阻挡着前进,
强暴要以强暴来排除,
软弱呢,我们从年轻时就学会战胜!①

……

这是密茨凯维支成名作《青春颂》里号召青年为美好理想而斗争的诗行,也是卢森堡少年时特别喜爱的。正如她在十多年以后,在她纪念诗人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的,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富于魅力的青春热情和锤击般的节奏号召他那整个一代齐心协力去‘把腐朽的世界翻转过来’并把它引上新的轨道。于是,诗人立刻成了整个思想运动的中心,成了受到无限崇敬的对象。自然这仅仅是指青年一代无限崇敬的对象。”②卢森堡正是当时青年一代中十分崇敬他的人之一。在她后来成为无产阶级杰出革命家的生

① 译自《密茨凯维支诗选》1959年华沙波兰文版,第72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汇中，不时在其政论作品中引用诗人的警句名言。中学生卢森堡不但读诗，而且还不时写些小诗赠给亲人和同学。她还尝试把俄国和德国诗人的作品译成波兰文。此外，卢森堡还深入细致地观察自然现象，如饥似渴地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在她成年以后，卢森堡还亲切地回忆起她14岁那年向母亲炫耀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情景：“我的母亲，她认为席勒以外，圣经是最高智慧的源泉，固执地相信所罗门是通鸟语的。我那时用我14岁时的全部思辨能力和所受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教育来嘲笑母亲的天真。”此后，卢森堡终身保持了对自然科学的爱好。

文学、诗歌、自然科学开阔了卢森堡的眼界，提高了她的修养，培育了她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能力和钻研精神，也锻炼了她的写作才能，对她丰富感情和坚强性格的形成起了良好的作用。

祖国的深重灾难，严酷的民族奴役，深深刺痛了卢森堡稚嫩的心灵，她萌生了反抗意识。1884年，即她14岁那年，与俄国结盟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访问了华沙。波兰过去的王宫“贝尔韦德尔”装修一新，德皇就住在那里。在沙皇政府的授意下，波兰资产阶级人士万人空巷，在德皇途经的街道上迎候他，奴颜婢膝地向德皇表示欢迎和敬意，许多头面人物还到王宫谒见他。对此，卢森堡感到十分愤慨，写下了一首带有浓烈政治讥讽色彩的打油诗，其中写道：“……您的宫殿，我不去瞻仰；您的赏光，我视若草芥。”

那时，沙皇政府为了永久奴役和同化波兰民族，禁止在学校里讲授波兰语文和历史，甚至严格禁止学生在校用波兰语交谈，违者严厉处罚。卢森堡对此深恶痛绝。这位机伶的少女联络了一批爱国同学，组织了抗议运动，并采取多种斗争方式巧妙地对抗学校当局。有一次，在俄国教员阿发纳斯也夫上俄语和文学课时，卢森堡毫不理睬他布置的作文的框框，按照自己的独立构思，写了一首由三个段落构成的长诗，思路开阔，文字激扬，这一下可触怒了这

顽冥的俄国教员。他早就想惩治一下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学生了。于是，他故意在课堂上高声诵读这篇作文，不时停下来横加挑剔和指责，企图用威势将任何敢于独立思考和违抗行为统统压下去。面对阿发纳也斯夫的大声呵斥，全班同学都为卢森堡捏一把冷汗。卢森堡却处变不惊，镇定自若，毫无惧色，甚至面露微笑，用平静而自然的声调，充满自信地侃侃而谈，替自己辩护，振振有词地逐条反驳了这个俄国教员的无理训斥，反而弄得这个愚蠢而刚愎自用的家伙瞠目结舌，狼狈不堪。这件事立即传诵校内外，大家都很钦佩卢森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

19世纪80年代是波兰王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进展的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岁月。华沙，这座具有600年筑城历史和300年建都经历的古城也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了新兴的工业中心。它的人口也由60年代初的20万人猛增至50万人。新增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工业无产者或半无产者。早在70年代晚期，华沙就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和学生的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秘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其他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这些小组不久就被沙皇军警破获和镇压下去了。1881年，波兰革命者、民意党人赫列涅维茨基以个人恐怖行动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沙皇政府借机加强了对波兰人民的残酷迫害，但却未能阻挡波兰工人运动的高涨。1882年8月，波兰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党”（或称“第一无产阶级党”）在华沙正式诞生。党在华沙等地建立了组织并领导了多次重要的工人斗争。1883年，党的优秀领袖路·瓦伦斯基被捕入狱。翌年，继任的党的领导人库尼茨基以及200多名党的积极分子相继遭到沙皇警察的搜捕和残酷迫害，使党的力量受了极大的打击和削弱。

1885年11月，沙皇政府在华沙军事法庭上公开审判了以瓦伦

斯基为首的29名“无产阶级党”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瓦伦斯基被判重刑并流放西伯利亚，后来病死狱中。库尼茨基、奥索夫斯基等4名革命者被判处绞刑。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们一个个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大无畏气概，骄傲地表述了自己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惜流血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庄严地声称：“我仇视现存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学说向工人们指明了摆脱当前处境的出路，我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信奉者……”，“法官们，如果你们判处我们死刑，我将无所畏惧地死去，带着这样的信念死去，即我是为真理和正义而牺牲的。”华沙无产阶级党人审判案所表现出来的敌人的残暴和革命党人的英勇，极大地震撼了波兰社会，也在少年卢森堡的心坎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无产阶级党组织的影响已渗入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卢森堡在接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读物的过程中，初步建立了这样的信念：正是无产阶级才是最具有前途的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多年以后，在1903年发表的《纪念无产阶级党》一文中，卢森堡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纪念四位英雄的殉难日，高度评价了曾给她少年时代难忘印象的英雄形象，指出：“这四个人具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们为理想视死如归，临终还以振奋人心的、热情的话鼓舞着活着的同志们……”。^①

沙皇政府的残暴镇压使无产阶级党的组织遭到了彻底破坏，工人斗争暂时沉寂了下来。但敌人并未能长久地窒息波兰的工人运动。从1887年开始，工人运动重趋活跃。工人群众走上了华沙街头发动示威游行，他们打着红旗，举着要“劳动和面包”、要“自由”的标语牌，抗议沙皇政府的暴行。这时，在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疾驰而来的哥萨克骑兵的马刀便在空中闪起一道道寒光，伴随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13页。

着警察手中呼啸着的皮鞭，冲向手无寸铁的人群……。这就是卢森堡不时看到的华沙街头的“街景”。街头上激荡着悲壮而高亢的《华沙曲》的歌声：

哪怕风暴还在横扫大地，
哪怕敌人还将我们欺压，
哪怕明天的命运还未决定……
我们勇敢豪迈地举起红旗！

……

劳动大众今天受尽了饥饿的折磨
可恶的寄生虫们却在纵情享乐，
我们绝不作可耻的懦夫叛徒。
敌人的绞刑架前绝不畏缩！
他们的热血决不会白流，
他们的英名活在亿万人民心中。
我们前进，高唱胜利的凯歌！
华沙啊，前进！
去进行流血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正义而神圣，
华沙，前进！前进！^①

《华沙曲》炽烈昂扬的斗争激情，奔腾豪放的动人旋律，表达出来的无产阶级战斗情怀和胜利信念，连同工人群众与前来镇压他们的沙皇军警英勇搏斗的种种情景，感染和震动了卢森堡的心灵。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严酷社会现实，使爱好学习和善于思索的卢森堡打开了眼界，开阔了思路，加速了她革命世界观的形成。她在当时所写的一首小诗中，表露了对吮吸人民血汗的剥削

^① 《华沙曲》的歌词用林洪亮译文，原载《世界文学》1977年第2期。

者压迫者的憎恨之情：

……

此时此刻，纵情享乐的人们，我直想惩罚他们，
骄奢淫逸忘乎所以，
他既不懂得也不感受，为了挣带血的面包，
成百万人在苦难中煎熬。
每每想到这里，能把人刺伤呀，每张容光焕发的脸，
会使我痛楚呀，快乐的微笑，
因为，受贫穷、愚昧折磨的人们，
没有欢笑，没有乐趣，也没有酬酢，
穷人的折磨，我愿身受，
包括静静流淌着的悲伤的泪水，
对那些铁石心肠，昧心享乐的人们，
该用可怕的复仇予以回报。

……

据卢森堡的女同学雅·西科尔斯卡回忆，卢森堡的这首小诗曾在华沙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中手抄流传，激起了青年们仇恨剥削者压迫者的层层感情波澜。

1887年，也就是卢森堡临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以路·库尔奇茨基为首的社会主义小组重新开展了革命活动，并与在普占区从事革命运动的著名革命家马·卡斯普夏克建立了联系，着手重建党的组织——“第二无产阶级党”。17岁的少女卢森堡毅然许身革命，加入了“第二无产阶级党”领导下的青年社会主义小组，从事秘密革命活动。除了在校内进行革命宣传外，她还出入工人居住区，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联系。在学习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过程中，这位热情奔放同时又性格坚毅、长着一头乌亮黑发和深栗色大眼睛的少女，迅速成长为一名勇敢的女革命者。

1887年夏，卢森堡完成了中学学业。她的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绝大多数功课都得了五分，只有少数几门课包括俄语和俄国历史是四分。实际上，她的俄语很棒，俄国历史也很通晓，只是出于对沙皇制度的憎恨和蔑视而有意考差的。按照她的成绩，理应获得“金质奖章”，但由于平时她对当局的“对抗态度”而被剥夺了获奖机会。对此，卢森堡并不介意，因为她的注意力早已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吸引过去了。

3. 出逃的风波

中学毕业后，卢森堡没有孜孜不倦地追求个人前途，立即到俄国或国外报考大学，而是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第二无产阶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这位18岁的少女几乎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第二无产阶级党”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高纲领，而以在俄国实行立宪制度和在波兰王国实行自治作为最低纲领。党的领导人库尔奇茨基等人还不是成熟的革命者，他们把从民意党人那里承袭过来的个人恐怖活动作为斗争的主要策略，从而使党组织在1888年秋天的大逮捕中遭到严重摧残，一批革命者被判处绞刑，终身监禁、流放和苦役，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活跃的年轻女革命者卢森堡的名字也被列入了沙皇军警追捕的“嫌疑犯”黑名单。同志们都劝她迅速转移。在追捕风声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她不得不离开华沙隐藏到外地。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经常转移的忧患使她染上了严重的肺炎。她在农村将养了一段时日。在病情好转后，在前辈革命家马·卡斯普夏克的安排和带领下，卢森堡来到了俄国与奥匈帝国占领区交界处附近的一个名叫波翁兹克的村镇，化名安娜（实际上是她姊姊的名字），在一个挖

墓人那里租赁了一间小屋暂住，伺机偷越国境。卡斯普夏克则寄宿在近处一个熟人家里，一切均已准备就绪。

到了约定越境出逃的那一天晚上，卡斯普夏克回家收拾衣服，刚进门坐下喝茶，只见三个彪形大汉推门进来，对着他大喝一声：“不准动，以法律的名义你被捕了。”原来沙皇的暗探已经跟踪上这位革命家了。卡斯普夏克镇定自若地说道：“你们搞错了吧？”一面虚与周旋，一面寻思脱身之计。对方看到卡斯普夏克身材魁伟，不敢贸然动手，其中一人出门到警察局搬兵去了，卡斯普夏克徐徐说道：“不用等了，我跟你们走吧！”由于门太窄，不能两人并行。于是，两名警探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走出门去，刚迈出门槛，卡斯普夏克抢前一步，朝前面那个警探头部的太阳穴上猛击一拳，那人摔倒在地，卡斯普夏克似离弦之箭，飞步跑出门去。当他正准备翻越公共墓地的围墙的时刻，后面紧追不舍的警探已经赶到，抓住了他的衣领，卡斯普夏克转身一脚，把那人的手枪踢飞了，他乘机翻墙进入墓地，在一条小径边，他一边拉着等在那里的卢森堡猛跑，一边气喘吁吁地简略述说了刚才发生的惊险情景。毫无思想准备的卢森堡听后浑身哆嗦，腿也软得迈不开步了，不得已，卡斯普夏克背着她走了一阵。然后，卡斯普夏克让疲惫不堪，惊魂初定的卢森堡歇了歇、整了整零乱的衣衫，把她领到了一位乡村教区神甫沙佩尼那里，那是普斯夏克事先约好的。

神甫仔细地审视着站在他面前这位高颧骨、大眼睛，洋溢着青春气息然而显得有些心神不定的姑娘。卡斯普夏克向神甫解释说，这位姑娘是犹太裔，决心皈依基督教，想改宗后嫁给基督教徒，但又怕触怒双亲，不得不想法逃往国外。好心的神甫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妙龄少女会是一名政治上的“危险分子”。他盯着姑娘略带迟疑地说道：“既然如此，您能否答应我一件事，我才能帮助你越过国境。”“一件什么事？”卢森堡陡然警惕了起来。神甫以布道的口

吻接着说道：“您既然求助于我，也就是求助于上帝。因此，姑娘，您若到了国外，必须保证皈依基督，接受洗礼。您能做到吗？”听到这里，卢森堡才放下心来，一一答应了。

1889年年初，一个严寒的隆冬，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在神甫的安排下，一辆满载谷草的马车缓缓驶向俄国与奥匈帝国的边境线。国境线上的俄国岗哨瞧见驾车的是当地的一位老农，没有任何留难更未搜查就放行了。因为边境两侧都是波兰村民，常有往来，谁能料到，车上的谷草堆里却藏匿着一位被追捕的年轻的革命者——罗莎·卢森堡。

逃离虎口后，卢森堡转道前往预定的目的地——瑞士。

从此，这位在风暴中成长的少女勇敢地迈上了漫漫征途，萍踪浪迹。颠沛流离，在异国他乡奋力拼搏进取，与政治流亡、革命斗争、激烈论战、铁窗生涯、胜利与失败、欢乐和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流亡瑞士 磨剑和试剑

1. 进入苏黎世大学前后

1889年2月，罗莎·卢森堡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瑞士，寄居苏黎世。当时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位身材纤弱、装束朴素、目光炯炯的少女提了一个简单的行囊，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走过街头。可半个世纪以后，设在这里的国际工人运动史研究所却把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多山之国瑞士，由于自己独特的国情，是欧洲各国中远离国际纠葛和国内纷争的一片净土。风光秀丽、人文荟萃的苏黎世更是当时来自波兰、俄国、德国的政治流亡者心目中的“绿洲”——避难所和活动中心。卢森堡很喜欢这座依山面湖、满街菩提树撑着绿色大伞的城市，在她后来致友人信中称赞它“幽静、洁净、花香馥郁”。

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卢森堡来到苏黎世后，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生活来源和栖身之所。好在该市原来就是波兰第一、第二无产阶级党积极分子活动的国外基地，有许多党员和同情者仍在这里做工和居住。筹划她出逃的卡斯普夏克当时曾在该市一家印制波兰秘密革命出版物的印刷厂当排字工。他和他的同伴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凑了一些钱，供她生活，使初来乍到的卢森堡得以暂时租住民房和艰难度日。

进大学深造是卢森堡向往已久的心愿，更何况苏黎世大学是

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而且是当时欧洲平等地对待男女学生的少数几所大学之一。卢森堡就是瞄准这个目标而来这个城市的。但念大学是需要一笔可观的花费的，这对漂泊国外的这位少女来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卢森堡住在大学街79号寓所时，曾多次到近在咫尺的这所学府门外徘徊逡巡，流连忘返，仰望着典雅而宏伟的建筑群久久不愿离去，向出入校门的大学生们投以羡慕的目光。

卢森堡的精神生活并不寂寞，尽管一时未能进入大学学习。因为她参加了各国流亡者组织的一些集会和活动。这些政治流亡者的立场和观点纷繁多样，从无政府主义信徒、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直到马克思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形形色色，包罗万象。他们探讨的议题也是丰富多彩的，从黑格尔哲学、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巴枯宁、蒲鲁东、布朗基、俾斯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波兰解放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非常法”的斗争，成百上千的议题无所不谈。然而，革命及其斗争方法却是最热门的话题。刚到苏黎世的卢森堡马上就被这种活跃而热烈的探讨氛围吸引过去了。在参加讨论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活动中，她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结识了许多本国同胞和异国朋友，其中包括了德国移民吕贝克博士。

卡尔·吕贝克博士是移居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论家，学识渊博，心地善良，因患病而行动不便。他的妻子奥林比亚原籍波兰，并曾与无产阶级党有联系，是党的同情者，她热情好客，富于同情心。他们邀请刚邂逅相识的卢森堡到他家暂住，卢森堡欣然前往，在吕贝克家，卢森堡不但感到亲切融洽，而且找到了一份数额虽然菲薄，然而可以糊口的收入——帮助博士抄录整理文稿，卢森堡在和他们一家的交往和谈话中，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她尔后选择德国作为她

革命活动基地的决定奠定了感性认识的基础。但是，当时双方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卢森堡九年后竟然当上了这个家庭名义上的儿媳！

1890年，卢森堡终于得到了家庭的一笔资助，那是父母节衣缩食积攒下来并通过银行从遥远的华沙汇来的，从而使她得以实现夙愿，进入了苏黎世大学学习。她先是攻读生物学和数学。不久，她的志趣转向了社会科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无独有偶，卢森堡的这种学习志趣与同时期在喀山大学上学的列宁如出一辙。1890年秋，卢森堡注册成为哲学系的学生，此后，哲学，法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成了她深入钻研的科目。扎实的数学基础有助于她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初步接受革命洗礼的卢森堡，是不会甘心于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的。她一边刻苦攻读专业课程和外语——英语，法语和自学意大利语，一边抽空参加校内外社会主义团体发起的各种集会和讨论会。性格坚毅、思路敏捷、善于雄辩、才情横溢，又能流利地运用多种语言交谈的卢森堡，很快就在大学的莘莘学子群中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和受尊敬的活跃人物。

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活动家赫·拉科夫斯基，在后来回忆作为大学生的卢森堡时写道：“和罗莎·卢森堡，或简称罗莎，就像当时朋友们圈子所称呼她的那样，在1891年我就认识了，当时我是日内瓦的大学生……。罗莎以她非凡的智力和聪明而显得突出，这是大学生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时代。当时罗莎就领导了这种小组之一。困难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哲学问题，在她所做的报告里，讲的简洁和明瞭，她当时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了波兰和俄国革命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卢森堡不仅是青年学子推崇的人物，也是教授们刮目相看的，甚至是难以对付的对手。她的导师之一的尤·沃尔弗教授是一位知名学者，是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不同意卢森堡的观点，

但不得不承认她有出类拔萃的才华，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在课堂讨论的意见交锋中，卢森堡经常使他望风披靡，狼狈败退。

后来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安·卢那察尔斯基，当时也在苏黎世大学上学，他多年后是这样回忆在苏黎世求学期间的卢森堡的：

“狂热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沃尔弗授课时我还碰见了罗莎·卢森堡。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罗莎发生的这样的事，当她用挖苦和嘲弄的雄辩碰烂了沃尔弗的杂货堆时，他就陷入了窘境，反来复去重讲，咕咕哝哝不知所云，在使自己受惊的瑞士学生面前显得手足无措，尽管他无疑是机敏的且有非凡学识。”

2. 邂逅约吉希斯

1891年的一天，在一次气氛热烈的讨论会上。正当卢森堡就某一问题激烈争论但一时找不到有力论据而语塞时，忽然有人妥贴地列举了几个无可辩驳的论据使对方无言以对，恰如事先与卢森堡有默契相互配合似的。卢森堡感到惊讶，寻声看去，这才发现有一双目光锐利的眼睛正凝视着她。这位男青年身材中等而壮实，下颌蓄须，安稳地坐在一个角落的座位上。卢森堡心里蓦然激起了一阵异样的感情的涟漪。列昂·约吉希斯就这样突然闯入了卢森堡平静的少女生活。

列昂·约吉希斯生于1867年，比卢森堡年长4岁，在波兰工人运动中他以杨·梯什科的姓氏闻名。他是波兰东北部维尔诺市（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青年革命家，也是“第二无产阶级党”的成员。他出身于富商家庭，因参加革命活动而与家庭闹僵，到一个工厂当了钳工。他因参加反政府宣传而被沙皇当局判处坐牢一年半。出狱后仍受到“公开监视”，但他仍无畏地从事革命斗争。

为了逃避再次被捕和强征入伍，于1890年逃亡瑞士。不久，他也成为苏黎世大学的一名学生。

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相识后不久，共同的革命志趣使两人萌发了炽烈的爱情。卢森堡是这样描绘自己的恋人的：“他意志坚强、聪明睿智，然而倔强和固执。”确实，他俩的气质和性格是有差异的。约吉希斯的性情比较深沉含蓄，爱沉思少言语，精于剖析复杂的事物，而卢森堡则反应敏捷，谈锋犀利，善于开门见山地展示事物的本质。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情投意合的爱侣，而且相得益彰。他们没有沉溺于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而是在大学课程的砥砺切磋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探讨中，在此后并肩斗争的革命生涯中，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他们深知，大学生们的社会主义团体的讨论会虽然唇枪舌剑，争论激烈，有助于开阔思路，增长才干，但更重要的是实践，是以实际行动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

这样的时刻很快到来了。

自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号召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于每年五月一日组织工人的示威游行以来，五一节已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国际团结的盛大节日。在第二国际号召下，在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的组织下，从1890年起，波兰王国的华沙等地，每年都要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1892年春，侨居瑞士的第二无产阶级党的国外组织约请卢森堡撰写一本《迎接五月一日》的宣传性小册子，以便在国外印制后偷运回国在五一节前夕散发，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卢森堡欣然允诺，而且很快写成了。同志们拿来一看，原来是一部热情洋溢、铿锵有力的长诗！在同志们劝说下，卢森堡不得不改写成政论作品。在约吉希斯的资助下，这本32页的小册子在巴黎印刷装订后迅速偷运回波兰散发，在波兰工人中广为流传。

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就这样，卢森堡开始以笔作枪，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署的是卢森堡的化名——R·克鲁辛斯卡。在书中，卢森堡号召波兰无产阶级投入反对有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斗争，并与俄国无产阶级紧密合作，从而显示了卢森堡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已知的卢森堡的第一部政论著作，它以犀利明快的独特文风、富于感情色彩的精美语言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并作为经典式论著多次再版。

为了向波兰和俄国国内更多地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约吉希斯和卢森堡酝酿在国外成立出版机构。为此，有必要取得俄国革命者的合作。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由约吉希斯出面，向当时流亡瑞士的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普列汉诺夫提议，双方合办社会主义读物出版机构并由约吉希斯领导。但高傲的普列汉诺夫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对方还是个无名之辈。这激怒了约吉希斯，也惹恼了卢森堡，从此，不但约吉希斯和普列汉诺夫关系冷淡，早就和普列汉诺夫熟识的卢森堡也疏远了和他的关系。

3.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

这时，集结在卢森堡周围的波兰革命者的力量有了增强。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1866—1925)和阿道夫·瓦尔斯基(1866—1937)等人也来到了瑞士。马尔赫列夫斯基，化名卡尔斯基，是1899年在华沙创立的波兰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由于领导罢工运动受到沙皇当局的迫害，在坐牢一年多获释后被迫流亡瑞士，刚来到苏黎世，也进入了苏黎世大学攻读法学和社会科学。阿·瓦尔斯基是第一无产阶级党的成员，波兰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沙皇当局逮捕，流放西伯利亚。他从流放地出逃后也辗转来到了瑞士。为了使波兰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革命路线

发展,抵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的侵蚀,卢森堡、约吉希斯、马尔赫列夫斯基、瓦尔斯基等人展开了紧张而繁忙的创建党组织的工作,在1893年初拟订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党纲。23岁的卢森堡成了新创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7月,他们共同创办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工人事业》在巴黎创刊问世,并成为党的机关刊。卢森堡是该刊的实际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工人事业》的创刊号上刊登了卢森堡主持起草的党的纲领性文献,《波兰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这个文件把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党的最高纲领,而把争取8小时工作日、工厂立法、提高工资、争取民主权利以及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作为党的最低纲领。^①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党纲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的。但党纲是有缺陷的,即没有提出波兰独立的要求。卢森堡及其战友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重建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只能争取民族自治权,因为被瓜分国所占领的波兰的三个部分已深深地同它们在经济上溶合起来了,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解决民族问题。这种观点反映了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的偏颇认识。

1894年3月,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华沙召开。卢森堡是沙皇政府追捕的“嫌疑犯”,无法回国与会。但她仍是大会的“灵魂”,因为大会通过的党纲和党的政治路线,主要是她亲手制订和规划的。后来,这个党在1899年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卢森堡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

马尔赫列夫斯基后来在回忆卢森堡在建党前后的功绩时,曾

^① 参阅《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文献和材料》第1卷,第1分册,1957年华沙版,第3—6页。

以十分钦敬的口吻指出：“创建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理论基础的任务落到了罗莎·卢森堡的身上。当时，为给这些思想铺平道路，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罗莎·卢森堡立即表现出卓越的政论天才和光辉的理论才华。我们心悦诚服地承认她是我们的理论领袖。”

这时，卢森堡十分关注的波兰工人运动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分裂。1892年底，部分侨居国外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成立了“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还提出了“波兰社会党纲领草案”。这个纲领把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的首要目标，而且拒绝与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革命的道路去实现独立，还提出了“逐步实现土地、生产工具和交通手段的社会化”的要求，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推行了一条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路线。这样，波兰社会党就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右翼政党，为了与波兰社会民主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个党从1893年底开始在国内建立组织。这就引起了两党之间的激烈斗争，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从而造成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局面。

1893年8月，第二国际在苏黎世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波兰两个党之间的斗争转移到了国际舞台上。卢森堡被《工人事业》杂志推举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5年来波兰王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总结报告，这是卢森堡第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重要会议。但是，出席大会的波兰代表团主要由机会主义者组成，为首的是波兰社会党首领伊·达辛斯基。他们不满卢森堡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特别是与俄国无产阶级结盟共同反对沙皇制度的主张。于是，他们采取了恶毒诽谤的手段，声称卢森堡“面目不清”、“身份不明”，对她发动人身攻击。卢森堡据理力争，进行说服工作，双方仍争执不下，最后，波

兰代表团就卢森堡的代表资格进行投票表决，结果7票赞成，9票反对，3票弃权，否决了她的代表资格。只有马尔赫列夫斯基（化名“卡尔斯基”）一人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出席大会。

这次挫折并没有使卢森堡气馁。此后，在国际社会党人的各种活动场合，常常可以看到她活跃的身影，出色地阐述和捍卫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立场。正如俄国革命家卢那察尔斯基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卢森堡的“像剃刀般锋利、像银子般闪光”的发言常常使听讲者倾倒折服。卢森堡后来的女友、当时刚认识她的马尔赫列夫斯基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在这一时期，我发现罗莎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那时普列汉诺夫经常到苏黎世来，他的讲演在大学中极受欢迎。罗莎常常是他的论敌。她以其激昂的气概，逻辑严密的论证和丰富的理论学识同这个强大的论敌进行争辩。”

卢森堡是《工人事业》的“灵魂”。这份刊物在她心血的浇灌下，在波兰工人运动中声誉日隆，倍受工人群众喜爱和欢迎。她几乎独自负责该刊的组织、编辑、撰稿，甚至编排、校对、出版，还要想方设法通过沙皇政府严密检查的边境关卡偷运回波兰。为了使刊物按时在巴黎印制出版，她经常奔赴巴黎短期工作。这不仅影响她的学业，而且影响她的生活，因为得从生活费中节省一些钱作路费，何况她的生活状况本来就极为清贫。来自家庭的资助时断时续，主要靠约吉希斯的补贴过活。正如她从巴黎致约吉希斯的书信中所说的，为了节省开支，她连电车也舍不得坐，经常从寓所步行到印刷厂办事。据统计，《工人事业》从创刊到1896年的4年中，该刊竟有50多篇文章和报道出自卢森堡的手笔。她为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由此可见一斑。

工人阶级的日益发展的斗争实践，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此期间，卢森堡正处于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关键阶段。她充分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如饥如渴地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论著，加深自己的理论修养，举凡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文学和美学，无不在她探讨之列。但是，卢森堡决非钻象牙塔的纯学者。她努力铸造自己的思想武器，不仅是为了认识这个世界，更主要的是为了改造现存世界，献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她不仅关注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也重视德国、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工人事业》上，她撰写了许多通讯和评论，论述了俄国、德国两国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在她更多关注的关于波兰工人运动一系列论文和报道中，卢森堡最为强调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教育和引导工人运动走社会革命的道路。在重视当前具体斗争任务的同时，始终不忘运动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卢森堡并不否认三个瓜分国对波兰的民族压迫造成的严重恶果，即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她还指出了消灭一切民族压迫形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她极力坚持阶级斗争是首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才能最后和真正消灭民族压迫。基于以上认识，她猛烈抨击了波兰社会党，因为这个党把斗争目标仅局限于争取波兰独立，却把无产阶级的阶级使命放到了次要地位的错误立场。可是，她过高地估计了波兰王国经济与俄国经济溶合的程度。忽视了波兰争取独立的迫切性。这在她于1895年出版的小册子《独立的波兰与工人事业》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把更多的波兰工人群众争取和团结在自己周围。

早在90年代中期，卢森堡已经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国际工人运动。1896年5月她已经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刊物《新时代》、有影响的《莱比锡人民报》以及瑞士、法国等国的社会

主义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法国的可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思潮，其中包括谴责伯恩斯坦等人最早表露的支持殖民侵略的错误立场。卢森堡以她出色的政论作品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中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声誉。她的文风与那些学究式的枯燥无味、平淡无奇的“客观”叙述迥然相异，立论鲜明，文采照人。正如开始接触她的文章的德国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后来所说：“她著作的语言闪烁着智慧、充满着机智和辛辣的嘲讽，心仿佛由于抑制激动而在颤抖，显示了渊博的知识和整个丰富的内心世界。”

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卢森堡作为波兹南地区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代表赴伦敦与会。当波兰社会党的首领们故伎重演，企图以诬蔑不实之词再度否定她的代表资格时，对她已有所了解的各国代表支持了她，使妄图阻挠她与会的阴谋遭到了破产。会议期间，一位身材不高、衣着朴素的女青年，缓缓登上了大会讲台，就波兰问题发表了言词犀利的演说。人们以关切的眼光，注视着这位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的年轻女革命家。她，就是卢森堡。然而，在这篇演说词中，卢森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仍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波兰独立是不现实的。经过激烈争辩，大会没有就波兰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只是作了一般的表态：承认各个民族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决权，对处于军事专制主义桎梏下的各国工人表示同情和支持，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4. 内心的独白

卢森堡漫长的大学生涯是在交织着艰辛与奋斗的境况中度过的。从经济方面来说，她一直过着清贫的穷学生生活，来自家庭的

经济资助时有时无，而且数额微薄，须知她的家庭属于收入不稳定的市民阶层。幸亏得到颇有家资的约吉希斯的支援，卢森堡才得以勉强度日。多年后她自己回忆说，当时在她寄宿的小房内，只有一支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堆放杂物的小柜，不多的几件衣物。房租和低标准的伙食费吞噬了她生活费的一多半，吃饭时使用的是“变得乌黑的，油腻的叉和镀镍的木柄刀。”购买几本书籍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见到心爱的书刊，往往无钱购置，只能忍痛割爱，到图书馆去借阅。但是，清贫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奋进精神，对此她安之若素。她有挑灯夜读的习惯，寂静的深夜，融融的灯光，不论是严寒或酷暑，她都聚精会神地阅读或写作，那是她每个晚上的“必修课”，那是充实、提高自己的“黄金时刻”。因为白天的时间太不够支配了：繁重的功课、忙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工作，缠入的《工人事业》的事务。肚饥时，她就啃晚饭时剩下的面包片或饼干之类。夜11时半，她按时用冷水擦抹全身，疏通血脉，以保证12时前安然入睡。早晨，她6时半最晚7时起床。生活十分简朴、规律，艰苦的生活、紧张的学习、纷繁的工作和斗争，并未妨碍她热爱生活、喜爱大自然。在暑期或其它节假日、她一人或与约吉希斯一起，或邀约少数几个知己朋友，带上她的植物标本采集箱或矿石采集袋，徜徉在雄伟壮丽的阿尔卑斯山群峰或秀丽多姿的日内瓦湖畔，在湖光山色中，对大自然进行鉴赏、观察和研究，度过她难得的业余时间。

卢森堡不仅是一位坚强勇敢的革命者，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细腻的女性，在她不时赴巴黎筹划《工人事业》出版事宜和搜集博士论文素材而与约吉希斯暂时分离时，她在致其恋人的信中，除了谈党的事务和工作以外，还以简洁的叙事方式，娓娓动听地倾诉自己的感受和情怀，与恋人分享自己的喜悦，不管是大事还是琐事。例如，在一封信中，她像一个大孩子似地谈到了自己的日常起居和喜

悦之情：“我的桌子上有两个插着帕尔玛品种紫罗兰的花瓶，玫瑰色的灯罩，瓷制的新墨水瓶，绣花新拖鞋，新的面纱、新的手套、新的衣饰，我是美丽的！”真挚细腻之情，跃然纸上。

5. 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

1897年3月12日，卢森堡通过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的答辩，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大学当局的褒奖，从而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大学学业。5月1日，恰好在这个象征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节日，卢森堡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翌年，她的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在德国莱比锡出版。这是一个殊荣，因为当时她才27岁，出于初出茅庐者之手的、非德国问题的学术著作，能受到出版商的青睐，得以出版，是比较少见的。在这部中等篇幅的著作中，卢森堡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她认识到，这个研究课题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为了明确波兰工人运动前进的方向。她把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统一起来了。

在这部著作中，卢森堡有力地论证了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中肯地分析了波兰王国形成中的各派政治力量分野的社会经济原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应指出，这部书也包含有不那么正确的观点，即否定了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卢森堡认为，“波兰和俄国的经济今天正在形成为统一的复杂机体”，^①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波兰无产阶级必须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沙皇制度。她认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热情地支持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给予崇

^① 卢森堡《波兰工业的发展》1957年华沙版，第131页。

高的评价，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19世纪后期，在波兰和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和融合的情况下，如果工人运动把很大注意力集中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上，会妨碍工人阶级完成其夺取政权、为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这个根本任务。显然，卢森堡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她只看到了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过高地估计了波兰工业和俄国资本主义的融合程度，没有看到政治因素的主要作用，特别是沙皇专制制度、民族压迫在窒息波兰民族正常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忽视了波兰无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个问题曾使卢森堡困扰多年，也正是在这个民族问题上，使她后来与力主民族自决权的列宁论争多年。

6. 困难的抉择

告别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一边磨剑一边试剑的大学生涯后，思想上政治上趋于成熟的卢森堡面临人生和事业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无疑，献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她坚定的人生目标，可是，路怎么走，去哪里呢？

重返自己的祖国波兰吧，那是她渴望多年然而却是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她早就是沙皇政府缉拿的对象，而且由于她在国际舞台上的革命活动已成为一名知名的革命家，沙皇政府的秘密档案里，一直在不断增补她作为“敌视国家的危险分子”的材料。更何况她领导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当时正遭到沙皇政府的残暴镇压，国内革命运动正处于沉寂状态，假如她冒险回国的话，等待着她的无疑是逮捕和审判。正因为如此，当卢森堡在1897年秋获悉慈爱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后，虽悲痛万分却不敢回国参加葬礼。因此，斟酌再三，卢森堡不得不忍痛打消了返国的念头。

继续留在瑞士，或许是一条出路。卢森堡可以设法先找一份

工作，然后想办法获得瑞士国籍，再与约吉希斯正式结婚。^①这样，也许可以经营一个舒适恬静的安乐小窝，还可以参加瑞士和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可是，这里活动的天地毕竟显得太狭小了，无法充分施展她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抱负和才华。

经过半年左右痛苦而困难的思虑，在先期到达德国的她的战友马尔赫列夫斯基、瓦尔斯基等人的敦促下，卢森堡毅然决定前往德国。这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最有威望的党。这个党不仅拥有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培养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如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卡·考茨基，而且在工人阶级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经过严酷斗争终于取得了废除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的胜利后，党的力量和影响又有了飞速增长。其次，原波兰西部国土西里西亚、波兹南等地区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当地的工人运动也亟需波兰裔的党员去开展。这一切对卢森堡来说，无疑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此外，此时的卢森堡已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在党的报刊《新时代》、《来比锡人民报》上已出现了她撰写的文章。这也是一个有利因素。然而，到德国去，这意味着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的两地分居，因为他尚未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暂时不能离开瑞士。不仅如此，为了能在德国公开活动，卢森堡还必须设法获得德国国籍。因为外国人要在德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极为困难的，马尔赫列夫斯基就是由于没有获得德国国籍而处处受到掣制，只能搞报刊的政论工作。为此，她在1897年秋登门造访了早就熟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吕贝克及其波兰裔夫人，同他们磋商与其三子古斯塔夫进行伪婚的事宜。在他们一家慨然允诺和出具文书的

^① 卢森堡与约吉希斯的结合从未办过正式的结婚手续，原因是复杂的。客观原因是他们两人都是非法逃亡在外的俄国“臣民”，不易从官方渠道获得身份证明。

协助下,1898年4月19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卢森堡与古斯塔夫一起领取了结婚证书。^①随后,卢森堡到柏林办妥了取得德国国籍的手续。从卢森堡的私人信件和谈话看,她始终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尽管从法律形式来说,她已成为德国臣民。由于伪婚,也就取消了卢森堡同约吉希斯正式结合的任何可能性,这对于热恋中的一双情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件令人烦恼和痛苦的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秘密,为什么卢森堡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还在瑞士逗留了几乎整整一年,她经过理智的思考,排除了感情上的纷扰,最后才这样做了。这正如卢森堡后来自己所表白的:“暂时放弃个人幸福,去开创伟大的政治事业。”

^① 两人一离开市政厅就分手了,但直到1903年4月,卢森堡才正式办完“离婚”的手续,从而解除了伪婚。

三、初居德国 改良还是革命？

1. 暴风雨前夕

1898年5月16日，罗莎·卢森堡孤身一人来到柏林，以“罗扎莉亚·吕贝克夫人”的名义在这个普鲁士的首都、德国的最大城市和工人运动中心定居，开辟她事业的新天地。在一般场合下，人们仍称呼她为“卢森堡小姐”。

当时，处于工业化狂飙突起状况下的、拥有二百五十万居民的柏林，对幽居世外桃源式的苏黎世多年的卢森堡来说，是一个喧嚣而陌生的城市。甫到该市，她在致瑞士友人的信中，以复杂的心情谈到了她对柏林和德国人的最初观感：“柏林一般来说给我留下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印象：寒冷、乏味、喧闹——真像一座厂区。那些可爱的普鲁士人带着一股傲慢劲。个个直挺挺的，如同吞下了一根棍子似的，好像随时准备教训人！现在我深感周围缺乏同情心和瑞士式的那种文化修养……”。然而，卢森堡没有让最初的孤寂感压倒自己，而是振奋精神，立即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联系，要求参加德国党的工作。由于德国党的主席奥·倍倍尔当时不在柏林，接待她的是执委会成员伊·奥艾尔。老资格的奥艾尔对卢森堡并不了解，以傲慢的神情听取了她的陈述，但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卢森堡暗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不仅要在德国的“波兰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且要在推进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她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披

露了自己的心迹，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她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征服”柏林，说她“非常想投身到‘斗争’激流中去”。

卢森堡在德国参加的第一个“战役”，就是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构——执委会的委派，到上西里西亚从事国会竞选活动。因为当时处于德国统治下的西里西亚地区波兰工人较多，而地方党的工作却因长期受到忽视而显得十分薄弱，只有奥古斯都·文克尔一人负责。尽管卢森堡并不十分情愿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成效尚难预测的竞选运动上，但出于责任心，她还是接受了任务。6月2日，也就是说她到柏林刚半个月，才找到栖身之所，就立即奔赴上西里西亚去了。在将近一个月里，她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遍访各工业中心，其中包括弗罗茨瓦夫、累格尼察、比托姆等地，会见工人积极分子，散发竞选材料，在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在启遍工人群众的觉悟、扩大党的影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胜利返回柏林时，累得几乎站立不稳了。在致约吉希斯的信中，她以欣悦的心情描述了这次活动中激动人心的情景：拥挤、雀跃的听讲人群、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动人的献花场面……。对于阔别祖国近10年的卢森堡来说，上西里西亚之行使她郁积胸臆的思念祖国之情像涌泉般喷薄而出，使她激动不已。她在致约吉希斯的信中直抒胸怀：“给予我最主要最强烈印象的是这里的环境：黑麦田、草场、森林、广阔的平原以及波兰语和周围的波兰农民。你无法想象，由于这一切我是多么幸福。我恍惚获得了新生，恰似重新找到了立足之地。我简直听不够他们的说话，吸不够此地的空气！”首战告捷，更加激励了卢森堡的革命热情和信心。她在另一封致约吉希斯的信中写道：“……我充溢着最美好的希望。我不仅未陷入急躁和狂热之中；相反，我却很冷静并坚信未来。”但是，卢森堡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和鼓动工作，即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强调要把当前的日常斗争和长远

目标结合起来的言论，却招致了资产阶级报刊的仇视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不满。资产阶级报刊说她“煽动阶级仇恨”，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说她的言论“不合时宜”，他们开始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革命者大肆挞伐和攻击。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德国社会状况和党内情绪密切相关的。

19世纪末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转折时期。在将近30年的和平环境里，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上的繁荣带来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稳定。经过无产阶级长期的艰苦斗争，德国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19世纪90年代，自从取得了废除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的胜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又有了飞速增长。1898年，德国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得到了210多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27.2%，是德国各政党中得票最多的党，在国会中拥有56个议席，是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但是，伴随着这些成就和胜利而来的，出现了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机会主义思潮的滋生和抬头。德国党内思想极为混乱，党的领导层、议会党团、工会首领以及党的报刊的编辑中间，盲目崇拜合法性已成为一种时髦。他们热衷于具体的议会选举和工会活动，把它当做党的主要工作，把它当做追求的主导目标，放弃了党的推进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这就是说，机会主义已深深渗透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践中去了。正因为如此，卢森堡的正确主张受到歧视和打击就不足为奇了。

不久，一场严峻的考验悄悄降临到了卢森堡身上。从1896年10月到翌年6月，德国党的政论家和活动家爱德华·伯恩斯坦在党的主要理论刊物《新时代》上陆续发表了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组6篇文章，企图系统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策略路线。他打着“批评自由”的旗号，公然声称时代已发生

了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已经“过时”，应当“修正”。他认为，资本主义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以及信贷制度，改善了的交通和通讯设施有可能消除危机，从而缓和阶级矛盾，而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的发展已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因而不能再把国家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可以通过逐步改良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已无必要。最后，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著名”的修正主义口号。

在修正主义的挑战和进攻面前，德国党面临严重的考验：拒绝还是接受？党的一些活动家虽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理论修养，不知道该如何剖析和反驳。党的许多基层组织茫然不知所措，听凭这种思潮到处泛滥，甚至当做“新潮流”来追求。党的主要理论家、号称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卡·考茨基对此熟视无睹，装聋作哑，不置一词。这是因为，对伯恩斯坦的某些观点，他是同意的，某些观点他虽不同意，但碍于多年私交的情面面不愿出而反击。党的领导人奥·倍倍尔尽管看到了机会主义的危险，但并没有采取实际措施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只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以及帕尔乌斯等个别人写文章予以批驳，但反应微弱。在此情势下，卢森堡不仅忠实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她义愤填膺，目光如炬，当仁不让地站到了反对伯恩斯坦主义斗争的最前沿。从她致约吉希斯等友人的书信中得知，她对批判伯恩斯坦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早在停留瑞士的最后期间，她就酝酿写作批判文章。乍到柏林的5月，她深夜挑灯伏案“攻伯恩斯坦”，上西里西亚之行归来后，她以主要精力投入此项工作。到7月初，用她自己的话说，已“准备了一个很好的论战计划”。卢森堡为何如此孜孜不倦地“攻”伯恩斯坦呢？因为她已敏

锐地感觉到，伯恩施坦提出的“修正”问题是攸关社会民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在该年10月将于斯图加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前予以揭露批判，引起全党的关注和辩论，重新明确党的前进方向。

9月21日至28日，在德国党内和社会上颇有影响的《莱比锡人民报》以题目的标题分7次连载了卢森堡的长篇论文《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击中痛处的伯恩施坦分子暴跳如雷，怒骂如狂，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加紧攻击卢森堡。同意卢森堡观点的同志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她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未能恰当表达的心里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莱比锡人民报》的主编休恩朗克称誉这组文章是“辩证法的杰作”。刚结识卢森堡的克拉拉·蔡特金热情地赞扬了自己的女战友：“勇敢的罗莎，她狠狠地敲击了面口袋伯恩施坦一顿，敲得厚厚的粉末满天飞，伯恩施坦学派的假发一根根从头上竖立了起来，因为他们没粉可敷了。”

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敦促党的领导层把伯恩施坦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卢森堡以神奇的速度，在两天内赶写了一组系列文章，发表在她刚接任主编的《萨克森工人报》上，其中主要有《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一文。她不指名地针对伯恩施坦说：“某些知名的同志的言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些言论关系到党的原则和策略，只在报刊上发表个人意见是远远不够的，“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①她还提醒全党，认为争论有害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无论何时，在继续不断的，时常束缚人们眼光的日常斗争中，始终是我们整个革命世界观的牢固基础为我们提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供令人生气勃勃的养料，使我们擦亮眼睛，振奋精神。这一次重新探讨我们纲领的基础，也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党的队伍在坚持目标，加强胜利信心，提高战斗乐趣方面获得新鲜的、强大的动力。”^①她还引用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故事作比喻，认为讨论党的世界观的基础，就会像巨人安泰接触到大地母亲能获得克敌制胜的力量一样，使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新的力量。

总之，在与伯恩施坦主义展开面对面激战的前夜，卢森堡不仅自己作好了拼搏的准备，而且还为动员党的革命力量作了一定的舆论发动和准备。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党内思想斗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2. “新兵”的锋芒

斯图加特，1898年10月3日至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卢森堡由于上西里西亚之行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当地工人的称誉和信任，从该地区获得了两个选区的代表委托书，从而使她得以出席党代表大会。这是卢森堡第一次参加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也是会上最年轻的女代表。

在阴雨连绵的仲秋过后，10月，正是中欧地区的“金秋”时节，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但是，在党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却是另一番情景，笼罩着一种期待和紧张的低气压，人们预感到一场激烈论战即将爆发，尽管党的领导层并未接受卢森堡的正确建议，没有将伯恩施坦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果然，在讨论执委会工作报告的代表发言时，尽管伯恩施坦本人当时正滞留英国未归，只寄来一份顽固地坚持其观点的书面声明，但一小撮伯恩施坦分子沃·海涅、威·彼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0页。

乌斯、康·施米特之流彼此呼应，声嘶力竭地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否定党的原则，放弃最终目的。这时，卢森堡登上了讲台，就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与日常斗争的关系作了简短而精辟的分析。她义正词严地指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把日常斗争超越于党的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标这个根本任务之上，“只有最终目的才构成我们社会斗争的精神和内容”^①并使这一斗争成为阶级斗争，而要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她的发言锋利明快，像一阵密集的枪弹，打得伯恩施坦分子气喘吁吁。人们以惊讶和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在党内初露头角的青年女性。“这位女士是谁？”人们相互探询着，出席大会的200多名代表并不知道，这位女性虽很年青，但实际上已有10多年的革命活动经历了，而且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

第二天，恼羞成怒的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格·福尔马尔登台发言。他以尖刻的言词讥讽“卢森堡小姐”的发言是“陈词滥调”，是“骗人的结论”，甚至歪曲、篡改她的话来进行诬蔑攻击，还倚老卖老，气势汹汹地责难她作为一名“新兵”竟敢“攻击”曾“为党立下功劳”的伯恩施坦、海涅等“老兵”是不自量力。海涅也第二次登台发言，唇枪舌剑地攻击卢森堡这个“女神”企图“给自己蒙上一种新的真理的灵光”，说她和蔡特金一起编造他们是工人阶级叛徒的“谎言”，在他们“背后捅一刀”，还说什么“编织出来的蜘蛛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无处容身的”，^② 气焰十分嚣张。

而对伯恩施坦分子成群结伙的大肆挞伐，深感处境维艰的卢森堡毫不气馁，她再次登上讲台，义正词严地说道：“我知道，我应在德国的运动中争取获得自己的肩章。但我愿意站在同敌人作斗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2页。

② 以上引语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8、30、31、33页。

争的左翼，而不愿站在同敌人妥协的右翼去获得，如果福尔马尔竟搬出这样的论据来反驳我的公正论述，说什么你还是个黄口小儿，我可以做你的祖父哩，我认为那就证明他快理屈词穷了。”^①在发言的最后，针对伯恩施坦提出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式，她以铿锵有力的语调，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革命号召：“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②卢森堡的这个概括，虽然也有偏颇之处，但充分显示了她的原则坚定性。对卢森堡这种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蔡特金等人报之以热烈鼓掌和欢呼。但是，虽然党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坚持革命原则的决议，却没有公开表态批判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的修正主义谬论。

确实，卢森堡当时是加入德国党才几个月的“新兵”，从年龄上说，她才28岁，而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已年近50岁了，确是她的父辈。然而，正是这位不惧“权威”的“新兵”，却在德国党内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勇敢地打响了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枪！

会后，为了动员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认清修正主义的根源、危害并予以反击，卢森堡又发表了《党代表大会的回顾》一文。她严正地指出，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自从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取消后，党“在合法性的阳光照耀下蓬勃发展，这就带来了新的危险”，即过高地估计日常的改良工作，产生了日益抬头并趋于成熟的机会主义倾向，这对党的活动造成了危害，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但她遗憾地指出，党的“老战士”不但没有从争论一开始就投入战斗，却设法予以回避，甚至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指责革命派使用了“过分尖锐的语调”。为此，她对老战士们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他们太软弱了，“非常缺乏决心，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和全力以赴地抵制有害的倾向”，她认为这是“很糟糕的”。^①她还点名批评考茨基让伯恩斯坦在自己主持的《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却不开展批评，甚至连起码的编者按也没有加，在论争中一直保持沉默，他们的“慎重”已对党产生了不利后果。对此，卢森堡深感忧虑。在她致友人的信中，她认为从党内思想状况的角度讲，已经变得“很坏”。

实际上，考茨基乃至倍倍尔并不是因为“慎重”而保持沉默的，而是由于他们并没有能够认清伯恩斯坦观点的要害和实质，他们只是猜测，伯恩斯坦可能由于长期“所处的英国环境”，^②或者由于错误地引用了统计数字而得出了错误结论。因此，他们只停留于规劝他改变观点并迁出英国。

卢森堡在文章中提出的，单刀直入式的批评使党的某些领导人感到难堪，只有倍倍尔一人表态接受她的批评，其余人仍保持不寻常的沉默。她的批评更刺痛了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开始了排挤和打击卢森堡的最初步骤，首先是剥夺卢森堡在《萨克森工人报》的舆论阵地。事情是这样的，正是在斯图加特党代会召开前的9月下旬，卢森堡接受了即将被警察当局驱逐出境的原任主编帕尔乌斯的提议，接任了在德累斯顿出版的《萨克森工人报》的主编职务。对此，她的恋人约吉希斯曾表示担心，怕她胜任不了，专门拍电报劝她不要接受。卢森堡却回答说：“在斗争面前退缩吗？决不！”她决心把该报办成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击伯恩斯坦主义的有力阵地。此后，她在该报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章，招致

① 以上引文见《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9、50页。

② 参阅奥·倍倍尔1898年10月16日致爱·伯恩斯坦的信。载《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60页。

了伯恩施坦分子的妒恨。他们借口卢森堡拒发伯恩施坦分子，德累斯顿选区国会议员格拉德瑙埃尔空洞无物，无理纠缠的论争文章，对她进行“制裁”，不但要她接受编辑部其他成员的“监督”，甚至不允许她以个人名义对攻击进行反驳。在围攻的阴影下，卢森堡只得于11月初愤而辞去主编职务。但谁也无法迫使她沉默，她继续在《新时代》和《莱比锡人民报》等报刊上撰文，而且执著地把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置于她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首位。

3.《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反击伯恩施坦主义

1899年3月，伯恩施坦抛出了系统地宣扬修正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该书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等方面的基本观点提出怀疑。他顽固地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会崩溃，《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很大的适应性并正在向社会主义进化，“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会减少。”因此，“实行革命的时代，今天已经过去了”，现在工人阶级只须进行合法的政治经济活动，即议会和工会工作，就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不必要的了”^①。对此早有准备的卢森堡神速地完成了第二组批判伯恩施坦的系列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4月初分5次连载于《莱比锡人民报》。同月，她把批伯恩施坦的两组论文汇集成册，辑成《社会改良

^① 参阅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5页。

还是社会革命》单行本出版。在这部书的引言中，卢森堡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立场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她说，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①因此，“伯恩斯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在此书的正文中，卢森堡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伯恩斯坦的政治观点和经济理论。她形象地讥讽说：“伯恩斯坦想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密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②。她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③。她还指出，“合法的改良和革命并不像在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④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质：“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来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把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01页。

④ 同上书，第130页。

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非本质的变动。所以，从伯恩斯坦的政治观点中和他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①

由此，卢森堡得出结论说，与伯恩斯坦的论战“已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② 卢森堡以层层剥笋方式总结说，伯恩斯坦的理论是一种堕落的理论，这种理论从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然后是放弃社会主义阵地，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放弃剩余价值学说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最终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最后，卢森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巨大气魄，鄙夷地讥讽说，伯恩斯坦的书一出来，机会主义便完成了它理论上的发展，它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它仅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破烂货的堆积，“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蹂躏过、嘲笑过、摧毁过！”^③ 但与此同时，卢森堡没有足够估计到在工人运动中战胜机会主义思潮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流露出了低估伯恩斯坦主义的情绪，认为“伯恩斯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④ 尽管如此，她仍能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伯恩斯坦是工人阶级和党的事业的危险敌人，对他的理论必须进行彻底清算。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143页。

③ 同上书，第148页。

④ 同上书，第145页。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部论战性著作,像一门火力威猛的大炮,以泰山压顶之势,摧毁性地轰击了伯恩施坦主义。卢森堡像外科大夫操作手术刀那样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锋刃剖析修正主义的实质,运用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辩证观点驳斥伯恩施坦的种种谬论,运用精采的文笔来突出和明确问题,用入木三分的辛辣讥讽来嘲弄痛击对手的要害,恰似其分地运用比喻和幽默来说服和争取同志,从而使该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式的反修名著。

令人欣慰的是,在蔡特金等人支持下,卢森堡经过一年多的顽强奋战、奔走呼号,宣传群众,不断论战,她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理解,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也表示要亲自出面主持和组织对伯恩施坦的全面批判,他还让蔡特金转告卢森堡,要她作好准备,务必参加即将在汉诺威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为此,卢森堡于1899年9月中旬,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致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她明确指出,党内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斗争决不是像伯恩施坦分子所宣称的是出于“误会”,他们的主张和所谓“批评自由”是想使党改变性质,这是决不能容许的,现在是党明确“宣布这种批评是一种堕落的理论,它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容身之处的时候了。”^①她大声疾呼要警惕修正主义对党的侵蚀。在把伯恩施坦分子的种种言行加以归纳后,她强调指出:“那就必须非常严肃地看待倍倍尔说的迟早‘要打断’社会民主运动的脊梁骨的那一危险。”^②她对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默许和纵容修正主义的泛滥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愤慨,她发表了《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一文,严正要求它对伯恩施坦的理论公开面明确地表明自己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06页。

^② 同上书,第210页。

的态度，批评该报持调和和掩饰分歧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促进党的分裂”，说明该报已进入了“机会主义的航道里游泳。”^①卢森堡正是根据伯恩施坦已经堕落为党的异己分子的判断，在莱比锡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卢森堡公开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②

1899年10月9日至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了另一次代表大会，党内两种思潮和势力的斗争波澜迭起，达到了新的高潮。大会议程的主题就是“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倍倍尔在会上作了长达6小时的主题报告。他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路线的谬论。

在会上，配合倍倍尔的报告，卢森堡4次登台发言，集中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施坦分子爱·大卫等人宣扬的“资本主义正在全面社会主义化”因而没有必要夺取政权的澜言。在10月11日的发言中，她指出，像历史上所有的没落的统治阶级一样，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斗争和工会斗争去一点一滴地去“挖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为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就能够获得经济权力，那是一种幻想，它只能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③她还指出，并不是无产阶级一心想用暴力手段进行暴力革命。”但是，这种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敌人。”^④针对伯恩施坦等人把工资协议、工人参加合作社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措施乱贴社会主义标签的拙劣手法，她引用了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对他们进行讥讽：“人们只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15、216页。

② 参阅卡·弗罗梅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259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18页。

④ 同上书，第221页。

是忘记了，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如果人们把鞋刷子归入哺乳动物一类，那它决不会因此长出乳腺来。”^①

由于卢森堡坚持不懈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铁面无情地、淋漓尽致地批驳了伯恩斯坦分子的种种奇谈怪论，把他们的可憎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无地自容，这招致了这伙人的疯狂攻击。他们集中火力对卢森堡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攻讦。卡·弗罗梅影射她“虚构出一些妖怪并且狠狠地加以攻击”，以便自诩为“英雄”，^②还说这是搞“宗教裁判”。福尔马尔攻击卢森堡作为“这一批人中间最得力的先锋”，恰似一只乱叫唤的母鸡，“为了生下一个孵不出的蛋，用不着这样大声地咯咯叫。”^③

面对恶浪翻滚的诬蔑和攻击，卢森堡多次向大会提出抗议。但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没有以牙还牙进行人身攻击，而是平心静气地进行说理斗争。她在10月12日的发言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她和同志们的批评决不是搞“宗教裁判”，但决不能允许借口“批评自由”对党的原则和路线滥施攻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讨论的俱乐部，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党，这个党必须有明确的基本观点。”^④

经过大会激烈的争辩，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和斗争下，伯恩斯坦分子不得不有所收敛，大会最后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但这决不意味着机会主义分子已幡然悔悟，放弃了他们的错误立场，而是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两面派策略，仅是改变了斗争方式而已。因为他们认为，大会决议仅是一纸空文，缺乏实际的约束力，可以随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20页。

② 参阅《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259页。

③ 同上书，第274、275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23页。

意理解和解释，仍可以依然故我，继续以各种手段兜售他们的货色。这从他们在大会上的最后表态和会后的声明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卢森堡面临的是一场无比艰巨的斗争。

4. “米勒兰主义”的波澜

当时修正主义思潮的滋生和蔓延，决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仅有的，也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十九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关头，用本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国外殖民掠夺的财富喂肥了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改变了统治手法，对部分工人阶级采取了和平收买的策略，从而使工人政党内的合法主义情绪得以泛滥，这在客观上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滋生和猖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成份的急剧增长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由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修正主义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伯恩斯坦主义得以像毒疮一样溃烂和蔓延，并成为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行动纲领。与德国的伯恩斯坦分子相呼应，国际上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流派的头面人物，如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法国的米勒兰、饶勒斯；美国的龚柏斯；意大利的屠拉第；奥地利的阿德勒，鲍威尔；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等人。

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亚·米勒兰实践了伯恩斯坦的理论，以社会党首领的身份，参加了反动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出任工商部长，与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剑子手加里费合作共事。正如列宁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米勒兰入阁是“在真正全国广大范围内

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① 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借此大肆吹嘘逐步“排除”资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甚至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描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围绕着米勒兰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施坦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国际规模的论战。论战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取得政权的道路问题。

卢森堡又一次地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她撰写文章，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猛烈抨击主张到资产阶级政府恩去做官的机会主义者。在米勒兰入阁不足半月之际，卢森堡于7月初就及时地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一个策略问题》一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革命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危害性。她说：“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作为政府的成员，……实际上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因此，……社会民主党人进入政府只会带来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引起腐败和混乱的后果。”^② 最后，她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自己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废墟上，它才能成为执政党。”^③

在1990年9月下旬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大会上，卢森堡坚决支持法国党内盖得等左派提出的禁止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决议。可是，由于考茨基等人的伪善和妥协，大会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所谓“橡皮决议案”把米勒兰之流的背叛性行径说成是无关宏旨的“策略问题”，从而为米勒兰主义打开了通行无阻的绿灯，使盖得、卢森堡等左派的斗争遭到了挫折。

此后，卢森堡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写作了许多文章，如《法国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7卷，第17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85页。

③ 同上书，第186页。

社会主义危机》、《卡尔·马克思》、《社会民主党与议会民主》等，批驳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实践——米勒兰主义。当德国党内老牌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仍吹捧米勒兰时，卢森堡怒不可遏，在致友人信中认为对他“应该猛击一掌”。在党的各种会议的发言中，在群众集会的讲演中，卢森堡毫不倦怠地展开了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卢森堡不屈不挠的坚定立场使修正主义者大为恼火，也招致了他们的密集攻击。他们从多次较量中致北的事实中总结了一点经验教训，懂得与她正面交锋很难讨到便宜。因为她立论深刻，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言词犀利，谁也驳不倒她。于是，他们变换手法，从侧面进攻，说她是个“外国人”，“不了解德国的情况”，对伯恩斯坦等人的批评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在1901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他们公然把这套“理论”搬上了大会讲台。机会主义者李·费舍尔跳出来攻击卢森堡说，她是“来自东方他外来者”，是一个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格格不入的人物”，她对党内一些活动家的攻击是不能容许的。对此，卢森堡十分气愤，她向大会提出了抗议声明，指出这不仅涉及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而且关系到了她所代表的政治方向。但是，考茨基借口维护党的团结，拒绝在党刊上刊登这则声明。

在1902年9月13日至20日召开的党的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尽管卢森堡已就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抬头的问题准备好了发言稿，但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大会主席团竟然不允许卢森堡登台讲话，借口是为了保持党内的“和气”，不要因爆发争论而为敌人所利用，只允许她就普占区的波兰工人运动发言。对此，卢森堡感到十分气愤和忧虑，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党内左派处于少数地位，备受排挤和压制，尤其是像卢森堡这样活跃的、令人瞩目的左派代表人物，更是他们的肉中刺、眼中钉，他们用迫使她缄口的卑劣手法来削弱其影响。卢森堡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在卢森堡等人的努力下，左派力量也开始集结起来了。1902年春，卢森堡和著名的著作家和左派活动家弗·梅林一起被委任为颇负盛名的《莱比锡人民报》的政治部领导人，从而使该报成为左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卢森堡和梅林在该报共事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在右派的排挤下，她于当年6月又被迫离开了报社，但她和梅林的战斗友谊却长久地保持下来了。从这一时期开始，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卢森堡、梅林、蔡特金、李卜克内西由此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阵营的实际上的领导人。

1903年9月中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累斯顿举行了党代表大会。党的策略问题仍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伯恩斯坦、福尔马尔等人仍企图通过改变党的策略来改变党的性质。大会围绕国会选举、党应否争取副议长职位、修正主义的意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卢森堡已就上述问题发言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就像上一年的慕尼黑党代表大会一样，她的发言要求遭到了拒绝，仅允许她就普占区波兰工人运动发表意见，理由仍是怕她“过分激烈”的言论“伤了党内和气”。在此情况下，无可奈何的卢森堡只能通过会下的积极活动参与这场斗争。大会以倍倍尔的发言为基调，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谴责了修正主义者想使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转变成向现存制度妥协的企图。

这次党代会使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但是，这次大会是有很大大缺陷的，这不仅表现在屈从于修正主义者的压力，不让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左派发言，更主要的是满足于对修正主义者局部表现的批判，而没有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更坚决的斗争，从而使修正主义思潮和势力得以继续蔓延。这次党代会以后，德国党再也没有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斯坦和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声讨和批判。可是，从修正主义分子会上的发言和会后的活动来看，修正主义远远没有被克服，修正主义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

活动中都在继续发展，使党的健康肌体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蚀。

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卢森堡最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性。在德累斯顿党代会后的10月，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了《破灭了的希望》一文，从剖析资产阶级对德国党内斗争的态度和意图入手，深刻地论证了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引向深入的必要性。她指出，当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日益丧失其拥护者以后，他们的希望就是：“至少通过修正主义的中介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推上资产阶级政治的轨道，折断无产阶级斗争的支柱。”^①她指出，鉴于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修正主义者的加紧勾结，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如果说从前历次党代表大会谴责了修正主义实践的个别表现和修正主义理论，那么党在德累斯顿和德累斯頓以后不仅更加尖锐地重复那一判决，并且还对修正主义另一个方面即它的政治伦理学和与此相联的个人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进行了声讨。”^②卢森堡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保卫其思想的纯洁性，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和腐蚀，修正主义者打着“自由批评”、“自由发表意见”和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自由撰稿”的旗号，“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之间发生了一种思想渗透，资产阶级的腐败产生的毒素可以通过这种渗透畅通无阻地侵入无产阶级政党机体的血液循环中去。”^③这是决不能允许的。

这样，1903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的高潮，也是双方正面冲突的告一段落，因为此后的党代会再也没有正式列入这个议题。但是，正面论战的降下帷幕并不意味着修正主义者销声匿迹了，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中止了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了，而是标志着斗争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92—493页。

② 同上书，第493页。

③ 同上书，第496页。

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将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再进行评介。

总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伯恩斯坦主义滋生和泛滥的最初年代里，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的激烈论战中，卢森堡，作为德国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名“新兵”，朝气蓬勃，坚韧不拔、殚精竭虑，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她不顾修正主义者的围攻、压制、侮辱、打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全力保卫和精辟阐述了被修正主义者所阉割、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把为社会主义目标而从事阶级斗争的革命党改变为搞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的改良党，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科学精神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那么，从1898年到1903年，通过对伯恩斯坦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分析和系统批判，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究竟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第一，卢森堡以极高的政治敏锐感指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她明确指出，斗争的实质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策略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即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目标问题。因此，这是“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把问题的实质点得如此明确和提到如此高度，这在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第二，卢森堡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戳穿了伯恩斯坦之流散布的所谓新的“资本主义适应性”。伯恩斯坦以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为借口，大肆吹嘘资本主义有了新的“适应性”，普遍危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将得到稳定发展。卢森堡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论证一一予以驳斥。她指出，资本主义所有的新的适应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恰恰相反，推行

帝国主义政策，即她当时所说的“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只能使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严重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为它自己的最后崩溃准备了条件。

第三，卢森堡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与最终目的，即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质的区别。她反复强调指出，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社会改良只是手段，社会革命才是目的。针对伯恩斯坦关于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通过革命，而可以通过在现存社会制度内逐步改良、普选制的改进、工会和合作社的进步的观点。她强调提出，改良与革命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一个社会制度转变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实行革命变革，“其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转为新质”。她指出，伯恩斯坦不但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而且要用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反对发展过程的质变、飞跃，在政治上反对革命变革，反对夺取政权，这是一种市侩式的、庸俗的观点。她指出，资本主义不会“长入”社会主义，只有靠无产阶级的“铁锤”，即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重新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权威。卢森堡杰出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批判了伯恩斯坦企图回避革命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她反复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有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上产生的各种客观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二是工人阶级在主观意识上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变革途径才能消除这些矛盾的必然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这种认识，掌握客观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利用它发展它，通过明确自己任务的革命无产阶级坚韧不拔和坚持不懈的斗争，以便在适当时机经过革命变革来解决矛盾，而不能像伯恩斯坦所主张

的那样，折断无产阶级的“锋刃”，把它们“弄钝”，苟安于现存制度。这样，卢森堡把社会的发展、革命的产生看作是一个相互影响、辩证发展的过程，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革命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辩证法则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历史发展的认识论，从而重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权威。

5. “红色罗莎”的真面目

正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反对德国党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猖狂一时的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使卢森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活动家、政论家和演说家的巨大声望。她那气势磅礴、睥睨一切的革命气概；她那恣肆汪洋、鞭辟入理的锐利文笔；她那热情洋溢、充满魅力的动人演说，使同志感佩，使对手气馁，使敌人胆寒。当时正和卢森堡一起在《新时代》编辑部一起工作的梅林，甚至把她的写作才能和马克思相比拟。资产阶级的报刊称她是“红色的罗莎”，^①甚至诬称她是“嗜血的罗莎”。伯恩斯坦分子掌握的报刊则诬蔑她“专横”、“阴险”，是“好争吵的婆娘”、“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女神”，甚至还在漫画中把她画成半男半女的模样，进行低级下流的人身攻击。一些党内同志也觉得卢森堡似乎过于锋芒外露，咄咄逼人。党的元老倍倍尔就曾戏谑地把她比喻为攻击性很强的“鲤鱼塘里的梭子鱼”。总之，在许多人看来，卢森堡好像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复仇女神。

但是，真理往往深藏在事物的底层。凡是和卢森堡稍有交往的人都会了解到，她是一个胸怀坦诚的人，谦逊豁达的人。她并不鲁莽，也不粗暴，更不狂傲，只是有着深沉的自信和执著的追求，容

^① 双关语，罗莎与玫瑰在德文中发音相近，红色指卢森堡激进的革命色彩，玫瑰有刺，暗喻她是棘手的女人。

忍不得在原则问题上的调和折衷。对于人们中肯和适度的评价，她感到高兴和欣慰。对于人们脱离实际的颂扬和谀词，即使是善意的，卢森堡也不以为然。例如，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一位主编休恩郎克曾对卢森堡推崇备至，称她为“天才”、“党内唯一的哲学家”、“党的一支光芒四射的笔”。她曾多次劝阻他不要这样说，对方不听，她还为此十分恼火。对于对手的恶意攻击，她往往一笑了之，不予理睬。她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沉默的蔑视就是一切，你能说些什么呢？”，“要把注意力置于争论的政治实质上”。对朋友的误解或者歧视，她有时也感到伤心，但从不计较。她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曾经谈到，假如她有哭泣的习惯的话，那她哭泣的机会可多了。因为她到德国以来，不仅机会主义者攻击她，而且许多人借口她是外国人而予以冷遇和歧视，但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要找一个角落躲起来向隅而泣，而宁愿选择一个僻远而可爱的角落静静地从事科学研究。对同志们的求助，卢森堡总是热心去办。例如，在她参加的第二届国际历届代表大会和各种国际交往中，掌握德、法、英、俄、波、意六种语文的卢森堡，经常不辞劳苦为各国代表排忧解难，义务充当翻译和担任联络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赞扬和爱戴。一位参加1904年第二届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荷兰社会党人女代表罗兰—霍尔斯特，是这样描述卢森堡的：“谁要是在这些日子里在阿姆斯特丹碰见罗莎·卢森堡，看到她在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如何微跛着腿蹒跚而行，从几多时辰的发言或翻译之后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的脸庞上容光焕发，她的嗓音和微笑洋溢着魅力和活力，谁这样瞧见过她，谁就会永远铭记她非凡的感召力。如果有谁是第一次见到她，大概会沉思：‘她就是那个嗜血的罗莎吗，如同小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所称呼她的；或者她就是那个凶狠好斗的女人吗，就像党内一些同志说她的那样’。”

和卢森堡比较知己的熟人都知道，她是一位感情丰富细腻，十

分珍惜友谊，善于和人相处的女性。她曾为结识梅林及其夫人爱娃而感到欣慰。当他们刚相识时，卢森堡就曾发表感想说：“其他人的亲善好感，对我来说就像获得某种意想不到的珍贵礼物。”卢森堡的女友、考茨基夫人路易莎就曾谈到，卢森堡到她家和其他友人家时，常常和主人谈论政治，同主妇聊家常和张罗美化家庭的活计，和孩子们嬉戏逗乐，甚至帮助女佣操持烹调，表现出了非凡的适应能力。

除了事业上的执著追求以外，卢森堡也和普通女性一样，渴望获得家庭幸福，享受天伦之乐。但她以惊人的毅力，自觉地使个人幸福服从于事业的利益。卢森堡在同她的战友兼情侣约吉希斯长期分居异国两地的过程中，很少有相聚一处共诉衷肠的机会。约吉希斯难得在假日里秘密到柏林与她短暂相会，或者俩人相偕到瑞士或德国某地度假。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他们主要的论题仍是革命活动，也交流彼此的工作经验和各种感受，分享各自的欢乐和苦恼，卢森堡偶而在信中吐露自己的情愫和希冀。

有一次，她在信中对恋人说：“有时我想，我和你见面还是越少越好，可是有时又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想忘掉一切投入你的怀抱……。”另一次，她具体而细致地设想了他们未来家庭生活的美妙图景：“有自己小小的住宅，有自己一组精致的家具，自己的小型图书室；宁静而平凡的工作，一起散步，偶而去听歌剧，每年夏天到乡村度假一月，届时完全排除操劳；或者还有一个如此幼小的婴孩？”此后，她还几次写到：“我常感到需要孩子，有时这个愿望还是强烈的。”

应该说，这些愿望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较易达到的“寻常事”，可对卢森堡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面对严峻而复杂的现实环境，她对居无定所、聚散无常的革命生涯早已习以为常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坚贞的，情操是高尚的，而且由于共同的

革命热忱和个人情爱的水乳交融而显得更为丰满和深沉，尽管由于俩人性格的迥异和客观环境的影响，有时也难免出现感情上的“摩擦”。1899年8月，卢森堡重返她曾盘桓多年的苏黎世，在附近一个景色宜人的小镇和约吉希斯共同度过了6个星期的假期。这是几年中他们聚首时间最为悠长的一次。

1899年秋，从瑞士返回德国的卢森堡来到了德属波兰西部地区的沃波累市，与从华沙来的父亲会晤并团聚了一段时间。这是卢森堡流亡国外10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他们父女的最后一次相聚。

1900年2月，卢森堡又到苏黎世作短暂逗留，以便着手解除与古斯塔夫·吕贝克的伪婚。因为这种伪装的联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卢森堡已取得了德国国籍，可以在德国从事公开活动了，没有必要再妨碍比她小六岁的古斯塔夫缔结良缘了。但由于不太清楚的缘由，此行未能取得结果。虽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蹉跎的岁月，颠沛的遭遇，使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的正式结合长久地延误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卢森堡个人生活中的一大缺憾。直到1903年4月4日，苏黎世法院才判决离异。但不知何故，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此时仍未正式结婚，这是卢森堡传记中一个迄今仍未解开的谜。

1900年10月，卢森堡在柏林获悉了父亲已于9月在华沙逝世的噩耗。她陷入深沉的悲痛，闭门不出，“长期避免和人们发生任何接触”。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工作的旋风”又把她从悲苦的追思中拽了出来。

6. 首次入狱

德国反动当局是不会放过对革命者的迫害的，尤其是像卢森

堡这样活动能量大、感召力强的社会民主党左派。这些年来，卢森堡在无数次群众集会上揭露和谴责了政府的反人民政策，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也招致了当权者的仇视。早在卢森堡刚定居柏林才半年的1898年11月，柏林警察当局就认为她是一个“危险的煽动分子”，予以跟踪、盯梢、监视。1900年，卢森堡因维护德国境内波兰人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益、反对日耳曼化而触犯了当局、被加上了“反民族的态度”的罪名。由于她在1900年12月发表了题为《保卫民族性》这部小册子而被加上了“侮辱”普鲁士教育部长的罪名而受到指控。经过卢森堡出庭辩护和法院的审理，结果处以100马克的罚款，作为教育部长名誉受损的“赔偿费”而了结此案。1904年1月，卢森堡再次受审，罪名是上一年她在威茨考的群众集会的讲演时“褻渎”了德皇威廉二世，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同年8月26日，判决生效，卢森堡在德国首次锒铛入狱，被关押在萨克森的威茨考“国家监狱”。在长7步、宽4步的狭窄的单人囚室里，卢森堡在寄出的信件里，虽然发出了“生活始终在和我捉迷藏”的感叹，但谈论的不是个人的坎坷遭遇，关心和筹划的却是德国党的事务：如何在预定于9月召开的党的不来梅代表大会上巩固左翼阵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身陷囹圄的她无法参加这次党代会了；研究和学习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提高德国工人运动的水平。

1904年10月底，由于萨克森新国王弗·奥古斯特登基而发布“大赦”，卢森堡提前一月出狱，尽管她本来并不想“沾光”，但不得不服从。出狱三天后，她在致荷兰女战友的信中，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描绘了自己的铁窗生活：“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尽管饮食恶劣，两月中几乎经常挨饿，然而我变胖了。我衷心称道强制休息和孤寂，使我重新获得了心灵平衡……。”在另一封信中还说：“这两个月中，我发愤读书和工作。除了我的专业——经济学外，稍稍涉猎了文学和哲学。”寥寥数语，足以使我们窥见这位女革命家坚毅勇

敢、勤奋好学、丰富而深沉的内心世界。

实际上,从她这一时期致友人的信札中,我们可以发现,她除了对诗歌继续保持特殊爱好外,对文学、艺术、音乐也发生了浓厚兴趣。1898年12月,在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世界级大诗人之一的亚当·密茨凯维支百年诞辰之际,她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题名《亚当·密茨凯维支》的长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用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对这位诗人历史地位作了颇具说服力的评述。这是一篇马克思文艺评论的杰作。她在致约吉希斯的书信中还表示了要“研究艺术”的宿愿。在她的信札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一系列她即兴写下的、简短而精彩的、富于哲理色彩的文艺随笔和读书札记。然而,繁忙而紧张的革命生涯是不可能允许她用更多时间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的。

从上面的种种情景可以看到,卢森堡定居德国后的最初岁月,她过的是一种虽没有硝烟和枪声,然而却是身边刀光剑影、脚下荆棘丛生的战斗生涯。但不论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当面迫害,还是机会主义的背后捅刀,都未能使她后退半步,是什么力量支持这位身材矮小、体质单薄的年青女革命家如此大的勇气呢?她在1903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恰恰是她绝妙的自我写照:

“如果说今天的工人运动不顾敌人的种种镇压行动仍旧战无不胜地抖动它的鬃毛,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冷静地认识到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①也就是造成了对剥夺者的剥夺——社会主义革命。它通过这种认识看到了最终胜利的绝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保证,他从这种认识中不仅汲取了激情,而且也汲取了耐心、行动的力量和坚持的勇气。”^①

这一切,正如列宁所总结的,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正是在这场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战中,锐不可挡的卢森堡站在为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奋战的最前列!

卢森堡跨出狱门不久,一场革命风暴在东方地平线上蕴育成熟,她又迈着矫健的步伐,迎着鸣雷闪电走去!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81页。

四、激流中浮沉——1905年 俄国革命前后

1. 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 民主党的领导岗位上

20世纪初的俄国，迅速崛起的工人运动正积聚着力量，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正酝酿着一场革命风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在俄占波兰地区工人运动也重新趋于活跃，由于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而中断了一段时间活动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在费·捷尔仁斯基等活动家的努力下，不但恢复了自己的活动，而且扩大了活动区域，进入了立陶宛地区。正因为如此，波兰党在1900更名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罗莎·卢森堡虽然早已定居德国并以主要精力从事德国党的革命活动，但她一直密切关注俄国的革命运动的进展，并认为那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她很早就撰文参与反对伯恩斯坦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斗争。她还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用自己的笔给予沉重打击、“叫他脱掉一层皮。”

经常使卢森堡萦怀于心的是祖国波兰的命运。在她定居柏林的年代里，她频繁旅行于普鲁士统治下的原波兰西部地区，即西里西亚和波兹南等地，在工人的集会上发表讲演，协助当地的党的活动家开展工作，揭露和谴责普鲁士当局对波兰工人的歧视和压迫，宣传波、德两国革命者团结一致共同斗争，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

捐戴，多次获得了当地 组织的代表委托书以参加德国党的代表大会。在卢森堡的支持和配合下，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开始在普占区大力开展工作。1901年12月，该党在慕尼黑召开了党的活动家会议，决定在该市出版党的理论刊物《社会民主党评论》。卢森堡慨然答应与该刊合作。1902年，该党又在波兹南创办了《人民报》，卢森堡是该报实际上的主编。卢森堡还和波兰党在波兹南地区的领导人，在她逃离波兰时曾给予巨大帮助的马·卡斯普夏克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正是在《社会民主党评论》的1903年第1—2期上，卢森堡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论文《纪念“无产阶级”（党）》，^①系统地总结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对现实斗争的教益。但卢森堡在强调无产阶级党坚持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这个革命传统的同时，忽略了该党坚持爱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传统。这种偏颇之所以出现是与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密切相关的。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重建以后，从一定意义上说，卢森堡仍是该党的精神和理论领袖，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她无法亲自参与该党的国内活动。可是，卢森堡为该党起草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大量宣传鼓动材料，指导党的重大斗争。该党的文件把卢森堡尊称为“元老”，其实她当时才三十岁。但是，卢森堡与该党的领导层的关系却不是始终融洽的。1901年9月，波兰党在华沙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卢森堡对党的三大决议持某种保留态度。此中缘由，除观点上的一些分歧外，与她和党的国内领导人扎列夫斯基个人之间的龃龉也有关系。

^① 见《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13—470页。

2. 和列宁的最初相识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随着俄国与俄占波兰地区革命运动的重趋活跃和俄、波两党之间的接近，卢森堡和列宁也开始了最初的接触和合作。

1901年5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春风和煦。在慕尼黑市斯瓦宾区一所僻静的房子里，列宁正伏案工作。蓦然，一位装束朴素，仪态端庄的女士，在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男子的陪同下，步入庭院。那位操着一口流利俄语的女士作了自我介绍。“啊，罗莎同志！”列宁迎了过去并紧紧握手。这是卢森堡同列宁的初次相识，陪伴卢森堡的就是她的爱侣约吉希斯。当时，列宁正侨居慕尼黑主办《火星报》。卢森堡专程从柏林前来与列宁会晤，商讨波兰和俄国两国革命运动和两党的合作事宜。两人彼此仰慕，恳谈良久，从而肇始了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持续近20年的友谊和合作。

在革命友谊的长河中，不仅荡漾着意见一致的波光涛影，有时也会出现观点分歧的涟漪和漩涡。1904年夏，围绕着俄国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卢森堡与列宁之间出现了第一次公开的意见分歧。1904年春，列宁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当时列宁在书中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党必须实行严格的、高度的集中制，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指出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1904年7月，卢森堡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同时刊登在俄国党的新《火星报》和德国党的《新时代》上。该文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表述了卢森堡的不同观点，卢森堡的这篇文章虽是应孟什维克波特烈索夫的约请面撰写的，但她表述的观点却与孟什维克是不同的，因为孟什维克是反对集中制而主张实行自治制

的，而卢森堡则是赞同集中制的原则的，但她对集中制却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卢森堡指出，“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①这就是说，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党这个根本点上，卢森堡和列宁是没有什么分歧的。争论的中心是她所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②问题。她指责列宁的主张显示出“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③甚至认为“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了”^④。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⑤她还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⑥而仅仅由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⑦她担心，权力过分集中会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广大党员群众，助长个人专断的危险。她认为，仅仅是“集中主义是一个远远没有概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的历史内容和特点的口号”，^⑧它必须和民主相结合，也就是必须加强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加强全党首创精神的发扬。她说，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应该是这样的，它“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01、502页。

② 同上书，第502页。

③ 同上书，第501页。

④ 同上书，第503页。

⑤ 同上书，第501页。

⑥ 同上书，第503页。

⑦ 同上书，第501页。

⑧ 同上书，第500页。

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①

卢森堡提出的“自我集中制”这个概念的内涵虽然不甚明确，但她的基本思想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党必须有严格的、统一的纪律，在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达大多数人的意见，集中大多数人的意志，实行“大多数人的统治”。她十分强调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批评和民主监督作用。她深信，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发挥广大党员的首创精神，是保持党的旺盛生命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卢森堡责备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的实质是，“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② 她认为俄国党的一部分人企图使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③ 这是一种“主观主义”。

可以这样说，卢森堡对列宁建党思想的批评，虽然其中包涵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高度重视党员群众的创造作用，强调党内民主，反对过分集中，要求实行民主监督，把党员群众的批评权利视作使党能够生气勃勃前进的力量源泉，如此等等。但是，她的批评从总体上是不准确的。这是因为，第一，她的指责脱离了俄国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在沙皇的专制制度统治下，俄国没有政治自由，党完全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谈不上实行选举制和民主监督。与此同时，党内孟什维克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低估党组织建设的意义。在此情况下，列宁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强调职业革命家的作用，强调秘密工作的作用，是完全符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04页。

^② 同上书，第508页。

^③ 同上书，第517页。

合俄国当时的国情、党情和斗争的需要的。当时，卢森堡对俄国的斗争实况了解不够清楚，对孟什维克的认识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她的批评就不免失之于偏颇。她的批评主要是从当时德国党内状况和个人体验出发的，是从党可以合法存在并进行各种活动的德国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第二，她的指责不符合列宁主张的实际，即不够确切，误解了列宁的某些思想。例如，她指责列宁搞布朗基式密谋组织的原则。实际上，列宁并不是不主张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选举制，而只是说当时条件不成熟。俄国1905年革命后，随着列宁所说的“党的活动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后，列宁在1905年11月发表的《论党的改组》一文中提出了实行党内选举的必要性。在新的政治状况下，列宁还提出了“需要全体同志共同主动地，创造性地研究出新的组织形式”^①的建议。1906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4次即统一代表大会上，列宁把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概括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列入了党纲。由此可知，在列宁前期的论著中，的确对发展党内民主问题论述不够充分，不够具体，尤其考虑到俄国党内外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特别强调了集中制思想，但列宁决非极端的集中主义者，他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是逐步形成的。

第三，卢森堡对党的中央机构，即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卢森堡认为，斗争策略是工人运动自身的产物，党的领导层在制定策略时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从而忽视了党的中央机关在制定斗争策略、指导运动方面发挥应有的巨大作用。由此她还引伸出了党的各级组织要有行动自由的主张。这种看法失之于偏颇。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卢森堡的这种见解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构的僵化、保守、官僚主义而提出来的，目的是想用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82页。

面的工人运动冲破和改变这种局面，推进革命运动，这是符合德国党的实际的，因而也是切中德国党的要害的。但是，卢森堡把它概括成一个普遍的适用的原则到处套用，这就未免显得片面和不正确了。卢森堡在该文最后一段的概括，就属于这类情况：“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 error，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 error 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①

总括起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如前所述，列宁的建党思想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列宁在 1905 年以后才形成完整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卢森堡在 1904 年与列宁在组织问题上发生争论时，在建党的一些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卢森堡同列宁并无实质性的分歧。总体上说，卢森堡和列宁一样，都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组成独立政党，这个党必须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按集中制原则组成，这个党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密切联系群众。两位革命领袖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列宁比较强调集中，卢森堡更强调民主。尽管卢森堡的批评有许多失实和不准确之处，但她十分担心一个实行高度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由于种种复杂的党内外原因，党内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有遭到破坏的危险，而且后果将是严重的。历史实践表明，卢森堡的这个看法不是杞人之忧，而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正确见解，其中包含有防患于未然的有益忠告，问题在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1904 年这场争论过去以后，关于党的组织原则，主要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卢森堡与列宁之间时断时续、论争多年的问题之一，直到 1919 年卢森堡牺牲为止，分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弥合，尽管 1905 年俄国革命后，卢森堡部分地收回了对列宁的某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 518 页。

些批评，如指责他搞布朗基主义等。

应该着重指出，卢森堡与列宁在一些问题上虽有分歧，这在以后本书还要谈到，但他们都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分歧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如果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是建立在立场、观点、方法完全一致基础上的典范，那么，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友谊则是在求大同存小异基础上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楷模。这可以从两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和此后国际斗争舞台上的紧密合作和终身友谊中得到充分印证。

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前夕，在1904年底和1905年初出版的波兰党的刊物《工人评论》上，连载了卢森堡的一篇长文《我们需要什么？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该文中，卢森堡为波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规划了近期任务：与俄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全俄范围的民主共和国，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波兰获得自治地位，争取一系列的民主权利和保障工人的立法。这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体上是吻合的，但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有保留。

3. 面对狂飙突起的俄国革命

1905年初，俄国无产阶级为了推翻沙皇制度，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革命风暴席卷全俄，其中包括处于俄国殖民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在革命烽火刚刚燃起，即彼得堡“流血星期日”事件之后不久的1月27日，卢森堡就在德国党的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俄国革命》一文。在论文的开头，她以巨大的历史洞察力敏锐地观察到了时代的变迁：“革命浪潮的起点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①她还有力地论证了狂飙突起的俄国革命证明了马

^① 《卢森堡全集》1972年德文版，第1卷，第2分册，第477页。

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是正确的，是对机会主义者的社会改良谬论的一次重大打击。她指出，俄国革命象驱散轻飘飘的秕糠那样，驱散了所有那些在国际上风平浪静时期繁茂生长起来的对今后平静的、“合法的”发展进程所抱的幻想。在论文的最后部分，卢森堡以雄浑的笔锋正确地估量了俄国革命的意义：“1月22日，神降临于人间，这一天向全世界宣告了俄国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独立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的神，是这个神，为俄国的自由在彼得堡的街头进行了第一次伟大战斗，而这个神，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迟早总会赢得胜利。”^①

在俄国革命的号召下，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推动下，波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压抑已久的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怒火迸发出来了。1月下旬，波兰王国的两大工业中心华沙和罗兹的工人阶级首先发难，举行总罢工以声援彼得堡工人。接着，革命烈火燃遍波兰其它地区。“啊，什么样的年头！谁曾在我们国家见过……”，卢森堡内心满怀兴奋和喜悦，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

1905年初夏，波兰地区的革命斗争再次掀起高潮。6月下旬罗兹工人与沙皇军警的冲突演变成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惊惶万状的沙皇当局调集大批军警进行血腥屠杀。罗兹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和沙皇当局的镇压措施激起了波兰和全俄各地的声援和抗议浪潮，进一步推动了全俄革命浪涛的高涨。沉浸在亢奋的革命情绪中的卢森堡以全部身心投入了支援波兰和俄国革命的活动，在波兰党的报刊上撰文指导斗争，用传单和小册子形式印刷地下宣传品偷运入波兰境内散发以鼓舞斗志，在德国党的报刊上撰文及时报导和评论革命事态的发展，呼吁德国工人支持波、俄无产阶级的斗争，募集资金支援波兰党的活动和帮助罢工工人。

^① 《卢森堡全集》1972年德文版，第1卷，第2分册，第484页。

在火热而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波兰党的领导人不断遭到逮捕和牺牲。她为被捕的战友、波兰党的领导人费·捷尔仁斯基的命运感到担心。她为革命前辈，曾多次给予她无私帮助のカ斯普夏克的罹难而悲痛万分。1904年春，作为波兰党领导人之一的卡斯普夏克在华沙的秘密印刷所与前来搜捕的警察交火，在击毙5名敌人后负伤被捕。1905年8月，华沙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9月被杀害。当卢森堡在获悉这一噩耗后，在党刊《战地》上撰文寄托深切的悼念之情。

革命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地闪现过去了，情况瞬息万变。重要的是，及时追踪事态的进展、给予科学的总结并作前瞻性的展望，以指导波兰党的工作。为此，卢森堡特别重视党的出版工作。她说，“我们现在必须播出版物。”在此项工作中，她首先带头身体力行。她不仅督促检查党的报刊《红旗报》、《战地》、《工人评论》等能否及时出版和内容是否充实，提出批评和建议，还对出版物的清样进行修改。更主要地，她本人亲自动手经常用波兰文为党的报刊撰稿，从而表明她仍然是党的首屈一指的理论家、政治家、工作指导者。她的论著涉及的问题是十分广泛的，从革命的战略到党的路线、方针一直到策略等各个方面，还包括对社会党的评论。她撰写了党的纲领性文献《下一步怎么办？》。该书最初作为《红旗报》的增刊刊出，后来在续写了第二、三部分后以单行本出版。为了广泛发动各阶层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天主教徒参加革命运动，她还专门写了两本论著《致波兰知识分子》和《教会与社会主义》。后者她用“约瑟夫·赫拉姆”的笔名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在该书中，卢森堡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视了天主教会发展的历史和教会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之后，精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和教会的立场。

卢森堡以波兰文撰写的关于革命的第一本论文集，在事件尚

在发展过程中的1905年,就以《沙皇俄国境内的革命发动》为题名在克拉科夫出版问世。她还为论文集《波兰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写了长篇序言。该文集除了卢森堡的一些论文外,还收入了列宁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以及考茨基、梅林、帕尔乌斯等人的论文。她在序言中阐述了波兰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与波兰社会党争论的来龙去脉,她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是为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而坚决斗争和最后解决此两项任务的唯一现实力量。但和过去一样,她仍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重建波兰独立国家是不可能的。她的这种不正确立场挫伤了一部分工人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也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了损害。

1905年8月,为了就近观察波兰事态的发展并在当地开展党的活动,卢森堡偕同约吉希斯来到了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逗留了两周。她满怀喜悦之情写信告诉考茨基夫妇说,她已“站在了维斯瓦(河)母亲岸边”。

1905年9月17日至23日,德国党在耶拿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卢森堡以波兹南等三地区代表的身份与会。她在大会上三次发言,除了谈工会与党的关系,对《新时代》杂志的看法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言论以外,着重谈了俄国革命问题。她号召德国工人支持俄国革命、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尤其是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经验。她批评了机会主义者把总罢工看成是“政治自杀”的错误观点。她指出,机会主义者之所以顽固地坚持单纯的议会斗争策略而否定总罢工,是因为“没有看到我们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由渐进突变为革命的时代已经来到”^①。她语重心长地强调,“我们看到了俄国革命,如果我们什么也学不到,那我们便是蠢驴。”^②

卢森堡的发言遭到了右派的恶毒攻击。沃·海涅、罗·施米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2分册,第602页。

^② 同上书,第602页。

特等人对她冷嘲热讽，说什么一些理论家并没有俄国工人那样的遭遇，虽然“某个时候他们来自波兰和俄国，可现在却坐在德国”，没有去参加那里的实际斗争并积累经验，却在写什么“革命”文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也随声附和这种论调，尖酸刻薄地讥讽说，如果有人想革命的话，尽可以到华沙去，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此等等。一份名叫《嘘声》的讽刺杂志，还三次刊登丑化卢森堡的漫画。

尽管如此，卢森堡还是怀着乐观的心情离开耶拿的。在致约吉希斯等人的信中，她认为“革命情绪主导者整个会议”、“整个耶拿是我们巨大的全线胜利”。确实，通过左派的坚持和努力，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广泛地运用群众性罢工”是工人阶级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在大会前后，卢森堡不顾党内机会主义首领的反对，多次旅行全国各地，到处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不倦地宣传俄国革命，号召向俄国革命学习。

1905年秋，卢森堡在柏林多次接见列宁派来的使者瓦·伏洛夫斯基，列·克拉辛、拉多夫等人，商谈波兰党和俄国党的合作事宜。卢森堡还接受列宁的提议，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份合法报纸《新生活报》的合作者。列宁和卢森堡都把过去的争论搁置一边，开始了紧密的合作。卢森堡还表示同意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使波兰党与俄国党合并和参加即将召开的俄国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总之，在1905年这个俄国革命狂飙突起的年头，卢森堡整个身心者被革命吸引过去了，她以笔做枪，在一年内以惊人的神速和不竭的才思写作了数达60余件的论著、短评、宣言，阐述俄国和波兰革命事态的发展、经验以及波兰党、德国党应采取的战略策略。后来，她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创作热情时说，她是如此激动，以至“笔尖就像‘闪电’似地滑动”。即使这样，她仍对自己不满意，认为在“波

兰工作”方面做得太少了，“负了债”，甚至为此深感内疚。

4. 重返华沙与铁窗生涯

在俄国革命波涛汹涌之际，德国党内许多来自俄国和波兰的活动家闻风而动，纷纷返国参加革命斗争。对此，卢森堡也怦然心动，她在致约吉希斯的信中写道：“我对他们简直感到嫉妒”。

1905年岁末，莫斯科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俄国革命达到了高潮，波兰境内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革命的召唤和对祖国的眷恋思念，使卢森堡萌发了冒险重返故国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念。她假借同事安娜·马奇卡的名义，领取了赴俄的出国护照，得到了俄国领事馆的入境签证，以《前进报》记者身份赴俄采访。后一点是确实的，因为她在11月已接受倍倍尔的提议，担任了党中央和机关报《前进报》的固定撰稿人。

1905年12月28日晨，卢森堡登上了东去的列车，考茨基全家到柏林火车站为她送行。但火车在中途延误了很多时间，第二天才通过德俄边境。由于波兰铁路工人的罢工，列车无法运行，几经周折，最后她搭上了一列既无取暖设施甚至没有照明的军用列车，在12月30日这个风雪弥漫的寒冬之夜，回到了阔别十余载的华沙。

卢森堡以记者安娜·马奇卡的身份，投宿伐列夫斯卡伯爵夫人开设的、位于雅斯纳街一号的寄宿公寓。随后不久，她的恋人约吉希斯也从瑞士返回了华沙。

1906年初，波兰各大城市其中包括华沙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被革命声势吓坏了的沙皇当局调集了大批军警和哥萨克骑兵，用马刀和枪弹镇压革命群众，但罢工浪潮仍连绵不断。这一切正如卢森堡致德国友人信中所描述的，当时华沙正

处“在浪涛汹涌、风雨交加之中”。

在交织着血与火的日子，波兰的革命者没有动摇和犹疑，继续坚持战斗。在与波兰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卢森堡以沸腾的革命热情，与战友们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参加党的秘密会议，进行宣传鼓动、组织罢工斗争、会见工人积极分子、成立党领导下的工会、在军队中展开宣传和争取工作、写作传单、出版报纸和小册子。然而，作为假护照的持有者，卢森堡不宜过多抛头露面公开活动，她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写作，不停地写，以自己的辉煌政论指导斗争。她以满意的心情，在信中向柏林的朋友们通报说，“工作进展顺利”。她还指出，波兰工人的坚韧性和团结精神堪为德国工人的楷模。他们自愿把一周中一天的工资收入拿出来，支援被剥夺了工作的同志，以便共同坚持斗争。

繁重而紧张的革命工作，担惊受怕的地下生活，使体质本来就不佳的卢森堡疲惫不堪，但她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稍事歇息，也无暇与离别多年的哥哥姊姊们畅叙骨肉之情，与同胞们的会见只限于每周一次。

使卢森堡感到恼怒的是，波兰社会党的头面人物伊·达辛斯基以“公开信”形式，公然攻击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工人运动，怀疑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还反对波兰工人阶级与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卢森堡立即在党的理论刊物《红旗》上发表了题为《达辛斯基先生的“公开信”，评波兰社会党处于十字路口》，与达辛斯基展开了尖锐论战。她严厉谴责了对手提出的，在反对沙皇制度和俄国的名义下，波兰工人阶级放弃阶级立场，与波兰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要求。她指出，这将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使革命斗争陷于瘫痪，是一种反动的主张。接着，她还写出了另一本与波兰社会党论战的著作《联邦制纲领、评波兰社会党陷入怪圈》。卢森堡在该书中指出，幻想把沙皇俄国改

造成联邦制共和国是不现实的，是一厢情愿的“反动的乌托邦”。为了总结俄国革命经验，阐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原则，她还在1906年发表了两部著作：《来自革命时期。下一步怎么办？》、《论立宪会议和临时政府》。

从这一时期卢森堡的论战著作和正面阐述波兰党的纲领和战略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卢森堡提出的俄国革命近期斗争目标是：争取建立革命的临时政府，建立全俄的立宪会议、在华沙建立自治议会。从总体上看，是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目标基本上是吻合的，只是在民族问题的解决程度上有所差异。

1906年春，革命转入低潮，逮捕和迫害革命者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华沙。

3月4日，这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来说是个凶险的日子。这一天，约吉希斯从附近的“胜利”旅馆搬到了卢森堡暂寓的寄宿公寓。暗探早就把卢森堡作为行踪可疑的革命者予以盯梢。当晚，警察搜查了寄宿公寓，卢森堡和约吉希斯同时被捕。在她的住处搜出了许多非法出版物、印刷品的校样、她本人的手稿清样以及信件、未完成的俄文手稿《俄国和波兰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这是应《火星报》约请而撰写的一部专著。这份手稿随即保存于警察局的档案内，在事隔将近60年后的1973年，这份手稿发表于苏联的《工人运动档案》。

卢森堡被捕后押解到了市政府预审处囚禁。在提审中，她承认自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前进报》记者马奇卡。但她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被查明了，是早已被当局列为“恐怖分子”和“暴乱分子”的“罗扎莉亚”。

在沙皇警察当局侦查卢森堡“犯罪”事实的过程中，德国资产阶级反动报刊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当卢森堡被捕的消息传到德国后，德国资产阶级为此十分幸灾乐祸。柏林的《邮报》更是乘火

打劫,落井下石,就在当月公然撰文诬称她是“阴险毒辣的女人”、“嗜血成性的女干将”、“疯狂的女革命者”,还罗列了她在俄国和德国活动的“罪状”;并为德国能够“摆脱”她而欣喜若狂。这家报纸提供的“罪证”竟然成了沙皇当局“起诉书”的重要内容加以引用。

卢森堡被捕之初,波兰党组织大力进行了营救活动,甚至拟订了越狱计划。但由于卢森堡囚禁处所的转移而未能实施。

4月11日,卢森堡作为重要的政治犯被押解到了以警戒森严、阴森可怖闻名于世的“华沙要塞监狱”。按照革命者的“传统”习惯,她也把自己的姓名镌刻在狱墙上。华沙警察当局对卢森堡的“案情”十分重视,到处收罗“罪证”,拟判重刑,甚至酝酿把她移交军事法庭审判,所以她被移交法庭侦查审讯的过程拖得很长。她拒绝了亲友们劝她上书俄国总理大臣请求赦免和要求德国驻华沙领事介入此事使她获释的提议。在狱中,由于非人的待遇、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使卢森堡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她进行了绝食斗争。但她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在党组织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偷着撰写论文,送出狱外,用她自己的话说,想以“雷霆万钧之势”,参加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为俄国党的4大作准备。身陷囹圄的卢森堡被剥夺了参加俄国党的第4次代表大会的可能。这是她早就盼望并作了充分准备的,因为在这次拟议的大会上,将实现波兰党加入俄国党作为它的一个地区组织,还要商讨党的战略策略,意义十分重大。为此,她深感遗憾。但使她感到欣慰的是,当俄国党的4大于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时,她的战友阿·瓦爾斯基、费·捷尔斯基等人在这次大会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根据她的指示精神支持了布尔什维克,从而加强了两国革命运动和两党的合作。

整整4个多月非人的铁窗生活吞噬了卢森堡的健康。她再次

以绝食进行抗争，但政治犯的恶劣待遇丝毫没有改善。后来，卢森堡在回忆她哥哥来探监的情景时，写道：“在那里我被带到一个完全用铁丝编起来的双层笼子里。这就是说，一只小笼子三面脱空地放在一只更大的笼子里面，我们必须隔着两层闪闪发亮的铁丝网交谈，因为那时正是我绝食6天之后，我是那样虚弱，以至那个宪兵上尉，即我们的典狱长，不得不把我连拉带拖地送到探监室。我双手紧紧抓住铁丝支撑着身子，这样更像动物园里的一只野兽了。笼子搁在屋内光线非常昏暗的一个角落里，我的哥哥把脸紧贴着铁丝网。‘你在哪里？’他不停地问，一面擦抹夹鼻眼镜上阻挡他视线的眼泪。”

即使在疾病缠绕，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卢森堡仍在狱中反复思考着俄国革命进程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如何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当时，俄国革命开始转入低潮，普列汉诺夫及其孟什维克追随者和西欧、德国的机会主义者沆瀣一气，顶礼膜拜资产阶级合法性，对武装起义等革命行动横加攻击，大肆诽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密谋家”、“布朗基主义者”，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微弱的表现形式——杜马当做偶像来崇拜，鼓吹议会斗争第一，实质上要求党和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局限于议会斗争范围之内。正是在此期间，卢森堡针对上述谬论，完成了重要论文《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并由人偷带出狱，交付波兰党的理论刊物《红旗》于6月刊出。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卢森堡严厉批驳了普列汉诺夫之流妄图取消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她指出，这伙人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因而放弃革命行动，寄希望于沙皇的骗人的杜马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她表示支持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路线，“即重点放在杜马外，放在人民群众积极革命行动之上的策略”，^①认为这是唯一正

^① 《卢森堡文选》第1卷，华沙版，第491页。

确的路线。这表明，在有关俄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卢森堡的基本观点和列宁是完全一致的。

经过波兰、德国、俄国党的同志们多方奔走和大力营救，沙皇当局又慑于卢森堡在国际上的巨大威望，不得不同意假释病魔缠身的卢森堡出狱就医。因为6月9日的体检表上记载着卢森堡确实患有多种疾病：严重贫血、视力减退、心痛、心动过速、失眠、肠胃粘膜炎症、肝肿大等。医生建议尽快采取治疗措施，其中包括矿泉治疗。6月28日，由卢森堡的哥哥马克西米利安出面，在交纳了数达3000卢布的巨额保证金以及向宪兵局长苏希科夫行贿2000卢布款项后，卢森堡于7月8日假释出狱。应该说明，上述巨额款项远远超出了小康之家卢森堡亲属的经济承受能力，主要是波兰党秘密筹措和德国党支援的。倍倍尔不但亲自参与了组织营救活动而且慨然允诺从党的经费中拨款支援。

卢森堡以就医名义假释是有条件的。沙皇当局规定她不得离开华沙，听候法庭传讯，随传随到。与卢森堡同时被捕的约吉希斯，由于他过去从事革命活动的“罪行”以及当前的革命行动，新帐老帐一起算，因而不但未能获准假释而且被判处8年苦役。但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很快就越狱逃跑了。

卢森堡出狱后，在养病过程中还曾数度接受传讯，审讯档案中不断增添新的“物证”，指控她“图谋推翻国家制度”，处境异常险恶，有移交军事法庭重判的威胁。但卢森堡处险不惊、镇定自若，继续从事著述和指导波兰党的工作，正如她在致友人信中所说的，她为“工作和写作的愿望所燃烧”。在同志们的催促下，她于8月1日借用了别人的一张身份证，机智地摆脱了密探的监视，潜离华沙。卢森堡是怀着依恋和黯然神伤的心情离开华沙的。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告别华沙，从此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国和华沙。

脱险的卢森堡来到了彼得堡。在这里，迎候她的有费·捷尔

任斯基，当时他正在俄国首都从事活动，既是俄国党的中央委员，又是波兰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彼得堡短暂逗留期间，卢森堡来到了涅瓦河滨中路6号，与列宁第二次晤面。随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化名“费莉茨娅·布杰沃维奇”，办了假身份证的卢森堡和列宁先后抵达芬兰的库沃克卡拉（今苏联境内雷皮诺）。此地政治气氛虽不像俄国本土那样紧张，但仍有暗探出没。卢森堡的住处与列宁相距不远，两人过往甚密，多次深入探讨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问题，加深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和支持，尽管两人有时也在某些问题上热烈争辩，但相互十分尊重。正是在此期间，当列宁对卢森堡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后，称她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①十分赞赏她在俄国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卢森堡也十分尊敬列宁，还热情约请列宁为德国党的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撰稿。列宁欣然允诺。这样，在1907年第3期《新时代》上，首次出现了列宁的文章。

在此期间，卢森堡通过逗留在彼得堡的捷尔任斯基与波兰党以及自己的亲属——哥哥马克西米利安和约瑟夫保持着联系，继续指导波兰党的斗争和商谈她潜离华沙后的善后事宜。

5.《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

正是在芬兰短暂避难期间，卢森堡完成了在狱中已撰写了一多半篇幅的《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这部中等篇幅的重要著作。在该书中，她试图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工人运动史上首次创造出来的群众性罢工，特别是总罢工的意义。她批驳了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和方法的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69页。

法。她指出,决不能局限于议会斗争,人民公开的政治斗争在客观上可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问题,主要应该从发动群众的角度进行探讨,以便把工人的行动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来。她强调指出,俄国革命的经验对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具有重大意义。德国无产阶级应该重视和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并当做自己的事业,这不仅出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首先应该当做自己社会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列宁对卢森堡的这一著作是赞许的,认为是对俄国革命,尤其是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用德语写成的最好的著作”。

在这部书的一开头,卢森堡论证了群众性罢工的意义和由来。她指出,俄国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性罢工思想……以及总罢工本身”,使之成为“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最强大的武器”。^①

这与过去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与政治斗争无关的群众性罢工是截然不同的,也不是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那种由“上层决定”、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斗争方式,“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②群众性罢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是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条件发生深刻的内在急速变化的标志”,^③“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的表现形式”,^④它的“内在机制”在于,“它是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不停的相互影响为基础的”。^⑤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1卷,第494、496页。

② 同上书,第500页。

③ 同上书,第501页。

④ 同上书,第532页。

⑤ 同上书,第538页。

那么，俄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群众性罢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德国呢？因为两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都是完全不同的。卢森堡自己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通过详细的分析和对比后，她得出结论说，尽管国情不同，但两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是相似的，这种斗争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德国，这是因为“群众性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形式，而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愈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愈是突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愈发展，群众性罢工必然会愈是强大和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①“因此，群众性罢工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②

据此，卢森堡告诫德国无产阶级不应把自己的斗争方式局限于守势的议会斗争，因此，“在德国一旦进入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行动时期，社会民主党就无论如何也不应仅仅把自己的策略死死固定在议会中采取守势”，^③而应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发动强大的群众斗争。

在《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这部著作中，卢森堡还精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与工会组织的关系，工会斗争与议会斗争的实质，批判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关于工会应独立于党和党的政策之外的种种谬论。她说，工会的斗争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党则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未来利益和整体利益。因此，工会与党的关系应当是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而如果说那种关于工会与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在工会领导人中间如此受到赞同，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对工会的本质及其在工人阶级普遍的解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1卷，第563页。

^② 同上书，第564页。

^③ 同上书，第566—567页。

放斗争中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错误认识。卢森堡强调指出：“就其本质而言，议会斗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上的改良工作一样。议会斗争又是政治性的当前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性的当前工作一样。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议会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这也和工会工作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一样。”^①

根据以上认识，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看来，关于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就不单纯是理论上的误解了，也不单纯是本末倒置了，而是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倾向的表现，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②

从以上论述看来，卢森堡关于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的作用和关系的见解不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而且不乏深刻的独到见解。但是，也必须指出，卢森堡的认识尚有不足之处，她论述党的领导作用时，大体上停留于强调政治上的领导，而忽视了党的组织作用，这是和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这不能不说是她认识上的一个缺憾。

1906年9月中旬，卢森堡从芬兰重返德国，在汉堡停留了数日，以解决她的《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一书的付梓问题。

卢森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考茨基对该书的评论意见，特别是如何看待她的一个主要思想，即强调必须把工会置于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的想法。这次会见的目击者，当时正在德国的布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1卷，第573页。

^② 同上书，第573—574页。

尔什维克党的女活动家亚·科隆泰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见的：

“我有机会成为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会见的见证人。其特点是，考茨基注意谛听并表示赞同。使人感到，罗莎·卢森堡不必如此胆怯地等待‘教皇’^①的判词，在交谈意见中，实际上是‘学生’带领着‘教师’走，迫使他稍稍壮着胆靠左走。”科隆泰还说：“毫无疑问，如果说考茨基在曼海姆（1906年）和耶拿（1907年）党代表大会上之所以站在比较革命的立场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卢森堡的影响。”

1906年9月23至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曼海姆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刚回到德国的卢森堡不顾自己病后的虚弱和旅途劳顿，就匆匆赶去参加这次党代会。德国工人运动能否从1905—1906年俄国革命中学习什么经验？特别是可否把政治性总罢工当做工人阶级斗争的武器？党和工会究竟是什么关系？以上问题是这次党代会热烈探讨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激烈交锋的焦点。

受到俄国革命洗礼的卢森堡在大会上两次发言，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认真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坚持和维护1905年耶拿党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承认群众性罢工是德国无产阶级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的决议；工会决不能和党平起平坐，工会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服从于党的政策和路线。但是，以倍倍尔为首的党的执委会却屈从于工会内机会主义首领大卫等人的压力，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立场，倒向了右派一边。尽管蔡特金、梅林、李卜克内西等人支持卢森堡的观点，但机会主义者在人数上占了上风，他们放肆地向卢森堡鼓噪进攻。倍倍尔对此也未加阻止。卢森堡不得不对倍倍尔提出了批评。这次大会的决议实际上把党

^① 指卡·考茨基。当时考茨基的机会主义面目尚未充分暴露，许多人仍把他当做马克思主义的“教皇”。——本书作者附注

贬低为一个同工会平行的组织。这意味着修正主义者又一次在德国党内取得了胜利。卢森堡为右派势力在党内的猖獗而深感不安。于是，她直接面向群众，在工人集会上，在党的报刊上，到处热情介绍和大力传播“俄国的斗争方法”，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教育群众，受到了工人群众和革命左派的欢迎。

6. 在德国的第二次牢狱之灾

俄国和德国的反动当局象害怕火一样害怕卢森堡的革命言行，他们犹似一对难兄难弟，配合默契，不约而同地相继对卢森堡采取了迫害行动。

1906年9月15日，沙皇政府内政部对华沙宪兵总局关于卢森堡的“身份”问题的请示给予了批示。它指出，卢森堡虽然由于与外国人结婚而获得了外国国籍，但按照帝国法律，只有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卢森堡只举行平民结婚登记且后来离了婚，由此卢森堡获得的外国国籍是无效的，“因此，卢森堡应认为仍然是俄国臣民”。9月26日，华沙宪兵当局通知卢森堡的哥哥马克西米利安，命令卢森堡务必于11月5日前到该局报到并听候审理，卢森堡以健康状况为由发出陈情信件予以拒绝。11月14日，华沙总督斯卡隆把卢森堡—约吉希斯一案移交华沙军事法庭审理。法庭决定没收保证金，缺席控告卢森堡犯了“叛国罪”并发出了通缉令。该通缉令还具体开列了卢森堡的相貌特征：中等身材，黑发，栗色眼，鼻，嘴适中，长圆脸，在右颊嘴角附近有一块胎痣，真可谓煞费苦心。但沙皇当局慑于国际舆论的愤怒反应和卢森堡的巨大威望，未敢贸然向德国政府提出引渡的要求。

1906年11月底，卢森堡接受了同志们的提议，到意大利的旅游地摩德纳短暂度假。在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斗争、铁窗生涯、

紧张工作之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确实该稍事歇息了。但波荡漾的加尔湖的秀丽景色使她心旷神怡。但是，严酷的现实却中断了她的休假，因为德国反动政府又向她伸出了迫害的魔掌，要她出庭听候审理的一纸传票又把她召唤了回来。

1906年12月，德国魏玛市的“国家法庭”亦步亦趋，紧跟俄国沙皇政府对卢森堡的迫害步伐，“控告”卢森堡在德国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企图“煽起暴动”、“危害国家安全”，悍然判处她两个月徒刑。但在工人群众强烈抗议的压力下，当局暂时还未敢将这一判决立即付之执行。

1907年春，从华沙的莫科托夫监狱越狱脱逃的约吉希斯来到了德国。在柏林与卢森堡再次会晤。可是，他们两人之间过去那种炽热的爱情却冷淡了下来，出现了感情上的疏远。此中缘由，人们至今不甚了了。从此，他们之间已不再存在亲密的私人关系，但仍保持着战友的情谊。人们发现，此后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已不再谈及私人的事务，只是就党务或工作上的事交换意见。

卢森堡理智地、冷静地对待个人生活上的坎坷，继续以全部身心从事革命事业。

1907年4月，列宁在赴伦敦参加俄国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途经柏林，再次与卢森堡会晤。就大会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人观点完全一致。正如列宁稍后所指出的。“在一切根本点上……是一致反对孟什维克的”^①。列宁还热情地敦促她务必与会，卢森堡欣然允诺。

伦敦，1907年5月初，冬春之际笼罩城市的雾霭刚刚消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里召开了第5次代表大会。卢森堡以德国和波兰两党的双重代表身份应邀与会。她的战友马尔赫列夫斯基、约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5卷，第343页。

吉希斯等人则以波兰党的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卢森堡以德国党的名义致祝辞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她充分肯定了俄国革命的经验，高度赞誉了俄国党所取得的业绩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她指出，俄国革命使德国党的队伍重新振作了起来，增添了新的策略口号——群众性罢工。“这种口号已不再指望议会活动，而是指望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登场了。”^①她还预言，随着德国国内情势的发展，德国或迟或早也会出现一个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时期，正因为如此，德国无产阶级把俄国兄弟当作他们的先驱者，当作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加以双倍的重视。她还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需要根据马克思基本原理去扩展和充实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担负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党：不是在国家生活处于正常的，平静的议会政治时期，而是在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期应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她还指出，在现时期，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它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革命作用，无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先锋，在民主革命中也将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广大农民群众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卢森堡的讲话多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凝神谛听的列宁也不时热烈鼓掌。卢森堡的讲话结束时，列宁从座席上站了起来，高兴地“搓着手”，趋前与她紧紧握手表示感谢和祝贺，还说：“罗莎同志，您的发言好极了。”

在此后几天的讨论过程中，卢森堡还数度大会发言，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坚定不移地支持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痛斥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观点。她猛烈地抨击了普列汉诺夫之流只知道迷恋于议会的讲台，苦思冥想地想从琐碎的议会活动中寻找阶级斗争的微弱“苗头”，而无视和鄙视广

^① 《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506页。

大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直接的革命行动的机会主义观点。她幽默地引用德国诗人席勒的诗句，把普列汉诺夫之流比作席勒笔下那头愚蠢的“野兽”，只知道在议会斗争的“贫瘠的荒野上”转圈子，而看不到周围群众革命斗争的“绿色牧场”；“一个家伙，苦思冥想/像一头野兽，在贫瘠的荒野上/而周围却是美丽的绿色牧场”^①。卢森堡还严厉地斥责了机会主义者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卑劣行径，形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这只雄鹰搏击长空的学说，而你们却把它变成了正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粪堆上寻觅着一颗珍珠的母鸡发出的无限忧愁的咯咯叫声。”^②

列宁对卢森堡的会上发言十分赞赏，认为她的发言是俄国党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会后，列宁和卢森堡还进行了几次私人会晤。

与会的一位代表，在当时发表的《代表的札记》中写道：“罗莎·卢森堡同志完全赞同布尔什维克”。这位代表就是约瑟夫·斯大林。

总之，从十九世纪末期两种思潮论战到1905年俄国革命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围绕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改良还是革命，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经验，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俄国党内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与机会主义右派的分野和斗争进一步明朗化和激化。机会主义右派从高尚的议会座席上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种种方式予以低估和诋毁，以掩饰自己的怯懦和背叛。他们声称，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是发生在“半野蛮”国家里已属于“过去”了的革命，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无关”。他们把普列汉诺夫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背叛性声明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1卷，第596页。

^② 同上书，第600—601页。

作为反对革命派的杀手锏，他们诡称政治总罢工和武装斗争是封建落后国家的一种表征，西方“文明”国家的工人已普遍有了选举权和政治民主、议会政治，所以不需要这些“野蛮”的斗争形式了。他们企图抹煞群众革命运动，政治总罢工以及武装斗争这种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式的意义，沿着议会政治的老路走下去。卢森堡作为德国党内左派力量的卓越组织者和旗手，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左派的杰出代表，始终不渝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走社会革命道路，又亲身经历了俄国革命的战斗洗礼，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论著和讲话中，她以自己特有的革命家的战斗热情和理论家的锐利思想，痛斥了那些迷恋于议会讲台而无视群众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分子，批判了那些沉溺于“逐步改善工人生活”而放弃革命最终目的的机会主义庸人，抨击了关于在现代军事条件下武装起义已经过时的取消主义滥调。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尤其是俄、波两国1905年革命过程中，在反对德国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家”的斗争中，卢森堡逐渐形成了她那光辉的革命思想：两个阶级决战的时刻或迟或早总是要到来的，那时，最后的发言权属于广大群众的直接行动；那时，将由街道上和工人里的无产阶级在与敌对阶级的搏斗和较量中作出社会转折的决定，而不是在议会党团的俱乐部内，由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和工会领袖同政府和资本家的代表，在绿色的谈判桌上作出社会转折的决定。这充分显示卢森堡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胸襟和远见。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卢森堡过高地估计了革命运动中“行动本身教育群众”的作用，忽视了无产阶级政党启发和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和斗争水平的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作用，从而使卢森堡在发动和领导德国革命群众运动的具体实践中未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卢森堡和整个德国左派的一个共同的弱点。

当卢森堡于1907年5月从伦敦返回柏林后，等待着她的是牢狱的大门。魏玛法院在工人抗议浪潮平息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宣布执行上一年对卢森堡的判决。这样，从6月12日至8月12日，卢森堡被囚禁于魏玛市“国家监狱”。这是卢森堡在德国的第二次坐牢。身囚铁窗的卢森堡不仅自己蔑视敌人的刑罚，还以火一样的热情，从狱中写信给荷兰的一位女战友，勉励她去掉厌倦情绪，勇敢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坚持下去，“你要留在队伍里，这是我们的义务。因为我们都是战士。”

五、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调和还是斗争？

1. 帝国主义的理论与研究 反帝斗争的实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过渡。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军国主义，疯狂地扩军备战，无情地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频繁地发动侵略战争，谋求重新瓜分世界。扩张、掠夺、冲突、战争，从帝国主义这个“魔盒”中释放出来的瘟疫，在世界各地到处溃烂成灾、吞噬一切。

如何认识这些纷繁复杂的，新的历史现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何对待这些世界政治中最尖锐的问题，是调和还是斗争？无可回避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在德国党内和整个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中，卢森堡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军国主义和战争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即帝国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

早在1898年，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部名著中，卢森堡就中肯地指出了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来说，军国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原因有三。“第一，它是正在竞争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的斗争手段，第二，它无论对于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第三，它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①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99页。

在1899年2月发表的《民军和军国主义》一文中，卢森堡进一步精辟地分析了军国主义对于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中的必要性。她指出：“军国主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上是完全不合理的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压低他们经济生活水平，目的是使他们在社会上受奴役；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在经济上是最光辉的、无法替代的投资方式，正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支柱一样。”^①

由上可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卢森堡最先清楚地认识到，军国主义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死敌，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卢森堡告诫国际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它们的权力和统治都凝结在军国主义之中，而社会民主党是原则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唯一政党。因此，反过来说，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斗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本质。放弃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根本上否定同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斗争。”^②因此，卢森堡在德国党内和国际舞台上不倦地大声疾呼，要求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把反对军国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起初，卢森堡还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而使用“世界政策”这一用语来表述帝国主义的外部主要特征。

早在19世纪末，卢森堡就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侵略的扩展，特别是对亚洲和中国侵略行径的加强，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折。早在1898年，卢森堡在评论美西战争的《一次胜利的代价》一文中，她指出：“美国夺得菲律宾以后，美国就不再仅仅是美洲的一个强国，而是成了世界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56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列强之一。门罗主义这个防御性口号让位给一种进攻性的世界政策，一种在别的洲实行兼并的政策。但这意味着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①从而使美国与英、德、俄发生国际冲突，进而造成了更大的战争危险。与此同时，美国效法欧洲列强，“采用普遍兵役制和常备军，这样一来，地道的军国主义就大张旗鼓地进入美国了。”^②这样，由于美国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它就面临着外交和内政、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变革。”^③在1899年初发表的《世界政策的变动》一文中，卢森堡进一步明确指出，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中日战争不仅在亚洲的发展中，而且也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时代。”^④由于这场战争，使“整整一个大洲可以供受到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奔驰了”^⑤。“开发中国却既给国际政策又给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块取之不尽的肥沃土壤”^⑥。卢森堡正是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对亚洲和中国的掠夺侵吞，得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若干基本特征：“随着对亚洲的瓜分和吞噬……世界真正被瓜分完毕了”^⑦，而随着世界的瓜分完毕，“资本主义本身就将进入穷途末日”。^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卢森堡已经有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思想萌芽。

卢森堡还进一步论证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和亚洲所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的国际和国内的后果：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矛盾尖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54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③ 同上书，第57页。

④ 同上书，第66页。

⑤ 同上书，第67页。

⑥ 同上书，第67页。

⑦ 同上书，第69页。

⑧ 同上书，第69页。

锐化”，引起了欧洲的“大规模陆地和海上备战的新纪元”；“通过开发中国而开辟的军国主义、海上扩张主义和保护关税的纪元反过来影响欧洲国家的内部社会关系，加深了反动，使政府和统治阶级为一方，劳动人民为另一方的矛盾尖锐化”^①。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这既在政治上也在经济上给阶级斗争带来了强有力的新的动力”。^②

由上可知，当帝国主义刚刚在地平线上露出它可憎的面目时，卢森堡已深刻地分析了它的若干特征及其造成的后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有力地说明了，卢森堡确是国际共运史上帝国主义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日益增长，反对军国主义问题就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席佩尔、海涅等人公然拥护德国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政策和殖民政策，并企图以此为代价，乞求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和“补偿”，从而暴露了修正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推行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的同谋和帮凶。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与战争的态度，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者的错误立场，向工人阶级指出斗争的方向。卢森堡当仁不让地担当了这个重任。1900年7月，卢森堡发表了《世界政策的成果》一文。她指出，英国之所以与南非的布尔人发生战争，是“由于它的帝国主义欲望而陷入的一场冲突”。^③卢森堡的这个正确判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是因为，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帝国主义”一词作为一个褒义词来运用，用以表达“文明国家的威望”。现在，卢森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68页。

② 同上书，第68—69页。

③ 同上书，第230页。

堡却对它重新作了解释，把它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以此表示对世界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掠夺、剥削落后地区的“欲望”，卢森堡的这个独创性见解在学术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卢森堡还明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即她所说的“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世界政策在所有情况下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导至同一目的：加强军国主义”。^①在1899年10月德国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她还要求把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这是因为：“军国主义是资本国家最重要具体的表现，如果我们不反对军国主义，那末，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将是空谈。”^②

卢森堡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尤其使中国人民感到亲切和可贵的是，她从一开始就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一贯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其中包括德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表的文章和演说中，卢森堡反对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胶州湾，反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她指出，随着1897年对胶州湾的占领，后起的帝国主义德国才确立了它的“世界政策”的新纪元。她还指出，如果说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冲突的舞台，“那么这并不说明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而只不过是已经确立的政洲对立被移植到中国并在中国土地上爆发而已。”^③换句话说，卢森堡已深刻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只是争夺中国，只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应该说，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对当时中国事件的最早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伯恩施坦的态度。在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30页。

②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1卷，第261—262页。

③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分册，第397页。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明目张胆地为德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辩护，说什么即使德国不占胶州湾，其它国家也会下手的，所以德国党不应谴责而应赞同德国政府取得胶州湾。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决定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秋季，英、德、俄、日、法、奥、意、美组织了八国联军进行远征。德帝国主义在这次远征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不仅联军由德国将领瓦德西为统帅，而且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马，于德国远征军在不来梅港登船之前，对士兵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不要宽恕，也不要抓俘虏！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就遭殃。”他公然要求德国士兵像1000年前匈奴人那样残暴地屠杀，使德国人的声威在中国流传千年：“使中国人永远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威廉二世这一野蛮讲话历史上称之为“匈奴演说”。怒不可遏的卢森堡立即作出了反应，在事件刚发生不久的9月，就谴责正在中国登陆的德国远征军要完成的使命是“匈奴人的文化使命”。^①

对于德国政府这次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文章，还像平时那样把制止侵略行为的希望寄托于国会，卢森堡对这种“议会痴呆症”是极为不满的。1900年9月17至21日，德国党在美因兹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卢森堡借用这个机会，从庄严的讲台上而次发言，批评了党的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呼吁党广泛而深入地发动群众，并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采取实际行动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她强调指出：“中国战争是世界政策新纪元的第一个把所有文明国家卷进去的事件，联合起来的欧洲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67页。

各工人政党必须立即用抗议来回答国际反动派——神圣同盟的这第一次进攻。在这方面，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个国家的党（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本书作者附注）本来应该采取主动。”^①她还指出，想依靠国会解决问题只是幻想，因为国会不久前才批准了扩展庞大舰队的提案，从而证明它是“世界政策的最可靠的支柱”。她认为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唤起群众，发动抗议运动，揭露战争的实质。

1900年9月23至27日，进占北京的八国联军正象野兽般地在那里烧杀掳掠，而巴黎却恍如世外桃源，社会党国际正在这里举行代表大会，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大会的主题。会上的气氛冲破了这座城市表面上的平静，把人们拉回到了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来了。卢森堡在会上作了《人类和平、军国主义和常备军》的主报告，她的精彩的报告不时被掌声所打断。她指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是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的反动潮流，是“帝国主义世界政策”变本加厉的表现。因此，她把“世界政策”、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看成是新的帝国主义现象的三位一体的表现，是新的战争威胁。她指出，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经常性的政治行动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她还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或许还要长久保持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丧钟迟早会敲响，为了使我们在决定性时刻担负起伟大的任务，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必要通过不断的国际行动为这一时刻作好准备”^②。这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卢森堡第一次从理论上比较明确地阐明了军国主义、现代战争与帝国主义发展的关系，并指出了国际工人运动应采取的态度。与会代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接受了她这个表达大家共同心愿的提议。在会上，卢森堡还首创性地提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71页。

^② 同上书，第275页。

战争的若干实际斗争方法，大会接受了她的提案并写入了决议：以反军国主义精神教育和组织青年；社会主义政党的议员在国会中投票反对推行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的拨款；组织反对军国主义的抗议运动^①。包涵上述内容的大会决议在当时对于帮助各国党统一认识，动员工人阶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卢森堡在巴黎大会上的报告是她首次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的发言，给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使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声誉和影响。一位初次见到卢森堡的荷兰社会党女活动家，亨林达·罗兰——霍尔斯特是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印象的：卢森堡“她那深沉而动听的嗓音，她那美妙的表达方式，她的自制力，在大会上沉着的自信，使大会的政治激情达到了沸腾的热度……这一切给予我极大的印象。这比她提出的论据更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正是由于她在第二国际中的巨大威望和影响，1904年春，卢森堡被选入第二国际“国际局”成为其成员。该局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是第二国际的通讯联络机构。在该局的任职使卢森堡有更多的机会广泛接触各国社会党领导人，也有助于她开展国际性活动。

阿姆斯特丹，1904年8月14—20日。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仍是大会关注的主题。卢森堡以波兰党和德国党的双重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她还被选入大会下属的“社会主义策略原则委员会”工作。不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委员会的会议上，卢森堡多次发言，阐明了国际社会党人在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受到了各国代表们的欢迎和提戴。卢森堡在私人信件中也表示，认为大会是有成果的，使各国党的立场

^① 参阅《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74页。

有了接近，国际主义感情有了增强，有利于克服社会主义沙文和民族主义。

在二十世纪初交织着危机与战争的年代里，卢森堡除了从理论上研究帝国主义，参加国际活动和发表文章外，还不顾自己的体弱多病，冲破了机会主义者的反对和阻挠，奔走德国各地，出席了数十次群众集会，到处发表讲话，形象、生动、深刻而富有说服力地揭露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发动战争的罪恶图谋，号召德国和各国工人阶级提高认识，加强革命斗争，增强国际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真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只是1906年投身波兰和俄国革命以及铁窗生涯才使她暂时中断此项工作。

斯图加特，1907年8月18—24日，闷热的溽暑刚刚过去，正是中欧凉爽的初秋。但聚集在这里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各国社会党人的心头却并不轻松，因为这是军国主义日益猖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连绵不断，工人运动承受巨大压力的年头。

这时，德国党内过去号称马克思主义权威的考茨基的机会主义倾向已日趋明朗化。他为了控制大会，一方面竭力支持极右派伯恩施坦等人出席大会，一方面玩弄手法排斥左派，特别是阻挠卢森堡与会。经过多方斗争，刚从魏玛监狱释放出来的卢森堡不但作为波兰党代表团的成员，而且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也从德国地方党组织那里获得了代表资格证书，从而赢得了第一个斗争回合，即争取与会权的胜利。这充分说明，卢森堡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是深得人心的。卢森堡深深懂得，争取代表资格仅是前哨战，斯图加特大会将是左派革命力量与右派机会主义力量的严重较量。因此，在出狱后的第三天，即8月15日，她无暇稍事休整，就提前来到了斯图加特，寄居在好友蔡特金那里，一方面是为了参加大会前的国际局会议，另一方面也是为大会上的斗争作好充分准备。

列宁亲自率领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这次意义重大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卢森堡以十分诚挚的口吻，悄悄向不认识列宁的蔡特金介绍说：“仔细瞧瞧那个人，他就是列宁。瞧他那个固执倔强，稍带亚洲人轮廓的头。这个头有翻江倒海的雄图，也许这个头会被碰碎，但它决不会屈服。”

当时，不祥的战争阴影正在欧洲上空急剧聚拢。德、俄、奥、法的参谋总部内，将军们正聚精会神地拟订各种作战方案，军备竞赛正以疯狂的速度加紧进行，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的重担压得工人群众喘不过气来。国际工人运动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因此，如何对待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就成为这次大会激烈辩论的中心议题。各国党代表团起草了好几个决议案，虽然指出了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都有重大的政治缺陷，要么把议会斗争说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形式，要么笼统地、单纯地把争取和平的口号来代替反战要求。倍倍尔代表德国党提出的决议草案就属于前一种情况，因而不能使列宁和卢森堡满意。于是，卢森堡和列宁紧密合作，以他们的名义共同提出了决议修正案，并由卢森堡在大会上宣读。修正案首先分析了军国主义的实质，指出：“……这些战争是军国主义不断进行军备竞赛的必然产物。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从经济上、政治上奴役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然后，修正案向工人阶级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如果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威胁，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采取适当手段阻止战争爆发，这种手段要根据阶级斗争尖锐的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自然地加以改变和强化。如果战争还是爆发了，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力求迅速结束战争，并且竭尽全力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崩溃。”^①

^① 以上引文见《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38页。

为了使这个革命性决议获得各国社会党人的共识和通过，卢森堡和列宁在争取和团结国际工人运动左派力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他们轮流在各自的驻地召集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各国左派举行非正式会议，共商对策，紧密配合，从而挫败了右派的阻挠和破坏，终于使决议为大会所通过。这个决议以马克思主义精神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道路。这是以列宁和卢森堡为代表的革命左派反对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一次重大胜利，并在此后的反帝反战斗争中继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大会还在无产阶级政党与工会的关系问题，殖民地政策问题上击败了机会主义者的进攻，作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决议。

在大会进行期间，在斯图加特还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卢森堡出席了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

2. 党校任教与《国民经济学入门》

从斯图加特返回柏林后，卢森堡开辟了新的工作战线——接受党的委派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任教。这所党校是1906年创办的，办校的宗旨是培训党的地方组织的干部。由于左派在该校处于主导地位，这所德国党的中央党校也就成了培养左派的阵地之一。从1907年10月起，她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这两门课。稍后，她又接替弗·梅林讲授社会主义史。每月授课50小时。这对卢森堡来说，不仅开辟了工作新领域，而且也改善了她个人的生活状况。任课使她每年有了3600马克的固定收入。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薪资，比她过去一些年主要靠撰写论著的稿费收入维持清贫生活要强多了。卢森堡在党校的教学生涯一直延续到1914

年大战爆发前数月。和卢森堡同时在党校任教的既有她的战友梅林以及海·敦克尔，也有她未来不共戴天的仇敌——杀害她的元凶之一弗·艾伯特。她的学生中间有未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德国首任总统威·皮克等人。卢森堡的讲课是极受欢迎的，她以思想的深刻性、论证的雄辩性、资料的翔实性、讲述的生动性像磁石般吸引了学员们的心，使本来似乎枯燥和艰深的理论问题显得明白易懂，更主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党的日常斗争和长远任务，使熟悉党务的同志能迅速提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得益甚多。

随着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左派与机会主义左派两股力量斗争的激化，党校也成了双方争夺的阵地。机会主义者艾斯纳等人对左派在党校占据主导地位深表不满，在1908年9月13日至19日举行的党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对群众和干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据此提出了取消党校的主张。出席大会的卢森堡不得不在会上就党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指出了对党的干部进行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她指出，“群众缺乏的是普遍的教育，理论使我们有可能把生活的原料系统化，并且将它们锤炼成反对我们敌人的致命武器”^①。在左派的努力下，击退了右派的进攻。此后，她还在学员们的拥戴下，挫败了伯恩施坦等人想把她从党校排挤出去的图谋。

正是在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期间，从1908年开始，卢森堡着手写她那部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入门》，断断续续写了多年，战前已完成大部分篇幅，大战期间于狱中最后修改定稿。这部共有10章的著作由于战争当时未能出版，1919年卢森堡被捕抄家时，后半部书的手稿，即研究理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部分，反映她的经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56页。

济观点的主要部分遗失了,至今未见踪影。因此,该书在1925年首次出版时,只收了前5章和第6章的一个残篇。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但是,即使是一部不完整的著作,我们仍可以看到,卢森堡在《入门》的前半部不但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批判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种种谬论,而且以大量新的历史事实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资本论》发表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规律,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创性见解。因此,《入门》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历史文献。

按照卢森堡原来的设想,这部书应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通俗化。这一点她是出色地完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她笔下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胡编乱造的伪科学在她的剖析下显得幼稚可笑,无处藏身。在剖析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时,卢森堡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她指出,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生产的技术发展水平,而是所有制关系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了不同生产方式的特点。只有从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变化这个角度来考察,才能理解“整个生产的性质,以及劳动分工的性质,生产物的分配和交换的方向与范围,最后,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所有这些情况却是依下列关系为转移:生产资料是展于劳动者公有,还是属于不劳动者个人私有,或者他们一无所有反而同生产资料一起作为生产资料属于不劳动者所有;他们是否被生产资料所束缚而成为不自由的人;或者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自由人,被迫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料来出卖。”^①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卢森堡正确地划分了原始社会,奴隶私有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

^① 卢森堡《国民经济入门》,第232页。

方式和社会形态。

最具特色的是本书第5章“工资规律”。在这里，卢森堡不仅批驳了拉萨尔错误的“工资铁律”，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标准的决定因素，乃是资本家把工人生活水平压低到其生理的动物的最低限度的倾向，换言之，即不断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来支付工资的倾向”。^①更主要的，她从中得出了工人阶级必须进行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结论。她指出：“对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即新发明与机器，蒸汽与电气的采用，交通运输手段的改良等，工人阶级不能有什么斗争行动。所有这些影响工人相对工资的生产上的改革，完全是从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商品的性质中无意识地产生出来的，因此，无论怎样强有力的工会，对于这种相对工资急剧降低的倾向，也完全无能为力了。而且，反对降低相对工资的斗争，因此意味着反对劳动力商品性的斗争，也即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故反对降低相对工资的斗争，早已不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斗争，而是给商品经济的存在以革命性的打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②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卢森堡认识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确实有把工人的工资水平压低到“其生理的动物的最低限度的倾向”，即绝对贫困化的趋势，但她强调的是“相对工资降低的倾向”，即相对贫困化的倾向。这就是说，卢森堡是把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作为她注意的中心的，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主要倾向。她进一步论证说，“因为，在某一时期，工人虽比以前获得了较多的生活资料，即更丰富的粮食和上等衣服；但在另一时期，若其他阶级的财富增长得更为迅速，则工人阶级对社会产品的份额当然就会减少。所以，工人的生活生平常本

^① 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232页。

^② 同上书，第243—244页。

身,从绝对量上看,虽然提高了,如若和其他阶级比较,相对地看来,则其对社会产品的份额反而降低了。因此,每个人和每个阶级的生活水平,只有拿来和一定时期及同一社会内其他阶级的生活水平相互比较,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①最后,她还指出:“只有认识了相对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机械地降低的规律,才能使我们完全理解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真正意义。”^②据此,过去有人一直批评卢森堡,指责她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估计不足,甚至放弃了绝对贫困化理论。现在看来,毋宁说这是卢森堡的真知灼见,是她敏锐地觉察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是主要倾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卢森堡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提出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是主要倾向的第一人!

值得注意的还有书的最后部分,即关于“资本主义的各种倾向”这一章的一个残篇,即第一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这里涉及到了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景的认识。她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会导致它自身的没落,并为人类新的发展开辟道路。迄今为止,我们只是研究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成为可能的那些现象之间的关系;现在,则已经达到应该了解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成为不可能的那些条件了。”^③她指出,资本主义统治充满矛盾的内在规律“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就会变成反抗人类社会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切根本条件的东西”。^④

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力图把自己的势力机械地扩大到全世界,并排斥其他所有旧的社

① 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239—240页。

② 同上书,第248页。

③ 同上书,第254页。

④ 同上书,第254页。

会形态”。^①按照卢森堡的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展是“依靠两种途径即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对殖民地的掠夺达成的”。^②然后，卢森堡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世界贸易和殖民地掠夺的残酷过程及其严重后果。接着，卢森堡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在过去的各种经济形态里，人类的消费乃是生产的目地；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它（消费）只不过是其真正目的——资本主义利润的积累——的手段而已。”^③这就产生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能力，它本身是不知什么界限的，因为，与技术进步的同时，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界限”，然而，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愈发展，那么，一方面，生产扩大的要求和扩大的可能性就愈加扩大；另一方面，市场扩大的可能性就会愈加减小。”^④

由此，卢森堡认为，尽管资本主义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因为全世界还有许多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有许多外部市场可开拓，工业发达国家内部也还存在小生产，内部市场也还有潜力。但她认为，从长远看，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终将陷入根本矛盾的困境；资本主义愈加排挤落后的生产形态，那么，为追求利润所创立的、供满足现有资本主义企业扩大再生产要求的市场界限也就愈加狭小。所有这些情况，只要我们对下述因素稍加考虑，就可以完全明白；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得这样迅速，以致地球上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换言之，只是在大企业中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家用雇佣工人的

① 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254页。

② 同上书，第255页。

③ 同上书，第255页。

④ 同上书，第259页。

劳动生产出来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能性就鲜明地暴露出来了。”^①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卢森堡根据自己的认识,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性,预言了她认为的“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能性”的发展前景,尚未明确地提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后者是她在1913年发表的《资本积累论》的中心议题。即使如此,卢森堡在《国民经济学入门》中所表述的这个观点,遭到了当时和后来许多人的非议,认为她曲解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因为按照卢森堡的观点,在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设想中的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用于投资的剩余价值,无法在内部市场实现,而只能在外部市场,即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实现,如果资本主义成了囊括全球的经济形式,资本积累就不可能了。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卢森堡的观点,一直是各国学者议论纷纷的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进一步研究,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说到。但可以肯定一点,卢森堡并未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会“自动崩溃”的结论。那是一些批评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加给她的。恰恰相反,她一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决不会自动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必须要由工人阶级通过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来实现。

3. 与考茨基的分道扬镳—— 《疲劳战略还是斗争?》

1908年在战云密布、世界政局动荡的情况下来到了。

机会主义思潮逐步浸染了各国社会党。1908年初,法国社会党的首领饶勒斯大肆美化帝国主义,竟把英、法帝国主义和沙皇俄

^① 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260页。

国为了准备帝国主义战争而建立的协约国军事集团描绘成“和平联盟”，认为大国首脑人物通过外交接触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是巩固欧洲和平的基础。这件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彼此呼应，各自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为扩军备战和结成军事集团辩护，丧失了社会民主党人应有的革命立场。义愤填膺的卢森堡拍案而起，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著名的《致饶勒斯的公开信》，痛斥了他的背叛性言论。她强调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不管是战争或者和平的社会根源较之执政的‘首脑’人物的意志和微末阴谋深远得多，……这并不能借助于拼凑某种同盟而消失……军国主义国家的一切‘盟约’和‘协定’仅是加强军备的隐蔽工具”。^①她还指出，社会主义者决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散布幻想，指望通过国与国之间玩弄外交手腕保持和平，而是必须“步步紧逼地揭露这种可笑的、无聊的外交把戏的无力性、局限性和虚伪性。”^②接着，卢森堡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和企业界无产者以革命行动反对这种帝国主义联盟。列宁完全支持卢森堡的严正立场，认为她的信是对饶勒斯机会主义言论的“出色的评论和激烈的驳斥”。^③但机会主义者却对她进行了围攻。

在卢森堡与饶勒斯以及各国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考茨基持虚伪的“中立”立场，从而使卢森堡与考茨基在思想上的鸿沟加深了。

考茨基是卢森堡的前辈，而且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卢森堡是他家的座上常客，与他的夫人路易莎更有相当亲密的关系。但是，随着考茨基中派主义立场的日益表面化和向机会主义者的严重倾斜，卢森堡对他的批评日益增多和尖锐，尽管她仍

①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2卷，109页。

② 同上书，第110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7卷，第175页。

怀着善意的等待。早在1907年春季，卢森堡在与考茨基的谈话中，就发现他“冷漠，迂腐和保守”，不愿走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开始识破他的伪善面目。此后，两人关系迅速变化，但卢森堡仍与其夫人保持友好的私人关系。卢森堡是很重感情的人，与考茨基的决裂对她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既然在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上已缺乏共同语言，卢森堡就毅然这样做了。

卢森堡与列宁的友谊，在俄国革命的烈火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巩固，随着在国际舞台上的紧密合作和共同战斗面有了深化。1908年1月初，列宁偕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柏林作短暂访问。卢森堡邀请列宁夫妇到她寓所作客和畅谈。除了就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任務交换了意见外，他们还探讨了马赫哲学。但不久之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分歧和论争——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起因是卢森堡在1908—1909年在《社会民主党评论》上的连载著作《民族问题与自治》。列宁对该书进行了评论和批评，从而引发了争论。列宁认为，只有实行民族自决，才能加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联合，才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卢森堡则认为，民族压迫是要消除的，但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的。为了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使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阶级要求上来，她强调必须把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解决。卢森堡反对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对的，但不提民族独立要求却是矫枉过正了，是脱离波兰无产阶级群众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的。显然，这本书是她过去在民族问题上偏颇看法的系统化。这一分歧和争论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他们的关系，但并未长久地妨碍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和紧密合作，因为分歧毕竟是第二位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和当代工人运动紧迫任务的认识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909年5月18日，当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后，列宁立即寄赠一本给卢森堡，并在上面题词：“……做为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时关于马赫的谈话的纪念。”^①为了向各国读者介绍这本新著，列宁还给卢森堡写信，请她设法在《新时代》上报道该书的出版消息，卢森堡欣然接受并满足了这一要求。在上述信件中，列宁还高度赞扬了卢森堡的文章在俄国党内所起的良好作用，并写道：“可惜您用俄文写的东西太少了。”^②

1909年是卢森堡心绪郁闷烦躁的一年。除了帝国主义的猖獗使她感到不安外，她更为德国党的日益向机会主义蜕化深感忧虑。但她深深懂得，革命的人生就像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斗争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她顶着除风恶浪继续坚持战斗。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党校任课、写作和与右翼机会主义分子论战中度过的。

初春，柏林乍暖还寒，而南欧却已春光明媚了。身心疲惫不堪的卢森堡来到了意大利小憩，先是在热那亚海滨。然后又渡海到了法国的科西嘉岛。那里壮美的自然景色和纯朴的民风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她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扰，涤荡了胸中的郁闷。大战期间，卢森堡曾在狱中发出的致李卜克内西妻子索菲娅的信中，细腻地回忆了岛上的印象。她说：在那里人们会“忘却欧洲，至少是当代的欧洲。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广漠而雄伟的景色和它的高山和峡谷的庄严轮廓；上面除了深沉的灰色调子的岩石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下面则是葱茏茂盛的橄榄树和月桂树，还有古老的栗树。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则是原始的寂静：没有人声，没有啾啾的鸟语，只有旁边的山岩中间有小河的潺潺流水声，而也可能这是高处什么地方，风和悬崖的喁喁私语——这正是扬起奥得赛的帆的那种风。”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5卷，第233页。

^② 同上。

7月初，柏林是烦人的闷热，加上思想上的压抑感，卢森堡赴瑞士度假，在沃赫伦湖畔的夸尔顿盘桓了一段时日，使自己精神焕然一新。她返回德国后不久就出席了德国党于9月12日至18日在莱比锡举行的代表大会。由于机会主义者掌握了大会的多数席位，在他们的鼓噪进攻下，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左派在会上处境孤立，一些正确主张得不到大会的认可。

1910年是德国政治危机激化的一年，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化，从议会斗争为主向议会外群众性革命斗争转化的一年。这种转化是由于反动派加强向工人阶级进攻而引发的，并进而促使德国党内左中右三派的营垒更加明朗化。

1910年，德国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在疯狂扩军备战、扩大对外侵略的同时，加紧了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进攻。继在选举法上玩弄花招以减少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之后，还以所谓“财政改革”搜刮民财，来加重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激起了工人群众、广大劳动者和农民的愤怒抗议。

卢森堡认为这是宣传群众、扩大党的拥护者大军、握高和巩固广大群众社会主义觉醒的良好机会。于是，卢森堡在该年3月的布勒斯劳的《人民哨兵报》上发表了《播种季节》一文。她指出，党应该抓紧时机，“把启蒙的种子大把大把地往地里播撒”，在唤起、激励、教育群众方面“全线转入猛烈进攻，以回击反动统治者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挑衅”。在政治方面，在不放松宣传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同时，为了反击反动统治的加强，为了争取和团结最广大群众，卢森堡明确地提出了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争取建立具有广泛民主的共和国的口号，把这一要求作为“进行经常性斗争的结论和简明概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长征路上的小小的一段路程”。^①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303、304页。

同月，卢森堡还发表了题为《下一步怎么办？》一文，探讨了党的斗争策略，坚持不懈地宣传用群众性罢工以对付反动派进攻的思想。卢森堡的上述文章本来是准备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刊《前进报》和《新时代》上发表的，甚至已排了版，但由于考茨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攻讦和干预，最后被撤下来了，不得已而发表于党的地方报纸——多特蒙特的《工人报》上。

同年4月，卢森堡还旅行德国各地，在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上巡回讲演，宣传上述思想。

卢森堡的这一系列革命主张和革命行动深深触怒了考茨基，也冲破了党的首领们不准讨论党的策略问题的禁令。为此，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今后怎么办？》一文，表示强烈反对卢森堡关于做好准备发动政治性群众罢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为了反击考茨基的错误观点，卢森堡神速地写了标题为《疲劳战略还是斗争？》的长篇论战性文章，分两次刊载于5月27日和6月3日的《新时代》上。于是，卢森堡与考茨基的炽烈论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篇著名的《疲劳战略还是斗争？》的论文中，卢森堡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高度，深刻地揭露了考茨基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人和恩格斯政治遗嘱执行人的假面具。她指出，考茨基的战略理论基础是，他认为对革命阶级来说，“‘击破战略’一直到巴黎公社起义都是起决定作用的。但从那以后，它就被‘疲劳战略’取而代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它整个力量的增长和它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归功于这种‘疲劳战略’。”^①即用国会内的斗争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用选举斗争来震撼现行社会制度的基础。接着，卢森堡进一步指出，考茨基自称他的“疲劳战略”是直接来自恩格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2卷，第138页。

斯的“政治遗嘱”，即《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继承来的，但实际上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和伯恩斯坦的论据如出一辙，都是机会主义的。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疲劳战略”无非是“将其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帝国国会选举上”^①，而德国已经有了蓬勃开展的群众运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议会斗争形式。因此，党的任务是：“充分利用群众昂扬斗志和激动的情绪，向群众行动提出政治口号，把这些口号变为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指明道路，走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前进。”^②卢森堡最后指出：“不要采用‘疲劳战略’；而是要在全线展开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③

此时，原来动摇不定的考茨基已决定性地向右摆，向伯恩斯坦立场靠拢，并成为中派的理论领袖。他继续发表文章，以“疲劳战略”为依据，与卢森堡展开了尖锐论战。卢森堡在读了他的反驳文章后，在致友人书信中气愤地预告：“我对这个胆小鬼将给予相应的反击，此人只有对别人背后猛击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我必须等待他的丑恶显露无遗才行……”

在实际行事上，起初卢森堡对考茨基的批判还是留有余地的，仍对他的转变立场寄予一线希望。但是，考茨基却已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条企图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调和的机会主义道路。因此，卢森堡与考茨基的友谊已步入了山穷水尽的破裂阶段。两人的关系已呈现剑拔弩张的态势，以致卢森堡不愿把自己的稿件直接寄到《新时代》编辑部，而由别人转交。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为的是不写任何带有考茨基字样的信。她让自己的朋友、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医生汉斯·迪芬巴赫充当传送材料的中介人，正是由于这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2卷，第196页。

② 同上书，第206页。

③ 同上书，第209页。

个缘故，迪芬巴赫此后渐渐成了卢森堡的好友。

在德国党内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激烈论战和交锋过程中，德国党的第一线活动家日益分化为壁垒分明的左、中、右三派。这一点考茨基也是看到和承认的。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巴登与卢森堡之间》一文，一语双关地宣称，“地图上的位置象征着今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这就是说，他把地理上的卢森堡比拟为左派，即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地理上的巴登比拟为右派，即以巴登分子为核心的机会主义右派，而特利尔，即马克思的故乡处于中间地带，他以此自诩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心”的地位上。实际上，考茨基只是玩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反对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走社会革命道路，站在中间立场上搞折衷调和。因此，中派主义的实质仍是机会主义。正是在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公开袒护和支持下，机会主义者成了党的领导层中的多数，他们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打击左派。

面对党内外险恶的环境和压力，卢森堡沉着应战，以笔作枪，一篇接一篇地发文章，捍卫自己的革命立场并反击对手的进攻。但是，争取政论的发表权本身就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每当卢森堡的文章送往党的中央报刊编辑部时，掌握大权的考茨基及其同伙以消除“宗派”、“狭隘性”为借口，或以“不能暴露党内分歧”、“避免授敌人以口实”为幌子，要么拒绝或推迟发表她的文章，要么通过所谓“校订”、“删削”、“修改”等卑劣手法，磨钝其革命锋芒，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对党内以考茨基为首的实权派这种怯懦与卑鄙的行为，卢森堡嗤之以鼻，在致友人的信中，她满怀鄙夷地嘲弄说：“因此，如果党的报刊被调训得如此卑躬屈节，我们又何苦呢，倒不如坐在咖啡馆的小桌旁，用高人一等的自诩讥笑别人就行了。”在此状况下，卢森堡只得在党的地方报刊上发文章。但那里她也经常碰壁，因为落入机会主义者掌握中的地方报刊也秉承领导者的

旨意，时时封锁她的真理的声音。

面对考茨基等人以上种种卑劣伎俩，卢森堡目光如炬，怒斥了考茨基向机会主义分子讨好和投降的奴颜婢膝态度并与之彻底决裂。从而使卢森堡成为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中最早认识考茨基伪善的、假马克思主义真面目的第一人，走在了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前面，也走在了列宁的前面。这是列宁也承认的。正如列宁后来在1914年10月的一封信中所说的：“罗·卢森堡很早以前写道，考茨基……在党的多数派面前，在机会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卢森堡说得很对。”^①

1910年上半年，当党的执委会和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工会总委员会无视广大工人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企图从议事日程中取消讨论普遍性罢工这一重大问题时，卢森堡挺身而出，表示坚决反对。她认为，党和工会领导人不能越俎代庖，无权扼杀群众的革命精神和积极性，无权阻挡和取消群众的革命发动。她指出，我认为最为迫切的是，在党的最广泛的群众中发动讨论，群众自身应该作出决定，我们的义务是向他们提出同意和反对的论据。

为了向群众提供讨论材料，说服和争取群众，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自觉性，卢森堡曾两度酝酿重印她在1906年出版的《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只是由于经费筹措的困难而作罢。

于是，卢森堡尽可能直接面对群众，进行普遍性罢工作为斗争的有效手段的宣传，她顶着夏日的炎阳，旅行德国各地，在布勒斯劳、鲁尔矿区、不来梅等地出席了十几次群众集会，发表讲演，阐述了自己的革命观点，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服和支持。

酷暑刚过，卢森堡把目光暂时转向了国际政治舞台。

哥本哈根，1910年8月28日至9月3日，高纬度北欧凉爽的初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25—26页。

秋，第二国际在该城召开了代表大会，卢森堡再次以波兰党和德国党的双重代表身份出席。瓦尔斯基、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拉狄克则以波兰党代表团成员身份与会，卢森堡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然而她的工作是繁忙而紧张的：为反军国主义委员会、工会问题委员会主持起草决议和声明，为蔡特金草拟关于死刑问题的报告，与法国社会党人埃·隆居特共同起草关于西班牙局势的决议，如此等等。在会上，卢森堡和列宁一如既往，紧密合作，按照惯例，他们仍轮流在各自寓所召集左派的非正式会议。团结一致的左派击退了机会主义者的进攻，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合作社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等重大问题上，通过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正确决议。会议期间，列宁还和卢森堡等人一起专门讨论了如何加强反对日益抬头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的问题，两人取得了一致意见。

4. 艰难的抗争

斗争舞台重又转回了德国。

1910年9月18日至24日，德国党在马格德堡召开了代表大会。左派只占与会代表的少数，处境分外艰难。他们提出的许多重大提案，如讨论和宣传政治性普遍罢工的问题，在普鲁士为争取普选权两斗争的问题，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和中派对党的决议的反抗问题，都未能为大会所接受而被迫撤回。甚至卢森堡的代表资格问题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最后以微弱多数票得到了确认。卢森堡在会上就党的竞选政策和议会斗争策略问题两次发言，批评了党的领导的错误路线。但她的发言遭到了右派的猛烈攻讦。

左派在党代会上的失利，由于工人群众对卢森堡等人所持观点立场的支持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例如，该年10月，卢森堡抵达威斯特法伦州的黑根，在两千人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

了题为党与工会的讲话。全场活跃，对她的讲话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这充分证明了，在广大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热情，与党和工会领导人的怯懦软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这次群众集会的情景，《莱比锡人民报》是这样报道的：

“如果说当卢森堡同志出现于大厅里时就彼伏此起地响彻了向她致敬的欢呼声，那末她讲话时则经常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当她报告终了时集会群众报之以暴风雨般的欢呼，这在黑根的工会集会上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在街道上人们也向她欢呼致敬，而她从会场到旅馆的路途可以比拟为凯旋式的游行。

集会的过程和与会者的情绪表明，黑根的工人们在群众性罢工问题上持另外的见解，与某些部门工会领导人所强调的是不同的。”

世界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进入了1911年，这年一开始就给卢森堡带来了麻烦。由于她上一年10月在斯图加特群众大会上揭露了政府在柏林——莫阿比特地区镇压工人暴行，深深刺痛了政府。根据暗探呈送的秘密报告，斯图加特法院传讯了卢森堡并进行了预审，以便确定她是否犯下了“侮辱”德皇威廉二世这位“最仁慈的”的最高统治者。

该年夏季，狂热地在欧洲和世界推进争霸计划的德国派遣了“豹号”炮舰和“柏林”号轻巡洋舰到摩洛哥，从而挑起了同法国争夺摩洛哥的殖民战争。

面临险恶的国际形势，社会党国际主席胡斯曼建议召集有德、法、意、英和西班牙等有关国家的党参加的紧急会议，共商对策，组织抗议运动。法、西两国的党表态谴责了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浸染了沙文主义情绪和屈从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德国党的执委会，竟然以执委会成员莫尔肯布尔私人信函的形式表示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如果德国党在摩洛哥问题上表态，是不得

人心的，会损害党的“切身利益”。党的领导人倍倍尔也写信给社会党国际局，认为这种会议“没有价值”。德国党领导层的错误态度导致了会议的流产，怒不可遏的卢森堡立即发表了一批政论，如《摩洛哥问题》、《摩洛哥》等，谴责了党的首领的怯懦，并在德国党执委会致第二国际的信件中附上了自己的文章，以表明革命派的严正立场，她还号召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来反对战争和殖民政策。对此，考茨基大为恼怒，在《前进报》上撰文予以抨击。卢森堡毫不示弱，以《莱比锡人民报》为阵地，与党内机会主义势力展开了新一轮激烈论战。

恶名昭著的伯恩斯坦异常活跃，在文章和讲话中一再大肆肯定和吹捧德国反动统治阶级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硬说殖民主义会给本国劳动群众带来“好处”，具有“优越性”，要求工人群众支持政府争夺殖民地的“现实政策”。卢森堡在批驳他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伯恩斯坦的言行证明了他们是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帮凶，必须彻底揭露。

恼羞成怒的右派们群起而攻之，除了恶毒谩骂外，凭借他们在党内上层组织中居于多数的地位，竟然用开除党籍来威胁卢森堡，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险峻的形势下，卢森堡义无反顾地坚持了自己的斗争。

1911年夏秋之际，在左派的努力下，德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在摩洛哥冲突中推行加剧战争政策的群众运动高潮。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卢森堡马不停蹄地旅行德国各地，直接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各种集会和发表讲话，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和党内机会主义者的可憎面目，号召群众以自己的更加高涨的革命行动来对抗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她的精彩讲话以其生动具体的事例和深入浅出的分析使听众出神入迷，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到处受到工人们的热情欢迎。她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

描述了在莱茵区一次群众集会上讲演的情景：“当我讲演临近结束时，对我讲的每句话都响起了赞同的喝彩声和暴风雨般的全场活跃。进入会议厅的入口已被警察封锁，几百人就站在走廊里。”在访问了西、中部的一些工业中心后，她来到了德国东部普占波兰滨海地区继续巡回演讲。不论是波兰工人还是德国工人，都热情欢迎她。在挤满人群的大厅里，她说得嗓子都嘶哑了，但她感到十分满意。正如她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说的，“因为群众高涨的情绪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一位她讲演时在场的见证人是这样描述她的：“当罗莎作报告时并不只是安静地站着。她迈着小步在讲台上来回走动，生动地作手势。用相应的动作来配合她强调的话。理解她的论据是不难的，她说得逻辑严密和简单明了，工人们都懂得她强调的和阐明的是什么。”

1911年年中的几个月里，卢森堡就是在这种奔波、繁忙、紧张、疲惫而欢快的气氛中匆匆度过的。

卢森堡的一位俄国女战友，十月革命后苏联女外交家亚·科隆泰，后来在回忆中描述了卢森堡在这一时期紧张活动情景的一个动人场回：

“罗莎从宣传旅行回来时病了而且疲惫不堪。医生严厉地命令她卧床养病。罗莎向周围的人保证，要正儿八经地躺几天，因为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从她苍白的脸庞上也可觉察到，她确实疲乏之极。朋友们离去了，有意留下她一个人。一小时后，大家都惊讶不已，床上没有了罗莎。从罗莎打回来的电话方才得知，一个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集会等待着她去参加。一个半小时以后，她已坐在近郊火车的车厢里了。”

由上可知，卢森堡之所以能够在宣传运动中鼓舞和感染别人，主要是因为她自己首先能从她为之奋斗的理想受到鼓舞，甘愿为之奉献自己！

耶拿,1911年9月10日至16日,德国党的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卢森堡和支持她的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累德堡、连施、迪特曼等人都参加了大会。在左派的坚持下,议程上列入了摩洛哥危机问题。党的执委会在摩洛哥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大会激烈辩论的中心。卢森堡在会上再次严厉批评了德国党执委会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的修正主义分子勾结隐蔽的机会主义者——中派分子进行了猖狂反扑,攻击卢森堡德自表态违反了党的纪律并要求给予党纪处分。左派的奋力反击才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但左派提出的要求党摒弃错误的“疲劳战略”,更积极开展群众革命斗争和反帝斗争的建议没有被大会所采纳,只是通过了一般性的保卫和平的决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机会主义的泥潭中已愈陷愈深。

同年9月23日至24日,第二国际在苏黎世举行了国际局会议,讨论了摩洛哥问题。在这个国际论坛上,卢森堡再次抨击了德国党首领所坚持的动摇和怯懦的机会主义立场。参加会议的列宁在发言中完全同意卢森堡的观点,坚决支持了卢森堡的革命立场。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关于摩洛哥问题的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的反战立场并表示反对用帝国主义的外交手段“和平地”扩大殖民地。

1911年10月,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卢森堡猛烈抨击了帝国主义各国的殖民掠夺政策,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要求消灭物价上涨和战争危险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即使在如此紧张、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斗争生涯中,卢森堡仍积极关注和参与波兰党的活动。当波兰党的报纸《论坛报》被沙皇检查机关查封后,她为帮助创办新的党刊《锤子》费了许多心血,并为该刊撰写文章,接待来访的波兰党的活动家,通过不同途径指导波兰党的斗争,卢森堡仍是波兰党的精神和理论领袖。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程一直是卢森堡密切关注的对象。

1911年10月，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延续数千年的帝制，这使卢森堡十分欢欣鼓舞，很快作出了反应。12月19日，在柏林第一选区的竞选集会上，卢森堡热情地赞颂了中国革命。她说：“中国传来了革命正在胜利推进的消息。中国和革命！在中国，人们宣告成立共和国，而我们在德国却生活在中国式的官僚统治之下。既然4000多年的中华帝国都阻挡不住现代的革命风暴，难道德国反动派这一小撮渣滓还能阻挡进步？”^①

卢森堡的这段话，既体现了她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肯定，也证明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来都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

1911年底和1912年初，卢森堡利用国会竞选的时机，继续坚持不懈地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的宣传。她严厉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妥协立场，其中包括倍倍尔。他在晚年开始倾向于机会主义右派了。她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与会工人群众对她的革命立场的支持。她写道：“当我批判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战争的情况下拒绝服从当局命令的时候，人们由于激奋而满面红光焕发……。很可能由此我要吃官司，那又能把我怎样呢。”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现在必须系统地反击议会痴呆症的危险”，“‘我们决不后退一步’，我认为这是最佳口号。”

卢森堡的上述认识是切中德国党的要害的。1912年初，由于党在议会竞选中的胜利，使德国党在国会中议员人数达到了空前的110人之多，成为帝国国会中最大的党团。但这种胜利是虚假的，表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竞选的胜利更增加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何况德国党议会党团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党的整个影响和腐蚀作用越来越严重了。卢森堡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危险，强调了反对议会痴呆症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81页。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要求把议会活动和议会外群众革命行动结合起来，推进革命事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

1912年1月，列宁来到了柏林，多次与卢森堡会晤，商谈俄国党内事务，因为卢森堡领导下的波兰党是俄国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向卢森堡通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介绍了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方针和计划。列宁指出，由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面目已越来越明显，拒绝进行革命斗争。因此，布尔什维克不能容忍他们继续留在一个党内。希望卢森堡能理解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由于当时卢森堡尚未充分理解布尔什维克独立建党的重大意义，交谈未能取得一致认识。

但是，卢森堡对列宁仍是极为尊重的，她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和对列宁的印象：“从昨天到今天，列宁已来我这里四次了。我乐意和他交谈，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和学识渊博的人……”

同月，列宁从柏林来到了布拉格。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议。在会上，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开除孟什维克出党的决定。从此，布尔什维克最终地成为独立的党。卢森堡由于未能认识到与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彻底决裂的必要性，在《莱比锡人民报》上撰文表示希望保持俄国党的团结，反对党的分裂的尝试，不论来自左翼或右翼。在社会党国际局于1912年11月召开的苏黎世会议上和1913年12月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卢森堡仍持上述立场。卢森堡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受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两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和共同斗争。

1912年10月，酝酿已久的巴尔干战争终于爆发，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世界大战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在此前后，德国党内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

者继续空喊通过“实现普遍裁军”、“国际仲裁法庭”、“取消秘密外交”来解决国际争端，用这种虚伪的和平言词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斗志，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战争计划打掩护。在工人阶级斗争策略上，他们仍然固守议会斗争的“疲劳战略”，阻遏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发动。卢森堡及其左派战友无情揭穿了这些口号的欺骗性，指出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还深入而具体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备战活动的种种事实，号召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以自己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该年9月，德国党在开姆尼茨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卢森堡因从事革命活动过分劳累而病倒了，未能出席大会，虽然她拥有莱茵区代表资格。

同年10月，刚刚病愈的卢森堡接受社会党国际局的委托，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委员会，主持起草和发表了《巴尔干问题宣言》，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严正立场。

同年11月24—25日，在战争的阴云下，第二国际在巴塞爾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深秋阵阵袭人的寒风拂不去郁结在代表们心灵的浓重忧虑。这是第二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卢森堡和列宁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卢森堡对在紧急状况下专门召开的这次大会是寄予厚望的，希望它开成动员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员大会。她指出，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巴塞爾的讲台，那里肃穆地响起了钟声，庄严地号召投入一场劳动大军与资本强权之间的伟大搏斗。在列宁、卢森堡和各国党的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和哥本哈根大会决议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国际对当前局势的宣言》，号召各国人民团结一致，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战争爆发，就以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来结束战争。这次大会使国际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5.《资本积累论》的问世

1913年初,卢森堡出版了她最主要的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这部书有一个副标题《从经济上阐释帝国主义》。这个副标题有力地说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是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无疑,这部书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长远价值的著作,尽管她的一些论点是有争议的。从19世纪末期起,卢森堡一直密切注视主要资本主义列强在全世界的扩张,研究资产阶级在国内实施的国家军国主义化,在国际上推行“世界政策”,大举入侵非资本主义地区,争夺殖民地并造成列强之间矛盾的激化,引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并出现了世界战争的危机。正是基于对以上现象的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卢森堡把她的理论结论凝聚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企图通过从理论上阐释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来找到在实际斗争中战胜帝国主义的途径。这就是说,卢森堡的这本书是有其强烈的、现实的政治意图的,决非纯学术性著作,更不是纯经济学著作。对此,卢森堡在该书序言中有所表露。她说,这本书在“理论上牵涉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以及有关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它的经济根源的问题。倘若我能够成功地把这些问题给予科学的正确的处理,那么,这本著述将不仅具有纯理论上的兴趣,而且在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实际斗争中,也将具有一定意义吧!”^①

应当指出,卢森堡之前的学者,包括写了《帝国主义》一书的霍布森和写了《金融资本》一书的希法亭在内,他们在初步描述帝国主义的产生时,主要着眼点是资本主义宗主国内发生的种种现象。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原序,第3页。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一书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她试图从总体上探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向帝国主义演化的历史进程，把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发展过程同非资本主义区域殖民化演变过程看作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表现方面。卢森堡把自己的注意力重点放在别人较少注意的第二个方面去了。她引用了大量具体实例，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侵入非资本主义区域、怎样摧毁这些地区原有的生产方式、传统文化、奴役当地人民，通过殖民化把这些区域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她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侵入和控制非资本主义区域是资本得以积累，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条件。她指出，“资本如果没有全地球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那是不成的”，为了使积累顺利进行，“必需要地球上一切地带的自然财富及劳动力。绝大部分的资源 and 劳动力，事实上还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范围内”。^①因此，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地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②正是从这里，卢森堡认为不能停留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认为这个问题的主要一章实际上并未完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问题只是提了出来，但并未给予完满的解答。所以，卢森堡认为应予突破，她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非资本主义市场问题。她认为，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问题，才不顾一切向非资本主义区域扩张，争夺殖民地和不对发达国家进行控制，也才能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合乎规律地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内在结构。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83页。

^② 同上书，第289页。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二卷在分析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时,马克思为了研究方便,运用了科学的抽象法,假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而把其它阶级一概排除在外,因此,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假设 C 为固定资本(原料、机器、厂房等)、V 是可变资本(工资)、M 是剩余价值(利润)三个部分,从而得出下列公式:

第一部类: $C + V + M$

第二部类: $C + V + M$ 社会总产品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公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把这个公式应用于社会实际,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第二部类就会出现剩余产品。这就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所产生的增多物品”,^①这种剩余产品工人却无力吸收,因此,它的销售就成了问题。资本家为了实现它的全部剩余价值,以保证扩大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就必须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以外寻求外部市场,以吸收一部分用来投资的剩余价值,只有这个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外部市场,即农民和手工业经济,才能吸收剩余产品,实现全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的积累。没有这个外部市场,资本主义便不能生存下去,整个体系就会崩溃。因此,争夺非资本主义市场和出口,就成了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

正是根据以上认识,卢森堡决定超越马克思的公式:“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中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品的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的过程的。”^②接着,卢森堡根据她的认识,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公式的特征和内在矛盾: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91页。

^② 同上书,第273页。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因此不符合积累在实际进展中诸条件，积累的进展不能像图式所规定的那样，简单地分解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之间静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各部类间的内部关系，它首先是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生产的两大部类，有时可以单独进行积累过程，两部类间互不依赖，但即使是这样，运动的每一步都是相互交错，相互穿插的。由此所生的复杂关系，即两部类的积累进展的速度与方向的差异，资本积累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上的不同关系，所有这些使我们不可能以硬性的公式规定出来。马克思的积累图式，不过是一种对资本的统治已达到顶点的那一瞬间的理论表现而已。因此，在某种条件下，这个图式，正如对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理论表述的出发点的简单再生产表式一样，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而已。就在这两个虚构的东西之间，我们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积累及其规律的确切界说。”^①

那么，卢森堡所说的在“两个虚构的东西之间”的“资本主义积累及其规律的确切界说”又是什么呢？这里所指的正是她对帝国主义扩张及其规律的认识。她认为，垄断资本正以帝国主义扩张的方式大肆侵入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大他们的占领区域以攫取更大的利润，实现资本的积累。作为实例，卢森堡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英国侵入亚洲的印度；法国侵入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列强侵入中国的血淋淋的史实。使中国人民感到十分亲切的是，在该书中，卢森堡引用了丰富的史料，细致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列强在“和平贸易”、“传播文明”的旗号下，自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残暴地侵入中国的史实。她正确地指出：“中国近代史，从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33—334页。

整个十九世纪内，是以战争来分段落的。”^①她还概括性地总结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严重恶果：“欧洲人每前进一步，不仅带来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且标志着伟大而古老的都市化为废墟，广大地区农村的农业荒芜，以及偿付战费而征收的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中国四十个以上的通商口岸，都曾付出流血、屠杀与摧毁的代价。”^②

《资本积累论》的出版，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水一样，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参加了这场论战。无保留地同意和支持这本书的观点的有梅林和马尔赫列夫斯基，而更多的人则持非议、批评和责难的态度，其中包括列宁等人。列宁曾打算撰文予以评论，但后来却未能实现。

为了回答众多的批评者，卢森堡于1915年在狱中写出了《资本的积累——反批判》一书。该书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的信仰者怎样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在此书中，卢森堡坚持了她原有的理论观点，而且更加精练地表述了她的想法：

“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验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然而，如果一个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是唯一的形式，全体人民只是由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所组成——作出的假设不提出疑问，那怎么可能呢？”^③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及其续篇《反批判》发表至今已七、八十年了。历史的发展沧海桑田，变幻多端。可是对这两本书的评

① 《资本积累论》，第307页。

② 同上书，第313页。

③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70页。

价却一直聚讼纷纭，论争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足。20年代，苏联的尼·布哈林曾写过一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对之进行了否定性评论，但人们的不同看法并未消除，至今仍是如此。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两本书，尚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卢森堡的著作是对现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广泛探讨的第一次勇敢的尝试。她的论述范围和深度远远超过了霍布森和希法亭的同类著作。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三年后出版的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表述的某些重大观点是一致的。例如，他们两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帝国主义已走上穷途末路，代之而起的将是社会主义。当然，更应指出，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论述的一些重要方面，是有别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她没有把垄断看作是帝国主义最决定性的本质特征，而把帝国主义与追求控制非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地区联系起来，着重强调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政治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代表，怀着如同身受的同感，着力地、深刻地描述了帝国主义扩张给非资本主义国家，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深重灾难，把这些国家的殖民化与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的演变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不同表现方面来考察。这样做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第一人！所以，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学者，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看作是从第三世界立场观察和分析帝国主义的主臬之作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不够完整和全面的，没有能达到列宁的认识水平，而且对资本积累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的描述未必恰当，但她仍在帝国主义研究上有其历史功绩。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卢森堡的功绩在于，她以有说服力的方式证明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

叶的巨大发展，是历史性地靠牺牲非资本主义阶层和通过大规模发展军国主义并野蛮地进行殖民征服来完成的，这有助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贡献！

《资本积累论》问世以后，卢森堡继续对帝国主义问题和工人阶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行深入的研究。在1913年发表的一系列政论中，卢森堡指出，在帝国主义这个新时期里，随着国际形势的突变，战争危险的增加，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剥削和压迫的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彻底的阶级斗争精神，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政策，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富有成效的群众行动，才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她说：“帝国主义发展时期给工人阶级越来越沉重的政治打击，而我们的行动往往没有达到可以与之匹敌的程度。”^①因此，“光靠议会政治、靠旧机构和老规矩是对付不了的。我们党必须学会在相应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行动并领导这些行动。”^②据此，她严厉批驳了德国党的机会主义首领的种种谬论，如借口“时机不成熟”、“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而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甚至躲避斗争，从害怕革命走向取消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作为当仁不让的群众领导者，所必需的不是为寻求确有把握的胜利而操心，而是遵循一个革命政党的基本戒律：比任何一次失败要糟糕千百倍的，是在斗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地方长期躲避这场斗争”。^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特别是它的国会党团，在机会主义的泥潭里愈陷愈深，现在他们已经不是逃避革命斗争了，而是直接为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效劳了。1913年6月30日，党的国会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257页。

② 同上书，第257页。

③ 同上书，第258页。

党团竟然首次投票赞成为军事法案筹款的一次性国防税和财产增值税法。这是机会主义分子公开倒向帝国主义营垒的先兆。许多党员对议会党团的倒行逆施表示愤慨并提出了抗议。

7月，卢森堡发表了长篇政论《帝国国会党团和军事法案》，对党的国会党团的背叛性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她指出，同意这个法案实际上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帝国主义的阶级统治，就是背弃党的纲领原则。

1913年9月14—20日，在耶拿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这是德国党在大战前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党的策略问题和党的国会党团的表现问题再次成为激烈辩论的中心议题。党的执委会在右派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项关于遏制群众性罢工的提案，卢森堡和左派代表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彼·贝尔滕、格·累德堡、安·潘涅库克等人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提案，要求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要求“党在一切领域采取进攻的、果断的和坚决的策略”，即“有意识地把斗争的重点转移到群众运动方面”。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大卫等人坚决反对讨论群众性罢工问题，认为辩论仅是毫无意义的“词句之争”，甚至争论是“有害的”，会把党内的“无能”状态暴露给敌人。右派和中派沆瀣一气，操纵表决机器，以多数票否决了卢森堡等左派的提案，通过了执委会的提案。在讨论党的国会党团投票赞成增收财产税的问题时，再度爆发了争论。右派支持党的国会党团的做法，认为增收财产税的负担主要落在有产阶级身上，有利于工人阶级。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驳斥说，向有产阶级增收的财产税，最后必然转嫁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身上，增收财产税以弥补由于巨大军费开支而造成的政府财政收支逆差，实际上就是支持政府扩军备战和对外侵略，这是违背党的纲领原则的。为此，左派提出了拒绝赞同党的国会党团做法的提案。右派和中派彼此呼应，再度联合起来，通过了执委会的决议，左派的提案被

宣布无效。针对这个表决结果，卢森堡高瞻远瞩地警告说，如此发展下去，一旦战争爆发，就会导致党的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卢森堡的这个警告当时没有得到大会的理睬。可是，历史证明，卢森堡的这个警告是有预见性的，为翌年8月战争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可耻表现所证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睿智的然而却是悲剧性的预见：

耶拿党代会的状况表明，机会主义已侵夺和腐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多数代表已经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用卢森堡的话来说，这次大会的结果是：“依据泥潭派（指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本书作者注），联合右派，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党团多数派在耶拿代表大会的关键问题上赢得了自己的胜利。”^①卢森堡等居于少数地位的左派在会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仍无法扭转形势。多少个紧张活动的无眠之夜，多少次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心力交瘁和悲愤严重损害了卢森堡的健康。她在致约吉希斯的信中，诉说自己“无法思考、无法入睡、不能进食……达两月之久！”

耶拿党代会以后，中派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对卢森堡等左派发出的革命号角声，特别是揭穿他们机会主义真面目的文章，如卢森堡的《理论的半官方性质》十分恼火。他们采取步步进逼的策略，先是企图迫使左派沉默，不再发表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批判性文章，遭到拒绝后，就玩弄阴谋诡计，夺占左派的主要舆论阵地——《莱比锡人民报》。该年9月，卢森堡的战友马尔赫列夫斯基就任该报代理总编辑，但机会主义者安插在编辑部的人员不尊重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决定，拒绝刊登卢森堡评论耶拿党代会的两篇论战性文章。因此，马尔赫列夫斯基愤而辞职以示抗议。接着，考茨基控制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352页。

的党的出版委员会得寸进尺，伙同编辑部内听凭他们摆布的人提出要改变该报的办报方针，不再坚持左派立场而采取“中立”态度。同时还无理决定，凡是卢森堡、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撰写的文章，只有经过出版委员会审查通过才能发表，否则就不予刊登。这场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迫使卢森堡、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退出了他们长期工作的《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从而实现了考茨基等人把左派从党的有影响的机关报中排挤出去的阴谋。该年年底，在考茨基的唆使下，决定停办由梅林主持的《新时代》评论副刊。梅林最终被排挤出了《新时代》编辑部，使左派又丧失了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不甘屈服的卢森堡等三人，经过奔波筹办，在左派和党员群众的支持下，在该年年底创办了《社会民主党通讯》，每周出刊三次，作为左派的革命喉舌，继续同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并向党员指出革命斗争的方向。卢森堡等人还以蔡特金主持的《平等》杂志为阵地，宣传左派的主张。此外，他们还作出努力，巩固和扩大左派在波洪、不伦瑞克、多特蒙特、北爱斐特、爱尔福特等地方党报编辑部中的影响，以抵制机会主义思潮的扩散。

随着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和表面化，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她指出，当前是“帝国主义恣意疯狂的时刻”，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矛盾极其尖锐化，高度使用暴力的时期”^①，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时期”，是“资本用武力分割世界的最后阶段。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海上和陆上进行一系列无尽无休、闻所未闻的军备竞赛，一连串血腥的战争从非洲蔓延到欧洲，并且随时可能使星星之火变为全球大火”。^②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91页。

^② 同上书，第193页。

应该指出，卢森堡上述对帝国主义外部特征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中对帝国主义认识最为深刻的见解之一，尽管她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概括仍不够全面完整。

6. 法庭内外

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火焰的蔓延，防止世界帝国主义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成为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首要任务。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反战运动正日趋高涨。卢森堡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她告诫说：“在这疯狂扩军备战的时刻，只有工人群众的坚决斗争的态度，只有采取强有力的群众行动的能力和意愿，才能维持世界和平，才能延缓行将爆发的世界大战。”^①1913年9月26日，在法兰克福市附近的博肯海姆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卢森堡用火一样鲜明炽烈的语言抨击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然后她大声问道：“我们能让他们平白无故地拖入战争吗？”与会群众高呼：“决不能！”卢森堡应声说道：“如果有人鼓动我们举起屠杀的武器去反对我们的法国或其他外国兄弟时，那么，我们应大声回答：“不行，我们决不会干！”到会群众以雷动的掌声和欢呼来支持这个表达工人心愿的庄严声明。会场上呈现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动人情景。

德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历来害怕卢森堡富于感召力的演说，视为莫大的威胁。这次，他们更是心惊胆颤，官方报刊把她说成是“可怕的煽动家”。于是，德国当局以进行“反战鼓动”、“危害国家安全”为罪名，给她扣上了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叛国”，对她提出了起诉。这次审判是德国最高当局周密策划的。在那次群众集会后不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94页。

久，德国内政部驻法兰克福的地方机构立即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她的激奋人心的讲话经常给听讲者造成强烈印象，同时必须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即上述此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激进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因此官方派出了一名监察官监听了讲演者在9月26日群众集会上的讲话”。看来这次德国当局精心策划、罗织罪名，决心要把卢森堡置之死地而后快了，险风恶浪一齐向卢森堡袭来。

1914年2月20日，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国家法院第二刑事庭开庭审讯卢森堡。检察官霍夫曼列举了她的所谓“罪状”，还说，卢森堡本来就不是德国人，只是通过形式上的婚姻才成为德国人的，她从不承认德国是自己的祖国，她的“绝顶聪明”只是用来为自己狡辩，逃避罪责，她获得“红色罗莎”的绰号是有道理的。霍夫曼还说，被告犯下的罪行“是对我国生活根基的侵害”，是对国家制度的“巨大威胁”，由此他要求判她一年徒刑。在敌人的法庭上，尽管卢森堡有两名辩护律师，但她自己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她推翻了所有的诬证，淋漓尽致地批驳了检察官的起诉书。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把敌人的法庭变成了革命者的讲台，尽情揭露和控诉了德国统治阶级推行军国主义、进行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欺骗群众充当炮灰的种种罪恶。针对检察官指控她犯有“煽动罪”，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什么叫‘煽动’？……如果德国人在战时开赴敌国时，例如中国，向他们表示，要使任何中国人百年之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假如我这样说了，那才是煽动。”^① 她的这段话的斗争锋芒直指德皇威廉二世。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德皇在欢送登船东去的德国远征军时，发表了著名的“匈奴演说”，号召德军像当年匈奴人那样野蛮地杀戮中国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2卷，第234页。

人，使中国人百年之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因此，她的这段话实际上讥讽说，真正犯了“煽动罪”的是德皇威廉二世而不是卢森堡。她还用辛辣的讽刺来嘲弄检察官霍夫曼博士的愚蠢和无知。理屈词穷的霍夫曼只能用刑罚加以威胁。卢森堡不顾法庭的阻挡，大义凛然地说道，你根本不懂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忠于自己的事业和蔑视你们所有的、成捆的、然而脆弱法律条款，我们的事业将违背所有检察官的意愿而发展成长！”^①恼羞成怒的法官不顾旁听席上愤怒的人群的嘘声，也不顾卢森堡本人的抗议，悍然宣判处以卢森堡一年徒刑，但鉴于她的健康状况，缓期执行。

第二天，当判决的消息闪电般传遍全国后，各地掀起了急风骤雨般的抗议浪潮和反战运动。柏林、斯图加特、不伦瑞克等大中城市的无产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2月22日，卢森堡出席了法兰克福市盛大的群众抗议集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她大声疾呼：“标志着反动力量不断加强的这些事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教训：我们必须加倍警惕，我们必须转入进攻！”同日，《前进报》在《军国主义、战争和工人阶级》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卢森堡法庭上的辩护词。这篇震撼人心、感人至深的辩护词和她在群众集会上火一般炽烈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极大轰动，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争相传诵的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有力宣言。

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蔡特金、李卜克内西等左派优秀活动家也活跃在各种集会、会议和报刊上进行反战宣传，有力地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反战反政府的革命情绪。

这场扣人心弦的官司暂告平息以后，身心均告疲惫的卢森堡无暇稍事休息，继续致力于这半年多来一直从事的工作：巩固和扩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2卷，第245页。

大左派在柏林、埃森、哥达、下莱茵区、萨克森、佐林根、斯图加特等地方党组织中的力量 and 影响，在各地的群众集会进行反战革命宣传，其中包括后来给她带来新的官司的弗赖堡3月讲话。

1914年4月，心力交瘁的卢森堡来到瑞士的克拉米斯短暂度假。这是战前卢森堡的最后一次度假，也是她整个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次度假，因为当年大战爆发后，战火和炼狱伴随着她蹉跎了全部战争岁月，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她从狱门出来就直接投身革命洪流直至牺牲，她再也未曾稍有歇息的时机。

在山青水秀的克拉米斯，卢森堡贪婪地吮吸着那里清新的空气，享受着明媚阳光的爱抚，陶醉在笼罩一切的寂静里，求得心境的暂时平衡。在大战时期孤寂的牢狱生活中，她十分缅怀这次旅行，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渴望战后有机会再一次实地领略日内瓦湖的风光、积雪的山顶、绿荫密布的葡萄园……而不仅是浸润在梦境般的回忆中。但是，敌人的屠刀使她这个平凡而美好的愿望付之东流。

五一节前夕，当卢森堡还在瑞士度假的时候，《社会民主党通讯》刊出了她的题为《五一节二十五周年》一文。她借纪念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伟大节日的时机，以高昂的革命激情，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二十五年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鼓励工人阶级继续以五一节精神推进革命事业。她指出，五一节“将经受住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升过程中一切不可避免的令人沮丧的时刻。它永远是各国无产阶级兄弟友谊的环球彩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大军将通过它光辉灿烂的彩门，向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迈进！”^①在德国和世界工人运动处于严峻考验的时刻，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溢于言表！德国各地一共有35家党的报刊和进步报刊转载了这篇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436页。

笔力雄浑、气魄恢宏、富于感召力的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这篇文章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鼓舞了人们的革命斗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随着战争的迫近和反动统治的强化，政府掀起新一轮迫害浪潮。4月，马尔赫列夫斯基以“煽动罪”被捕。这是打击革命派的一个危险信号。果然，5月，反动政府又对卢森堡提出了新的控告。由于卢森堡经常在群众集会和报刊上揭露普鲁士军队的腐败情况，使军事当局狼狈不堪，寝食不安。经过长期策划和收集“罪证”，由普鲁士战争部长冯·弗尔肯海恩将军亲自出马，“控告”卢森堡“侮辱德国军队的全体军官、军士和士兵”。主要罪证就是卢森堡于3月7日在弗赖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速记稿。这是内政部调查局以每小时20马克的价格雇请暗探在集会现场偷偷速记下来的。6月，对卢森堡的诉讼又增添了新的“罪证”。因为当局又从暗探速记下来的、她在6月14日柏林地区群众集会的讲话中，“发现”了她犯有“侮辱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军士”罪。她还犯有唆使军人不服从命令的“教唆”罪。这样，卢森堡两罪并发，又被传到了法庭。

1914年6月29日至7月4日，由普鲁士战争部长弗尔肯海恩为原告、由国家首席检察官萨莱格曼博士亲自主持，柏林国家法院第四刑事庭制造了一起“审判”丑剧。法院周围布满了警察，警戒森严，如临大敌，以防工人发动示威游行进行“滋扰”。战争部长和国家首席检察官双双出马，这在德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足见这次审判的“规格”之高，令人咋舌。不仅说明了反动派对卢森堡的“重视”，更暴露了敌人对卢森堡的惧怕和惶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但不帮助和支持卢森堡进行辩护，反而卑鄙地设置重重障碍，阻挠证人出庭作证，企图借敌人之手，拔掉他们忌恨的眼中钉。腥风血雨一齐向卢森堡袭来。

卢森堡临危不惧，在法庭上骄傲地叙述了自己的正义斗争，确

凿有据地历数了军队中发生的丑行，无情地斥责德国政府是真正的战争罪犯，彻底地批驳了敌人的诬告，反而把敌人推上了被告席。曾在军队里服役过的、人数众多的群众也出庭为士兵被虐待的实情作证。截至开庭前，自愿报名为卢森堡公开作证的人数已达922人之多，开庭后，踊跃报名的证人早已突破了1000人。卢森堡在群众中享有无比崇高威信和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弄巧成拙的法官们手忙脚乱，理亏心虚，审判进行不下去了，不得不宣布“延期审判”。7月3日重新开庭后，官方仍一无所获，狼狈地宣布再次延期。实际上，从此“开庭”一词如同逝去的黄鹤杳无音讯。一场丑剧不了了之。

柏林的讽刺杂志《诚实的雅可布》就卢森堡审判案刊登了一幅漫画，惟妙惟肖地反映了法庭上角色倒转的场面：面露庄重神色端坐在上首主审席中央的是卢森堡，肃立在下首被告席上的是象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一个肥胖将军。两旁证人席上排列着象征军国主义牺牲品的一行行骷髅。

惊涛拍岸，浊浪排空，在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卢森堡凭着非凡的胆识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又一次脱险了。但自感遭到羞辱的德国军国主义者和反动政府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伏下了战时对卢森堡累加迫害的祸根。

1914年7月，柏林烈日当空，酷暑难忍。刚从敌人的法庭上以胜利者姿态走出来的卢森堡，该稍稍松弛一下神经和恢复一下体力了。从她致友人的信中可以得知，本来她确是想飞到外地小憩的。但战争阴云密布、雷电轰鸣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她留在首都坚守革命岗位。正如她在致友人书信中所表示的，她要像神话中把天火偷给人间而被锁在山头上接受惩罚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守护革命：“我必须留在炎热的，令人窒息的柏林，如同被锁在岩石上的普罗米修斯，任谁也无法从我这里偷走什么。”

当时，大战的火药味已浓烈地弥漫欧洲。在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皇储弗·斐迪南大公之后，奥地利先是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在7月底向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宣布支持奥地利并不惜对俄开战。

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形势下，7月28—29日，社会党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局的最后一次会议。卢森堡行色匆匆赶到布鲁塞尔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的发言中，卢森堡除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外，还抨击了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日益增长的社会沙文主义情绪。她号召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群众。经过紧急磋商，国际局发出了一份号召书，要求所有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的工人群众行动起来，加强斗争，抗议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会议期间，卢森堡还代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与亨·瓦列茨基为代表的波兰社会党左派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表示一旦发生战争，两党将共同反对沙皇制度，并与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7月31日，卢森堡从布鲁塞尔乘火车返回柏林。这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火车。此时，布鲁塞尔已笼罩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紧张气氛之中，城市已失去了往昔那种宁静和安详。街头流行歌曲里的一句唱词逼真地抒发了人们窘迫的心境：“乌云和狂风与我们一起嬉戏。”这句寓有悲剧情绪的歌词很快应验了。同一天，德皇威廉二世宣布德意志帝国领土处于“战争威胁的危险状态”。

大战终于来临了。

7.“人应当像两端同时燃烧的蜡烛”

从1906年9月卢森堡从俄国脱险归来，到1914年7月大战爆发前夕的将近8年中，悠长的岁月，严酷的环境，火热的斗争，激烈

的论战，不断的迫害，没有喘息停顿的革命活动，令人疲惫不堪的旅途奔波和巡回讲演，似乎耗尽了卢森堡的全部精力，须知她是一位意志坚强然而身体羸弱的女性。但是，她是一个对大自然、对生活、对人民爱得异乎寻常地深沉的人，是一个善于发现美，兼有革命家、学者、诗人和艺术家气质的女性。“人应当像两端同时燃烧的蜡烛”，这是卢森堡喜爱的格言。这说明了，卢森堡对人民怀着炽热的爱，对敌人抱着强烈的恨。她的整个言行表明，爱和恨，在她身上表现得像白天和黑夜那样截然分明，毫不含糊，却又辩证地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

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个人坎坷的经历，卢森堡在与约吉希斯疏远后一直过着孤寂的单身生活。但她俭朴的业余生活却情趣盎然。1911年，她迁居到了柏林幽静的苏台德区。在林登街二号的二楼上租赁了两间一套的住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房前是一片绿树成荫、花草繁茂的小小庭院。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如果她有暇在家的话，有时就在庭院里摆上小桌，一边伏案写作，一边捎带领略自然景色，因为她特别喜爱自然环境。书房内陈设雅致而不华丽，临窗的宽大的写字台上铺压着一块晶莹透明的大玻璃板，一尊大理石的贝多芬头部雕像占据了写字台的一侧，而另一侧摆着一个古典式的精美青铜座钟。夜晚，当卢森堡在台灯的柔和光线下凝神写作时，除了座钟发出的有规律的的嗒声以外，偶而打扰她的只是她的宠物——一只名叫“咪咪”的猫。它有时跳上她的膝头以示亲热，有时居然大模大样地蹲坐在写字台上一动不动地瞪大眼睛凝视着主人。卢森堡在致友人的信中有时也提到咪咪聪明可爱的模样和动作。

卢森堡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以“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境，津津有味地叙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她写道：“温暖的春日里，在我居住的苏台德区的街道上，我简直游荡起来了……双手揣

在短外衣的口袋里，漫无目的，只是想吮吸一下生活气息——从尾里传出了复活节拍打褥垫的声音，某处母鸡在大声啼叫，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在路上高声说笑并阻塞了人行道，奔驰而过的郊区火车吼叫着并在空中喷出了转瞬即逝的欢乐的火星，满载啤酒桶的车辆沉重地敲击着地面，马匹的铁蹄在过铁路早桥时发出了有韵律的碰击声，而在这嘈杂声中，麻雀却在啾啾，如此的《欢乐之歌》是任何巴赫或贝多芬都无法复制的，从这一切，从每一个最平凡的琐事中，我的心感到欢快。”从这段街市日常小景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中，可以窥测，卢森堡以乐观主义的人生哲理，企图于平凡中揭示生活和人生的某种意蕴。

卢森堡的的大学生涯就是从攻读自然科学开始的，后来尽管成了职业革命家，整天与斗争、论战、讲演、写作打交道，然而她继续对自然科学保持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在繁忙的工作和斗争之余，卢森堡仍然爱好地质学和植物学。她认为地质学会告诉人们自然和人类本身历史发展的许多奥秘，而植物则是人类不可须臾离开的朋友。她不但抽空浏览有关专业书籍，而且一有机会，不论是在旅行途中或偶而休假期间，就到处采集地质和植物的标本并进行分类，装满了许多箱子和纸夹。

她还是一位业余画家。她在1908年尝试创作的几幅肖像画，特别是她的自画像，不仅技法娴熟，而且形神俱肖。透过她画笔下炯炯有神的、沉思的她自己的目光，恰似可以窥见她深邃而丰满的内心世界。通过她有力而鲜明的双唇上的线条，似乎可以测知她坚韧不拔的性格。但卢森堡有自知之明，晓得自己是不可能干这一行的。正如她在致蔡特金的儿子康斯坦丁的一封信中幽默地所说的：“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连一只狗也不需要我的拙劣的画，而人们倒是需要我的文章。”

卢森堡仍然爱好诗歌和文学。在政论、演说、书信中她不时摘

引各国诗人的诗行，巧妙而恰当地引用诗人的比喻来形象地阐明她所强调的事物。她的政论和演说不但思想深刻、思维清晰，而且文采照人、富于魅力。听了卢森堡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党代会上上的讲话后，无产阶级文学巨匠马·高尔基十分赞赏，认为她的讲话“漂亮、热情和尖锐”。卢森堡在致友人的一些书信中，尤其是从狱中发出的书信中（因为铁窗生涯使她有了更多阅读时间），对许多名家的文艺作品，包括莫扎特的乐章和伦勃朗的画，进行了即兴评论，虽然着墨不多，却有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她还写了一些篇幅较长的文艺评论，其中包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席勒、密茨凯维支等人的评论，至今仍受到文艺评论家的重视和好评，卢森堡还对文艺的社会功能、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她认为，党的报刊推荐给工人群众阅读的文艺作品，必须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如同食物一样，这些“食物必须是真正有益健康和优质的：我们的工人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取得这样的食物！”^①

她还认为，文艺作品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完美应该是一致的，她厌恶那种“追求虚张声势和华而不实的作风，追求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内容极为贫乏的思想”。^②后来，她还说过：“对于那些作家，我有点讨厌他们有本领出色地、完美地掌握形式，掌握诗的技巧，但同时缺乏伟大而崇高的世界观，这确是事实。这种不调和的情况在我思想中显得如此空虚，以致美丽的外形在我看来竟成了丑脸。”^③

卢森堡喜欢自然、真实、质朴、简洁、刚健、开朗的作品，反对矫揉造作和虚饰，更厌恶感伤和颓废。她说：“艺术——同一切公

^① 《卢森堡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卢森堡文选》，第160页。

认的美学哲学概念相反——决不是奢侈品，不是在多愁善感的灵魂中激起美感、快乐的情绪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手段；艺术就和人类的语言一样，是人们的一个重要的、在历史上形成的交往形式。^①这种认识，是和她充满朝气、乐观豁达的精神人格是完全一致的。她还认为，作家的人格和世界观如何对其作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世界观，就没有伟大的艺术。”^②

坎坷的个人遭遇和变幻的政治风云磨练了卢森堡坚毅的性格。在不断探索人生真谛的过程中，她深深懂得必须作生活的强者，必须与“命运”抗争，必须以奋斗的精神对待人生和事业。在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以前，在写给对方夫妇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她对人生意义的深刻认识：

“我想，在大海的风采面前，最强烈的感受必然是自我空虚感，特别是面对大海的永恒性、不变性、庄严的冷漠性。在观察瑞典境内莱茵河瀑布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它那永不停歇的咆哮，它一秒钟也不沉默，日日夜夜倾泻奔流着，延续了几多世纪，使我充满了可怕的、毁灭性的感觉……，当然，它是敌人——使人们联想到自己，也是这样突然陷入空虚缥缈的境地。对世界的见解也有类似印象，就像本·阿基巴对一切事件所作的回答那样：‘永远如此’，^③好像一切就这样安排好了似的，而人及其愿望、能力似乎显得如此地多余……。因此，我仇视这种哲学，宁愿投身莱茵瀑布和像核桃皮似的死在那里，强似摇晃着聪明的脑袋听任其继续呼啸，

① 《卢森堡文选》，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50页。

③ 这里卢森堡借用了德国剧作家卡·古茨考的剧作《乌里埃尔·阿科斯特》中主人公本·阿基巴的说法，阿基巴是一位年老的犹太教牧师，他认为人世问发生的一切事都是过去有过的，将来也会如此重复下去。

就像我们老祖宗时候这样呼啸，我们身后还将这样呼啸那样。”

从这段寓意深刻的话里，从卢森堡心声的倾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人生哲学；决不能屈服于“永远如此”的“命运”，人必须永不停歇地前进，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才能获得人生的幸福。

那么，卢森堡是怎样理解和感受生活的美呢？正如熟知卢森堡的路易莎·考茨基后来所回忆的，卢森堡“善于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美，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从生活中夺回幸福。不管她是在独立地创作，还是在顽强地研讨别人的研究成果，总之，她在各方面都能找到幸福和欢乐”。卢森堡本人回忆的一件事也证实了这一点。从1911年底开始，卢森堡在长期从事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和在党校讲课的基础上，开始写她那本最重要的名著《资本的积累——从经济上阐释帝国主义》（即中译本《资本积累论》）。卢森堡本人对该书的写作不仅重视，而且视为生活中的极大幸福。她写道：“写作《积累》的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仿佛生活在梦中，日日夜夜，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我别无所思，别无所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给我带来更大的乐趣：在构思过程中，当纷繁的问题向我高速奔驰而来时，我在房间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来回踱步，咪咪（卢森堡的爱猫——本书作者附注）转动着它那聪明的脑袋随着我的步履来回盯着我，深思熟虑的内容形成了，通过我手握的笔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了……真是闻所未闻，在30个月里，我一挥而就地写了30个印张，连原稿都没有再读一遍，就立即交付刊印。”

通过这段自叙，卢森堡那种乐观、顽强，对创造性的生活充满挚爱和情趣的性格和气质，可谓跃然纸上！

由上可知，从20世纪初到大战爆发前夕，卢森堡和她的战友们，为坚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路线和策略，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及其在内政和外交上推行的战争政策和反人民政策，

为使第二国际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英勇顽强的搏斗，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遗憾的是，由于德国党内和第二国际内机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和蔓延，从蜕化变质最后走向沉沦破产。也由于左派的弱小和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的某些弱点和失误，更由于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卢森堡等左派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出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这不仅是卢森堡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严重挫折。

1914年8月初，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终于猛烈地燃烧起来了。卢森堡的革命生涯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战与炼狱的严峻考验时期。

六、大战和炼狱——灵与肉的考验

1. 八月四日剧变之后

1914年8月，帝国主义终于把全世界拖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腥的世界大战。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即以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等为一方的同盟国集团，以英国、法国、俄国等为另一方的协约国集团，为了重新分割世界，挑起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以咄咄逼人之势向欧洲和世界扩张的德国是发动这次大战的罪魁祸首。8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向德军发布总动员令并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战火开始燃遍全欧。头戴尖顶钢盔足登过膝皮靴的德国士兵潮水般涌过了邻国的国界，欧洲为之颤抖，世界为之震惊。

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前一天以所谓党的“纪律”强制少数派服从他们的决定之后，在当天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案。党的主席胡·哈阿兹还宣读了一项背叛性的声明。这项声明违背了党的纲领原则，也放弃了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以来多次重申的关于战争的决议。声明竟然说：“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战争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必要的款项问题……在危难存亡之际，我们决不置祖国于不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此项声明实质上就是对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公开和直接的背叛。实际上，他们的背叛行动在数日前已经开始。早在7月31日，即德皇

宣布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党的执委会就发表呼吁书，要求工人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做“无谓的和盲从的牺牲品”，即公开表示放弃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

在德国党这股祸水的带头冲击下，其他交战国的社会党的机会主义首领及其议会党团，都纷纷丢盔卸甲，抛弃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被所谓的“爱国”浪潮所淹没了，站在所谓“保卫祖国”即“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立场上，帮助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玷污和践踏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神圣旗帜，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同谋，堕落成可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被机会主义彻底腐蚀的第二国际实际上已不再存在。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坚持反帝反战革命立场。和列宁站在一起的还有各国党内的少数左派，主要有以卢森堡为杰出代表的德国党左翼、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保加利亚的“紧密派”等。

8月4日，当卢森堡获悉党的国会党团竟然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案后，她为党的国会党团的可耻行径所震惊，为党的首领的背叛性声明所激怒。正如她稍后所说的：“那个8月4日，最初一刻，我惊呆了，几乎压垮了。”但卢森堡迅即镇定下来，立即邀集少数左派战友当晚在自己寓所里聚会，商讨革命派的对策。参加这次聚会的有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威廉·皮克以及海·兹克尔夫妇、胡·埃贝兹因、恩·迈耶尔。卢森堡在发言中猛烈抨击了党的首领和国会党团的叛卖行径。她说，从今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是一具发臭的僵尸，如今只有我们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要为拯救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后来，当列宁获悉卢森堡提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具发臭的僵尸的断言后，大为赞赏，认为这是卢森堡的一句名言。根据卢森堡提出的不能沉默和等待的提议，会议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相机进行有组织的反对帝主

义战争的斗争，但不同意以退党来表示对党领导的错误路线的抗议。会后，卢森堡当仁不让地承担了组织革命左派的重任，迅即给全国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拍发了300多份电报，希望他们表态反对国会党团的背叛行径并组织左派力量。但是，由于机会主义已经腐蚀了全党和地方党组织基本上处于机会主义分子控制之下，而多数党员群众还不明确前进方向等原因，响应者寥寥无几。只有蔡特金立即表态坚决支持卢森堡的立场，其他人都以各种借口婉言拒绝了。因此，立即组织左派力量的希望落空了。但卢森堡毫不沮丧和气馁，继续思考和酝酿今后的斗争方向。

9月5日，当时正在柏林的俄国女革命家亚历山大·科隆泰造访了卢森堡，描述了卢森堡的心境和打算。科隆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会见了罗莎。会晤是短促的，却使我神清气爽，罗莎清醒地看待生活。她以无情的讥讽琢磨了许多事情。非法斗争她认为尚嫌过早。私下的会议则现在正在进行。没有失去与群众的联系。从个别接触中感到工人们目前对战争不抱热情。联系到物价飞涨，我指出妇女们可能发挥的作用。罗莎表示同意。她谈到了克拉拉（蔡特金）。她谴责了盖得。对王德威尔得不抱任何期望。”^①

9月10日，在卢森堡倡议下，德国党左派领导人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和克·蔡特金四人联名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表示不赞成他们关于战争的原因、性质和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作用的说明。由于无法在国内刊登此项声明，所以直到10月30日，才在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哨兵报》第一次见报。

^① 指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盖得、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暨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的王德威尔得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战争并参加法、比两国政府。

1914年11月，卢森堡致她过去在国际局中的同事、比利时社会党活动家、原第二国际主席卡·胡斯曼的信中，更加明确地谈到了她对当前形势和第二国际破产的看法，而且反对在旧的基础上复活第二国际。她说：

“我们的状况是异常困难的。但我相信，工人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当有可能向他们摆明问题的时候。当然，现在他们利用战时状态，企图恐吓我们和麻痹群众。然而人们的思想状况正在加速演变……”

国际是彻底地破产了……至少我反对作出这种努力，以便用滑稽面具和欺骗来使它改头换面……”

同月，卢森堡在致党外朋友迪芬巴赫的信中，再一次表述了对德国党和第二国际破产的看法以及叛徒们的卑劣行径：

“党和国际经历了彻底的失败，这一点并不引起人们的任何怀疑。……每当看到过去的‘朋友们’的一切新的卑劣行为时，看到报刊空前坠落情况时，有时你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

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的被迫停办，卢森堡的生活费来源断绝了。她不得不接受她的好友，当医生的迪芬巴赫的资助，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当时，战争正在德国东西两线猛烈进行。随着秋季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中的失利，粉碎了德国军国主义一厢情愿的速胜战略，持久的阵地战代替了速决的运动战。战争形势的转变促使一部分受沙文主义影响的群众有所觉醒，从而有利于反战斗争的开展。

经过最初的沉寂后，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德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逐步开展。为了反击由机会主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狂热地宣扬的、蛊惑人心的“国内和平”（“城堡内和平”）、“阶级合作”的口号，以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为首的革命派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革命口号：“不要国内和平，要进行国内战争！”“敌人是在

本国之内”。10月，以柏林及其郊区为中心，德国许多城市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左派小组，它们有计划地进行反战反帝的宣传和斗争。尽管他们人数还不多，然而却显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卢森堡是这些左派小组的组织者之一。

1914年秋冬之际，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不顾反动政府禁止政治活动的戒严令，冒着随时被捕的风险，以多种形式，在全国各地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人群众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宣传革命的积极活动，并在柏林、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纽伦堡、哥达等城市的反战集会上发表了多次演讲，还与各地的党的反对派组织进行接触和磋商，以争取和团结更多群众。为了扩大革命宣传，给工人群众指明斗争方向、壮大左派力量，他们除了出版秘密的反战传单和小册子外，决定创办一个杂志，定名《国际》并由卢森堡任主编。

与此同时，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还在英国的社会主义报刊上刊登信件，向国际无产阶级揭露德国党和第二国际首领们的背叛行为，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2. 第三次在德国入狱与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在这乌云蔽日、浊浪铺地的日子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是革命左派的英勇旗手，也是反动派惧怕万分的“危险分子”，千方百计企图迫使他们沉默和消除他们的影响。早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政府当局就命令电信机构撤去卢森堡住宅的电话，切断了她的对外电话联系。10月20日，帝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卢森堡的上诉，那是她不服该年2月判她一年徒刑而早就提出来的。12月2日，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第二次军事拨款表决中，冲破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禁

令，毅然投入了反对票。这是国会中唯一投反对票的议员。他的勇敢举动捍卫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荣誉，大大鼓舞了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志，也招致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疯狂攻击。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通讯》上撰文，热烈赞扬和支持李卜克内西的举动，有力地批驳了右派的攻击。她严正地指出，破坏党的纪律的不是李卜克内西，恰恰是那些赞成军事拨款的国会党团多数人，他们背叛了党的纲领原则和目标。

反动派暴跳如雷，恶毒诽谤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企图“叛国”。迫害的阴影逐步向他们逼近。1915年2月7日，反动政府下令征召李卜克内西入伍，充当建筑工兵，企图以此隔断他和左派群众的联系，只准许他在国会开会期间才可以返回柏林参加国会会议，明令禁止他参加国会以外的任何政治活动。1914年12月，反动政府准备执行前此作出的判处卢森堡一年徒刑的判决。但由于卢森堡正在患病，获准推迟到第二年3月31日开始服刑。可是，1915年2月18日，丧失人性的反动政府突然提前逮捕尚在患病的卢森堡，将她囚禁于柏林市的巴尔尼姆“国家”女狱。为什么反动政府提前逮捕她呢？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她在2月10日抱病参加了一次党的集会并发了言，触犯了当局，因为他们早就想制止她的反战反“国内和平”的活动了；二是当局怕她出国。确实，一些时候以来，卢森堡已和蔡特金多次酝酿赴荷兰与她们的战友、荷兰党的女活动家罗兰—霍尔斯特一起，筹备在一个未卷入战争的中立国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后来确在瑞士的伯尔尼召开了。

卢森堡的被捕入狱引起了国内外无产阶级群众和革命派的严重关注和强烈反响。柏林和各地的许多工人群众发出了愤怒的抗议呼声，她收到了很多致敬的书信和表示慰问的花束。李卜克内西在普鲁士国会的发言中就此事向政府提出了抗议。3月下旬，

在伯尔尼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蔡特金的主持下，以会议名义发表了抗议声明。4月上旬，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也就此事提出了抗议。

卢森堡的身陷囹圄，不但对她本人是一个打击，破坏了她信心十足地拟订的整个活动计划，而且对德国整个左派革命运动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无人能够完全替代她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但她为之耗费了许多心血、作了长期准备的两项工作结出了硕果：3月上旬，党的左派领导人在柏林—斯特格利茨的威·皮克的寓所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这是集结左派力量的一个良好开端；4月中旬，她主编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月刊》终于问世了，上面刊有她执笔的社论《国际的重建》。在这篇社论中，卢森堡无情地斥责了党的首领的叛卖行径。指出他们已堕落成为“在当前战争中充当帝国主义的拿盾牌的仆从”^①。她还严厉谴责了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分子丧失原则的立场。她指出，甚至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与他们的手法比较起来也是小巫之见大巫。她斥责了考茨基关于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的谬论。她指出，正是在战争期间，才更有必要进行阶级斗争，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指导下为结束战争和争取和平而行动起来。她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经验，要求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革命的原则重建国际。在文章的最后，她形象地为拟议中的国际提出了任务：“它的历史使命是：去摧毁社会不平等这棵千年古树，去移山倒海。”^②《国际》是革命的号角，虽然它只出了一期就被政府以破坏“国内和平”为借口而查禁了，党的执委会也发出通告，攻击它破坏了“党内的统一”。但《国际》在国内外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和

① 《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社会民主党背叛行径的本质。从此，集结在该杂志周围的德国左派就被称为“国际派”。

高高的狱墙阻挡了卢森堡与工人群众、革命战友的联系，使她至感孤寂，恶劣的“政治犯”待遇损耗着她的体质，使她的健康久久未能康复。但这一切磨难均未能损蚀她的革命意志。经过斗争，她从当局那里争取到了准许阅读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于是，卢森堡充分利用狱中的漫长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重新捡起了中断多时的《国民经济学入门》一书的写作；回答众人对《资本积累论》的批评，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它的续篇《资本的积累——反批判》，然而，卢森堡绝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只钻象牙之塔的纯理论学者。大战的严酷现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等一连串问题，使她梦魂萦绕，难以忘怀，对此必须作出革命者的正确回答。于是，卢森堡利用监狱当局放松对她监视之机，违背禁令，克服劳累和疲痛，搁下其他论著，从1915年4月开始，奋笔直书她那闻名于世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称《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书。为什么又称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呢？这是因为，卢森堡在书上署名“尤尼乌斯”，意即“青年人”。这就是说，卢森堡以青年人自勉，以青年人特有的锐意进取的精神来写这部书的，足见卢森堡的革命斗志是多么旺盛！这部书稿完成后，由探监的李卜克内西偷带出狱，于1916年4月在苏黎世出版，那里正是她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的地方。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出版后，引起了各国社会党革命左派的广泛重视和好评，鼓舞了人们的革命斗志。这部书是在丰富的史料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卢森堡在书中从深入地分析帝国主义的发展入手，科学地追溯了大战的根源和实质，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猛烈地抨击了第二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倒向帝国主义的背叛行径。她痛心

指出，正是他们糟塌了近代工人运动存在以来就一直高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订的神圣旗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偷换为“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和消灭”。联系到1914年8月4日德国党的国会党团的拙劣表现，他们自我辩解说什么是由于必须在祖国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不能两全的困境下，在两者必须择一的情况下，才怀着“沉重的心”，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的骗人鬼话。卢森堡严正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空话。恰恰相反，在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之间，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时期，是完全和谐一致的；不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要求最大限度地致力于发展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坚持捍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卢森堡强调指出，背弃阶级政策，就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放弃了自己生存的基础”。^①

卢森堡在书中还谈到了民族问题。她指出：“社会主义承认每个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权利，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然而，把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作为这种民族自决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的真正嘲弄。……”^②“国际社会主义承认各民族自由、独立、权利平等的权利，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创造这样的民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③由此可知，此时的卢森堡已改变了过去的观点，对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口号本身已不再否定，承认了它的政治意义，她争论的主要是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性和时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中，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驳斥了考茨基刚炮制出笼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按照考茨基的观点，似乎资本主义可以再经历一个新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2卷，第370、343页。

② 同上书，第353页。

③ 同上书，第355页。

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似乎战争的教训会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放弃相互斗争，建立相互和解和协调，达成“协议”和“裁减军备”，“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从而实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卢森堡列举并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你死我活地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种种历史事实，指出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和战争是紧密相连的。不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消灭帝国主义而“期待和平新纪元”只是一种幻想。她还指出，不号召甚至反对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坐等帝国主义恩赐和平是骗人的鬼话，只有进行坚韧不拔的阶级斗争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和取得和平。应该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出笼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批有力地批判这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这是她的一个值得称道的历史功绩。

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的附录里，刊印了卢森堡草拟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纲》。她在这个著名的《提纲》中分析了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迫切问题，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坚持国际团结，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努力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把反帝反战斗争变为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危机》一书和《任务》一文都未能明确地提出实现这一任务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路线，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此书出版后，列宁当时正在瑞士，他并不知道“尤尼乌斯”就是卢森堡的笔名。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该书和附录，还撰写了长篇评论，向该书的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本小册子“总的说来，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①同时，列宁严肃地指出了书中包含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指出社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3页。

会沙文主义者同机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没有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这个口号去反对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目的。列宁强调指出，这不是作者个人的缺点，而是德国整个左派的软弱造成的，“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秘密组织来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来教育群众”。^①

列宁对该书的另一个批评是，说作者否认帝国主义时代还存在民族解放战争。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卢森堡在书中是这样说的：“在今天的帝国主义环境下民族自卫战争根本不可能有其位置的。”^②从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卢森堡显然是指发动战争的双方，即不论德、奥方面，或是英、法、俄方面，都是为了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发动大战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不可能具有民族解放战争或民族自卫战争的性质了，这是为了揭露和驳斥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提出的所谓“保卫祖国”的谰言的。至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发动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卢森堡是决不会反对的。大战爆发前一年发表的《资本积累论》已鲜明地表现了她在这一方面的立场。在那本书中，她无情鞭撻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行径，热情讴歌和支持了被压迫民族，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事实。实际上，在《危机》一书中，关于卢森堡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定立场，列宁是看到了的，也是予以肯定的。

卢森堡的书在苏黎世出版后，秘密运回德国散发，在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广为传播，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鼓舞了人们的革命斗志。

列宁指出的，德国左派缺乏严密的秘密组织这个缺点的批评

^① 《卢森堡文选》第2卷，华沙版，第35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60页。

是异常中肯的，德国左派自己也已经有所觉察，并在实际行动采取了纠正的最初步骤。1916年1月1日，在身陷囹圄的卢森堡建议下，“国际派”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的律师事务所内，召开了左派分子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与会代表讨论了卢森堡在狱中起草的《国际社会党的任务提纲》和李卜克内西的修改建议。但李卜克内西更为激进的修改意见未能为会议所接受。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卢森堡的提纲，稍作修改后于2月出版，作为国际派的行动纲领。这次代表会议的召开客观上标志着德国左派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国际派”决定出版定期的宣传性质的报刊《政治书信》，借用古罗马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斯巴达克的名字，发行人署名为“斯巴达克”。从此，该刊就以《斯巴达克书信》驰名于世，因而德国的左派也就称之为“斯巴达克派”。此后，卢森堡从狱中不断为《书信》撰稿，仍是斯巴达克派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和理论领袖。

上述种种事例表明，卢森堡身居牢房心在革命，通过自己多产而有极强针对性的狱中论著，以自己光辉的思想影响和指导着德国左派的斗争，为德国革命运动作出了自己独特而可贵的贡献。在肉体与灵魂的考验面前，她是胜利者。她那崇高的精神面貌，正如她的战友蔡特金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她那不屈的意志，把残酷禁锢肉体的牢房，变成了精神自由的场所……她十分珍惜地利用每一寸光阴，每一束光线。信念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驱散了疲劳和病痛。”

柏林的工人群众对被囚狱中的卢森堡的命运是极为关注的，经常探询关于她的消息和生活状况。当他们得知她即将出狱时，甚至争着凑钱为她购置了衣裙以示心意，以便使她出狱时能穿戴整齐。工人们的殷殷情意当然不是区区钱物所能衡量的，但却说

明了卢森堡与工人群众心心相印的感情联系。

1916年2月18日，刑期届满一年的卢森堡被释出狱。这一天，1000多名柏林工人群众，其中多数是劳动妇女，聚集在巴尔尼姆女狱前，迎候他们所爱戴的卢森堡出狱，形成了自发的集会和示威。下午4时，当李卜克内西陪伴她坐上小汽车徐徐驶出狱门时，响起一阵阵热情的欢呼声：“罗莎万岁！”“和平万岁！”人们跨上小汽车的踏板，探首车窗，把鲜花抛进汽车，并向卢森堡热烈问候和握手。卢森堡苍白疲惫的脸庞上浮现出了动人的微笑，频频向人群招手致意。出狱的第一天，除了战友、熟人、朋友探访慰问外，更多的是不相识的劳动妇女，陆续来到卢森堡的寓所热诚问候。卢森堡与每位看望她的人都要交谈几句。这使她兴奋不已。

3. “斯巴达克派”的领导者

出狱后的卢森堡顾不得稍事休息，就立即投入了新一轮组织左派力量的艰巨工作。她先是到德国西部地区旅行了一趟，那里是工人阶级密集的地区。她通过宣传和动员群众，物色，选拔，培养和组织斯巴达克派的骨干队伍。返回柏林后，卢森堡还不断地到工人集会上发表讲演，解释斯巴达克派的革命纲领。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工人群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甚至出席了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即中派分子的会议。经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分头下去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以后，斯巴达克派的力量和影响迅速扩大。《斯巴达克书信》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深受工人群众欢迎，但也引起了政府机构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的惊恐和仇视。他们策划于密室，窥测时机，准备再次向革命派领袖伸出迫害的魔爪。

1916年3月19日，在左派力量日益壮大和思想认识有了提高

的基础上,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恩·迈那尔等人发起,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柏林和全国各城市,地区的近40名代表。会议讨论了革命派面临的任
务,反对派的状况,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问题以及对即将召开的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国际代表会议的态度。会议根据卢森堡所作的关于国际和美齐尔瓦尔德运动的报告,作出了支持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决议。根据李卜克内西关于组织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报告,会议作出的决议要求同任何机会主义政策严格划清界线。会议的决议还提到要不断冲破戒严状态,粉碎“国内和平”和“阶级调和”的谰言。决议指出,整个宣传的目的必须是“为进行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创造条件”,并使这个运动向自觉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方向发展。应该说,这次代表会议基本上完成了斯巴达克派的组建工作,并为组织和领导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卢森堡等左派领袖还没有充分理解到,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政党,对于胜利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具有的无比重大的意义,因而他们拒绝了部分同志提出的独立建党的要求。认为组织上留在原有的党内,思想上与其划清界线的作法有助于争取党员群众的多数。

通过这一阶段的合作共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不仅有工作上的紧密联系,而且增进了个人友谊。该年春季复活节时,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及其俄国籍妻子索菲娅一起度过了短暂的假日。此后,卢森堡与索菲娅友谊日臻,形同姊妹,经常来往。

4月,随着所谓“反对派”——以考茨基、哈阿兹、迪特曼、累德堡为代表的中派分子机会主义面目的更加暴露,斯巴达克派加强了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其表现之一就是广为散发卢森堡的小册子《二者必居其一》。卢森堡在书中指出,必须与中派分子划清界

限，分道扬镳，同他们合作并容忍其不彻底的、软弱的幻想和政策已不可能了。

与此同时，斯巴达克派在广大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左派阵地，还培养出了一批骨干队伍，依靠他们与最重要工业企业的工人建立联系，形成了遍布各地的组织网络，在斯巴达克派领导和影响下，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暴虐统治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16年五一节时，斯巴达克派组织和领导了首都柏林和不伦瑞克、不来梅、德累斯顿、耶拿、基尔、莱比锡、马格德堡、斯图加特等城市和地区的工人集会和示威游行。这是大战爆发以来德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在五一节公开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愿望。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与群众一起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拦和封锁，参加了在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举行的强大的反战反政府示威和集会。在万众欢呼声中，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登上了讲台，前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并带头响亮地喊出了“打倒战争！”“打倒政府！”的革命口号。还没有等卢森堡讲话，挥舞警棍的警察冲了上来殴打并逮捕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在同志们掩护下侥幸脱险。反动派想一网打尽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是预谋的。前此不久，马尔赫列夫斯基和蔡特金就已锒铛入狱。

卢森堡以笔作枪，在《斯巴达克书信》上撰写文章，号召群众以斗争来回答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迫害，以群众性的斗争来争取打倒政府、结束战争。

早已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和帮凶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爱·大卫，为了奴颜婢膝地表白自己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是何等的忠诚，跳出来攻击李卜克内西，说什么“大声叫的狗，是不咬人的”。义愤填膺的卢森堡立即提起她那横扫千军的如椽之笔，在题名为

《狗政治》的革命传单中，淋漓尽致地揭露和痛斥了大卫的叛徒嘴脸：

“舐主人的皮靴，他的主人多年来用脚踢他，这样的人才是一条狗。

谁对威严状态表示缄默，却阿谀献媚，看他的军事独裁的主子的脸色行事，低声下气地向他们哀求恩典，他才是一条狗。

谁对一个不在当面的，被人带上枷锁的人狂吠，并且供目前的当权派役使，他才是一条狗。

谁要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就发誓否认和诬蔑他的党的整个过去，发誓否认整世代认为是神圣的事物并践踏于泥潭的，他才是一条狗。

……”

1916年5—6月，柏林和许多城市的工人群众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乃至政治性罢工，以抗议反动当局逮捕和审判李卜克内西。在这两个月内，卢森堡除了参加群众集会，发表讲演，“制造”（卢森堡语）传单，揭露反动派罪行，谴责叛徒们的阴谋，指明斗争方向以外，几乎每天“出征”：陪伴李克内西的妻子索菲娅带上食物和报纸探监。稍后，当卢森堡也被捕入狱后，她在致索菲娅的信中，以乐观主义的幽默感回忆了这段难忘的往事：“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当时却感觉良好。我们每天清晨坐车到波茨坦广场，然后途经浓荫密布的动物园驶向坐落在宁静的莱赫泰尔街的、用高高的榆树树桩围起来的监狱。然后返回，到富尔斯滕霍菲区照例必须停的站（指李卜克内西家——本书作者附注），再到苏台德区我那里完成您那义务性的访问，那里五月的美景正熠熠生辉。在我的厨房内，在静悄悄的时辰里，您坐在铺着白桌布的小桌旁，和咪咪（卢森堡养的猫的名字——本书作者附注）一起耐心地等待着我的烹饪杰作，您还记得那出色的巴黎式的绿

色菜豆吗？……”

敌人是不会放过卢森堡的。她早就被反动当局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最有能量的煽动家”，早就被警探秘密监视和盯梢了。但卢森堡从来把从事革命活动看作是她天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继续顽强地从事斗争。6月初，卢森堡就遭到短期拘留，罪名是写了“煽动性传单”。

7月初，卢森堡来到莱比锡进行反战反政府宣传活动。暗探在向警察当局呈送的秘密所告中她说的讲话“纯粹是政治性的”，触犯了戒严令。

1916年7月9日，星期日，当卢森堡从外地旅行返回柏林寓所时，得知上一天就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找她。第二天破晓，那两人又闯了进来。他们是秘密警察。卢森堡就此被捕入狱。从这个“黑色星期一”开始，卢森堡进入了一个渺无期限的“预防性监禁”时期。敌人为了达到长期迫害和囚禁她的目的，干脆实行了“三不”政策：不起诉、不审讯、不判决！

4. 铁窗关不住心灵的美 ——狱中世界

入狱之初，卢森堡再次被关押于柏林市内的巴尔尼姆女狱。不久，她又作为“要犯”移囚于亚历山大校场边上的警察总局监狱。她在一间肮脏的、满是臭虫，房内放置便桶，没有照明的单身黑屋内关押了6周。反动当局又觉得这里也不够“安全”，因为尽管这里是在他们眼皮底下，但毕竟离工人区太近了，怕出意外。于是，1916年10月底，卢森堡被转到德属波兰地区波兹南省僻远的弗龙克要塞监狱。1917年7月，卢森堡最终被囚禁于德属西里西亚的布勒斯劳市（现为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监狱。直到1918年11月德

国革命爆发才获释出狱。这样，卢森堡在监狱中度过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艰难岁月。

在阴森、孤寂、凄凉、黑暗而漫长的囚徒生涯中，在十分艰难困苦和疾病缠绕的恶劣环境里，在与外界联系极为稀疏和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在灵魂与肉体的双重考验中，卢森堡的革命意志没有丝毫消沉。她的精神生活是丰满充实的，尽管正届盛年的她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了，有时情绪也显得有些烦躁。但是，卢森堡振奋精神，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一方面大量地博览群书，一方面勤奋地写作。通过邮检部门送达狱中的战友们和朋友们寄来的信件和书籍，被她视为珍贵的礼物，往往反复阅读和咀嚼，充分吮吸其中带来的生活气息。正如她在致友人的书信里自己所写的：“在这里，一切精神上的享受，作为我已与之脱节的现实生活的代用品，必定对我产生较之在通常条件下更为有力的作用。”书是战友们探监时应她的要求带来或寄来的，或是由她忠诚的女友、原秘书玛·雅各布收集后送来的。她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除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外，还津津有味地涉猎自然科学图书，包括天文学和地质学。即使在警察总局监狱那种连照明设备也没有的牢房里，卢森堡仍顽强地坚持读书。正如她从狱中所发出的书信中所说：“我的囚室晚上没有灯，因而不得不把书高高地捧在手里，为此我就不得不站着读，以便可以借助从门上部的玻璃透过来的走廊里的昏暗光线。”她为生命的短促和学海无涯面感叹：“当我想到我还只能活多么短的时间并且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的时候，我真是感到可怕。”

卢森堡写作的书信、论文、传单则千方百计地瞒过狱卒，由探监的战友或她的秘书雅各布带出狱门，设法送达战友手中或秘密印刷出版。这样，在斯巴达克派的地下报刊上、传单上，处于苦斗中的人们得以读到她那珍贵的政论作品。在非法出版的斯巴达派

机关报《斯巴达克书信》上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作品。在左派唯一合法出版的周报《斗争》上也经常刊登她的文章。尽管当时人们未必知道这些文章出自她的手笔，但人们从她那特有的热情、尖锐、泼辣的文风上，依稀可认出她那矫健的身影并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此期间，卢森堡整理完成了她那大型著作《国民经济学入门》。遗憾的是，她未能亲自看到该书出版，甚至该书的后半部手稿也在她1919年1月被捕抄家时丢失了。值得告慰她的英灵的是，该书在1925年初版后曾多次再版，还被译成多种外文流传各国，得到了良好评价。她在狱中还完成了她的另一名著《资本的积累——反批判》。这是她的《资本积累论》的续篇，也是前书更集中、更明确的概括。这部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研究帝国主义的一部有影响的书，尽管时至今日人们仍对它议论纷纭，褒贬不一。不管人们对她在该书中阐发的思想理论有何种评论，卢森堡本人对该书是十分重视和满意的。她在致友人信中写道：“……这个作品实际上是我感到有点自豪的成就，而且看来有可能流传下去。我认为它比《积累》要成熟得多；它的文字已做到十分单纯，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故意卖弄和虚假的光彩。它的一切干脆都归之于几条大的线索——我要说的是——‘朴素无华’，像一块大理石。”

卢森堡在出狱前数月，即1918年夏季，还完成了具有波兰血统的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译成德文的工作并写了长篇序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如此严酷的狱中环境里，在她那如此紧张的现实斗争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卢森堡要花费如许心血和精力去从事一部长篇小说的翻译呢？是出于纯文学的爱好吗？不是的，她翻译这部作品是出于对俄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也是和她当时的心境紧密相连的。她的长篇序言道破了这个秘密。她在序言中指出，俄国社会中那种“漫长的黑

夜,墓地般的寂静是假象,是虚幻的”。正是俄国现代文学的狂飙突起是和“俄国现代”政治发展之间的惊人的相似”,促使她对柯罗连科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作品“是从反对现存制度,从斗争精神上产生出来的。”^① 她的这部译稿连同序言送出狱外后,于1918年底由柏林的卡西列尔出版社出版。但该书于1919年初实际印出时,译者已牺牲了。当她的精彩的长篇序言译成俄文作为单行本于1922年发表于苏维埃俄国时,作者已长眠地下两年有余了。然而,她的这篇序言得到了很高评价,被苏联学者认为是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概括性论述。卢森堡还就狱中大量阅读过的各国文学作品以书信和随笔的形式发表了许多简短而精练的文艺评论。她的这些书信和随笔后来也结集出版了,而且译成多国文字发表,人们从中可以受到许多教益。这不仅是从美学角度,更多的恐怕是文艺的价值观方面。她还论述了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联系,指出了文学作品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价值。

卢森堡从监狱里公开地或秘密地同她的同志们、朋友们进行了通信联系,论人生的真谛,叙读书的心得,谈自己的生活感受。这些后来得以公开出版的信札都是优美、流畅、细腻和刚健并存的抒情散文,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间所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哪怕她在倾诉自己的痛苦时也是如此。她不但自己敢于直面人生的痛苦,经受灵魂与肉体的折磨和考验,而且坚信人类社会通过痛苦和灾难,将走向进步和幸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鄙视那些向敌人妥协投降的中派机会主义者。例如,她在1916年12月底致玛·符尔姆的信中,斥责了“不可靠的牧师考茨基”、前党主席哈阿兹以及迪特曼、巴尔特之流是“软骨头”,“卑鄙的、不成器的家

^① 《卢森堡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58页。

伙”，而她自己则“从来不是软的，最近取得了炼过的钢那样的硬度”。她还引用歌德的诗行来比喻说：“是一个人，这就意味着一生不动摇，任凭‘命运的伟大天平’来处置。”在致友人的其他信件中，她曾自称是党内最后两个男子汉之一，另一个男子汉是克拉拉·蔡特金。她十分厌恶党内那些投靠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同路人，说她们是“党棍和小店主”，是“风信鸡”，对这些“卑躬屈节的英雄们”只能“嗤之以鼻”，她表示再也不愿和他们往来，而只能加以鞭挞。与此同时，她以火一般的热情，诗一般的意境，去感染和激励同志们“勇敢”、“无畏”，顽强地生活和战斗，迎接美好的未来。她在致同样被囚狱中的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让我们到美好的时候再见面”。

当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缺乏曲折生活经历磨练的少妇索菲娅，因丈夫已被囚一年多两十分苦恼和显得悲观的时刻，卢森堡频频给她写信，劝慰、晓喻，帮助她认识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哲理。她在一封信里写道：“……这种情况拖延得愈长，每天发生的卑鄙、恐怖的事情愈益逾越常轨，我也变得更加镇定，更加坚强，正如人们对化学元素、草原上的风暴、洪水、日蚀一样……在历史的相当时机内，会产生出最巨大的事变和最有纪念意义的伟业。人们在社会演进中也要像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必须泰然自若，襟怀磊落，面含微笑地去接受这一切。”

在另一封致索菲娅的信里，卢森堡写道：“我在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躺在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褥垫上，屋子里笼罩着墓地里惯有的那种死寂，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坟墓里一样，天花板上映照着一小块从小窗里透过来的灯光，这是牢房前一盏通宵点燃的灯发出的微弱的光。偶然可以听见远处一列疾驰而过的火车发出的低沉的车轮声，或者近处狱卒在窗前发出的干咳声和他挪动僵直的双脚而使笨重的靴子踩着砂砾而发出的绝望的吱吱声，好像人生的凄

凉和无望全都随着这声音传播到潮湿、黑暗的夜晚去了。我一个人静静地躺着，身子像是被冬日的黑暗、愁闷和不自由的黑布层层缠绕蒙住了——但是我的心却由于一种无从捉摸的、奇异的内在的喜悦而怦然跳动，恰似我在辉煌的阳光下走过一片绚丽的草原一样。在黑暗里我向生活微笑，仿佛我已洞悉了一个魔法的秘密，这秘密制裁一切邪恶和令人厌恶的谎言，并能把这一切化为纯真的光明和幸福……我相信，这秘密不是别的，它就是生活本身。漆黑的夜幕美丽、柔软得像天鹅绒，只要你能正确地看待它。在狱卒沉重、迟缓的步履下潮湿的沙砾所发出的吱吱声也像在低唱浅吟一首短小悦耳的生活之歌，只要你懂得如何去听。我并不想以苦行主义的虚幻的欢乐来哄骗你。我给予你的是一切现实能感觉得到的快乐，让你可以披着一件缀满灿烂繁里的外衣走过人生的道路，这件外衣会保护你，使你不受一切细屑繁琐的杂事和一切烦恼的侵扰。”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者生涯中遇到的挫折、痛苦、磨难乃至敌人的审讯、铁窗生活直到牺牲，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极难避免的生活之路，只能勇敢地迎接它们，没有理由消极地回避它们。她在致索非娅等人的其它信札中直抒胸怀：“我怀着必要的开朗、沉着的心情去承受命运的一切坎坷”，“你在明信片里问道：‘为什么一切都是这样的呢？’你真是一个孩子，生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切不外是痛苦、别离和热望。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且要把它看成是美的，善的。至少我对待生活是这样的。”因此，卢森堡说：“我不希望从我的生活中减少些什么，也不希望跟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的生活。”在另一处她还说：“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活的美就会跟我同在。”在另一封信里，她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岗位上，在一场巷战或者监狱里死去。”

紧闭的狱门只能禁锢卢森堡的肉体，却关不住卢森堡对社会大变动和革命的向往。她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描述，拟人化地表达了她对革命风暴来临的渴望：“空气中有一股雷雨前的郁闷，有一种微微使人压抑的紧张；灌木丛丝纹不动地挺立着……万物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我凭窗伫立，也在等待……；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鸣叫得像是一支清脆的银铃，它歌唱得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她如此赞赏勇敢的夜莺，倒不如说仿佛是在赞赏革命者，暗喻自己。不，她不是夜莺，甚至也不是歌唱风暴的海燕，而是搏击长空的革命雄鹰，正如1905年卢森堡参加波兰1905年革命时工人们所称呼她的——革命之鹰，列宁后来在她牺牲后也曾以雄鹰来比喻她的一生。

在狱中，卢森堡不仅抱着热诚的心态浏览许多自然科学书籍，而且她更向往和热爱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并透过大自然来捕捉人类社会不灭的希望。在狱中书信中她曾多次强烈地表示，在她获得自由以后，再次到她熟悉的瑞士、意大利、科西嘉等处旧地重游，重新领略雄伟秀丽的大自然的美色。然而，在铁窗中，她只能在书信中缅怀记忆中旧游之地的山山水水，聊以自慰，或者尽力发现和欣赏狱墙内狭窄天地里所能见到的自然景色，地上的花草树木，天上的流云飞鸟。在弗龙克监狱时，由于那里环境较好，管理也较松，她有在狱墙内庭院中散步的自由。清晨，在她接受了从牢房窗上射进来的“最早的阳光的致意”和早饭后，在允许的时间内，她漫步庭院，仔细端详枝干粗壮的栗树上披着的浓密而鲜嫩的绿叶，长着鹅黄小花蕾的醋栗，淡红色叶子迎风摇曳的樱桃，含苞待放的黑桦。总之，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舒解了她胸中的郁闷，使她得以“从最微小的和日常的事物中感受生活”。

后来，卢森堡转到了布勒斯劳监狱。那里既无长满草木的庭院，而且狱禁又严，整天禁锢在狭小的牢房内动弹不得。她只能透

过面向西北的狭窄狱窗，注视映照在窗上的夕阳、晚霞以及午夜的月色，谛听树叶簌簌的“耳语”，琢磨停在窗棂上的小鸟的动作，或者利用“放风”的时机，观察从狱墙根上顽强地长出来的小草，或者从高过狱墙的树梢上的一丝绿意揣摩春天到来的信息，排解心灵上的孤寂。她以女性诗人特有的丰富的感情，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笔触，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自然景观和动植物状貌，包括受欺凌的水牛，落巢的小鸟，寄托她的情思，也表现了自己的感受和气质。在致女友的信中，她还娓娓动听地谈到了对花木的观感。婀娜多姿的女贞、金红的合欢、洁白的鸢尾花、艳红如宝石的柔荑花，都是她喜欢的。她还说，兰花轻盈幽雅，娴静奇妙，但终究有些纤弱忧伤，带着矫揉造作，像一个故作姿态的贵夫人。卢森堡说她是怀着内心的矛盾和某种不安来欣赏兰花的。她对朴实无华的蒲公英却喜爱得多，她说：“蒲公英的色调里蕴含着许多阳光，它完全跟我一样，向着阳光满怀着感激之情盛开着。”应该说，这不是卢森堡对蒲公英的偏爱，这里蕴涵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生活哲理：蒲公英旺盛的生命力和奋斗不息精神正是卢森堡生命的象征！

无须赘言，卢森堡对大自然的一片倾心和爱恋之情绝非玩物丧志，逃避现实和斗争，既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更无没落阶级的颓废伤感。这些都是她极为反感的。她在致女友的信中就曾说过：“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仅仅满足于这些而放弃作为个有思想的人应有的积极生活态度。我只是想说，这就完全可以满足我对个人幸福的需求，足以酬报我在斗争中所经受的一切磨难，并且激励我去和一切痛苦搏斗了。”是啊，卢森堡的爱恋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观赏欣欣向荣的花木，是她热爱充实的生活和奋斗的人生，讴歌正义和自由，追求真、善、美价值标准，憎恶一切邪恶势力的表征。这一切都是她一生的整个言行所充分表明的。对卢森堡来说，像革命导师马克思那样充满活力的生活和忘我的斗争，像

诗人歌德那样多方面的兴趣和内心的和谐，两者是水乳交融地那样相互依存的。这是卢森堡的人生观和整个人生道路的一个鲜明特征。

西方有一些研究者根据卢森堡热爱人类、酷爱自由的一些表现，把她说成是一个单纯的人道主义者，这也是不真实的。因为卢森堡的人道主义，对人类、自然、自由、民主的热爱，是和她推翻整个旧世界的理想、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是一致的，也是和她的革命斗争方法是一致的，绝非单纯的人道主义所能涵盖的。

5. 面对新世界的曙光—— 《论俄国革命》

1917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大战仍在天寒地冻的战壕里残酷地进行着，整个世界似乎仍在原来的轨道上趑趄不前。然而，“于无声处听惊雷”。俄国二月革命一声春雷，不但摧垮了沙皇制度，而且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时刻关注着德国、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进展的卢森堡，在狱中兴奋地捕捉着来自俄国的每一个信息，虽然她的消息来源极为有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狱中允许看到的德国官方的几份报纸，它们对俄国革命的报道极为贫乏，混乱含糊，甚至相互矛盾，恰似一团乱麻，令人难以理出头绪，而且带有资产阶级惯有的偏向。二是她的忠实的女秘书雅可布秘密地传递进来的稀少而可贵的情报。此外，还有一个女看守，因景仰卢森堡伟大人格和不可抗拒的魅力而暗中不时向她透露的一点消息。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卢森堡仍以巨大的历史洞察力和革命敏感性正确地估计了俄国革命的广阔前景。她在致蔡特金的信中写道：“俄国的消息和春天给人们带来了活力和喜悦。俄国事变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我认为，至今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

是一支小小的序曲，事态将进一步雄壮地展开。这是必然的趋势。”她认为，俄国革命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事，它也是德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业。她确信，战争已不可能再长期延续下去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恶劣的、长期的铁窗生涯，使卢森堡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她不仅经常闹胃痛，而且神经痛，时常失眠，心搏也不正常。她在致其过去的女秘书雅各布的信中，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疲乏。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派中央曾酝酿过一个“营救”卢森堡的计划。鉴于卢森堡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他们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让她到俄国去，以便使她有可能参加那里先进的革命运动。但卢森堡拒绝了这一方案，她不愿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更不愿向他们乞求什么。与此同时，斯巴达克派中央也不愿失去像卢森堡这样杰出的领袖。这样，这一计划被最终放弃了。

卢森堡在狱中继续关注德国事态的发展。1917年4月初，以中派分子为主体，在哥达会议上建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决定加入该党，但仍保持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企图分化和争取中派影响下的群众。狱中的卢森堡是基本同意或者至少是认可这一行动的。但她与斯克达克派的某些领导人不同，始终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抱不信任和警惕的态度，认为他们是屈从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要和他们保持距离和划清思想上的界线，这可从她在《哥达代表会议》一文得到印证。卢森堡在该文中指出，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彻底破产，新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仍是“旧党的合法继续”。但是，国际派却参加这个党，这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也不是与他们进行兄弟般的和解，更不是与他们混同起来，而是为了有意识地对党员群众进行工作，发动和引导群众，经过批判性斗争

使群众在精神上从过去的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复活社会主义精神，从而把工人运动推向前进。^①

1917年11月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获悉这一消息后，正处于肉体 and 心灵巨大痛苦之中的卢森堡，在致友人的信中流露出了无限喜悦和振奋之情：“要有耐心和勇气！……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首先觉察出来，整个旧世界如何在沉沦下去，每天有一块地方沉陷，每天有新的崩裂，每天有新的天翻地覆……。”

而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艰难环境，卢森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但她认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伟大的变革。11月下旬，卢森堡在致蔡特金的信中写道，尽管列宁及其战友们可能难以对付这种局面，“但是他们的尝试却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并且是历史的‘转折点’……我深信，历史即将迫近决定性的转折。……我对整个局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因为我确信，最近几年内欧洲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场伟大的变革……”。前此不久，在11月中旬致索菲娅的信中，卢森堡还说：“我确信，在战后或战争临近结束时一切都会走上顺利的轨道，但最明显不过的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度过人类最沉重的苦难时期。”

卢森堡在写这些信时，她个人正处于心情十分痛苦的时刻，因为她刚刚获悉她的挚友汉斯·迪芬巴赫不久前在俄国前线阵亡了。这一噩耗使她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认为迪芬巴赫是最为了解她的密友之一。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她没有为个人私事和挚友的去逝而松懈对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关注。正如她在一封信里所说的：“他死了——这会使我伤心，可是事情也就这样结束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273—274页。

了。”

1918年，卢森堡在狱中继续不断地给《斯巴达克书信》杂志撰稿，主题就是她极为关注和高度评价的俄国革命事件。该刊的主编原是埃·迈耶尔。他被捕后由约吉希斯接替。1918年春，约吉希斯被捕，被释放出狱的迈耶尔重新接任主编。1918年8月号的《斯巴达克书信》上刊登了卢森堡撰写的社论《历史的责任》。在这篇年初写成的文章中，卢森堡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德苏单独和谈的前景深为忧虑。她认为，如果布列斯特谈判成功，德帝国主义就有可能把兵力从东线转移到西线，从而使大战长期化。她担心，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不仅对德国无产阶级是个巨大的打击，而且对俄国革命也是个致命的影响。但她强调指出，造成这个局面的责任，不应归之于俄国人，而应由德国无产阶级来承担，因为他们应该起来革命，担当历史的重任。接着，卢森堡撰写了一篇评论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的文章——《俄国的悲剧》，发表于该刊9月号上。在此文中，卢森堡表示担心，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俄国革命能否坚持下去。她认为，只有德国帝国主义后方的起义才能使俄国革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却加强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了德国革命的力量，从而使俄国革命被孤立和扼杀。这个过错可能造成俄国革命的“悲剧”。解决俄国陷入“悲剧”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德国人民的起义，这是结束战争和打倒德国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卢森堡还指出，不存在没有过错的革命，对于布布尔什维克的“过错”，应由国际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与伦比的卑劣和堕落来负责。^①从以上的局势分析和估计可以看出，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卢森堡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德帝国主义的力量，未能看到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不可避免地走向崩

^① 以上参阅《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卢森堡也过低地估计了俄国革命的力量，未能看到布列斯特和约签订的积极意义。鉴于以上情况，迈耶尔在该文的前面加上一则简短的编辑部说明，表示不完全同意该文的观点。这下可激怒了卢森堡，她立即给迈耶尔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同时又附寄了一篇观点更为激烈的文章。迈耶尔认为此文不宜公开发表，为此让保尔·列维专程从柏林到布勒斯劳狱中向卢森堡说明此事，时间是1918年9月。卢森堡在与列维交谈后，改变初衷，同意不再要求公开发表。但与此同时，她着手另写一部总结性地评论俄国革命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名为《论俄国革命》的著名手稿。当手稿接近完成时，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了，卢森堡获释出狱，这部未完成的，甚至还未加上标题的手稿就由卢森堡的女友和秘书雅各布保存。

卢森堡出狱后，在领导德革命的过程中，再未顾问此文稿。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热火朝天的革命过程中事务倥偬，卢森堡无暇顾及此事。另一种可能是，她认为此书尚不成熟，某些观点尚需重新推敲而不愿立即发表。卢森堡牺牲后，她过去的亲密战友约吉希斯曾表示反对发表手稿。据他说，在卢森堡牺牲前夕，他曾与之谈话，她承认此书手稿有错误。1919年3月，约吉希斯在领导和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中遭敌人杀害。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再没有人提起手稿的发表问题。直到1921年底，列维从雅各布那里拿到了手稿的抄件，别有用心地擅自予以发表，他加的标题是《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并在书前加上自己的反苏反共的长篇序言，因为当时他已脱离德共脱离革命。列维的用意是明确的，那就是企图借用卢森堡的权威和影响反对布尔什维克党。

《俄国革命》一书手稿出版后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卢森堡生前战友蔡特金和瓦爾斯基出于爱护她的善良愿望，在1921年12月22日的《红旗报》上发表联合声明，说出版

该书是违背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的生前意愿的，她出狱后已改变了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接着蔡特金在1922年又写了一篇《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的长文，结合卢森堡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言行，重申和进一步阐发了声明的观点。同年，瓦尔斯基在汉堡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了共分十节的长篇专题论文《罗莎·卢森堡对革命策略问题的态度》。他说，把《俄国革命》说成是卢森堡的政治遗嘱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作者的生前意愿的。在该文第一节“伪造的遗嘱”中，他提到一件事，说在1918年11月底或12月初，一名从柏林到华沙的德国士兵给他捎来一封用波兰文写的短信，卢森堡在短信中对他提出的疑问作了回答，信中写道：“……你的所有疑虑和保留我都有过，然而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已经放弃了这些看法，某些方面则我没有你走得那么远。”^① 蔡特金和瓦尔斯基的基本论点是，由于卢森堡在狱中得不到充分的情报，所以对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策略认识不清，判断错了，以后在德国革命中改变了看法。他们还强调了卢森堡与列宁在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

1922年2月，列宁写了《政论家的短评》一文，揭露了列维的卑劣意图并指出了卢森堡在这一著作中是有错误的，但崇高地评价了卢森堡光辉的一生。

1928年，在柏林发现了该手稿的原件，这才发现列维出版的版本有不少脱漏和错误。此后，在德、法、美等国曾多次出版过这本书的德文单行本和英、法文译本。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内，由于这部书涉及到了苏联模式这个最敏感的根本问题，人们长期避免涉及它。时光流逝，岁月悠悠，几十年来，《论俄国革命》实际上成了禁书，人们无法一睹其神奇的风采。

^① 《阿·瓦尔斯基言论选集》第2卷，1958年华沙版，第149页。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才开始改观。1974年，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才初次在出版的《卢森堡全集》的第4卷中首次收入了这部著作，编者加上了《论俄国革命》的标题。这是这部著作各类版本中迄今最为完整、可信的一种。此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才开始重视和研究这本书。

这就是卢森堡在狱中未完成的著作《俄国革命》一书写作和出版前后的简略背景。

为什么要花费如此笔墨介绍《论俄国革命》一书曲折的背景呢？这是因为，这部至今仍有争议的著作不仅是卢森堡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长久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著作之一，在当代仍有其影响力，而且认识仍不一致。

那么，卢森堡究竟是如何看待俄国十月革命的呢？

卢森堡在写作该书时，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那就是以“批判性的检验”来对待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书的开头部分，一方面，她以嘲弄和讥讽的笔触批判了考茨基之流攻击和诬蔑十月革命的澜言。另一方面，她充分肯定了十月的伟大胜利，高度赞扬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功绩。她指出，考茨基断言，俄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国家，尚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适合进行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卢森堡指出，从俄国革命的实际看，恰恰与此相反，“战争和革命的过程没有证明俄国革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①她还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且坚决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从而成为唯一理解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前党。“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缺少的全部革命荣誉和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61页。

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① 纵观卢森堡的一生，从来不愿对任何党说赞扬的话，如此高度评价布尔什维克党，充分说明卢森堡确是衷心欢迎和坚决支持十月革命的。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停留在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讴歌和赞誉，更没有采取迷信和盲从的态度。她认为，十月革命是实行“工人阶级专政的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由此，俄国革命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是“完善的顶峰”，如果这样看，那是荒谬的。所以，决不能把布尔什维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都当做社会主义政策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毫无批判地加以赞扬和模仿，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实质性同偶然性区别开来。”^② 作出批判性的检验。她认为，“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一点”。^③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即为了积极地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建立起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她对布尔什维克党所实行的某些政策，提出了一些批评性意见。

具体说来，卢森堡在三个问题上，即土地问题与农民政策，民族自决与媾和，解散立宪议会而引起的民主与专政问题上，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在土地与农民政策这个问题上，卢森堡认为，没收大地产，由农民直接分配土地，这对于摧毁大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站到革命一边，这是强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权的有效措施。然而，这种政策是从社会革命党和农民自发运动那里接受过来的，这与土地国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69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同上书，第61页。

有化，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农民阶层保守化，使农村中的阶级对立更加激化，造成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强有力的农民阶层。事实表明，卢森堡的这种批评是欠妥的，片面的，是由于狱中的卢森堡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现实状况造成的。不错，列宁本人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执行的农业政策确是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是一种妥协，但在当时危急的情势下，这是争取广大农民支持、建立工农联盟，使革命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力量发动的内战中赢得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列宁和党当时实行土地分配和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迟到以后解决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卢森堡的批评是脱离当时的实际的。至于后来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中发生的尖锐的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卢森堡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了，但那主要是操之过急和采取高压手段推行的结果，面非必然会发生的事。当然，如何教育农民和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化确是一个极为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觅得最佳解决途径尚是一项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卢森堡批评的第二个问题是民族自决权问题。这是卢森堡与列宁长期论争的焦点之一。她批评说：“布尔什维克用自己的口号使一切边疆国家的群众发生迷惑并且受资产阶级蛊惑宣传的支配。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导致和准备了俄国本身的瓦解，从而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①应该说，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原则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把原来沙皇制度奴役下的各民族解放出来，实行民族自决是完全正确的。确实，俄国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失去了芬兰、波

^① 《卢森堡专辑》第77—78页。

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土地，损失是够惨重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国家之脱离俄国，与其说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民族自决政策，倒不如说是形势所迫，是军事实力对比关系的结果。当时苏维埃国家在外敌和内部叛乱势力包围下，自顾不暇，危难重重，为了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当前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列宁力排众议，断然与德国割地求和，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政策抉择。因此，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也是欠妥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卢森堡批评的着眼点是要求警惕和防止俄国边境地区诸国的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反对和瓦解苏维埃国家，是出于对俄国革命的爱护，是出于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良好愿望。何况，当时她在原则上已不反对民族自决权，提出疑问的仅是时机的选择是否恰当。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批评即使有误，我们也不应求全责备，更不应扣什么帽子。

卢森堡批评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制宪议会解散，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正是在这后一问题上，卢森堡提出了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可贵思想，给人们以极大的启迪。卢森堡是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由于不了解当时俄国的实际状况而不正确地批评了解散制宪议会的措施。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之点在于，卢森堡精辟地论述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她指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没有考茨基所说的那种抽象的“纯粹民主”、“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或者无产阶级民主。她揭露说，考茨基声称要维护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正是考茨基“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她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它永远不能按照考茨基的善意劝告，在‘国家不成熟’的借口下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献身于民主，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不是背叛自己，背叛国际，背叛革

命。”^①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只能“毫无顾虑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②

卢森堡认为，民主和专政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可分割的。她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一专政的使命在于运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③卢森堡十分重视和强调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监督作用。她指出，“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官员排他的圈子之内”。^④她还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上下令实行的、钦定的”，^⑤是无法真正实现的。由此可知，卢森堡强调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

卢森堡在批评考茨基的同时，也批评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说他们也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只要专政，不要民主。她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⑥她还在手稿边页的注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只给政府的提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它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

① 《卢森堡专辑》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④ 同上书，第88页。

⑤ 同上书，第88页。

⑥ 同上书，第91页。

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①卢森堡是拥护和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但是她认为，如果没有民主保证，苏维埃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她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②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几十个或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了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③卢森堡说，“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④她说，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她认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⑤

对于卢森堡的上述批评和论述，应该作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首先，有些批评是失实的，如认为列宁也把民主和专政对立了起来。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列宁都是非常注意发扬民主的，但在当时战乱的条件下，充分发扬民主的客观条件受到了限制，而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打击反革命活动则是完全必要的。其次，卢森堡的某些说法是偏颇的。例如，她多次提到“不受限制”的民主和自由，从上下文来看，她显然指的是人民内部的民主和自由，因为对于阶级敌人她从来都是坚决主张实行专政的。但是，她

① 《卢森堡专集》，第87页注①。

② 同上书，第90页。

③ 同上书，第90页。

④ 同上书，第90页。

⑤ 同上书，第90页。

忽略了，即使在人民内部也还存在着民主和集中，纪律和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世界上的一切民主和自由都只能是具体的、相对的，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第三，卢森堡的某些论述，与其说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当地执行的某些政策提出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毋宁说是探讨了潜伏在革命运动内部的一些弊病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并表述了对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尽管其中有一些意见是不完善，不成熟的，乃至有片面性和错误成分，但可贵的是其中闪耀着极为深刻和富于远见的思想火花，对未来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颇有参考价值。

例如，卢森堡认为，正是因为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是整个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的事业，所以少数人企图以命令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铸造世界是行不通的，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又如，她指出，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就不会有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只会使全国政治生活受到压制，从而成为一种“虚伪的生活”，而在这种虚伪的生活中，官僚风气就会成为“唯一的活动因素”，结果，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逐渐衰竭。应该说，卢森堡当时较早提出来的有价值的这些思想与列宁后来在晚年的一些思想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列宁晚年时期，对苏维埃制度中逐渐复活和日益发展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等现象曾表示了巨大关注和深为忧虑，曾设想过与之作斗争的方案，以完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遗憾的是，列宁过早地逝世了。此后，苏联制度中权力过于集中，过分依靠行政命令管理，没有很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现象有了发展，从而使官僚主义、特权化和个人专断逐步盛行并酿成重大后果。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回过头来再看，卢森堡当时的某些论断不幸而言中了，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正确、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块“处女地”，要勇于实践探索，不能靠“钦定”，不能靠命令和法令来推行的思想。她认为，社会主义“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 and 法律的体系，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现成的方案，“我们的纲领里所具有的只不过是几条大的方针，它们指明应当按照什么方向寻找措施”。^①她指出，“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②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历史本身的产物，而历史“总是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的办法”。^③因此，社会主义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不能“钦定”，不能靠命令和法令来硬性推行，那怕最社会主义的政府也是如此，“只有经验才能纠正和开辟新的道路。只有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民想到成千的新的形式、主义，解放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④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卢森堡的这个论断极富远见性和预见性，而且很快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应验。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国家急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靠命令和法令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结果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列宁很快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明确提到：“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⑤于是，列宁和党调整了政策，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① 《卢森堡专辑》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176页。

从而使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转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人们没有听取卢森堡和列宁的告诫，没有记取这个历史教训，累次发生想依靠命令和法令来推进社会主义的错误，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失误和挫折。

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的结束部分反复强调指出，俄国革命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在革命而临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不可能要求十月革命是一个模范的，没有错误的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①但是，卢森堡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把上述情况下“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固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卢森堡对俄国革命所作的评论中，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失实、片面乃至错误的观点，但她的立场是革命的，用心是善意的，态度是积极的，语调是诚恳的，是与考茨基等人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和诬蔑是截然不同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卢森堡关于十月革命伟大意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历史功绩的中肯分析，尤其是关于不能把俄国革命当做一个完善的模式到处模仿和照搬的精辟见解，关于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光辉论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会导致社会主义蜕化的严肃告诫，关于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中肯想法，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迄今仍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份贡献。可以这样说，卢森堡是国际共

^① 《卢森堡专辑》第93页。

^② 同上。

产主义运动中试图对十月革命的经验进行科学的、全面总结的第一人,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提出独到见解的首批探索者之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她的论述从理论和方法上还有一些偏颇和失误之处。但那种苛求于前人,要求尽善尽美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是应该破除的。重要之点在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汲取卢森堡某些富有启迪意义的有益思想,以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使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在狱中曾预言,俄国革命之后,德国革命将接踵而至。

卢森堡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1918年秋,德国帝国主义败亡的迹象已暴露无遗。当时,德国社会犹似一座沸腾的熔炉,经济破产、军事失败和政治危机使旧秩序风雨飘摇,濒临崩溃边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屠杀政策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反对容克—资产阶级旧政权的反帝运动迅猛发展,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革命形势臻于成熟。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0月7日,斯巴达克派秘密举行了全德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革命斗争纲领: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成立苏维埃,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与此同时,迫于政治危机,德皇威廉二世玩弄花招,企图以改变统治形式欺骗人民,成立了以马克斯亲王为首的“议会制政府”、机会主义右派分子谢德曼等人参加了这个反人民政府。

1918年11月初,德国爆发了革命,基尔港的水兵首先发动了起义。接着,革命像燎原的烈火迅速向全国扩展。

11月9日,在斯巴达克派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推动下,柏林宣布起义。同日,布勒斯劳的起义者打开当地的监狱。卢森堡自由了。她在布勒斯劳市政府的阳台上,向欢呼的工人群众发表了讲话,号召把德国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11月10日傍晚，卢森堡乘火车抵达柏林。一批战友们在车站上迎候她。久别重逢，大家都十分高兴，更何况是在革命高潮之际，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但人们发现，卢森堡变了，过去满头乌亮的黑发已完全灰白了。岁月的流逝，特别是铁窗的磨难，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卢森堡返回柏林，意味着她生命旅程最后阶段的开始——等待着她的是壮烈的搏斗和烈火中的永生！

七、德国十一月革命——烈火中永生

1. 革命初潮时期

1918年11月10日晚，卢森堡匆忙赶回柏林之时，正是德国革命热火朝天开展之际。在同志们的安排下，卢森堡没有回自己阔别已久的寓所安歇，而是驱车直奔“埃赫策席舍尔”旅馆投宿。那里实际上是斯巴达克派的革命指挥部。稍后，她又随斯巴达克同盟执行局迁移至“莫尔特克”旅馆，以便全力以赴地投入领导革命的斗争，让工人群众认清革命的意义和目标。

当时，德国革命局势错综复杂，情况瞬息万变。在革命到来之际，斯巴达克派的主要领导人要么刚从牢狱中出来，如卡·李卜克内西是在10月23日才从要塞监狱中返回柏林的，要么还在监狱之中，如卢森堡。这就削弱了革命派在关键时刻的领导力量和延误了发动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机。尽管如此，11月9日，首都柏林的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在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下，冲破了社会民主党首领的阻挠和破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控制了柏林全城。德皇威廉第二眼看大势已去，在当日下午宣布退位并仓皇逃往荷兰，帝国总理马克斯·巴登亲王被迫辞职，帝制被推翻了，德国宣布退出战争。

当日，斯巴达克派的革命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的阳台上，向欢呼的群众宣告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斗争纲领。斯巴达克派在工

人群众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和影响,但他们人数还不够多,力量尚嫌薄弱,而且缺乏一个严密的行动计划。因此,他们没有能真正掌握政权。在权力真空之际,反动派加快了行动步伐,就在李卜克内西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两个小时,经过紧锣密鼓的幕后策划,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非·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一个阳台上宣布了“自由德意志共和国”的建立,并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等人勾结起来,组成了所谓“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临时政府。第二天,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批准”了这个以社会民主党首领弗·艾伯特为首的“政府”。这样,革命胜利果实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艾伯特、谢德曼一伙篡夺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向工人群众发出号召:“撤离街道,保持安定,遵守秩序,不要受人挑拨而去参加行动,别让人用绳子牵着走,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得到工作、和平和面包!”总之,企图让群众一切听命于政府,实际上想阻挡革命继续前进。

这个蛊惑人心的,自称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在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实行一些民主和自由,但其实质却是一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府。它一上台就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阻止革命的发展:宣布财产私有制,拒绝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反革命武装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用选举制宪议会的办法来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在革命高涨的情势下,工人群众、革命士兵和他们建立的苏维埃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也没有识破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的反动本质。因此,在机会主义的毒雾弥漫和笼罩下,受其影响的工人阶级多数错误地认为,通过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推翻反动皇朝,成立共和国和有了普选权就是取得了政权,就能使德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了。人们只是在街上

载歌载舞，欢呼雀跃，陶醉在虚假而短暂的“胜利”之中，没有觉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这一切便利了机会主义分子的叛卖活动。

此时，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德国革命左派——斯巴达克派展开了紧张的活动，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轨道而奋力拼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战友约吉希斯（他于11月9日才从柏林市的莫阿比特监狱获释）、皮克等人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11月11日召开会议，根据约吉希斯的提议，把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作为指导革命的中心。卢森堡在会上就同盟的当前任务提出了许多建议。同盟的中央局设在威廉大街114号的“莫尔特克”旅馆，后迁弗里德里希大街217号。“同盟”虽然尚未正式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已具有政治独立性，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领导机构。斯巴达克同盟的成立为组建无产阶级的独立革命政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二是正式创办《红旗报》以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报纸的编辑部也设在“莫尔特克”旅馆内。本来，《红旗报》第一期早在11月10日就出版了。那是斯巴达克派带领工人们占领了资产阶级反动报纸《柏林地方新闻报》的印刷厂后在那里印的。那一天卢森堡尚未抵达柏林，所以那期报纸是由李卜克内西和约吉希斯主持编印的。敦克尔和迈耶尔参与了编辑工作。《红旗报》的题名是约吉希斯提议的，因为1905年波兰革命时波兰党就曾出版过以此为刊名的报纸。但《红旗报》刊出两期后继续出版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印刷厂的老板不愿把印刷厂交给革命派，便向艾伯特政府提出了产权诉讼。几经周折，《红旗报》第三期才得以在11月18日正式出版，卢森堡既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红旗报》的主笔。用蔡特金的话说，卢森堡是该“报纸的活生生的灵魂”。因为重要问题由她决定，重要社论由她撰写。卢森堡以她的热情、才华、洞察力和预见性通过该报指导着德国革命运动。《红旗报》的报头下印着如下的一句话：“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

莎·卢森堡创办。”该报先是作为斯巴达克同盟机关报，后作为德国共产党机关报基本上未间断地一直出版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查封而停刊。

11月18日，正式发刊的《红旗报》发表了卢森堡撰写的纲领性的《开始》一文，给工人阶级的斗争指出了具体目标和前进方向。首先，她清醒地估计了当前形势。她指出：“革命已经开始，合适的不是欢呼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最严厉的自我批评和钢铁般的齐心协力，以继续进行业已开创的事业，因为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而敌人并没有打倒。”^① 因为霍亨索伦王朝虽被推翻，而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未被打倒。接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所谓“工人和士兵的政府，却充当了垮了台的帝国主义政府的代理人”。鉴于以上情况，卢森堡指出，革命的目标是“取消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它是当前这场革命的历史性课题”。^② 她又指出，革命目标规定了革命方法，那就是：“把整个政权交给劳动群众掌握，交给工人士兵苏维埃掌握；巩固革命事业，防止潜藏敌人的破坏。”^③ 为此，卢森堡要求：扩大和重选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清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召开工人和士兵的国会，迅速组织农村的无产者和小农，组建一支保卫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红色卫队并成立工人民兵，从行政、司法、军队中清除军国主义势力，立即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以及大地主的土地。在文章的最后，卢森堡以坚强的革命信念写道：

“今天，世界历史的议事日程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德国革命已进入这一光辉天体的运行轨道之中，它将越过风暴和障碍，经过战斗和苦难，道过挫折和胜利，走向最终目标。”^④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华沙版，第2卷，第441页。

② 同上书，第441页。

③ 同上书，第442页。

④ 同上书，第445页。

《红旗报》的出版，犹似点燃了一支光芒四射的火炬，极大地帮助了工人群众擦亮眼睛，透过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分子散布的重重迷雾，认清革命前进的方向，因而受到了革命工人的欢迎，报纸出版后立即销售一空，但也招致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翌日，即11月19日，反动派组织力量对报社采取了暴力行动。二百名武装匪徒袭击了报社，闯进了所有房间，在皮靴的嘈杂践踏声中，暴徒们口中有节奏地重复呼喊两个名字：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打算找他们“算帐”。幸而他们两人当时都不在现场，所以未遭毒手。暴徒们才粗野地谩骂着悻悻地走了。

2. 苏维埃政权还是国民议会？

11月中下旬，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对垒已达到了短兵相接的境地。在斯巴达克同盟的影响和领导下，柏林无产阶级群众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口号，并要求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无产者，向资本主义进行最后冲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从革命最初冲击中惊魂初定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背叛革命的机会主义分子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提出了与革命派针锋相对的反革命口号：“国民议会决定一切！”企图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形式保存旧制度，扼杀革命。所有旧秩序的维护者，统统聚集在这一口号下，向无产阶级展开了进攻。

德国革命进程表明，隐蔽的机会主义分子比公开的敌人更阴险、更狡诈。当时，考茨基和谢德曼一齐跳了出来，别有用心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企图毒化社会舆论，蛊惑人心。他们怯懦地叫嚷，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骚乱”、“不民主”。他们吹捧虚伪的、超阶级的“纯粹民主”、“全民的”国民会议，把它作为美妙无比的国家形式推荐给无产阶级。

卢森堡是不会容许叛徒们通行无阻地向革命无产阶级兜售这种骗人的狗皮膏药的。为了教育和争取群众，她及时撰文予以揭露和批判。在11月20日《红旗报》刊登的《国民会议》一文中，卢森堡开门见山地指出，苏维埃政权还是国民会议，这是识别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已经过时的遗产，是没有内容的空壳，是关于‘团结一致的民族’、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时代的必需品。今天，谁抓国民会议不放，他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革命拖回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他就是一个伪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一个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①卢森堡进一步强调指出：“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像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的。”^②她还大声疾呼，提醒无产阶级群众：“不用阶级斗争，经过国会多数表决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可笑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③卢森堡这一段精辟的分析真可谓金钟长鸣，催人猛省。但在当时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分子散布的妖风毒雾弥漫，多数无产阶级群众尚未觉醒的情况下，却无法力挽狂澜，扭转形势。

12月，从最初的革命打击中苏醒过来的反革命势力在柏林猖獗起来了。他们借助于源源不断地涌进柏林的反革命武装力量，

① 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11页。

② 同上书，第112页。

③ 同上书，第111页。

加强了对革命的进攻。12月1日，军国主义分子统领的野战部队——“近卫师”耀武扬威地手持武器在阅兵进行曲的军乐声中开进了柏林。12月6日，柏林城防司令、社会民主党右派奥托·威尔斯伙同卫戍司令部、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反动分子组织了一次暴乱。近卫师部分官兵参与了这次暴乱。他们逮捕了柏林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夺占了《红旗报》编辑部，宣布弗·艾伯特为总统，还在肖塞斯大街上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游行队伍开枪，群众死伤数十人之多。斯巴达克同盟组织工人群众，发动了声浩大的示威游行，武装了部分工人，粉碎了这次反革命暴乱并夺回了报社。12月10日，反动军官率领的卫戍部队开进了柏林，受到了艾伯特及其政府成员的欢迎和接见。该部还举行了宣誓仪式，表示效忠政府，“保卫共和国”，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12月中旬，全德苏维埃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社会民主党首领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头子的操纵下，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受到了排斥，不但未能入选代表，而且拒绝他们俩人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斯巴达克同盟的入选代表仅十人。大会竟然作出决议，把全部立法权和司法权交给了艾伯特政府，仅保持所谓的“监督”权。大会还作出决议，支持召开国民会议，承诺在国民会议选举后解散全德苏维埃。这种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实质上就是取消苏维埃，拱手把全部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卢森堡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明确指出，这是“反革命的全线胜利”。12月24日，反革命军队在炮兵部队支持下，进攻驻扎在皇宫及其附近的人民海军师，企图解除该师官兵的武装，使革命派失去倚靠，因为人民海军师同情和支持革命派。在危急的形势下，斯巴达克同盟再次动员和组织武装工人奋起反击，与革命水兵一起进行了几天的流血战斗，又一次粉碎了反革命武装暴乱。这次事件还引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哈阿兹等人退出了艾伯特政府。

在反革命势力的全线进攻面前，斯巴达克同盟及其同情者，支

持者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因为大多数工人群众仍处于资产阶级代理人——机会主义首领欺骗性宣传的影响之下。为了进一步打击革命左派，资产阶级和堕落为革命叛徒的机会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动员一切反革命舆论工具，发动了一场疯狂的诽谤运动，恶毒攻击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斯巴达克同盟及其领导人，甚至耸人听闻地诬称他们是恐怖分子，想通过暴力行动搞乱全国，使德国出现饥馑，说他们想发动一场使德国人相互残杀的残酷战争，使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如此等等，为镇压革命派做舆论准备。他们还无耻地诬蔑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暴徒”、“强盗”、“杀人犯”、“掠夺者”，甚至诡称李卜克内西是“百万富翁”。在街头的广告栏里，公然张贴着号召杀害革命领袖的醒目大幅标语。其中一幅写道：

“工人们！公民们！
祖国面临覆亡，
起来拯救祖国！
对祖国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
祖国受到了斯巴达克分子的威胁。
杀死他们的首领们！
杀死李卜克内西！
那时你们就能得到和平、工作和面包！”

反动派还动员地痞、流氓、特务多次强行闯入《红旗报》编辑部，企图绑架和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次，一伙暴徒想从报社强行架走卢森堡，幸遇及时赶来的报社同仁的大力解救才得以脱身。在风险浪急的日子里，卢森堡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有时留宿报社，有时深夜坐市内火车最后一班车返回住所，全力坚守革命岗位。有一次，一伙武装暴徒在火车车厢内认出了卢森堡，企图把她推出行进中的车厢，幸遇见义勇为的乘客的相助才幸免于难。即

使在这样处境险恶的情况下，卢森堡仍夜以继日地奋战，有时甚至彻夜不眠，指导斯巴达同盟和工人群众的斗争。对卢森堡来说，白天和黑夜的界线是模糊的，已成为混沌一片，只有奋不顾身的工作才是唯一的。

面对迎面袭来的阵阵腥风恶浪，为了揭穿敌人的造谣诬蔑，为了向广大工人群众阐明斯巴达克同盟的革命主张，以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和壮大革命力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分别深入工人群众，在许多工厂召开了一系列集会并组织了以《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的专题报告会，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不论卢森堡出现在哪里，都像挟一股风，带一团火，以她炽热的心燃起了人们的斗争激情。

正是在上述活动和报告的基础上，从12月14日开始，《红旗报》连载了由卢森堡撰写的纲领性文献：《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简要分析了1918年11月9日革命的性质、前提条件及其不足，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二部分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她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自身在斗争过程中觉醒和组织起来，才能“彻底改造国家并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基础实行彻底的改革”。文件的第三部分阐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卢森堡既否定了恐怖手段和政治暗杀等极端手段，也批驳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右倾幻想。她指出，资本家是不会服从国会的“多数裁决”的，他们宁可把国家变成一片冒烟的废墟，也不会自动放弃雇佣奴隶制的。因此，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只有几百万无产阶级用自己的铁拳夺取国家全部权力，用社会主义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革命任务。此外，第三部分还提出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具体要求。文件还专门列出一部分篇幅谈国际主义义务。文件最后一部分阐明了作为无产阶级有觉悟的先进部分的斯巴达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任务。总之，在这

个纲领性文件中，卢森堡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正确地回答了德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但是，仍应指出，这个纲领却缺乏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切实可行的、具体而明确的策略路线，从而暴露了卢森堡和整个德国革命左派的弱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马克思杰出理论家的卢森堡，正是在这一文件中，向人们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她所致力于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简洁图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广大工人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无产阶级群众必须从没有灵魂的机器、资本家役使的被动工具，成为生产过程中有思维能力和自主的领导者，必须锻炼自己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社会财富唯一主人的责任感。必须在没有资本主义式监工的情况下发挥干劲，必须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达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在没有枷锁的情况下遵守纪律，必须在没有鞭子的情况下保持秩序。为了服务于整个社会而抱有崇高的理想，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和表现出真正的公民责任感。”^①

应该说，这段富于独创性思想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概括论述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但却不是当时德国革命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任务。

当时德国左派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工人群众，特别是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认清革命面临的任务和应采取的立场。为此，卢森堡采取了行动，在12月15日，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大柏林地区党组织的会议。她在会上发言时要求从政府中撤回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国民会议，把整个政权掌握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她还警告说，革命已濒临失败的边缘，只有无产阶级的铁拳能挽救革命。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445页。参阅《卢森堡专辑》，第114页。

然而，她的观点和呼吁却没有为会议的多数人所接受，他们依然沉缅于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的梦想。这一目标恰恰迎合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前所述，由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掌握了德国工兵苏维埃的绝大多数席位，从而使这一机构无法成为推进德国革命的助推器，反而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御用机构。全德苏维埃大会在12月中旬所作出的交权的决议有力地表明这一点，这实际上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这不仅使卢森堡等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所作出的争取群众的努力受挫，而且也是葬送德国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德国革命面临最严峻的形势，必须另觅出路和对策，卢森堡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加快了独立建党的步伐。

列宁一贯重视德国革命，并对德国革命寄予厚望。这一时期，列宁密切注视着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斯巴达克同盟所采取的革命步骤表示欢迎和支持。从列宁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信件中以及发表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2月中旬，列宁还派出了一名专使，即出生于波兰，曾长期在波、德、俄三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卡尔·拉狄克专程到柏林，会见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等人，讨论了两国面临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接着，卢森堡在12月20日写了一封短信，向列宁表示亲切问候并预祝两国革命取得更大胜利。考虑到路途上的安全和保密问题，卢森堡的这封信是以私人“家信”形式出现的。信中写道：“利用叔叔前往之便，我们一家人（指斯巴达克同盟——本书作者附注），卡尔（指李卜克内西——本书作者附注），弗朗茨（指梅林——本书作者附注）以及其他向你们大家致以衷心的问候。但愿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们的一切心愿都能实现。”一星期后，携带此信的斯巴达克同盟专使，即信中所说的“叔叔”爱德华·富赫斯抵达莫斯科。列宁立即接见了。在向列宁汇报德国革命形势的谈话过程中，当富赫斯流露出担心德国革命缺乏相应的领导人时，列宁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可是你

们要什么呢，亲爱的同志！你们有三个头头，那是在整个国际上都是很难找到的：罗莎、卡尔和老人（指梅林——本书作者附注）。和这样的头头在一起，你们的革命必能无条件地达到目的，这些目的是有历史可能性的！”^①从卢森堡致列宁的信件和列宁与富赫斯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列宁和卢森堡之间存在着何等亲密无间的友谊和信任，尽管他们在过去曾在一些问题上发生过争论！随后，列宁让富赫斯返回后向卢森堡转达他最亲切的问候。令人惋惜的是，当信使于翌年一月下旬返回柏林时，卢森堡已惨遭敌人的杀害。

正当德国革命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卢森堡的祖国波兰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历史转折。在沙皇俄国被苏维埃国家取代和德国、奥地利战败，三个占领国均告垮台的基础上，波兰重新获得了独立。在革命运动席卷全国的形势下，波兰也同样面临着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还是苏维埃政权的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正是在波兰革命的关键时刻，酝酿合并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派出了专使约·齐谢夫斯基专程赴德国柏林向卢森堡讨教，因为卢森堡不仅一直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而且在战争期间仍在狱墙内外与这两个党保持着联系。1918年12月中旬，齐谢夫斯基到达柏林，在会见了李卜克内西和希吉希斯之后，来到了《红旗报》编辑部与卢森堡长谈。在亲切的气氛中，他俩是用波兰语交谈的。齐谢夫斯基随身携带了一份重要文件，即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合并的协议草案。他还带来了卢森堡的战友、当时正在国内领导波兰革命运动的阿·瓦尔斯基写给她的一封信。卢森堡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故国的专使。齐谢夫斯基向卢森堡通报了国内形势、两党合并事

^① 引自亚·科哈斯基：《罗莎·卢森堡》1976年华沙版，第364页。

宜以及筹备统一建党大会的情况。对此，卢森堡深为兴奋和高兴。她详细询问了波兰国内政治情势的发展状况，党的近期活动计划以及宣传出版工作。卢森堡表示，两党合并的时机早已成熟，新建的党定名波兰共产党并在前面加上“工人”字样，即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是正确的。卢森堡还就合并协议提出了几项修改意见。会见临近结束时，卢森堡说，代表斯巴达克同盟致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贺词将由李卜克内西签署，她和约吉希斯将另写贺信。第二天，当齐谢夫斯基临行前来取信件时，他带走的只是李卜克内西签署的斯巴达克同盟的贺信，事务缠身的卢森堡太忙了，未能来得及单独致函，而齐谢夫斯基却不能再等了，因为波兰共产党成立大会召开在即。12月16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建党大会在华沙举行。当晚赶回华沙的齐谢夫斯基直接奔赴会场，宣读了斯巴达克同盟的贺信并口头转达了卢森堡的问候和意见。

这是卢森堡牺牲前最后一次关心波兰问题和波兰党的事务。

3. 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在德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斯巴达克同盟的其他领导人终于认识到了建立一个独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全德代表会议在柏林市内的普鲁士国会议事厅召开。会议讨论了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和建立新党的问题。卢森堡和约吉希斯原来提议新建的党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接受大家的意见，定名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

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德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会在柏林市政府议事厅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46个地方的83位代表，还有“红色战士同盟”的2名代表，青年代表1名。此外，还有

16位外国客人。在大会的一致同意下，创建了德国共产党。卢森堡是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她被选入了由13人组成的党的“中央局”。入选中央局的还有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皮克以及保尔·列维、恩斯特·迈耶尔、敦克尔夫妇、保尔·弗勒利希等人。在党的成立大会上，卢森堡所作的关于党纲和政治形势的报告是大会的中心议题，也是大会的高潮。她一共四次发言，除党纲和形势外，还就党的策略、参加国民会议问题、与农村无产者和小农的联盟问题、工会问题等发表了自己意见。卢森堡指出，现在该是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直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了，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直接任务就是动员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历史主动性，“使社会主义成为事实和行动并且把资本主义彻底消灭”。^①她还揭露了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叛卖社会主义的实质。她指出，哈阿兹、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在社会主义招牌下的联合是“反革命政策的一块遮羞布”，他们“拼凑起来的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政府无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死敌，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打倒。卢森堡还指出，11月9日开始的革命第一阶段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有很大缺陷，政权落到了反动派手里，现在该是革命转入深刻的下一阶段的时候了。在下一阶段，革命将经历一场比过去更加尖锐、复杂和剧烈的阶级斗争，把革命引深到经济领域，把从上面夺取政治权力和从下面夺取资产阶级社会权力基础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政治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议会外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结合起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代表大会上，在关于党应否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卢森堡冷静而清醒地分析了形势。她认为，在革命

^①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2卷，第481页。

高潮中提出“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苏维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革命已经落潮,国民会议召开已势在必行,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应该而且有必要进行议会斗争,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当然,在议会政治的认识上,卢森堡是和机会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卢森堡对议会政治从来不抱幻想,她之所以主张进行议会斗争,是把它作为革命的讲台,作为争取群众和揭露敌人的一个据点,看作是促进革命事业的一种手段。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周,在《红旗报》上发表的《国民议会选举》一文中,卢森堡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她说:“我们现在处于革命之中,而国民议会则是为了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而建立的一个反革命堡垒。因此,必须攻取这个堡垒并摧毁它。为了动员群众反对国民议会,为了号召他们参加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必须利用选举和国民议会讲台。”^①她进一步指出:“参加选举是必要的,其目的不是要和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一起炮制法令,而是要把资产阶级和它的帮凶赶出殿堂,要袭击这个反革命堡垒,要在这个堡垒上空升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旗帜。这样做,是不是需要国民议会多数的支持呢?只有那些议会痴呆症崇拜者才相信需要借助于议会的大多数,才能解决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甚至国民议会本身的命运,也并不取决于议会的大多数,而取决于外而,取决于工厂里和街道上的劳动群众。”^②“这个反对革命议会的选举和讲台,应该有助于教育、团结和动员革命群众,成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的一个阶段。”^③

正是根据以上认识,卢森堡在德共建党大会上力排众议,主张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李卜克内西等人支持卢森堡的见解。但是,

^① 《卢森堡文选》第2卷,1959年华沙版,第469—470页。

^② 同上书,第470页。

^③ 同上书,第408页。

与会多数代表,尤其是青年代表,由于感染上了“左派幼稚病”,认为参加选举是一种可耻的、把工人引入歧途的“自杀性行动”。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局关于参加选举的提案最后被62票对23票否决了。后来,列宁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认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立场是正确的。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影响。列宁是充分肯定其特殊重大的国际意义的。列宁指出:“‘斯巴达克同盟’……改称‘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①

然而,在革命烈火中诞生的德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党。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党的纲领虽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但党还没有来得及制订一条正确而完整的策略路线,还没有来得及争取和领导绝大多数工人群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

但是,党的成立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的开始出现,也标志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加强了。德国反动派为此感到惊慌不安,他们决定在党还来不及巩固和壮大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尚未很好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先发制人,转入进攻,扼杀革命。

为达此目的,艾伯特—谢德曼政府采取了挑衅行动。1919年1月4日,普鲁士政府宣布免去独立社会党左派埃·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因为这是柏林唯一不属于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权的职务,更何况艾希霍恩比较同情工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这一挑衅行动是反革命力量转入全线进攻的信号,激起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443页。

广大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慨，数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发动强大的示威游行，占领了一批报社和公共建筑物，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社。在高涨的革命情绪的推动下，大柏林地区革命工人会议任命了有李卜克内西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在柏林地区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这个革命委员会作出了为时过早的、直接夺取政权的决定。1月6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柏林工人发动了总罢工，自发地分发了一批武器，工人发动开始转变为武装起义。这场武装起义是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仓猝发动的，没有得到应有的组织和武装。卢森堡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过早发动的、不成熟的起义。在德共中央局会议上，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要求李卜克内西和皮克退出革命委员会并与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划清界限。但在起义已是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卢森堡认为起义是关系到革命荣誉的大事。于是，她毅然坚定地站在起义者一边并成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尽管她冷静地认识到起义无法取得推翻反革命政府的胜利。起义开始后，艾伯特政府采取了反革命两手政策，一方面调集了大批“志愿团”武装匪徒和军队开进柏林，准备镇压起义者；另一方面，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虚情假意的谈判以麻痹群众斗志。起义者面对着三位一体的强大敌人：凶狠残暴的资产阶级及其掌握的反动军队；反革命真面目尚未被群众认清而气焰嚣张的社会主义叛徒；以武器和金钱帮助德国反动派的国际帝国主义。

在此情况下，可想而知，卢森堡及其战友们的处境是万分险恶的。卢森堡除了与党的中央局领导成员联系商谈，从事纷繁紧张的领导工作外，还要主持出版《红旗报》。报社的印刷厂一再遭到反革命暴徒的袭击和捣毁，但卢森堡和编辑部成员在工人们的支持下，仍排除万难坚持不懈地每天出报。为了躲过匪徒们的搜捕和暗害，卢森堡不得不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一处住所，有时一天转

移数次。起初，卢森堡潜居于布吕克尔广场附近她的女友、德共成员、医生肯特·敦克尔的住宅内。稍后，李卜克内西也住到了那里。1919年1月8日深夜，艾伯特政府派遣的武装人员包围和开枪袭击了《红旗报》报社。当卢森堡步出大门时，这伙士兵围了过来。卢森堡激动地对他们进行宣传和说服，围着她听讲的士兵越聚越多。当时在场的党的活动家雨果·艾伯尔莱因见状不妙，怕出意外，火速拉着她离开人丛，闯出重围。在这乱云飞渡的严酷日子里，卢森堡不仅要同敌人周旋和拼搏，而且还得与自己因疲劳过度而不时发作的昏厥病作斗争。但是，她拒绝了任何休息和治疗的劝告，坚守岗位。她那孱弱的身躯内跳动着一颗热爱人民和革命的赤子之心。没有一分钟的休闲，更谈不上消遣，连维持最低限度的睡眠时间也办不到。日子飞快地过去，朝霞接着晚霭，白天联接黑夜。卢森堡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仿佛预感到自己生命剩下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似的。为了及时指导瞬息万变的斗争，《红旗报》几乎每天都刊载有她的指导性文章。

1月7日，《红旗报》刊出了她的《领袖们在做什么？》一文。她告诫起义者必须对艾伯特—谢德曼政府保持高度警惕。她以极大的预见性敏锐地指出：“他们正在悄悄地、以反革命分子通常具有的那种充沛精力和慎重态度准备他们的阴谋，他们磨刀霍霍，要突然袭击革命，扼杀革命。”^①因此，革命者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占领一切权力阵地，不能听信独立社会党人与政府谈判并达成协议了，因为这是幻想。“不能浪费时间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必须给群众，革命的士兵发出明确和迅速的指出，必须给他们的力量和斗争热情指出正确的目标。”^②

1月8日，《红旗报》上刊出了她的《玩忽职守》一文。她直截了

^① 《卢森堡全集》1974年德文版，第4卷，第519页。

^② 同上书，第520页。

当地指出，革命如果要“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必须推倒这堵挡在它前面的墙——艾伯特—谢德曼政府。”^① 针对起义机关成员和柏林工长会议日夜开会无休止地辩论下一步如何行动并对反革命政府尚抱有幻想，派代表与之谈判的事实，卢森堡大声疾呼：在当前“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不要空谈！不要无尽无休地讨论！不要谈判！要行动！”^②

1月10日，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发表《领袖失灵》一文，她针对独立社会党右翼提出的蛊惑人心的“团结起来”、“平等”、“秩序”、“停止兄弟残杀”的所谓“团结运动”和“谈判政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团结”和“谈判”其目的就是“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导致革命工人阶级的投降”。对此，必须进行“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团结群众的革命力量和创立相应的机构，以便在斗争中领导他们”。^③

但是，“团结”、“谈判”这些字眼对普通德国人，包括大多数工人群众来说是有魔力的。他们还没有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们的蒙蔽下觉醒过来，没有认识到这些字眼的烟幕下隐藏着的是制止革命运动和瓦解革命力量的阴谋，是扼杀革命的杀手锏。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虽然不倦地向群众戳穿敌人的阴谋，但只停留于一般号召，没有或者说没有足够的力量组织和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这和刚诞生的德国共产党还没有能力担任革命的坚强领导者的角色息息相关。对此，卢森堡有切肤之痛。她在《领袖失灵》一文中写道：“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④ 为此，她号召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21页。

② 同上书，第524页。

③ 同上书，第528页。

④ 同上书，第528页。

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构。”^①但这一切已为时已晚。德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4. 最后时刻——“革命是永存的”

1月11日，德国革命两军决战的决定性时刻来到了。正如卢森堡在1月7日文章中所预测的那样，反革命集团经过密谋策划和周密准备后，对无产阶级和年青的德国共产党猛扑了过来。艾伯特政府宣称“总清算”的时刻来到了。反动军官给士兵们下令：“每支枪的刺刀上应该挑一名斯巴达克分子！”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无耻地自称为“嗜血狗”的无产阶级叛徒诺斯克，作为反动政府的“国防部长”担任了镇压革命的总指挥。他调集了大批反动军队冲进柏林，血洗全城。起义工人浴血奋战，英勇抵抗。工人们占领的一些大型建筑物遭到了炮火的轰击，街垒被猛烈的炮火摧毁了，起义工人死伤累累。反革命武装还成批枪杀被俘工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和起义准备不足，起义于12日归于失败。血腥的屠杀和搜捕开始了。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柏林街头。

在反革命暴力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为了消灭革命的领导中心，他们把屠刀指向了德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反动派指使无耻的叛徒组织“社会民主党辅助服务队第十四支队”出面，公开悬赏10万马克，高价索购两位革命领袖的首级。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也参加了号召杀害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行列，尽管方式上更为阴险狡诈。1月13日，该报刊出了一首寓意恶毒的挑衅性的诗，其中写道：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28页。

“成百上千人绝命身亡，在一个行列里，
无产者！
卡尔，罗莎……，
他们谁也不在其中，
无产者！”

在此危急关头，工人阶级和党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革命警惕，保卫两位领袖的安全，保存革命火种，不致遭到敌人的毒手。然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拒绝了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他们不计个人安危，坚守革命岗位，力图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力图在反革命的疯狂进攻面前，力挽狂澜。

此时，资产阶级和它的奴仆——叛徒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之流一起，弹冠相庆，洋洋自得地宣称：“柏林秩序井然！”1月13日，《红旗报》刊出了卢森堡的文章：《纸板糊成的小屋》。她愤怒地指出：“在冒烟的瓦砾堆上，在被杀害的斯巴达克盟员的血渠和尸体上，‘秩序’的英雄们匆忙地重新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今天明白无误的是，艾伯特和谢德曼只能靠刺刀来统治。”^①因此，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气魄，嘲笑敌人建立的秩序仅是纸板糊成的小屋，是持久不了的，革命通过曲折的道路终究会取得自己的最终胜利。

在反革命暴力横扫柏林全市的时候，德国共产党在威廉大街上的中央总部也被敌人占领了。德共领导人纷纷被捕，其中包括恩·迈耶尔和克·敦克尔、约吉希斯被捕后侥幸脱逃。《红旗报》编辑部再一次被敌人捣毁，但在同志们的艰苦支撑下，报纸仍坚持出版。同志们劝卢森堡暂时潜离柏林市区。临危不惧的卢森堡以戏谑的口吻回答说：“是吗，我们逃跑，我穿卡尔的衣服，而卡尔穿我

^① 《卢森堡文选》第2卷，华沙版，第510页。

的衣服？”她婉拒了同志们的建议。

1月12—13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秘密来到了柏林工人区——新克尔恩区暂住。1月14日，他们俩人又转移到了资产阶级住宅区——威尔斯麦多夫区的一位朋友、商人马尔库松的住宅内，顽强地继续坚持斗争，一边为《红旗报》撰文，一边与党中央机构保持联系。

1月14日，《红旗报》刊出了卢森堡的政论——《柏林秩序井然》和李卜克内西的文章《勇往直前》。他们文章中溢于言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卢森堡满怀悲愤谴责了伙同资产阶级绞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叛徒。联系到1831年俄军镇压了波兰起义后所宣称的华沙秩序井然，1871年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起义后所宣称的巴黎秩序井然和当前柏林秩序井然的历史和现实，卢森堡严肃地指出，旧“秩序”维护者想阻挡历史潮流的腾奔向前是不可能的，“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这也是革命的特殊生存规律——在这种形式的斗争中，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革命……将继续发起冲击，越过还没有掩盖的坟墓，把‘胜利’和‘失败’撇在一边，走向自己的伟大目标”。^①在文章的最后，卢森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以雷霆万钧之力豪迈地宣称：“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革命是永存的”，“明天，革命将在雷鸣电闪中冲天而起，在令你们胆颤心惊的号角声中宣告：

“我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依然存在！”^②

《柏林秩序井然》是卢森堡的最后手笔。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充满革命道义力量和声讨敌人的战斗檄文，也是卢森堡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临终誓言。

^① 《卢森堡文选》1959年毕沙版，第2卷，第516页。

^② 同上书，第521页。

敌人像害怕火一样怕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发出的真理的声音，像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害怕这两位坚毅不屈的革命领袖。他们除了发出通缉令和派出数百名配备有机枪的武装巡逻队和密探全城搜捕外，还策划于密室，酝酿了一场谋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罪恶阴谋。自愿充当这一谋杀阴谋“联络员”的凶顽是“反布尔什维主义同盟”的头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爱德华·什塔德特勒，而幕后指挥者则是“嗜血狗”诺斯克。据什塔德特勒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在这些日子里，他经常奔忙于诺斯克与执行这一指令的“近卫骑兵师”之间。1月12日，什塔德特勒来到了该师司令部所在地“艾登”饭店，会见了该师参谋帕布斯特大尉，传达了政府的秘密训令：“军队开进柏林只是事情的一半……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消灭……最危险的是罗莎·卢森堡……她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声望与日俱增……”。听到这里，帕布斯特大尉心领神会，眼睛蓦然闪出光芒。他站了起来，以军人的方式握了握他的手，简短地说，您可以信赖我！杀害卢森堡的指令就这样部署下去了。然后，传达该项使命的什塔德特勒亲自向诺斯克作了绝密汇报。诺斯克而露喜色，点头首肯，“满意地搓着手”。

1919年1月15日。这是一个朔风怒号、天色阴沉的严寒日子。经过多方侦查，敌人终于发现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行踪。当夜，刺骨的寒风停了下来，柏林街道上灯光黯淡，行人稀疏，只有一些军警暗探像鬼影似的在街头晃动。在林德莱尔中尉率领下，一支武装小分队包围了曼海姆路43号的一所宅院，配合他们行动的有该区的“公民自卫队”。当晚9时，敌人闯入并搜查了马尔库松的住宅。在这里刚避居一天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当场被捕。刚好来探望他们并带来假身份证的威廉·皮克也同时被捕。当士兵闯入卢森堡卧室时，因疲劳过度而感到头痛的她正躺在床上随意浏览歌德的《浮士德》一书。卢森堡穿衣下床后拿了一个小手提包，随

手塞进了几本书，准备在监狱里阅读，如同过去坐牢时那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勤奋好学的卢森堡仍念念不忘读书，但凶残的敌人已永远不给她这样的机会了。他们三人随即被押解到了柏林西区的艾登饭站，就是那个“近卫骑兵师”的司令部。早就预谋好并等候在二楼一间房里的是师参谋帕布斯特大尉。他心中有“数”，走过场式地提审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因为他们俩是敌人猎捕的首要目标。尚未引起敌人注意的皮克起初留在过道里听候审理。他后来灵机一动，声称自己是一家大报的记者，不了解实情的敌人糊里糊涂地把他放跑了。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李卜克内西。敌人简单地走场式地讯问了几句话以后，他就被押出了大门。门口的卫兵伦格已得到了指令，用枪托狠狠毒打了他一顿。头破血流的李卜克内西随即被押入一辆小汽车内，说是押往莫阿比特监狱。但汽车却往相反方向驶去。李卜克内西被带到蒂尔加尔腾公园并被推下汽车。上尉曾弗卢格克为首的一伙白匪军官在离他几步之遥的地方用乱枪杀害了这位革命领袖。遗体被作为街头事件的枉死者“无名氏”送到收尸所供人认领。然后，这伙杀人犯回艾登旅馆复命，按事先捏造好的说法谎称李卜克内西是图谋逃跑时被击毙的。

李卜克内西牺牲后就轮到了卢森堡。在以同样的方式经过简短审问后，她被押出了饭店的大门。兽性的白匪军官彼特里上尉已暗地下令，不得让卢森堡活着到监狱。因此，当卢森堡刚迈出饭店大门，站岗的白匪骠骑兵格伦就像恶狼一样扑了上来，用枪托连续两次猛击的她的头部。卢森堡惨叫一声当场倒地并失去了知觉。几个匪兵挟持她拖入那辆小汽车。随即，少尉克鲁利克又跳上汽车，用硬物猛击卢森堡的头部，并从她手腕上偷摘下了金表。车刚开动，伏盖尔中尉就从后座上用手枪射击卢森堡的后脑，凶残地杀害了这位革命领袖。当时卢森堡正届华年，才48岁，正处于她

思想和事业的顶峰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就这样陨落了。随后，这伙杀人犯在烈士的遗体上捆上铁丝，驾车驶向护城河，和等在那里的士兵一起，把烈士遗体拖出车外，偷偷地投入了护城河。这伙无耻的杀人犯第二天从主子那里领到了大笔奖金，然后就去酗酒，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并合影留念。

1月25日，柏林工人在安葬李卜克内西和一月起义中牺牲的数十名烈士时，因找不到卢森堡的遗体，只得以空棺暂葬。

直到5月31日，护城河的冰融解后，人们才发现浮上水面的卢森堡遗体。6月13日，成千上万的柏林工人怀着极大的悲愤和崇敬，将烈士安葬在柏林市弗里德里希墓地。在她墓前发表讲话的除德共的代表外，还有波兰共产党以及瑞典、匈牙利、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等国的共产党人代表。苏联政府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送了花圈。卢森堡过去的恋人和战友、继任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约吉希斯在同年3月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也被敌人杀害了。德国十一月革命落下了帷幕。

色厉内荏的敌人在谋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之后，在革命群众暴风骤雨式的抗议浪潮压力下，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假惺惺地导演了一出“侦查”和“审判”杀人犯的丑剧。1919年5月8—14日“近卫骑兵师”，即直接杀害两位革命领袖的刽子手们所在的那个师受命组成了“军事法庭”。被告席上的“主犯”是士兵伦格，还有七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名是“从犯”。杀人主犯实际上一个也没有坐上被告席，他们都被包庇和隐藏起来了，更不用说幕后策划者和指使者了。起诉书谎称，伦格出于“个人动机”，因为他在西门子工厂当工人时曾受过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侮辱”，因此矢志报仇，在既无同谋又无教唆者的情况下擅自采取行动的，当碰巧见到仇人后就用枪托把他们揍了半死。至于以后，其他被告出庭“作证”说，李卜克内西在汽车轮胎破裂而停车时跳出车门企图逃跑时被他打死

的。至于卢森堡，伏盖尔“作证”说，挟持入车内时不知其已否死去，车刚启动，一名“穿便衣的人”又跃上车来猛击其头部，从而致死的。她的尸体在运输车上被一伙斯巴达克分子抢走了。军事法庭就根据事先导演好的，如此拙劣和荒唐的“供词”，判处伦格两年零两个月监禁。伏盖尔则因证人、士兵格兰克出了“纰漏”——他如实描述了他见到的卢森堡遇害的情景，因而被判处两年零四个月监禁。但伏盖尔只坐了三天牢，就从监狱里“逃跑”了。他得到了近卫骑兵师师部从外交部那里弄来的护照到荷兰躲起来了。1920年他得到了“赦免”。其他军官都因“无犯罪动机”而宣判无罪。

士兵伦格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被抓了大头，代人坐牢太“委屈”了，干嘛要把不应由自己承担的罪责都揽在自己头上呢？干嘛上级不兑现事先许诺“无事”的诺言呢？于是，他写了长篇申诉书，把自己所知、所见、所闻的谋杀计划和实施过程和盘托出。实际上，伦格的“委屈”后来得到了“补偿”。1934年，希特勒第三帝国政府给予了他6000马克的“一次性奖金”。然而他的申诉书并未销毁，或者说被人遗忘了，在官方文件柜里锁了多年无人理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格的“申诉书”终于被发现了并公之于世。这样，震动国际的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谋杀案的真相才最后大白于天下。

列宁在获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的消息后，亲自参加了1919年1月19日莫斯科市苏维埃举行的盛大追悼会。列宁以巨大的悲愤谴责了敌人的卑鄙和无耻：

“这些所谓的社会党人杀人手段的卑鄙无耻，非笔墨所能形容……”

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锻炼出进行殊死的斗争的坚强意志。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447—448页。

八、多棱镜下70年——卢森堡 评价与研究的演化

1. 多彩多姿的真实形象

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论定”，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辞世之后，关于他一生的评价就可以作出结论了。可是，实际上历史的定论往往不是一次或一下子就能作出的。由于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它有时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乃至几代人才真正作出。罗莎·卢森堡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这样的人物。

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位卓越而独特的历史人物，她那孱弱的身躯内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她那高昂的头颅内蕴藏着非凡的智慧。毫不动摇的信念、永不衰竭的斗志、坚持不懈的追求、顽强拼搏的韧性、爱憎分明的情感，流光溢彩的才华，构成了她生命的主旋律。她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反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包括自己阵营内的背叛者和动摇者，把自己短暂而火热的一生，最后连同生命一齐无私地奉献给了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如果说，在科学实验中，一缕白色的阳光透过三棱镜可以分解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自然色的话，那么，透过社会历史这面无形的、复杂得多的多棱镜的检验，我们也是可以分解卢森堡身上所具有的多彩多姿的绚丽光辉的，尽管由于历史上尘雾的折射或散射，有时会呈现出一些使人扑朔迷离的光晕，令人难辨庐山真面目，然而，历史的尘雾终究是会飘落地上的。人们可以见仁见

智，莫衷一是。但是，历史却是公正的，是不会湮没任何一个在它的画面上留下过印痕的人的。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魅力长盛不衰的卢森堡比那些误解甚至诋毁她的人的形象更加高大得多。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卢森堡是一位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富于独创性思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跨越世纪，跨越时代。在人类社会从19世纪向20世纪更迭的年代里，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在无产阶级从积聚力量到开始直接冲击资本统治的转折时刻里，当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要求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奠定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补充、发展时，卢森堡是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的。卢森堡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党纲制订者，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理论领袖和波兰共产党的奠基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二国际多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人，一些革命决议的起草者，又是德国党校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课的教师，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种思潮连绵不断的，令人目眩的理论论战中的左派旗手。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过人的才智和惊人的学习毅力，使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有着广博的知识和精深的研究，使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理论家，帝国主义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者之一，在一些方面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她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著，除一些篇幅较大的著作外，还有数达几千篇的论文、政论、札记以及大量书信，总的说来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遗产的一部分，尽管其中也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错误，但更多的是启迪和智慧。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最优秀的左派理论家，但决不是某些西

方研究者所说的“最出色的”“左翼极端分子”。^①确实，如同许多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样，卢森堡总是急切地盼望革命形势迅速来到，革命早日胜利，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崩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到来有时往往估计过高，过于急切。但是，卢森堡绝不是思想上狂热、行动上走极端的“过激”分子。所以，把卢森堡划为“左翼极端分子”是极其不准确的，是不符合她的实际的。

与此同时，卢森堡是一位反对资本统治的无畏战士，是脚踏实地、不断探索前进的革命实践家。她视野广阔，跨越国界进行革命实践活动。她掌握波、德、俄、英、法、意六种语文，直接参加波兰、德国、俄国这三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国际事务尤其是英、法、意的革命问题有广泛的了解和积极的参与。她还高擎反对殖民主义的大旗，支持被压迫民族、受侵略国家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无反顾地反对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卢森堡不仅是波兰、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左派旗手，也是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20多年如一日驰骋于国际革命舞台，如此宽广的革命实践活动，这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卢森堡还是一位少见的、多才多艺的革命家。她满怀激情，富于想象，胆识出众，才华横溢。她既有诗人那种细腻敏感、观察入微的气质，又有政论家那种气势磅礴、横扫千军的雄浑笔锋，也有雄辩家那种汪洋恣肆、感人至深的讲演口才，还有思想家那种高瞻远瞩、善于剖析事物本质和预测社会发展趋势的历史洞察力。卢森堡还是一位难得的文艺学家。她不但大量阅读文艺作品，爱好音乐艺术、试唱歌剧的咏叹调，还自己动手写诗作画搞文学翻译，还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文艺评论。只是由于紧张繁忙的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才使她未能在文艺方面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正

^① 参阅〔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53页。

如她自己在一封致友人信中不无遗憾地所表露的：“……这一切都是狂热的幻想，我当然是没有权利于这一行……”。此外，卢森堡还怀着浓厚的兴趣，涉猎了数学、生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等自然科学，还采集了许多植物和矿石标本。可以这样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众多的革命领袖人物中，像卢森堡这样全面发展的，集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理论家、勇敢的实践家、优秀的演说家、卓越的政论家、热心的教育家、出色的文艺学家于一身，而且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极为少见的。作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卢森堡把它们统一起来了，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曾说过：“……广泛的兴趣，内在的和谐，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具备的，至少是应当朝这个方面努力的……，我想，正因为是一名政治战线的战士，恰恰应当努力做到高于寻常的生活，否则他就会陷于琐事。我这里当然指的是伟大的战士……”。卢森堡不平凡的一生，证实她自己正是这样一名伟大的战士。

伟大的战士还必须有宽阔的胸襟和高屋建瓴的气势。卢森堡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直言快语，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敢于冲破前人的思想樊篱，尽管有时也不免有误，但她一旦认识到了，就勇于改正。她在德国共产党建党大会的纲领报告中曾说过而句至理名言：“没有比幻想更损害革命的了，没有比明确地、坦率地说明真理有益于革命的了。”对她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科学，正如她在《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她按“社会主义的方式去相信它”，而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去思考”。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她一生在精神上是独立的，人格上是高尚的，不碌碌随波，不唯唯苟合，超脱了世俗的毁誉和名利。正因为如此，不仅像她在致友人信中戏谑地所说的，自己一辈子“与财神无缘”，而且连同自己的生命也毫无顾惜地奉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艰难困顿的环境中，她奋斗不息，那怕尘

埃蔽天，信念不移，那怕荆棘遍地、恰似郑燮《题竹》一诗中所比喻的，“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因此，卢森堡的英名长存，影响不衰，与其说人们是被她的惊心动魄的英勇业绩和气势恢宏的论著所折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被她伟大的人格力量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所吸引。

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她的重大贡献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肯定，从而使卢森堡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为人们瞩目而又最有争议的谜一样的历史人物。

在对卢森堡的研究和评价中，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是卢森堡观点正确或富于启迪意义的标准？从哪里去具体地探索她的理论贡献？正确的回答只能是一个：实践——当时和此后的社会实践！离开这个标准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科学的答案的。卢森堡逝世70年来，世界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也有了深刻的演变，真可谓沧海桑田，变幻多端。但是，时代并没有变，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没有变。70年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来潮和退潮，斗争的胜利和挫折，多次地、反复地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革命性转折的道路和方式，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渗透和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等众多复杂的问题，重新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这些重大问题恰恰是卢森堡毕生努力探索并作出了有价值的论述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总之，她的许多思想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黯然失色或随风而去。如同大海的潮汐受天体的引力而起伏一样，对卢森堡的研究及其评价受社会实践的引力而不断起伏，这就是70年世界各国对卢森堡及其思想的研究，探讨、评价、论争之所以时起时伏、历久不衰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

2. 傲视“鸡群”的“鹰”——20年代

早在卢森堡生前，特别是她逝世后的几十年来，围绕着卢森堡及其思想理论，在评价上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那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外，围绕卢森堡及其思想理论的长期论争是怎样产生和演变的呢？它的轨迹说明了什么？这里需要按历史发展的脉络，作一轮廓性的追溯和探源。

对卢森堡及其思想的评价之所以出现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与列宁的某些认识不一致和分歧而引发的。关于卢森堡生前与列宁的几次分歧和论争，本书有关部分已作了概括性介绍，这里就不赘言了。我们的回顾和探索可以从20年代初谈起。

如前所述，1922年初，脱离了德共的保尔·列维违背卢森堡生前的意愿，把她的手稿《俄国革命》等论著公诸于世，还写了反苏反共的长篇序言，企图借用卢森堡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某些批评意见来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事件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纷纷发表评论，毁誉不一。列宁立即写了《政论家的短评》一文，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列宁在指出卢森堡所犯的一些错误的同时，高度评价了卢森堡的一生。列宁提出：“列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想在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卢森堡那些恰恰犯过错误的著作。我们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这一点：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鹰那样高。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底和1919

年初出狱后,她已经纠正了自己的大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①列宁还强调指出:“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全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②这里,我们且不说列宁所列举的卢森堡所犯错误的批评是否全部恰当,其中一些问题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但应该说,列宁对卢森堡的总的评价决非偶发的溢美之词,而是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出于对卢森堡的深刻了解和对她的革命业绩和理论贡献的充分肯定。列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称誉卢森堡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③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④众多细心的读者如果翻一翻列宁全集,就会发现,列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外,列宁从来没有对其他任何人像给予卢森堡那样的如此高度的评价。当时,列宁曾设想在苏维埃国家出版卢森堡的全集,并委托卢森堡的亲密战友、德国革命失败后来到苏俄任高级职务的卡爾斯基,即马尔赫列夫斯基主持此事。遗憾的是,由于1924年列宁的逝世和随后1925年马尔赫列夫斯基的辞世,尤其是此后苏联国内情势的演变,使列宁在苏维埃俄国编纂出版卢森堡全集的遗愿一直未能实现,虽然陆续出了卢森堡的一些单行本著作。但是,正是根据列宁的提议,从20年代初期起,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和纪念卢森堡的活动,一些国家的革命青年还把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牺牲的一月十五日作为“青年节”来进行纪念的。在德国,正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在蔡特金和瓦为斯基主持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6页。

② 同上书,第626—627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69页。

④ 同上书,第35卷,第447页。

弗勒利希的参与下，在1923—1928年年间，德国共产党开始编纂并出版了卢森堡全集的最初几卷。原订计划是9卷，实际上只出了第3卷（反对改良主义）、第4卷（工会斗争和群众罢工）、第6卷（资本的积累）。正是在此前后，卢森堡的战友也发表了一批关于卢森堡的论著和回忆录，如克·蔡特金的《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阿·瓦尔斯基的《罗莎·卢森堡对革命策略问题的态度》、卡·拉狄克的《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列昂·约吉希斯》等。此外，还出版了卢森堡的一些书信集。尽管当时共产国际已在一些文件中开始提到“卢森堡理论的错误”，苏联头号理论家尼·布哈林在1924年出版了《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书中批评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但这一切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对卢森堡的总体评价，也未损害她作为傲视机会主义“鸡群”的“鹰”的光辉形象。

3. 风云突变——30年代

可是，这一局面在30年代初被突然打破了。

1931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抗议信，即有名的《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指责该杂志发表的文章歪曲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其中也涉及到了对德国左派和卢森堡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斯大林认为，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德国左派，虽然有一些重大的革命功绩，但是，他们“还没有抛弃孟什维主义的货色”，犯有“许多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因此，“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极严厉的批评”^①。显然，斯大林对卢森堡的尖刻指责是与卢森堡的实际有极大出入的，是不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3页。

符合列宁对卢森堡全面而中肯的评价的，也是违背了斯大林本人过去对卢森堡的评价的。

为什么要在卢森堡的评价上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呢？应该说，这是和当时苏联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正是从30年代初开始，苏联出现了个人崇拜盛行的“造神运动”，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滥用权威，个人专断，而卢森堡一贯强调的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化，主张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从而使卢森堡的整个思想理论遭到厄运，统统被视为“异端”而纳入了严厉批判之列。这种情况也殃及了对卢森堡的整个评价，甚至当时在苏联和许多国家已流行了多年的、每年1月组织的纪念三个“L”，即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纪念活动也被粗暴地中止了。卢森堡全集的编纂和传记的撰写也被迫停止了。卢森堡研究实际上成了禁区，代之而起的是对“卢森堡主义”的严厉批判。更为荒谬的是，几乎把卢森堡的某些思想理论等同于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甚至说成是“通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桥梁”，加上了一项顶吓人的大帽子，对卢森堡的评论呈现了只贬不褒，一家独鸣的冷落景象，使卢森堡蒙受了不白之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种不正常状况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4. 扑朔迷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方研究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卢森堡研究走上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呈现出一派扑朔迷离、晦暗不明的复杂图景。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包括德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恩·台尔曼等，亦步

亦趋地抄袭苏联30年的观点，简单化地否定卢森堡，使卢森堡的形象和观点受到严重歪曲和损害。另一些比较了解卢森堡并对她怀着深深的敬意的人，则站在较为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继续从事卢森堡研究，并写出了严肃的科学论著。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的，当推保尔·弗勒利希初版于1939年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弗勒利希曾是卢森堡的学生和战友，对她十分熟悉，也很敬仰，曾参与卢森堡全集的编纂工作，尽管他后来离开了德国共产党。弗勒利希在这部书中基本上做到了科学而客观地介绍卢森堡的生平和事业，对她的思想重点地进行了评价。这部评传流传较广，二战后曾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研究卢森堡的基本著作之一。其次，卢森堡的女友，曾是荷兰共产党人的罗兰德·霍尔斯特于1937年在苏黎世出版了《罗莎·卢森堡及其生平和影响》一书。该书主要从感性角度介绍了她所了解的卢森堡，其中不乏生动的事例，但缺乏深度。卢森堡多年的女友，甚至在与考茨基决裂后仍与之维持私人友谊的路易莎·考茨基也写了一部分，名为《罗莎·卢森堡，一本纪念册》，出版于1929年。该书从个人生活剪影的角度描述了卢森堡的为人处世及其品格。此外，还有一些人过去曾是共产党人，后来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早鼓吹者，他们也热心于研究卢森堡，但显然是有其独特的用意的。匈牙利的格·卢卡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卢卡奇在20年代出版的名噪一时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论文集中，有好几篇文章涉及到了卢森堡的思想和理论，如《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批判〉的批判考察》等。尽管卢卡奇对卢森堡的评论不乏可取之处，但却过高地估计了卢森堡的理论成就，例如，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在马克思的学生们中间，只有卢森堡才对马克思毕生事业所从事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和方法这两个方面作出了真正的发展。只有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学说具体地运用于社会发展现实状况的方法。”^①总的说来，这些人基本上是从把卢森堡与列宁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角度来研究卢森堡的，其中一些人甚至把卢森堡说成是“民主型”社会主义理论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因而走向了使卢森堡形象失真的另一个极端。值得注意的还有，过去曾是卢森堡的战友而后来沦落为无产阶级叛徒的卡·考茨基以及保·列维等人，也在20年代写了几本有关卢森堡的小册子，如《纪念卢森堡》等。这些书尽管其中也不乏某些客观的论述。但更多的是曲解或借机贩卖自己的私货，为自己的变节行为辩护。

总的看来，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各国，在卢森堡的研究和评价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真实与失实同在，卢森堡的形象在迷雾中时隐时现，似是而非，一片混沌，使人难识卢森堡真面目。

5. 卢森堡的事迹与中国革命

值得庆幸的是，卢森堡生平和事业的评价在中国是另一番景象，既有别于苏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可说是一枝独秀，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认识卢森堡比较晚。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的中国人民，不可能听到卢森堡从德国和国际舞台发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呼唤。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卢森堡的生平事迹和她的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一旦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对卢森堡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有所了解以后，就以极大敬仰之情怀念和学习她的革命业绩。

据中国学者周懋庸同志的研究，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人民认识和纪念卢森堡的历史演变过程大体如下：

1919年初，中国的一些报利杂志，如《进化》杂志，就已简略地报道了卢森堡牺牲的消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加入共产国际后，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先进工人中就展开了宣传和纪念卢森堡的活动。与列宁一起，卢森堡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革命青年崇敬和学习的楷模。正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和共产国际的安排，纪念和学习卢森堡的活动基本上是与纪念她牺牲的日子联系在一起，1922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组织和影响下，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都举行了相当规模的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活动。在上海宁波会馆召开的纪念会上，当时党的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讲了话，号召向两位先烈学习，尤其是学习他们向资产阶级和党内改良主义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在这个会上讲话的还有日本、朝鲜、印度的国际友人。北京的纪念活动是在西城的一所中学内举行的，参加者以青年为主。发言者除了一致赞颂先烈的牺牲精神外，主要强调要以同样的革命精神去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在召开纪念会的同时，许多进步报刊还发表了纪念文章。其中最隆重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在1月15日出版的纪念专刊，除了刊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多帧照片外，刊登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人民纪念他们并不是崇拜英雄，而是要学习他们既有为无产阶级革命献身的觉悟，也要具有他们那样的渊博知识，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纪念专刊还有两人文章的节译，其中卢森堡的是她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报告中的一个段落，即关于社会主义

不是靠法令，不是靠政府，而是靠群众建立的观点。这正是卢森堡有独到见解和富于启发意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卢森堡的讲话。

1923年1月，《先驱》又一次发表了纪念两人的专刊，同时还翻译发表了日本进步社会活动家山川菊菜所著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合传，它虽简略却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两人的生平和重要著作。这大概是中国读者第一次从中文读到的卢森堡小传。这期专刊还刊载了一位中国妇女写的一篇文章《卢森堡和中国女子》。作者联系到中国妇女的实际，指出，要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必须要像卢森堡那样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她还呼唤说：“卢森堡，拿你的血当作惊醒我们的炮声吧！”这反映了卢森堡的事迹已深深震动了中国正在觉醒中的妇女。

这一时期除了党的报刊外，一些进步报刊，包括社会影响较大而又处于党的影响之下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今日》、《星火》，也都发表了许多介绍卢森堡生平事业的文章。

此后，在中国革命处于艰难困苦的年代里，不管环境如何险恶，纪念和学习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活动从来没有停顿过，这是与苏联不同的。

1929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中国工人》在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牺牲10周年之际，都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发表了纪念文章，强调要像他们那样坚决反对中国的机会主义，还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指出这就是继承他们的事业。

1939年1月，在抗日战争已深入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时刻，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纪念文章，强调要像他们那样既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群众》发表了纪

念社论,指出在战争的环境下纪念他们更有意义,要像他们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加强共产党的力量,与帝国主义、机会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还需指出的是,这篇社论提到了列宁在1922年发表的《政论家的短评》中指出的卢森堡的几点错误,但并没有像在苏联那样对她严厉指责,仅是根据列宁的论断作了一般评论。

1943年1月,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即使在这样的年头,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卢森堡。在《群众》上刊出了一篇题为《他们的名字是德国革命——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逝世二十四周年》的文章。这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文章指出,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铲平了他们墓地,但这是徒劳的,他们的名字埋藏在德国人民心里。法西斯虽奴役了全欧,但在红军反攻下,法西斯终将面临末日,当奴隶们起来的时候,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名字一定会写在他们高举的旗帜上。

由上可知,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奋勇斗争的中国人民,一直把卢森堡作为学习的榜样,从中吸取了可贵的精神力量,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当然,由于当时中国国情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把卢森堡的论著介绍到中国来,更谈不上对她的思想理论进一步展开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了。

6. 初露转机——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卢森堡研究与评价开始有了缓慢的进展,虽然对她指责的基调未变。在民主德国,为了继承和发扬德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在纪念卢森堡诞辰80周年之际,在1951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卢森堡演说和论文选集》,这部选集只保留卢森堡与列宁观点吻合的作品,而把与列宁有某些分歧和争议的论著

一律删去，而且在书的前言中继续夸大卢森堡的错误。这种阉割卢森堡思想的完整性的作法遭到了世人的非议。接着，民主德国在1952年出版了费·厄斯纳所著的《卢森堡评传》（有中文节译本）。该书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轮廓性地介绍了卢森堡的生平和事业，不仅史料贫乏、语焉不详，而且回避了许多关键性场景，使卢森堡的光辉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第二部分评述了卢森堡的思想理论，作者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有时甚至是歪曲地把卢森堡的一些观点汇集起来，把它说成是“一个错误的体系”，作者的用心是良苦的，一方面希望通过宣传卢森堡来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来教育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企图把卢森堡的“有害的”、“消极的”影响“排除”出去，这种无法排解的矛盾使作者处于进退维谷的窘迫境地。

在卢森堡的祖国波兰，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在讨论走波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都有人提出了重新认识卢森堡的问题。例如，霍赫费尔德就曾两次撰文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卢森堡提出的想法是有价值的，即应从制度上保证法律和民主自由得到保障，这是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所必需的，他还指出，如果把一个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经验当作战略和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只能造成有害的后果。但遗憾的是，这两次讨论都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压下去了。

在此期间，苏联的卢森堡研究仍在原地踏步不前，一片沉寂景象。

那么，如何认识上述历史现象？为什么从列宁逝世直到50年代，在卢森堡的研究和评价上会出现如此偏颇的认识呢？它的根源又是什么？

我认为，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段时间内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原面，即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以及屈从于一党一国的利

益这个主要原因以外,还渊源于两个错误认识,第一,不是把社会实践作为判断某些思想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准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作为鉴定正误、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用这个不变的标准机械地去框卢森堡的思想理论,正是在此情况下,把当时当地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视野的局限而没有觉察到的、或者认识不了的新思想、新观点一律斥之为“异端”而予以排斥和否定。事实证明,卢森堡的许多正确的、中肯的、富于远见的思想和理论,就这样被扼杀了。后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深化,一些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了,而一些研究者仍囿于成见,不愿而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敢越雷池一步,宁可抱残守缺。这是一种僵化观点。第二,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不是辩证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待卢森堡的某些思想和理论,而是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挑选、截取、抓住卢森堡的某些论点,无视其出发点和变化,洞窥蠡测,牵强附会,然后一概否定。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正是在上述背景和观点的支配和影响下,卢森堡的研究和评价长期陷入了徘徊迷茫的怪圈。

50年代中期起,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国内情势的演变及其影响力的下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国际上对卢森堡的评论和认识有了新的转机。较早采取行动的是1956年“十月事件”后的波兰。1959年,卢森堡的祖国波兰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她保持的沉默,出版了她的两卷本选集。除大型著作外,她的主要代表作基本上包括进去了,但敏感度极高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仍未收入。选集的长篇前言对卢森堡的历史功绩予以适度肯定,对她与列宁的某些分歧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和分析。接着,处境独特并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南斯拉夫,也表现出了对卢森堡研究的兴趣,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研究这个总课题下,对卢森堡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

7. “重新发现”——六七十年代以来

60年代至70年代,是国际上“重新发现”卢森堡的时期。从欧洲到亚洲,从北美到拉美,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乃至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到处纷纷出版卢森堡的文集、选集、书信集、传记、专著,还发表了数量庞大的论文和评论,形成了广泛的、令人瞩目的“卢森堡热”。

在版本繁多的文集中,比较完整的是1970—1975年由民主德国出版的6卷本的《卢森堡全集》。《全集》收进了包括卢森堡与列宁有意见分歧的论著,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卢森堡的思想和理论。但这部《全集》也不全,因为没有收进卢森堡用波兰文发表的许多重要论文。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波兰学者弗·蒂赫正在搜集编纂有关材料陆续付梓。联邦德国和民主德以及西方国家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1至3卷的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

在新出的书信集中,由波兰学者弗·蒂赫主持编纂的,在1968—1971年由波兰出版的3卷本的卢森堡《致列昂·约吉希斯(梯什科)的书信集(1893—1919)》最为引人注目。如前所述,约吉希斯是卢森堡长期的亲密伴侣和战友,在20多年中,两人频繁书信往来,约吉希斯致卢森堡的大量书信在她被捕牺牲时损毁了,而卢森堡致他的书信在约吉希斯牺牲前却侥幸地保存下来了。这部书信集不但展现了卢森堡的生活情景、政治见解、思想风貌,而且广泛涉及到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重要的人物、事件和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联邦德国从这三卷本书信中选取了若干信札,于1971年出版了一卷本的书信集。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学者伊藤成彦编纂,补充了新材料的书信集《我在渴望中拥抱你们:1915—1918年狱中书信》,1980年已于柏林和波恩两地用

德文出版。此外，日本学者还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处发现了卢森堡其女秘书玛·雅各布的许多珍贵信件。当时，她与卢森堡结识已久，并受斯巴达克中央委托，照料大战后期卢森堡的狱中生活。这些信件是监狱当局和柏林军事当局检查过的非政治性的，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卢森堡的狱中生活和整个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些书信由伊藤成彦编纂后已于1971年和1980年于东京和波恩两地用德文出版。此外，联邦德国在1973年出版了充实新内容的卢森堡《1915—1918年狱中书信和文件》一书。

这些年来，在如同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的卢森堡的传记著作中，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有英国学者约·彼·奈特尔撰的两卷本大型传记《罗莎·卢森堡》，1966年出版了英文版，随后又出了德文版和法文版，还出了一卷缩写本。这是迄今出版的材料最丰富、描述最详尽的卢森堡传记，它的缺点是理论分析紊乱、观点偏颇、因为作者是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论证的。保尔·弗勒利希的名著《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一书，由于其条理清晰，论述精辟，在这一时期里也多次修订再版。意大利学者莱·巴紫撰写了《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在某些方面比较客观地探讨了卢森堡的思想和理论，先后用意大利文和德文出版，也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学者对卢森堡的评价有了较大的、可喜的转化，出版了一批有新意的论著和传记，其中罗·雅·叶夫泽罗夫和英·谢·亚日鲍罗夫斯卡娅合著的《罗莎·卢森堡传》（有中文译本）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是前苏联迄今出版的篇幅较大、企图予卢森堡较客观评价的传记。但在涉及前苏联制度的许多敏感问题上仍未摆脱过去的窠臼，而且不适当地把卢森堡与列宁进行机械对比，对卢森堡的革命功绩尤其是她的理论贡献未给予足够的肯定。在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安·拉席察和君·拉德联合著了《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该书于

1971年出版后获得了较大的反响。这部有一定深度的书比较客观地肯定了卢森堡的革命功绩，但在卢森堡与列宁有分歧的若干理论问题上仍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的看法，即凡是卢森堡与列宁有分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尽管口气较前缓和。在波兰，1976年出版了该国第一部《罗莎·卢森堡传》，作者是阿·科哈斯基。这是一本试图客观地看待卢森堡生平，事业和思想的书，但深度尚嫌不足。波兰在70年代还出版了两本专著，试图以新的观点和角度探讨卢森堡的经济观点和帝国主义理论。一本是塔·科瓦夫斯基的《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积累的理论》。另一本是杨·齐武尔斯基的《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经济观点》。此外，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许多学者，如季·巴迪亚、伊·费歇、于·汉斯、约·施莱夫斯泰因、弗·赫特曼、奥·弗莱希特海姆、C·韦尔、诺·格拉斯、诺·杰拉斯、戴·麦克米兰、赫·基歇特等人也写了许多有关卢森堡的传记、专著、评论，从不同的立场、方面、角度探讨了卢森堡的思想、理论、行动，并予以重新评价。总之，从6、70年代直到80年代，世界各国的卢森堡研究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进展，但同时也呈现出更多复杂的思想倾向。因为，一部分作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重新评价卢森堡，以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另一部分人则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卢森堡的，企图从卢森堡那里“发掘”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因素，因而也有曲解的地方，还有人站在纯“客观主义”立场上进行研究的，还有少数人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有意无意地歪曲卢森堡。因此，对“卢森堡热”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倾向应予以科学的鉴别和分析，切忌一概而论。

此外，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卢森堡研究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那就是，研究工作正从个别的、分散的形式向有组织的、国际性协调方向发展。1973年，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省

的首府波洛尼亚市召开了有英、法、意、荷、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日本、叙利亚、巴西、委内瑞拉等十几个国家学者参加的，探讨卢森堡学术会议。这是第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1980年9月，根据日本学者伊藤成彦的倡议，在瑞士的苏黎世，即卢森堡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召开了“卢森堡研究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年会。这反映了卢森堡研究国际化、协调化发展的动向。80年代，在瑞士、奥地利、联邦德国还多次召开了国际性的卢森堡研究学术研讨会，8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也开始出席上述会议，从而使卢森堡的国际性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1年是卢森堡诞辰120周年，“卢森堡研究国际委员会”已决定于日本东京召开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各国学者参加。

由此可知，卢森堡的“重新发现”和“卢森堡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个独特现象。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说过一段寓意深刻的话：“……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①

马克思的这段名言为我们认识卢森堡的“重新发现”的社会背景及其涵义提供了一把钥匙。

应该说，“卢森堡热”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一方面，它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也有着有机的关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2页。

从第一方面来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先导,迎来了一个生产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随着工业和生产的高速发展,西方社会出现了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诸如军备竞赛的愈演愈烈,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贫富悬殊的日益加剧,失业问题的更趋尖锐,劳动群众精神和心灵的备受摧残,如此等等。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和现代野蛮状态的出现使人们重新提出了资本主义何处去、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如何实现的问题。于是,人们重新向马克思请教,向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先驱者卢森堡请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森堡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提出来的,发人深省的一个著名命题:“是社会主义还是坠入野蛮状态!”^①引起人们的热烈探讨。人们认为,卢森堡提出的社会主义是避免现代资本主义坠入野蛮状态的唯一抉择的论断富有启迪意义。由此,人们期望把卢森堡研究与当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探索消除资本主义现代野蛮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前景。

从革命实践来说,60年代到70年代,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革命斗争此伏彼起的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心脏地区的欧洲,1968年在法国掀起了震动世界的群众性罢工斗争,随后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74年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酿成重大的后果,激起了工人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广泛不满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厉批判,也唤起了人们对卢森堡系统地论证过去群众性罢工,革命危机问题的重新估价和研究兴趣。人们认为,卢森堡论著中有许多适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独创性见解,虽不完备却富于启示性和现实性,有助于促进和提高工人群众的斗争水平。此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496页。

外,在联邦德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渴望改变现实的人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借助于卢森堡的观点猛烈批判了重新露头的伯恩斯坦主义,反对社会改良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邦德国基尔市的大学生在奋起造反的学潮中,把基尔大学更名为罗莎·卢森堡大学,以示对卢森堡的敬意。1971年8月,联邦德国重新兴起的新纳粹党的党徒在西柏林制造了一起事端,砸毁了用青铜铸造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纪念碑。那是上一年刚刚在当年卢森堡牺牲地点树立起来的。这两件事从正反两个方面形象地反映了不同社会集团对卢森堡截然相反的爱和憎。这些突出的社会现象有力地表明了,对卢森堡的态度和卢森堡研究,已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两种势力为这些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溶为一体了。这恰恰表明了卢森堡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和现实性。

欧洲国家群众性的“卢森堡热”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人们渴望在银幕上形象地重新认识卢森堡,电影《罗莎·卢森堡》应运而生。1986年,联邦德国推出由玛格丽特·封·特洛塔编导、巴巴拉·苏科娃主演的这部影片。它再现了罗莎生活的时代,刻划了她献身真理和革命,同时又热爱人生和生活,追求真善美的形象,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如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重新发现”的卢森堡的思想理论已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的人们正确认识现实,振奋工人群众革命精神,反对现存秩序,探索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

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也重新把卢森堡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早在40年代末,“南斯拉夫问题”的发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表示了巨大的关注。此后,国际

共运中发生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诸多问题以及苏联模式的弊端，社会主义现有体制的重大缺陷突出地显露出来了，从而使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重新成为人们瞩目和论争的重大问题。正是在国际共运出现新情况，面临新问题的背景下，在探讨社会主义模式，民主与改革的辩论中，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要靠实践去探索和创造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相互关系的独创性见解被重新发现，使人们得到启发和教益。许多研究者认为，卢森堡关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必须发挥人民群众在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中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依靠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扩大民主是避免官僚主义和个人专断，防止革命蜕化的有力保证的见解，不但富于科学性和预见性，已为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教训所反复证实，而且对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上可知，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变化，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卢森堡热”的另一强大推动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60—70年代国际上之所以出现“卢森堡热”，决不是单纯地探讨卢森堡本人的功过得失和历史地位，它有着更加广阔、更加深厚的社会根源。正如历史上那些有持久影响力的思想家一样，以深刻性、广博性、独创性和适应性著称的卢森堡的思想和理论，经历了而且还在经历着自己特有的历史命运。当代社会生活的强大涡流再一次把卢森堡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这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愿望为转移的，也不是任何权威人物的简单结论可以阻挡的，这就是7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外对卢森堡的实践、思想、理论的探讨、评价、论战之所以时起时伏、

历久不衰的社会根源。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炼,革命实践的检验,卢森堡的许多思想和理论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黯然失色,反而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保持着现实性和生命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重写她的传记和重新认识、评价卢森堡的重要出发点。

8. 建国以来中国的卢森堡研究

中国研究和评价卢森堡是这个世界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简略地评介新中国建立后这方面的进展概况。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70年代,这是中国人民对罗莎·卢森堡有了较多了解并开展初步研究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和中学的讲坛以及各类报刊杂志开始向青年学生广大读者概括介绍卢森堡的生平和事业。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国先后出版了卢森堡的一些原著,如《狱中书简》(1955年作家出版社版)、《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958年三联书店版)、《资本积累论》(1959年三联书店版)、《国民经济学入门》(1962年三联书店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使中国读者有了直接认识和了解卢森堡的可能,虽然这还是初步的,不完整的。《狱中书简》是当时的畅销书之一,卢森堡在这些书信中以优美的文笔所展示出来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革命乐观主义深深感染了中国读者的心灵。《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使读者熟悉了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巨大勇气。后两本书使人们了解到了卢森堡的经济学观点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里,关于对卢森堡的评价,中国读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来源获得的。首先是中文版的《列宁全集》和斯大林的著作。其次是从译成中文出版的苏联、民主德国学者所撰写的有关学术著作中看到的,如前述卢森堡著作所附的前言,1964年出版的民主

德国弗·厄斯纳所著的《卢森堡评传》等等。懂外文的人还可以从苏联，民主德国的其他出版物中更多地看到对卢森堡及其思想理论的“批判”性内容。不难看出，当时中国读者接触到的主要是苏联和民主德国的评论和观点。这些评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卢森堡的革命功绩。但更主要地强调的是她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错误”。流毒所致，加上当时中国国内存在着的“左”的思潮，严重阻碍了中国学术界对卢森堡从事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如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正是在此情势下，本书作者在60年代发表了两篇有关卢森堡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论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卢森堡的学术论文。

从60年代中期起，在持续10年的动乱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恶性泛滥，卢森堡研究如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陷于停顿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写于1963年的历史读物《卢森堡》在197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延边人民出版社接着出了朝鲜文的译本。这本简明扼要的小传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卢森堡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理论，重新肯定了她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称她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70年代后期起，随着十年动乱的被制止，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面纠正了文革的左倾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勃勃生机，我国学术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和活跃的时期。正是在这股潮流带动下，我国的卢森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80年代初，日本研究卢森堡的知名学者伊藤成彦先生的数度访华和讲学，对于促进我国学术界的卢森堡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80年代以来，我国的卢森堡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研究领域有了扩大和深化，观点上有了突破，而且与国际学术界有了交流。过去，我国学者着眼点主要是卢森堡的革命实践活动。现在，卢森堡作为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的思想理论体系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关注和重视。1981年3月，在卢森堡诞辰110周年之际，在中央编译局的主持下，在大连市召开了全国性的卢森堡思想理论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40多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就卢森堡的主要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卢森堡学术会议，这对于推动卢森堡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后，在殷叙彝、李宗禹、李兴耕和本书作者发表的有关研究论文中，人们不但肯定了卢森堡与列宁基本观点上的一致性及其独创性，也探讨了卢森堡与列宁的分歧点及其不足之处，还追溯了卢森堡与列宁观点有异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而且还涉及到了过去研究领域的“禁区”——卢森堡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论。作者们指出，尽管卢森堡的见解有片面和错误之处，但她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其中既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探讨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应当逐步完善的政策措施，也包含有防患于未然的有预见性的警告。有的作者还指出，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卢森堡的思想和理论是关系到正确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问题，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重大问题。

除了深入探讨卢森堡的思想理论外，我国学者也开辟了饶有兴味的新的研究领域——卢森堡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周懋庸所写的关于卢森堡与约吉希斯的关系以及狱中生活的文章，引起了中国青年的浓厚兴趣，并从中汲取了力量和启示。此外，用懋庸所写的卢森堡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填补了我国卢森堡研究的一个

空白点。

在国内研究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我国的卢森堡研究也开始迈入了国际领域。1980年，本书作者向该年于苏黎世召开的卢森堡国际学术会议提供了卢森堡研究在中国的学术论文。1982年9—10月，中国研究卢森堡的学者应日本方面的邀请，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学者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在东京、京都、名古屋、大阪、横浜等城市与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学术交流。1984年，在上海举行了中日两国学者卢森堡学术会议。此后，中国学者还应邀参加了在瑞士、奥地利、联邦德国举行的有关会议。这些活动标志着我国的卢森堡研究已开始面向世界。

我国卢森堡获得可喜进展的第二方面的表现是，卢森堡选集的出版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1981年，为了纪念卢森堡诞辰110周年，中央编译局迅速编译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专辑不仅收入了中国学者向往已久的《论俄国革命》以及卢森堡其它有争议的论著，而且由李宗禹、周懋庸写了背景性的评介文章，还选载了多篇国外有代表性的评论，从而使读者大开眼界。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学者主要凭借外国版本的卢森堡论著进行研究的不正常状况，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力量，承担了编译《卢森堡文选》的工作。李宗禹和周懋庸负责主持这一工作。1984年，《卢森堡文选》上卷，分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的编译工作也早已完成，该卷将于近期内出版。两卷本卢森堡选集包含了她的相当部分的主要论著，它的出版不仅使我国读者有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卢森堡的思想理论，也为我国的卢森堡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此外，王以铸翻译的《卢森堡论文学》也已于1983年出版，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卢森堡的文艺学观点。

在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借鉴方面，除了翻译出版苏联作者罗·

叶夫泽罗夫、英·亚日鲍罗夫斯卡娅所著的《罗莎·卢森堡传》(汪秋洲译、谷安康校,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以外,易克信、周亮勋、张启荣等人以及本书作者还发表了许多国外卢森堡研究进展状况和论争的评介性文章,有助于学者进行比较和鉴别。

总之,卢森堡研究既有它重大的理论意义,又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在我国仍处于初始阶段。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探索和追求中走向进步和完美。我们相信,前人的智慧之果是可以使当代人变得更聪明一点的,包括卢森堡在内的一切杰出思想家的思想理论遗产的开发、继承和发扬,将有助于推动我们伟大事业的前进。

九、当代启示录

1. 有历史洞察力的思想——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卢森堡的论著基本上是在研究她生活的时代的历史发展事态的，严格说来不是从事一般的哲学或理论的总体研究的，除了研究帝国主义现象的《资本积累论》及其续篇《反批判》以外，她并没有撰写过这方面的专著。一般说来，这类论著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会显得事过境迁而黯然失色的。但是，卢森堡的某些思想在事隔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使人感到十分新鲜，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这是极不简单的事。为什么她能做到这一点，人们众说纷纭，然而其根本秘密在于，她从不从静态的角度，即从抽象的图式或现成的结论看待历史的发展，而是从动态的角度，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前进中的新现象，去研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新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卢森堡许多思想之所以能在当代仍有巨大影响力和现实生命力，其谜底在于，它不仅有较强的适应性，更主要是由于有远见性，预见性，或者说是一种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例如，卢森堡对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论述就属于这种情况。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近一个半世纪中，马克思主义以它旺盛的生命力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事业既取得了举世震惊的伟大成就，也遭遇过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经历了艰辛而不平凡的历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开拓前进的道路上，凝聚着血、洒满了汗、蒸发着泪、闪耀着光、辐射着热、燃烧着火。当前，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社会主义国家承受的压力，马克思主义经受的考验，人们思想认识上遇到的困惑，都是空前的。本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至今尚不足150年，无产阶级政党开始掌握政权至今70年稍多，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在此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毕竟是有限的，犯错误和遭挫折也是在所难免的，资产阶级的肆意攻击和恶毒咒骂也是意料中的事。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是不会过时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还在经历着艰辛和坎坷，从历史发展规律来说，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洪流毕竟是不可阻挡的。

这一切，正如卢森堡在1903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的：“如果说今天的工人运动不顾敌人的种种镇压行动仍旧战无不胜地抖动它的鬃毛，这首先是因为它冷静地认识到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①也就是造成了对剥夺者的剥夺——社会主义革命。它通过这种认识看到了最终胜利的绝对保证，他从这种认识不仅汲取了激情，而且也汲取了耐心，行动的力量和坚持的勇气。”^②但是，正如卢森堡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人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基于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胜利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的信心之上，而应该进一步认真地、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因为

① 卢森堡此处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81页。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以继续前进的重要前提。

正是在如何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科学地总结这方面经验教训这个根本问题上，卢森堡为后人作出了一些睿智的、精辟的、发人深省的论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反批判》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追求新认识的世界观。它不是僵化的、令人生厌的、一次性有效的形式。它利用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在历史的电闪雷鸣中最出色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①在同期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等论著中，她还指出，没有已经规定好的，一劳永逸的有效公式，没有不会犯错误的领袖给现代无产阶级指出一条必经之路。历史的经验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教员，它的自我解放的艰难道路不仅是由无限的痛苦、而且也是无数的错误铺成的。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直面真理，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无产阶级的解放取决于是否善于向自身的错误学习。自我批评，毫无顾忌的，无情的，深入到事物本质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维持生命的空气和阳光。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历史的严厉规律就会恢复他们的力量，保证他们的最后胜利。上述论断不仅表现了卢森堡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伟大胸襟和气魄，更主要地向人们提出了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错误，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

在卢森堡的毕生事业中，正是上述思想指导着她推进马克思主义和进行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真理，绝对不能以僵化的观点、固定的模式看待它，要根据实践的前进和群众的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正如她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的，“如果社会进步又提出了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523页。

一系列更新的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那么，只有马克思的方法能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武器。”^① 卢森堡还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整个解放行程是由一系列失败和胜利无数环节所构成的，早在她同伯恩斯坦的最初论战中，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她就指出，无产阶级“必要的”、“不成熟的”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其它错误和挫折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重要的是要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1918年于狱中所写的《论俄国革命》一书中，她又重新强调了这一点：“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汹涌澎湃的生活才能找到成千上万的新的形式、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② 1919年1月13日，当德国革命濒于失败，在牺牲前夕，卢森堡在她的最后手笔《柏林秩序井然》一文中，再次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这也是革命的特殊生存规律——在这种形式的斗争中，能避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我们从历次‘失败’中吸取历史经验、知识、力量和理想主义。”^③ 正是在此文中：她以高昂的激情宣称，在工人阶级获得解放以前，革命将是永存的。与此同时，卢森堡以极大的预见性和远见性预言，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将经历无数的痛苦、挫折和错误，必须敢于和善于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向自身的错误学习，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

卢森堡以生命和鲜血反复强调的上述论断，至今熠熠生辉，给当代的人们以极大的启迪和教益。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一些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85—486页。

②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330页。

③ 同上书，第536页。

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坎坷和曲折，原因固然纷繁复杂，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如力量对比和环境情势的变化，外来势力的干预和渗透等等，更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忽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情势判断的失误和政策措施的失当等等。但归根结蒂，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正确地、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要么以僵化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无视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无视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无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追求新认识的世界观”，却把已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看作是“已经规定好的、一劳永逸的有效公式”，不愿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累累受挫。要么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破烂货色搬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视腐朽为神奇，执迷不悟，越走越远，使改革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航道，从而走上了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道路。

确实，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错误和挫折是最铁面无情然而也是最真诚的老师。如果说坏事能变成好事的话，那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警醒和提示。我们必须从中认真地学习和总结，使我们变得聪明一些，避免今后犯更多的过失和错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的人们不得不佩服卢森堡关于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历史洞察力，包括上述有极大远见性和预见性的防患于未然的忠告！

由此可知，卢森堡科学地、正确地提出了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命题，这是她的一大历史功绩。至于如何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全面而非片面地，深层次而非肤浅地，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途程中所经历的成败得失，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这就历史地落在了当代人们的身上了。

2.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辩证关系

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领袖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卢森堡在其毕生事业中予以极大关注的问题之一，关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到列宁，无产阶级经典作家都曾予以阐述，他们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党组织是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先锋队，领导党的是一批优秀的领袖人物。卢森堡的独到之处，即她的独特贡献在于：她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彻底的唯物史观为支点，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个基点出发，深入地、辩证地论述和分析了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党和人民群众，领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卢森堡一贯重视和强调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的中心人物。她认为，随着历史的前进，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行动的出现，必将是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对自身历史任务认识的提高。1903年，卢森堡在《破灭了的希望》一文中，遵循马克思的思想，深刻地谈了她的认识：“马克思在1845年就曾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迄今一切历史活动中‘最深入的’活动，它包括全部下层人民，它是阶级社会形成以来的首次符合群众自身利益的活动。”^②但是，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自发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使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 参阅《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90页。

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在此情况下，党的任务首先是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以提高他们对自身历史任务的认识，排除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思想渗透和控制，吸引和争取绝大多数群众站到自己一边。这是因为，“群众自身对于自己的任务和道路的认识也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先决条件，正像从前他们缺乏认识是统治阶级的行动的先决条件一样。”^①党在这样做了以后，“这些群众是满怀信心地加入我们阵营的，他们把这里看作唯一的一面旗帜鲜明地捍卫他们真正的阶级利益的政治阵营的。”^②

卢森堡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吸引和争取无产阶级群众，首要的一点是必须端正对群众的认识，决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群众当做是不屑一顾的、“尾随在他们后面”的一群盲从的群氓。她说：“歌德曾经说过‘令人讨厌的多数’这句话。这种多数是由少数几个强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群众’组成的。这句话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用来描绘‘多数’的经典公式而已。”^③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决不能照搬这个公式来看待人民群众，更不能颐指气使，要他们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她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行程是由一系列失败和胜利的无数环节所构成的，为了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能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前进并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革命主动性。卢森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具有革命自觉性的群众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使之取得胜利。她在最后手笔《柏林秩序井然》一文中写道：

“群众是决定性的要素，群众是基石，革命将依靠这块基石取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90页。

^② 同上书，第497页。

^③ 同上书，第499页。

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在使命的高度，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未来的胜利将从这一‘失败’中成长起来。”^①

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也是无法改变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掌握和驾驭这个规律的是人，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党组织及其既有优点又必然有缺点的领袖人物。规律发展的快或慢，走较直的路抑或走弯路，这要取决于人的行动，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自觉性。

卢森堡在强调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排斥党的领导作用，而且一再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在1906年出版的《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一书中，卢森堡是这样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社会民主党是思想最明确、阶级觉悟最高的先锋队。它不能听天由命地安然等待‘革命形势’的出现，等待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应当始终走在客观事物发展的前面，加速它的发展。”^②由此，她认为党的任务在于：“首先要使最广泛的无产者阶层懂得这一革命时期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导致这一时期内在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后果”；其次，要争取“最广泛的无产者阶层赞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性群众行动”，“在群众运动中真正掌握并保持领导，从政治意义上支配整个运动”；第三，“十分明确地、彻底地和坚决地给德国无产阶级规定即将到来的斗争时期的策略和目标”。^③

在1916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中，卢森堡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她高屋建瓴地论述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38页。

②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146页。

③ 同上书，第146页。

自觉性、能动性^①与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她指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是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无产阶级自己的活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是社会发展的进程不会不依赖于无产阶级，不会脱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动机和原因同它的成果和结果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是历史的决定因素。尽管我们不能跳越历史发展的阶段，就像人们不能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加速或延缓发展过程。”^②她还说，社会主义的“‘飞跃’是同历史的铁的规律相联系的，是同先前的极其痛苦的和很缓慢的发展的无数幼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由历史发展带来的物质条件的原料没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③的自觉意志所点燃的火花所激发的话，那么这种‘飞跃’永远不能完成。”^④

在《半官方的理论》一文中，卢森堡谈到了党的领导层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她指出：“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们的任务不是被事变拖着走，而是要自觉地走在事变的前面，预见发展的方向，通过自觉的行动来缩短发展，加速它的进程。”^⑤

在《策略问题》一文中，卢森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精神，再次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中心人物，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依命。她说：“即使有社会民主党出场，人民群众仍然是世界历史活的因素。只有当组织核心和人民群众之间不断地进行血液循环，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脉搏跳动，社会民主党才能表现出采取历史性行动的能力。”^⑥

由上可知，通过对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自觉性和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论证，卢森堡以唯物史观的彻底精

①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6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卷，第321页。

④ 同上书，第252页。

神，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那么，卢森堡是否盲目推崇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呢？是否像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意义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尽管我们也应看到，卢森堡在一些时候，在其论著中流露出推崇群众的自发运动和对党的组织作用估计不足。但是，从总体上说，她对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是有清醒的认识和中肯的分析的，既看到他们作为历史主人的根本长处，也看到他们身上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在1917年2月致友人玛蒂尔达·符尔姆的一封信中，卢森堡生动而形象地把群众的心灵比喻为大海。她说：“群众的灵魂，就像大海永恒的大海，始终蕴藏着一切潜在的可能性，风平浪静和狂风激浪，最可鄙的怯懦和最热烈的英雄主义。群众始终是根据它面对的环境必须成为的那个样子，它又随时都会变成和它现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一位船长只根据水面上一时的外观来驾驶自己的船只，而不懂天空中和深海处的征兆来推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那该是多么糟糕的船长。……一个气魄宏大的领袖不是根据群众一时的情绪而是根据铁的发展规律来制定自己的策略，并且不顾一切失望坚持自己的策略。”^①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卢森堡把群众比喻为起伏不定的大海，而把党组织及其领袖比喻为在大海上驾船前进的船长，应该说，这种比喻还是贴切和中肯的。她还谈到了对“船长”的要求，应该说也是切中要害的。

卢森堡深深懂得而且一再指出，要把群众的自发行动转化为自觉的运动，需要党组织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向他们传播社会主义意识，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这是党组织及其领袖人物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但她认为，无论何

^① 《致友人信》1950年德文版，第47页。

时，均不应该对群众“失望”。她认为，“‘对群众失望’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始终是最不体面的证据。”^①她指出：“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群众会去做’。”^②

卢森堡是十分重视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和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她认为，关键是要辩证地理解和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工人阶级与党和领袖作用之间的关系。在《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一文中，她写道：“社会民主党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觉信徒和精神产儿，不承认历史上任何一种英雄崇拜”，“社会民主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体现。实际上它的真正领袖是群众自己，当然这是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地加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对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整体上说社会民主党只是无产阶级运动有觉悟的先锋队，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它在斗争的各个时刻代表解放的永久利益，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各种局部利益相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内，它的领袖越是明确地和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他们就越有力量，越有威信。”^③应该说，卢森堡这段有独到见解的精辟论述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卢森堡也懂得，领袖和群众之间总是会出现矛盾的，甚至会有“裂痕”。在此情况下，领袖该如何办？卢森堡大胆地提出，领袖应该“放弃自身的领袖作用，使群众成为领袖，使自己

① 《致友人信》第47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73页。“群众会去做”是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句。

③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08页。

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执行人和工具。”^①这就是说，卢森堡认为，领袖人物应该自觉地成为觉悟了的群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这样做，他们就越有力量和威信，才是群众的真正领袖。正是根据以上认识，卢森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气魄，向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课题：“社会民主党运动的主导趋势现在是而且始终是取消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和‘被领导’的群众，取消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历史基础。”^②

那么，在群众成为“领袖”的情况下，怎样执行党的纪律和统一行动呢？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是深深懂得党的纪律和统一行动能力的极端重要性的。她明确指出，这是关系到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生命问题”。但是，她强调指出，党的纪律与资产阶级军队要求士兵盲目服从纪律是根本不同的，“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只能意味着每一个人服从绝大多数的意志和思想”。联系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她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决不意味着80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的执行委员会会有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80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③应该说明，卢森堡的上述论断是针对已深深陷入机会主义泥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说的，是有具体针对性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这段话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究竟应该谁服从谁？谁执行谁的意志？这是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90页。

^② 同上书，第491页。

^③ 以上引文见《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38、39页。

卢森堡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个根本论点出发，一贯强调，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时时处处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发挥主人翁作用。在1918年秋季于狱中所写的《论俄国革命》一书中，卢森堡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①她还指出，必须让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从中获得政治教育和管理经验，否则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些领袖人物发号施令来实行，强加在人民头上。她认为，这样做是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能也无法想象凭行政命令来实施，甚至最社会主义的政府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必须由群众本身，由每个无产阶级者在生活中实施。”^②由此，她断言：“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③

1918年12月，在争取把德国革命推上社会主义轨道而为斯巴达克同盟制订的纲领性文献《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中，卢森堡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导地位与社会主义本质之间的关系。她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一次只有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并由大多数劳动者去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革命。”而且，无产阶级群众“也必须由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动性一步一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而且在有意识的、自

① 《卢森堡专辑》，第92页。

②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2卷，第493页。

③ 《卢森堡专辑》，第12页。

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①接着，卢森堡还进一步概括地论述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工人群众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无产阶级群众必须从没有灵魂的机器、资本家奴役的被动工具，成为生产过程中有思维能力和自主的领导者。必须锻炼自己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社会财富唯一主人的责任感。必须在没有资本主义式监工的情况下发挥干劲，必须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达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在没有枷锁的情况下遵守纪律，必须在没有鞭子的情况下保持秩序。为了服务于整个社会而抱有崇高的理想，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和表现出真正的公民责任感”。^②

从上述精辟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切身事业。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从资本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群众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以主人翁的身份掌管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主义是不能靠发号施令来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具有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崇高理想。

由上可知，卢森堡怀着对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一往深情和崇敬，另辟蹊径，有创见地论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四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党和群众，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自觉性与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彻底性，今天读起来仍虎虎有生气。当然，如果求全责备的话，也许有些地方论述得不够确切和严密，如领袖的作用等。但是，透过历史的尘雾，时代的灰烬，她那以坚定的信仰和执著的追求为支点的思想轨迹依然耀眼闪光，熠熠生辉，值得人们长久地深思和吸取智慧的。

^① 以上引文见《卢森堡专辑》第113页。

^② 《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445页。参阅《卢森堡专辑》，第114页。

3.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 趋势的探讨

如前所述,卢森堡是现代帝国主义研究有功绩的拓荒者之一。她和列宁的基本结论是吻合的,即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级”和“最后阶段”,是注定要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她的独到之处的一个方面在于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崩溃方式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大胆的预测。

早在帝国主义刚形成不久的1900年,在国际社会党人的巴黎大会上,卢森堡在大会的报告中就曾对资本主义的末日作过这样的设想:“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一般设想,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将成为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头,资本主义大崩溃的开端。现在这种设想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可能,恰恰相反,愈来愈可能的是,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政治危机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①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速胜论者”相反,卢森堡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延续的时间作了冷静而睿智的预测:“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或许还要长久保持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丧钟迟早会敲响,为了使我们在决定性时刻担负起伟大的任务,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必要通过不断的国际行动为这一时刻作好准备。”^②

从卢森堡作出上述预测到现在,时间已经流逝了90年,由于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资本主义制度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活力。那末,将来究竟是政治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或者两者结合而导至资本主义走向最低崩溃,现在尚难断言,只有等待未来历史的检验了。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77页。

^② 同上书,第275页。

1912年，卢森堡在她的名著《资本积累论》中，进一步预测了资本主义灭亡前景的两种可能方式。第一种可能方式，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地向全世界扩张，一再瓜分世界，使非资本主义地区不断地被吞并和转化为资本主义。最后资本主义成为囊括全球，排挤和取代其它一切经济形式的体系。到那时，全人类实际上只由资本家和雇佣无产者所组成，因为没有外部市场可以扩展了，从而也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资本积累了。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得不走向自己的末日。卢森堡还指出，这种末日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需要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行动使之转向社会主义。第二种可能方式，那就是在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扩展过程中，随着国际竞争以及经济、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加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以前，就引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起义，从而导致资本帝国主义的崩溃。^①

卢森堡的上述论断和预测，是根据她的独特的资本积累论引申出来的。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能否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除了必须有内部市场外，还必须依靠外部市场。因此，只有掌握了非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即殖民地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的积累才是可能的。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进行对外扩张，推行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再瓜分世界。如前所述，对卢森堡的这个理论，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是值得商榷的。抛开理论是非不谈，从实践上看，卢森堡描述和预测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某些方面，却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实。从资本主义灭亡前景的第一种可能方式来说，正如卢森堡所预测的，本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不顾一切地向全世界扩张”，除少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以外，资本主义

^① 参阅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中译本，第386页。

生产方式正在成为排挤和取代其它一切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体系。这里，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种类型是原先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第二种类型是新兴的，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三世界国家。从第一种类型的国家来说，从本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走的是“外延式”为主的发展道路，即主要通过侵略、征服、占领、掠夺别国，争夺势力范围、击败对手，乃至瓜分世界，以此剥削别国人民，榨取超额利润来养肥自己。这一切，卢森堡曾给予充分的、有力的论证和预测。当前，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此类国家转到了以“内涵式”为主，内外剥削结合的发展道路，即凭借本国高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和更新产业结构，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重新开发本国市场的同时，主要通过科技进步，改善经营管理，扩展国际贸易，增强金融实力来打击对手，取得占领外部市场的更大份额，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势头。这种新的历史现象当然是卢森堡当时始料不及的。但这一切均未超出她所预料的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地向全世界扩张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即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陆续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来说，它们正如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之中，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广泛发展的上升时期。它们在国际政治斗争格局中，有别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坚持了反帝反殖反霸的立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军。但从生产关系的色度看，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可见卢森堡在70多年前所预测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一切地向全世界扩展，使非资本主义地区不断地被吞并并转化为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成为排挤和取代其它一切经济形式的体系的预言，在相当程度上已为现实所印证。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远远没有完成。在包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

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远远没有达到卢森堡所预期的只由资本家和雇佣无产者两大阶级所组成那种状况。恰恰相反，处于中间状况的广大“中间阶层”却有了扩展的趋势，不论是外部市场还是内部市场都还有扩展的余地。这可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还有一定发展余地的历史时期，它的崩溃尚需待以时日。

从卢森堡预测的资本主义崩溃的第二种可能方式来看，也得到了部分验证。她没有能像列宁那样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由此得出在其薄弱环节突破的结论，但她有远见地看到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竞争以及经济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加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以前，就会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起义。果然，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那就是以1917年俄国十月武装起义为开端的、发生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欧洲1918—1919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最后虽然由于社会条件不够成熟和力量对比关系等原因而失败了，但脱颖而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得到了生存和发展，打破了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二战以后，在欧、亚、拉美又建立起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社会主义在曲折发展中表现出了不可战胜的顽强生命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正进行着历史性的较量。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演变，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复杂图景，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卢森堡的设想，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将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卢森堡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崩溃方式的勇敢探索和大胆预测，尽管有不够确

切的地方,但仍具有长远的价值,值得当代的人们反思和进一步探讨。

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 社会变革的思考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于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处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变革与议会斗争的关系问题,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并对国际政治有深刻了解的卢森堡,在其毕生的革命活动中,一直把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革命变革的问题,作为自己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资产阶级国家本质和议会政治实质的认识上,卢森堡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是完全一致的。她的独特贡献在于,对议会政治的局限性和必要性,议会斗争与革命暴力的关系等方面,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深入的、有说服力的剖析和论证,迄今仍然富于启迪意义。

早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最初斗争中,卢森堡在她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就指出,通过改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改良资产阶级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制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这是由议会民主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从形式上看,议会制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① 社会改良和议会民主打不通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隔绝起来的高墙,“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00页。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①

接着，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践——米勒兰入阁主义的斗争中，卢森堡进一步分析了资产阶级统治及其复杂的现代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之间的关系。在1901年发表的《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一文中，她指出：“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就像一部齿轮机，它的各个部分在所有方面都相互联结在一起，彼此决定和调整它们的运动，使整个齿轮机转动起来的直接传动装置是资产阶级议会，但是原动力首先是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应该说，卢森堡的这个比喻是十分贴切的，道出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彼此关系的性质。

在亲身参加俄国和波兰的1905年革命后，卢森堡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一书中，她是这样论证革命与改良、无产阶级革命与议会斗争的关系的：“就其本质而言，议会斗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良工作……议会斗争又是政治性的当前工作……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议会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③这就是说，议会斗争只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手段，是局部改良，是当前工作，是斗争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而决不能把它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长远目标混同起来或代替之。据此，卢森堡猛烈地抨击了党内机会主义派别是议会痴呆症患者，正是“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④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01页。

② 同上书，第336—337页。

③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一卷，第573页。

④ 同上书，第574页。

卢森堡是深深懂得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局限性和软弱性的，针对机会主义者把议会民主抬到不应有的高度，抹煞议会民主的阶级实质的错误观点，她在《社会民主党与议会主义》等论著中，一再强调指出，议会制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作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议会民主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发展，人类进步以及诸如此类美妙事物的绝对产物，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某种历史形式。”^①对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决不能迷信。她警告说，“如果社会主义的合法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天生的历史形式，那么，他们不是在同一种具体的民主制，一种具体的议会政治打交道（这种民主制和这种议会政治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日子里是悲惨的和动摇不定的），而是在同一种虚构出来的抽象的民主制打交道。”^②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会碰壁的。她进一步指出：“片面地对议会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寄予希望只能使我们在政治上遭到一系列失败，引起人心涣散。”^③

正是根据以上分析，卢森堡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机会主义的议会痴呆症患者，指出他们这样做是在糟塌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这只雄鹰搏击长空的学说，你们却把它变成了正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粪堆上寻觅着一颗珍珠的母鸡发出的无限忧愁的咯咯叫声。”^④

卢森堡对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本质及其局限性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但她并不贬低选举斗争和议会活动的作用，而且认为它们是有其必要性的。为此，卢森堡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

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时指出：“如果说，民主制对于资

①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2卷，第318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5—396页。

③ 同上书，第381页。

④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1卷，第600—601页。

产阶级已经一部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它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首先，民主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总之，民主制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多余，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唯一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①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知，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之所以要参加议会活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可以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所创造的某些形式，如选举制、自治制等，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作为“跳板和支撑点”。卢森堡的这种想法已得到了实践的印证。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选举制和自治制。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参加议会斗争和争取更多民主权利的斗争，认识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局限性，“国家共同体”形式的虚幻性，从而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懂得了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实践表明，俄国人民在夺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的过程基本上正是走的这一条道路。

稍后，卢森堡还进一步补充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事议会活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不仅有利于教育无产阶级群众使之获得社会主义意识，而且也是为了争取有利于无产者目前利益的、具体的“实际的、明显的成果”。^②这就是说，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议会斗争的第三个着眼点是为了争取可能达到的、目前的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34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局部利益。

在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中，卢森堡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资产阶级议会活动中应采取的原则立场、任务和策略。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决不能混同于资产阶级激进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划清与资产阶级营垒的界线，必须执行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政策同资产阶级政策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者作为整个现存制度的敌人必须在资产阶级议会中采取原则上的反对派立场。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活动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对政府的政策进行系统的批判。”^①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由于社会主义者没有可能使自己的政策得到议会多数派的直接批准，就必须通过不断的斗争从资产阶级多数派那里争得让步。他们通过自己站在反对派立场上进行三种不同方式的批评达到这一点：首先，他们提出最进步的要求，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危险的竞争者，并且借助于选民的压力推动这些政党前进，其次，他们向全国揭露政府并通过舆论来影响政府；最后，他们通过在议会内外进行的批评把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政府和资产阶级不得不加以考虑。”^②

经过20多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实践的检验，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所写的《国民会议》一文中，卢森堡再次强调，机会主义者想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议会政党，而是一个统治阶级，它占有全部经济和社会的权力手段。”^③在平时平静的议会政治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09页。

^② 同上，第309页。

^③ 《卢森堡专辑》第110页。

中，不管各政党的议员们在议会辩论中如何唇枪舌剑，争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雇佣关系、利润这些资产阶级统治的生命线和动脉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们也就规规矩矩……。只要出色的国民会议真的制定完全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连根铲除资本统治，斗争就会开始，如果资产阶级被射中心脏——它的心是在现金保险箱内跳动的——，它将为它的统治殊死战斗，将千百次公开和秘密地反抗社会主义的措施。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①

卢森堡在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出色地论述了议会政治和革命暴力的相互关系。

在批判当时在国际共运中有相当影响的比利时党的首领艾·王德威尔得的机会主义观点时，卢森堡在《三论比利时的试验》一文中指出，机会主义者把议会政治、合法斗争与革命暴力对立起来，排除使用革命暴力的可能性的“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她论证说：“迄今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人民的暴力行动绝不像政治家和官方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想像的那样是所谓‘领导人’或者‘党’的一种随心所欲的、自觉的产物，不如说……其来源于现代社会的阶级性质。”^②“是进行革命还是纯粹合法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而主要是历史发展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机会主义者既然把革命排除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外，同时也就不折不扣地断言暴力已不再是现代历史的一个因素了。这是问题的理论核心。只要把上述观点表达出来，就会发现那是荒唐可笑的。暴力不仅没有随着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增加，随着议会政治的发展而丧失历史作用，而且它在今天正像从前的任何时代一

^① 《卢森堡专辑》第110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1页。

样也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基础，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暴力之上，它的军事组织本身就充分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的一个真正本领就是忽视这一事实。但是，甚至‘合法性’的领域本如果仔细加以考察也足以证明这一点。难道中国拨款^①不正是由‘合法性’，由议会政治提供的采取暴力行动的手段吗？”^②由此，卢森堡得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结论：“一句话，向我们提供的资产阶级合法性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暴力”，^③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还是资产阶级的整个法律制度，都只是他们的占统治地位的暴力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说，我们合法的议会活动没有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工人阶级的暴力作为后盾，那么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就会变成一种比方说同竹篮打水一样聪明的消遣了。”^④

基于以上认识，卢森堡进一步论证了“暴力”与议会政治即“合法性”的关系，议会斗争能否进行下去的条件。她指出：“暴力显然没有由于‘合法性’而被取消，不如说它是合法性的真正庇护人，确切些说是它的基础，这无论对资产阶级方面还是对无产阶级方面来说都是如此。反过来说，合法性是各个时期相互进行斗争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产物，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是允许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取消政治斗争的议会条件，要看这样做能否在大体上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定，其次还要看人民群众潜在的暴力能否作为攻击武器或者足以自卫的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⑤

① 指1901年10—11月法国政府向议会提出并得到通过的一项提案，要求提供军事拨款以支付法国军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1900年中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费用。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1—392页。

③ 同上书，第393页。

④ 同上书，第393页。

⑤ 同上书，第395—396页。

联系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出的策略上的修正，即重视议会斗争，认为这一斗争是“不断争取国家和议会政治的民主化的努力是在精神上和部分地在物质上提高工人阶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方法，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①时，卢森堡是持某种保留态度的。她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策略的修正“既没有把暴力从全部历史中一笔勾销，也没有一劳永逸地把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暴力革命一笔勾销，也没有把议会政治抬高为阶级斗争的唯一方法。完全相反，暴力现在而且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最后手段，是至高无上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一规律时而潜在地发挥作用，时而积极地发挥作用。”^②她进一步向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提出忠告说：“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当我们的努力针对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时迟早也要同资产阶级社会发生暴力冲突，但这不是出于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把议会政治看作使工人阶级得救的唯一的政治斗争手段，是空想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反动的，正如同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使它得救的手段一样。”^③

卢森堡深深懂得，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暴力虽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最后手段，但暴力革命也不是轻易就会发生的，它的使用也是有条件的，但必须为此作好准备。她指出：“暴力革命在今天的状况下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我们也可以预料，无产阶级只有在认为暴力革命是它向前突进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时，而且不言而喻只有在整个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多少有可能保证它取得成果的条件下才会采取这一手段。但是，明确认识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7页。

② 同上书，第397页。

③ 同上书，第397—398页。

到无论在阶级斗争个别事件中还是为了最终夺取政权都必须使用暴力，这是一开始就不可缺少的，这样的见解也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和平的合法活动发挥它本来应有的力量和作用。”^①

正是根据以上全面而严密的分析，卢森堡告诫说：“一旦社会民主党真的要像机会主义者们向它建议的那样始终拒绝使用暴力，并且使工人群众一味相信资产阶级的合法性，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议会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斗争本身迟早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且给反动派不受限制的暴力统治让出阵地。”^② 卢森堡这段精辟的话真可谓至理名言。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卢森堡的告诫是富于远见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科学箴言。

那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应该怎样夺取政权呢？卢森堡认为，必须把议会内的斗争和议会外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下面的斗争和上面的斗争结合起来，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夺取政权，完成社会革命性变革。卢森堡一直深信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者首创性和革命主动性所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在《策略问题》一文中，她指出：“真正的斗争力量，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的战斗准备，不在议会，而是在街道上。”^③ 在《社会民主党与议会主义》一文中，她进一步指出，应向无产阶级群众说明，“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活动，不要把议会斗争看做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中心。”^④ 这是最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进入议会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应采取革命的策略路线：“不仅应以反对党的身份出现，而且以革命阶级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8页。

② 同上书，第398页。

③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1卷，第290页。

④ 同上书，第325页。

代表的身份出现，换言之，由此产生的任务是：不仅从群众的现实利益的立场，即从现存社会的立场批判统治阶级的政策，而且在每一步上也应以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反对现存社会，而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理想已超越了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的范畴了。”^①卢森堡还特别提醒人们：“不要沉溺于议会中的日常琐碎问题，不要只从事政治反对派活动，而要愈来愈有力地表现出自己的‘根本倾向’——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②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卢森堡对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论俄国革命》等论著中，她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局部的策略问题。她说，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能力，即革命的远见、彻底性和敢于夺取政权的勇气。其次，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实际行动能力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意志。在革命策略方面，她认为，不是先取得议会多数然后再进行革命，而是要通过革命的策略手段去取得多数。卢森堡认为，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的致命弱点就在于缺乏“革命气节和行动能力”，才使自己的斗争累累受挫。应该说，卢森堡的这些见解和思考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1918年底，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刚出狱的卢森堡立即投身革命激流，为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发展轨道而奋战。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初期，卢森堡主张直接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和敌我力量对比的改观，卢森堡冷静而清醒地分析了形势，改变初衷，力排众议，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应该而且有必要进行议会斗争，参加国民

^①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1卷，第326页。

^② 同上书，第326—327页。

议会的选举。但是,在如何参加议会斗争问题上,卢森堡与机会主义者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她指出,机会主义者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议会里,是由于不相信革命和不愿意进行革命,幻想把国民议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阵地。革命者则应把国民议会作为革命的讲台,作为争取和教育群众,作为促进革命事业的一种手段。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处于革命之中,而国民议会则是为了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而建立的一个反革命堡垒。因此,必须攻取这个堡垒并摧毁它。为了动员群众反对国民议会,为了号召他们参加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必须利用选举和国民议会讲台。”^①卢森堡还进一步分析了参加选举和进行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和实质:“参加选举是必要的,其目的不是要和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一起炮制法令,而是要把资产阶级和它的帮凶赶出殿堂,要袭击这个反革命堡垒,要在这个堡垒上空升起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旗帜。这样做,是不是需要国民议会大多数的支持呢?只有那些议会痴呆症的崇拜者才相信需要借助于议会的多数才能解决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甚至国民议会本身的命运,也并不取决于议会中的多数,而是取决于外面,取决于工厂里和街道上的劳动群众。”^②“这个反革命议会的选举和讲台应该成为教育、团结和动员革命群众的手段,成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一个阶段。”^③但是,色厉内荏的敌人是不可能允许卢森堡将这一斗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在1919年1月起义失败后,卢森堡惨遭杀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卢森堡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论述,她的过早牺牲妨碍了她把这个具有理论和实践

① 《卢森堡文选》华沙版,第2卷,第469—470页。

② 同上书,第470页。

③ 同上书,第471页。

双重意义的重大课题的探讨进行到底,使之臻于更加完整和完美。但她的论述仍不失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份有价值的遗产,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闪耀着不灭的思想光辉!

后 记

罗莎·卢森堡这位国际共运史上传奇式历史人物的名字对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并不陌生。早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她的革命事迹传入中国后就鼓舞了成千上万青年志士前赴后继为新中国而奋斗。建国后，卢森堡的事迹载入了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教材，对她有所了解的人更多起来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除德国和苏联学者撰写的两种传记译本外，国内还没有出版过我国学者自己所著的关于她生平事业和思想理论的篇幅较大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撰写一部既有科学性、革命性又切近生活和人情的罗莎·卢森堡评传是我多年的一桩心愿。

早在50年代初刚跨入北京大学门槛的时候，我就为这位传奇式人物不同凡响的历史命运所吸引。稍后，当我就读于她的祖国波兰的华沙大学，对她有了更多了解，在学习之暇沿着她青少年时代经常漫游的、陡峭的维斯瓦河两岸散步并参观了她出生地扎莫什奇故居后，对她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此后，我便产生了更多地读她的论著和写她的事迹的强烈愿望并开始收集有关资料。正是在上述想法驱动下，归国后，在60年代初我发表的第一批论文的主题之一就是写她的革命斗争，在“而立”之年完成的第一本历史读物也是《卢森堡》（该书后于197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年动乱使我暂时中断了对卢森堡的研究，但仍心向往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春天。

我继续发表了一些有关卢森堡的学术论文，我所参加的一些国际学术活动主要也是围绕卢森堡研究这一主题的。正是在我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在借鉴和汲取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才完成《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这部书稿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局的林基洲、殷叙彝、李宗禹、周懋庸、杨威理等各位同志以及日本中央大学的伊藤成彦教授，他们在我写作此书前后给予了很多关怀、支持、帮助和鼓励。还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批准把这部书的选题列入基金项目并给予资助，才使这部书稿得以顺利完成。同时，我要感谢山西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冯子标教授对该书出版的关怀和支持。还要感谢该书责任编辑孙英春同志的真诚合作。

要写出一部既完全真实可靠又清新可读的人物传记本来就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像卢森堡这样一位身处复杂的历史环境，既有广阔的活动领域又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革命领袖型人物，要写好确是难事。我是这样想的，包括卢森堡在内的任何杰出历史人物，都是人而不是神，作为有血有肉活跃于历史舞台的领袖人物，既有名垂青史的丰功伟业，也有反映思想风貌和独特性格的生活轶事，既有非凡的才智和过人的毅力，又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也有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短处。这一切构成了他们丰满的形象和完整的人生。如果只写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斗争生涯而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思想情感避而不谈，人物的面貌会显得干瘪而苍白，也是不完整和不可取的。当然，如果连篇累牍只津津乐道于身边屑事或趣闻轶事而疏于重笔浓墨突出重大事件和理想，会使人物显得浮肿而猥琐，更是不足取的。关键在于勾勒人物形象是否疏密淡浓远影近景处理得当，如同绘画一样。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为指导，对卢森堡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理论进行了新的审视，在写作方法上，

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代发展为背景,以人物为中心,以围绕人物展开的波兰、德国、俄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线索,在严格忠实于史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全面反映人物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情感,切近生活和人情,还罗莎·卢森堡信念坚毅、意志坚韧、爱憎分明、处事果断,才情横溢,形神兼备的本来面目。为了增加可读性,书中除重要引文——注明出处和页码外,略去了繁琐的注释,同时在引用私人信件时一般只注明出处而不再注页码。

以上所谈的只是作者的主观意图或良好愿望。想法是否妥当,究竟已否达到上述要求或达到程度如何,敬祈贤明的读者和专家们指教和评论!

作者谨记

1990年11月于山西大学

附 录

罗莎·卢森堡生平年表

(1871—1919)

- 1871年** 3月5日,生于波兰东南部卢森堡省扎莫什奇县一个犹太裔波兰市民家庭。父亲艾略希曾是木材商人,母亲莉娜操持家务。双亲均有良好的文化素养。
- 1873年** 随家庭迁居华沙。
- 1874年** 因腿关节病卧床将养了一年。
- 1880年** 进入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念书。
- 1887年** 春季,加入了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领导下的青年社会主义小组,开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夏季,中学毕业。
- 1888年** 秋季,开始参加“第二无产阶级”党的革命活动。
- 1889年** 年初,在沙皇警宪追捕的威胁下,经前辈革命家马·卡斯普夏克帮助,偷越国境,转道前往瑞士。2月,来到瑞士,寄居苏黎世,参加流亡瑞士的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
- 1890年** 得到了家庭的资助,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先是攻读生物学和数学,后主攻法学和政治经济学。
- 1891年** 与列昂·约吉希斯(梯什科)结识并相爱。
- 1892年** 春季,发表第一部政治作品《迎接五月一日》。
- 1893年** 春季,和尤·马尔赫列夫斯基、阿·瓦尔斯基、列·约吉希斯共同制定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后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党纲。成为党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创办党的机关刊《工人事业》(在巴黎出版),主持该刊工作。
8月6—12日,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苏黎世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告。但代表资格被波兰社会党否决。
- 1896年** 7月27日—8月1日,参加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就波兰问题发

- 表演说。
- 8月,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文章。
- 1897年 3月,答辩并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翌年7月在莱比锡出版)
- 5月1日,获法学博士学位,结束大学学业。
- 1898年 4月19日,与古斯塔夫·吕贝克在瑞士巴塞尔办理伪婚登记,以取得德国国籍。
- 5月16日,抵达柏林定居。随后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从事革命活动。
- 9月,任《萨克森工人报》主编,后在机会主义分子压制下于11月愤而辞职。
- 9月21—28日,发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系列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伯恩斯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
- 10月3—8日,第一次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斯图加特大会。在会上多次发言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与对方展开了激烈论战。会后发表《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批评党的领导层奥·倍倍尔、卡·考茨基等人对修正主义态度暧昧。
- 1899年 2月20—26日,发表系列文章《民军和军国主义》,驳斥麦·席佩尔为军国主义张目的机会主义观点。
- 4月4—8日,发表反对伯恩斯坦的第二组系列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 4月,把批判伯恩斯坦的两组论文汇集成册,辑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出版单行本。书中指出,与伯恩斯坦的论战已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读书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 7月,发表《一个策略问题》,反对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并对资产阶级政府和议会政治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米勒兰主义的文章。
- 9月,发表系列文章《致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指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一种堕落的理论”,在工人群众集会上要求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

10月9—14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多次登台发言，着重批判“资本主义正在全面社会主义化”的谰言，指出“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的最大敌人是它自己的幻想”。

秋季，前往德国统治下的波兰西部地区的沃波累市，与从华沙来的父亲会晤。这是流亡国外以来父女第一次相聚，也是最后一次会面。

12月，赴上西里西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年底到翌年年初，发表许多文章，分析了帝国主义形成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现象和特征，谴责了帝国主义对亚洲和中国的侵略行径。

1900年 7—8月在波兹南地区进行宣传鼓动活动。

9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组织八国联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指出德国远征军执行的是“匈奴人的文化使命”。

9月17—21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国兹代表大会，在发言中批评了党的执委会在谴责政府出兵中国问题上的软弱态度，主张唤起和动员群众，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9月23—27日，出席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作《人类和平、军国主义和常备军》的报告，阐明了军国主义、现代战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指出国际工人阶级应采取一致政治行动反对军国主义、殖民政策。

12月，发表《保卫民族性》一书，捍卫德统区波兰人民的民族权益，反对“日耳曼化”，从而导至以“侮辱”了普鲁士教育部长的罪名受到法庭指控，经审理，以罚款结案。

1901年 5月，在慕尼黑第一次会见列宁。

9月22—28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会上，伯恩斯坦分子李·费舍尔等人对卢森堡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卢森堡向大会提出了抗议声明，但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上刊登。

1902年 2月在波兹南、上西里西亚、萨克森等地区从事宣传运动。

4月初，与梅林一起主持《莱比锡人民报》政治部。6月，在机会主义分子排挤下离开了该报编辑部。

4月，多次撰文总结比利时工人总罢工的经验，反对只把斗争局限于议会政治的机会主义观点，主张运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手段，尤其是政治性总罢工。

9月14—20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慕尼黑代表大会。出于排挤左

派的动机,大会主席团不允许她就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发言,只允许她谈德统区的波兰工人运动。

该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社会民主评论》创刊,卢森堡是该刊的首要合作者和撰稿人。

1903年 年初,发表《纪念无产阶级党》,总结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

4月4日,与古斯塔夫·吕贝克正式解除伪婚。

9月14—20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德累斯顿大会。大会主席团屈从于修正主义者的压力,拒绝了她就党的策略问题发言,只允许她谈德统区的波兰工人运动问题。在革命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决议,坚决谴责修正主义者关于使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变成向现存制度妥协的政党的企图。但是,一项由卢森堡等人支持的,要求在下届党代会上讨论总罢工问题的提案遭到了大会的否决。

10月,发表《破灭了的希望》,从剖析资产阶级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和意图入手,论证了排除资产阶级的思想渗透和腐蚀,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引向深入的必要性。

1904年 1月,由于一次反对军国主义的讲演,被加上了“亵渎”德皇威廉二世的罪名,判处三个月监禁。

2月4日,作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的代表,出席第二国际“国际局”的布鲁塞尔会议,就波兰问题发言。

春季,当选为第二国际通讯联络机构社会党“国际局”成员。

7月,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与列宁在组织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论争。

8月14—20日,以波兰和德国两党的双重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多次发言阐述了国际社会党人在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应采取的原则立场。

8月26日,在德国首次入狱,关押在萨克森的威茨考“国家监狱”

10月25日,因萨克森新国王登基而提前获释出狱。年底至翌年初发表连载文章《我们需要什么?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1905年 从俄国革命一开始,就追踪革命事态的发展,在报刊上和讲演中报道、评论俄国革命,不倦地宣传俄国革命的意义和经验,呼吁德国工人支持俄国和波兰的革命运动。

4月，撰写了波兰党的纲领性文献《下一步怎么办？》（又名《我们想要什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纲领解说》，初刊于《红旗》，经增补后以《红旗》增刊形式出版，最后于1906年出版了单行本。夏季，编纂出版论文集《波兰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并撰写了长篇序言。

9月17—23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就俄国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党和工会的关系，尤其是总罢工问题发言，批判机会主义观点。

秋季，多次接见列宁派来的使者，商谈波、俄两党合作事宜。

11月起参加德国社会民主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部工作并任固定撰稿人。

12月，赶上西里西亚进行宣传活动。

年底，在克拉科夫出版了她的论文集《沙皇俄国境内的革命发动》，12月28日，乘火车离开了柏林，赴波兰参加和领导革命运动。这次返国她假借同事马卡奇的名字领出国护照并得到俄国领事馆的入境签证，以《前进报》记者身份去的。

12月30日，抵达华沙。

1906年 1月，发表《达辛斯基先生的“公开信”，评波兰社会党处于十字路口》，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路线。

3月4日，与约吉希斯同时被沙皇当局逮捕和入狱。

4月11日移囚华沙要塞监狱。在狱中开始写《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一书。

7月8日，在交纳了巨额保证金后，以就医名义假释出狱。

8月1日，潜离华沙至彼得堡。在该处与列宁第二次会晤。

8月初至9月11日，避居于芬兰的库沃克卡拉，与列宁多次晤谈。完成《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俄国革命经验。该书于当年在汉堡出版。

9月11日，离开芬兰返回德国，16日抵达柏林。

9月23—26日，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就德国工人运动应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关系问题两次发言。这次党代会表明，德国党内左中右三派逐步形成。卢森堡是左派的杰出代表。

11月14日，俄国沙皇政府的华沙军事法庭缺席控告卢森堡犯了“叛

国罪”并发出了通缉令。

12月中旬，德国魏玛市“国家法庭”控告卢森堡“煽动暴动”、“危害国家安全”，判处她两个月徒刑。

1907年 4月，与列宁在柏林再次会晤。

5月初，以德国和波兰两党的双重代表身份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祝辞和发言中支持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6月12日至8月12日，上年12月判决生效，被囚于魏玛市“国家监狱”。这是她在德国的第二次坐牢。

8月18—24日，以波兰和德国两党的双重代表身份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批驳了机会主义观点，与列宁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正并获大会通过，向世界革命人民指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道路。在会上，与列宁紧密合作，团结左派，使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做得了重大胜利。

10月，从此时开始直到1914年夏，在德国民主社会党的党校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以后又增授社会主义史。正是在讲课基础上，开始写《国民经济学入门》这部著作。

1908年 1月初，接待了到柏林作短暂访问的列宁夫妇。

春季，发表《致饶勒斯的公开信》，驳斥了他美化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背叛性言论。

春夏之交，随着考茨基中派主义立场伪善面目的逐步暴露和论战的迭起，与考茨基的思想鸿沟加深，关系日益疏远。

9月13—19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纽伦堡代表大会，就党校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干部群众进行理论教育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击退了右派提出的取消党校的主张，维护了左派在理论教育方面的阵地。

年底到翌年初，陆续发表《民族问题与自治》一书的部分章节，在民族问题上发生了与列宁的第二次论争。

1909年 9月12—18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

1910年 3月中旬，发表《下一步怎么办》，探讨了在德国政治危机激化的情况下党的斗争策略，要求用政治性罢工对付反动派的进攻，要求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水平提高一步。

3月下旬，针对德国反动统治的加强，发表《播种季节》，要求加紧宣

行发动群众的启蒙教育,展开争取各种民主权利的斗争。

4月,旅行德国各地,就争取民主的选举权和总罢工问题在群众集会上发表巡回讲演。

5月27日和6月3日,针对考茨基的文章《现在怎么办?》,分两次发表了长篇论文《疲劳战略还是斗争?》,批驳了考茨基提出的只有通过议会斗争使敌人逐渐“疲劳”才有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所谓“疲劳战略”。她指出,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观点。她认为,应把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这两种斗争形式存在着辩证的统一性。

随着论战的激化和分歧的加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中、右三派的分野日益明朗化。考茨基成了中派的理论领袖。卢森堡与考茨基彻底决裂。她是左派的旗手和理论领袖。

夏季,卢森堡再次旅行德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宣传革命观点以争取和教育工人群众。

8月28日至9月3日,再次以波兰党和德国党的双重代表身份出席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继续和列宁合作,团结左派,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合作社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等重大问题上,使大会通过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正确决议。

经过多次重大国际斗争的锤炼,卢森堡成为第二国际左派的优秀代表。

9月18—24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在右派和中派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卢森堡的代表资格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在左派的努力下,她的代表资格最后以微弱多数票得到确认。卢森堡就党的国会竞选政策和议会斗争策略问题严厉批评了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

1911年 年初,由于上年10月在斯图加特群众集会上揭露了政府镇压工人的暴行,以“侮辱”德皇威廉二世的嫌疑罪受到了斯图加特法院的传讯和预审。

春夏之交,就如何对待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摩洛哥问题,与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

夏秋之际,德国各地的工人群众掀起了一场反对德国政府在与法国争夺摩洛哥问题上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群众运动。卢森堡旅行各地,深入群众,号召以革命行动对抗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还在报

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党的领导层在摩洛哥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9月10—16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严厉批评了党的执委会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反扑，以她在摩洛哥问题上擅自表态违背党纪为名，要求给予党纪处分。在左派反击下，这一阴谋未能得逞。由于右派和中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德国社会民主党加速转变为改良主义党。

9月23—24日，社会党国际局在苏黎世举行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卢森堡再次抨击了德国党首领的机会主义立场。列宁表态支持卢森堡。

10月7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卢森堡猛烈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掠夺政策，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要求国际工人阶级加强斗争，消灭战争危险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前后，卢森堡旅行各地，深入工人群众，宣传反帝反殖的革命观点。

12月19日，在柏林第一选区的竞选集会上，卢森堡热情地赞颂了中国在1911年10月发生的辛亥革命。

1912年 1月，数度与来到柏林的列宁会晤，商谈俄国党内事务。列宁希望卢森堡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决裂。但卢森堡不理解布尔什维克独立建党的重大意义，会晤未能取得一致认识。

同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议上，作出了开除孟什维克出党的决定。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最始独立建党。卢森堡撰文表示希望保持俄国党的团结，反对分裂。

在社会党国际局于1912年11月召开的苏黎世会议上和1913年12月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卢森堡仍持上述不正确立场。卢森堡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受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但这并未影响卢森堡与列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和并肩战斗。

2月初，发表《现在怎么办？》，主张在争取选举权斗争取得一定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前进，在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把革命运动推进一步。

10月，卢森堡接受社会党国际局的委托，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委员会，主持起草和发展了《巴尔干战争问题宣言》，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严正立场。

11月24—25日，出席国际社会党人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在列

宁、卢森堡和各国党的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重申了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两次代表大会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国际对当前局势的宣言》，号召各国人民团结一致，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1913年 1月中旬，出版了卢森堡最主要的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该书有一个副标题《从经济上阐释帝国主义》，说明作者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这部书是研究帝国主义的开拓性著作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长远价值，尽管作者提出的一些论点是有争议的。

在该年上半年发表的一系列政论中，卢森堡严厉批评了党的领导层逃避革命斗争和直接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立场。

7月下旬，发表连载长篇政论《帝国国会党团和军事法案》，严厉批判了党的国会党团支持军事法案的背叛性行动，指出这是与党的纲领原则相违背的。

9月14—20日，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卢森堡等左派提出两项提案，一是要求发动群众斗争和政治性罢工，要求“党在一切领域采取进攻的、果断的、坚决的策略”；二是拒绝赞同党的国会党团支持军事法案的错误作法。但这两项提案都被机会主义多数派所否决。卢森堡高瞻远瞩地警告说，如此发展下去，一旦战争爆发，就会导致党的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拨款。

9月26日，在法兰克福附近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坚持了世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国际主义立场，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

9月下旬，发表《半官方的理论》，系统地批驳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观点，着重批驳了他的“唯议会主义”、诽谤政治性群众罢工以及轻视群众革命首创精神和战斗力的观点。

10—11月，卢森堡、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与党的出版委员会发生激烈冲突，在考茨基等人的策动下，三人被排挤出《莱比锡人民报》和《新时代》编辑部，中派夺占了左派的主要舆论宣传阵地，这是左派遭到的一个重大挫折。

12月下旬，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梅林一起创办革命喉舌《社会民主党通讯》，这是左派首次独立出版的刊物。

1914年 2月20日，国家法院第二刑事庭在法兰克福市开庭审讯卢森堡，借

口上年9月卢森堡在该市一次群众集会的讲演中进行“反战鼓动”、“危害国家安全”、犯了“叛国罪”。卢森堡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地为自己辩护，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她的辩护词以《军国主义、战争和工人阶级》公诸报端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庭悍然宣布判处她一年徒刑，因健康原因缓期执行。

2—3月，德国各地工人群众掀起了抗议迫害卢森堡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反战运动。卢森堡旅行各地，进行反帝反战宣传并揭露了军队黑幕和对士兵进行的种种虐待。

4月底，发表《五一节二十五周年》，以高昂的革命激情鼓励国际工人阶级和德国工人群众以五一节精神推进革命事业。德国一共有35家报刊转载此文，反响极大。

5月，由普鲁士战争部长冯·弗尔肯海恩将军亲自出面，“控告”卢森堡“侮辱德国军队的全体军官、军士和士兵”。

6月29日至7月4日，由“国家首席检察官”萨莱格曼博上亲自出马，在柏林制造了一出“审判”卢森堡的新的丑剧。卢森堡在法庭上揭露了军队中发生的丑行，斥责反动当局是真正的战争罪犯，彻底批驳了敌人的诬告。上千名群众自愿报名为卢森堡公开作证。狼狽不堪的敌人不得不宣布无限期地“延期”审判。

7月28—29日，出席社会党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卢森堡在发言中号召国际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她还要求警惕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日益增长的社会沙文主义情绪。

8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案。党主席胡·哈阿兹还宣读了一项背叛性声明，声称要“保卫祖国”。赞同军事拨款和声明宣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同谋。当晚，卢森堡在寓所和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威廉·皮克以及海·敦克尔夫妇、胡·埃贝兹因、恩·迈耶尔等人商讨对策。卢森堡承担了组织左派力量的重任，迅即向全国各地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拍发了300份电报。会后决定筹建左派组织和出版刊物。

10月，以柏林为中心，在全国许多城市开始出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左派小组，卢森堡是其组织者之一。

10月30日,在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哨兵报》上刊出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四人在9月10日发表的声明,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则。秋冬之际,组织力量在全国各地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人群众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的活动,出版秘密传单和小册子。

10月20日,帝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卢森堡的上诉,维持该年2月判她一年徒刑的原判决。

12月反动政府拟将卢森堡拘捕入狱,因患病获准推迟服刑。

1915年 2月18日,反动政府突然拘捕正在患病中的卢森堡,将她囚禁于柏林市的巴尔尼姆“皇家”女狱。此举激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抗议浪潮。4月14日,卢森堡和梅林主持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月刊》问世。上面刊出了卢森堡执笔的《国际的重建》。在该文中,她严厉斥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也批判了考茨基的中派主义,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经验,要求按革命的原则重建国际。从此,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德国左派被称为国际派。

春夏之交,在狱中完成了《资本积累论》的续篇《资本积累——反批判》一书,同年出版。

1916年 1月1日,在身陷囹圄的卢森堡的建议下,国际派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左派全国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卢森堡在狱中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纲》,经修改后作为国际派的行动纲领。会议还决定出版地下报刊《斯巴达克书信》。此后,德国的左派就称为斯巴达克派。卢森堡是斯巴达克派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和理论领袖。

2月18日,刑期届满一年的卢森堡出狱,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3月19日,在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发起下,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基本上完成了斯巴达克派的组建工作,并为组织和领导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

4月,卢森堡1915年4月在狱中撰写的名著《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又名《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在瑞士苏黎世出版。该书不仅谴责了社会民主党首领的背叛行为,驳斥了“保卫祖国”的无耻谎言,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实质。在书的附录里,还刊印了卢森堡草拟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纲》。该书出

版后受到了国际革命左派的普遍重视和好评。

5月1日，斯巴达克派发动和组织了柏林和各国各大城市、地区的工人集会和示威游行。卢森堡组织和参加了在柏林的示威游行。卡·李卜克内西当场被捕。

5月，针对大卫攻击李卜克内西，说是“大声叫的狗是不咬人的”一语，写了广泛流传的《狗政治》传单，深刻揭露和痛斥了大卫等人的叛徒嘴脸。

5—7月，卢森堡到各地参加群众的抗议集会，发表讲演，起草传单，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和平”的革命宣传。反动当局把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最有能量的煽动家”。

6月初，因写了“煽动性传单”而受到短期拘留。警探暗中对她进行监视和盯梢。

7月10日，反动政府以“预防性监禁”的名义，将卢森堡逮捕入狱，从此开始了她长达两年零四个月的囚徒生涯。初囚于柏林的巴尔尼姆女狱，后又作为“要犯”监禁于警察总局监狱，10月底又移囚于德属波兰地区波兹南省的弗龙克要塞监狱。

在狱中卢森堡经常秘密地为《斯巴达克书信》和《斗争》撰稿，还从事著译工作。

1917年 初春，在狱中热烈欢迎俄国二月革命。4月，中派另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决定加入该党，但仍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狱中的卢森堡对该党持警惕态度，但认可参加该党以争取群众。

7月，最终被转移到德国东部的布勒斯劳市（现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的监狱服刑。

11月，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密切关注革命进程。

1918年 2月，《斯巴达克书信》刊出了卢森堡撰写的社论《历史的责任》，对德苏谈判媾和的前景表示忧虑。夏季，在狱中完成了把波裔俄国作家柯罗连柯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译成德文的工作并写了长篇序言。该书于该年底在柏林出版。

9月，在《斯巴达克书信》上发表了写于春季的《俄国的悲剧》，评论布列斯特和约可能给俄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及其解救办法。

9月，着手写一部总结性地评论俄国革命的著作，这就是后来收入

全集时定名为《论俄国革命》的著名手稿，直至11月初出狱时尚未最后定稿。

11月初，德国爆发革命。

11月9日，起义者打开了布勒斯劳监狱，卢森堡获得了自由。她在市政府的阳台上向欢呼的工人群众发表讲话，号召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11月10日傍晚，抵达柏林。

11月11日，和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皮克等人一起，主持召开斯巴达克派全国会议，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成立了自己的中央领导机构，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卢森堡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李卜克内西一起主编新创刊的《红旗报》。11月18日，发表纲领性的《开始》，给工人阶级的斗争指出了具体目标和前进方向：推翻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苏维埃。

11月20日，发表《国民会议》，她指出，苏维埃政权还是国民会议是识别当前革命性质的标志，艾伯特—谢德曼政府企图用议会民主形式保存旧制度、扼杀革命。为此，必须推翻这个政府，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轨道。

12月，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除几次发动武装暴乱外，还恶毒攻击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斯巴达克同盟及其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镇压革命运动做舆论准备。

12月14—24日，《红旗报》连载了由卢森堡执笔的纲领性文献《“斯巴达克同盟”要求什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回答了德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个纲领就是后来德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党纲的基本内容。

1919年 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建党大会。卢森堡是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状况》的报告。

1月初，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进一步采取挑衅行动并转入全线进攻，调集大批反动军队冲入柏林。德国共产党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大柏林地区革命工长会议共同行动，发动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1月6日，柏林工人发动总罢工并转为武装起义。

1月7—10日，在《红旗报》上连日发表文章《领袖们在做什么？》、《玩忽职守》、《领袖失灵》等，号召警惕和击败艾伯特—谢德曼政

府扼杀革命的罪恶图谋，不要相信独立社会民主首领与政府的谈判，要行动起来，占领一切权力阵地，推翻反动政府。

1月12日，诺斯克统率的反革命军队占领柏林全城，一月起义被镇压。

1月13日，在《红旗报》发表《纸糊的小屋》，嘲笑反动派的胜利和统治是纸糊的小屋，终究要坍塌。1月14日，在《红旗报》发表《柏林秩序井然》，愤怒谴责伙同资产阶级绞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叛徒，指出反革命建立的“秩序”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革命是永存的，革命必将通过失败和胜利的一系列环节走向自己的伟大目标。此文是卢森堡的最后手笔。1月15日夜晚，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和惨遭杀害。她的遗体被投入护城河。

5月31日，遗体被发现。

6月13日，遗体安葬于柏林市的弗里德里希墓地。

主要参考文献

一、原著

Gesammelte Werke, edited by Clara Zetkin and Adolf Warski,
editor-in-chief Paul Frölich, Vols I, IV, VI, Berlin 1923—
1928

《文集》，克·蔡特金、阿·瓦爾斯基以及保·弗勒利希編輯，第3、
4、6卷，1923—1928 柏林德文版

Gesammelte Werke, edited by the Marxism—Leninism-Institu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5 Vols, Berlin (East)
1970—1975

《文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馬列研究院編輯，5卷本，1970—1975年
東柏林德文版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edited by the Marx-Engels-
Lenin-Institu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2 Vols,
Berlin (East) 1951

《演講論文選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兩
卷本，1951年 東柏林德文版

Politische Schrifte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Ossip. K. Flecht-
heim,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6, 1968

《政治論文集》，奧·克·弗萊希特海姆編輯，3卷本，1966、1968年
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德文版

Róża Luksemburg, Wybor pism, I, II, Warszawa 1959

《盧森堡文選》，兩卷本，1959年華沙波蘭文版

《盧森堡文選》，上、下卷，1984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盧森堡專輯》，1981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資本積累論》，1959年三聯書店中文版

- 《国民经济学入门》，1962年三联书店中文版
《资本的积累——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
《卢森堡论文学》，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文版

二、书信

Briefe aus dem Gefängnis, Berlin 1920 letzter Neudruck Berlin 1979

《狱中书简》，1920年柏林德文版1979年柏林增订新版；1955年作家出版社中文版

Briefe an Karl und Luise Kautsky 1896—1918, Berlin 1923

《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书信(1896—1918)》1923年柏林德文版

Briefe an Freunde, Hamburg 1950, Köln/Frankfurt a.M. 1976

《致友人书信》，1950年汉堡德文版，1976年科伦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新版

Listy do Leona Jogichesa-Tyszki, (3 Vol.) Warszawa 1968—1971

《致列昂·约考希斯—梯什科的书信》(3卷集)1968—1971年华沙波兰文版

Briefe an Mathilde Jacob (1913—1918), Tokio 1972, Bonn 1980

《致玛蒂尔达·雅科布的书信(1913—1918)》

1972年东京和1980年波恩德文版

Briefe und Dokumente aus den Jahren 1915—1918, Frankfurt a. M. 1973

《1915—1918年狱中书信和文件》，197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Ich umarme Sie in großer Sehnsucht, Briefe aus dem Gefängnis 1915 bis 1918, Berlin Bonn 1984

《我在渴念中拥抱你们：1915—1918年狱中书简》1984年柏林和波恩德文版

三、参考著作

Karl Kautsky, Rosa Luxemburg, Karl Liebknecht und Leon Jogiches, Berlin 1921

- 卡·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列昂·约吉希斯》，
1921年柏林德文版
- Karl Radek, Rosa Luxemburg, Karl Liebknecht, Leon Jogieches,
Hamburg 1921, 1969
- 卡·拉狄克《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列昂·约吉希斯》，
1921、1969年汉堡德文版
- Adorf Warski: Rosa Luxemburg Stellung zu den taktischen Prob-
lemen der Revolution, Hamburg 1922
- 阿·瓦尔斯基：《罗莎·卢森堡对革命策略问题的态度》，1922年汉堡
德文版
- Clara Zetkin: Um Rosa Luxemburgs Stellung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Hamburg 1922
- 克·蔡特金：《关于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1922年汉堡德
文版
- Luise Kautsky: Rosa Luxemburg. Ein Gdenkhuch, Berlin 1929
- 露·考茨基《罗莎·卢森堡。一本纪念册》，1929年柏林德文版
- Roland Holst: Rosa Luxemburg. Ihr Leben und Wirken, Zürich
1937
- 罗·霍尔斯特《罗莎·卢森堡。她的生平和事业》，1937年苏黎世德文版
- Paul Frölich: Rosa Luxemburg. Gedanke und Tat, Paris 1939
Frankfurt a. M. 1973
- 保·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1939年巴黎和1973年美
国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1940年英文版
- Fred Oelßner: Rosa Luxemburg, Eine Kritische biographische
Skizze, Berlin 1951
- 弗·厄斯纳《卢森堡评传》，1951年柏林德文版，1964年三联书店中文
版
- Jodwiga Kaczanowska Feliks Tych: Bibliographia piernodruków
Rózy Luksemburg, in: Z pola walki, 1962, Warszawa
- 雅·卡恰诺夫斯卡、弗·蒂赫《罗莎·卢森堡初版文献研究》，载《来自
战场》，1962年华沙波兰文版
- John Peter Nettl: Rosa Luxemburg (2 Volumes) Lodon,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66
- 彼·奈特尔《罗莎·卢森堡》(两卷本) 1966年伦敦英文版; 1968年科伦、西柏林德文版; 1972年巴黎法文版
- Der Mord am 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 Dokumentation eines politischen Verbrechens, Frankfurt a. M. 1967
- 《对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谋杀案。一件政治罪行的有关文献》, 196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Lelio Basso: Rosa Luxemburg—Dialektik der Revolution, Frankfurt a. M. 1969
- 莱·巴索《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译自意大利文), 196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Tony Cliff: Studie über Rosa Luxemburg, Frankfurt a. M. 1969
- 托·克利夫《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 196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Erna Herbig: Karl Liebknecht—Rosa Luxemburg, Zum 100. Geburtstag. Anschauungsmaterial, Berlin 1971
- 埃·赫尔伯格《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100周年诞辰》, 1971年柏林德文版
- Karl und Rosa, Erinnerungen. Zum 100. Geburtstag Von Karl Liebknecht und Rosa Luxemburg, Frankfurt a. M. 1971
- 《卡尔和罗莎。回忆录。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百周年诞辰》, 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Jacek Ossovski: Rosa Luxemburg, Eine Streitschrift Frankfurt a. M. 1971
- 雅·奥索夫斯基《罗莎·卢森堡。论争集》, 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Giselher Schmidt, Spartakus, 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 Frankfurt a. M. 1971
- 吉·施密特《斯巴达克,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Tadeusz Kowalik: Róża Luksemburg. Teoria akumulacji imperializmu, Wrocław 1971

- 塔·科瓦夫斯基《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积累的理论》1971年弗洛茨瓦夫波兰文版
- Annalies Laschitza Günther Radczun: Rosa Luxemburg, Ihr Wirken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1971
- 安·拉席察君·拉聪《罗莎·卢森堡。她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1971年柏林德文版
- Jan Dziewulski: Wokół poglądów ekonomicznych Róży Luksemburg, Warszawa 1972
- 杨·齐武尔斯基《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经济观点》，1972年华沙波兰文版
- 程人乾《卢森堡》1972年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 Kongres über Rosa Luxemburg, in Regio Emilia, Organisiert vom Instituto per lo studio dell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Sept 1973, Frankfurt a.M. 1974
- 《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艾米利亚会议纪要》，197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Georg Waldemer Strobel: Die Partei Rosa Luxemburgs, Lenin und die SPD, Wiesbaden, 1974
- 格·施特罗贝尔《罗莎·卢森堡的党。列宁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974年威斯巴登德文版
- Lelio Basso: Rosa Luxemburg, a reappraisal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New York 1975
- 莱·巴索《重评罗莎·卢森堡》(译自意大利文)，1975年纽约英文版
- G. Badia: Rosa Luxemburg, journaliste, polémist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1975
- 格·巴第《罗莎·卢森堡：记者、政论家、革命家》，1975年巴黎法文版
- Jürgen Hentze: Nationalismus und Internationalismus bei Rosa Luxemburg, Bonn, Frankfurt a. M. 1975
- 尤·亨策《罗莎·卢森堡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1975年波恩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 Ronald Florence: Marx's daughters, Eleanor Marx, Rosa Luxemburg, Angelica Balabanoff, New York 1975

- 罗·弗洛伦斯《马克思的女儿们：爱琳娜·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吉莉卡·巴拉班奥芙》，1975年纽约英文版
- 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1976
- 诺·吉拉斯《罗莎·卢森堡的遗产》，1976年纽约英文版
- Frederik Hetman: *Rosa Luxemburg. Die Geschichte der Rosa Luxemburg und ihrer Zeit*, Weinheim, Basel 1976
- 弗·赫特曼《罗莎·卢森堡和她的时代的历史》，1978年魏因海姆和巴塞尔德文版
- Aleksander Kochanski: *Róża Luksemburg*, Warszawa 1976
- 阿·科哈斯基《罗莎·卢森堡传》，1976年华沙波兰文版
- Bernhard von Mutius: *Die Rosa Luxemburg-Legende* Frankfurt a. M. 1978
- 伯·冯·穆蒂乌斯《罗莎·卢森堡传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德文版
- 罗·叶夫泽罗夫 英·亚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1983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